

革命与反革命

# 革命与反革命

分共以後……………汪精衛

武漢分共之經過……………汪精衛



革命與反革命

## 現今革命之意義（一）

李石曾

△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之共同點：打倒馬克思派共產主義

△世界革命：蒲魯東主義打倒馬克思主義

△中國革命：三民主義打倒偽共產主義

革命乃人羣演進之自然，而相與始終，無時或息，其常而久之也，則曰進化。其變而驟也，則曰革命。是二者，互爲表裏，不可須臾離。故言人羣之革命者，亦必考人羣之進化。今爲是篇，言『現今之革命』亦猶言『現今之進化』也。

進化云者，普遍於事事物物。然近代進化名詞，則多應用於生物，而直接間接與人生關聯者，均無非其一端。故欲明革命之確狀，不可不先明生物進化之確狀。生物進化之示吾人者有種種：如由簡單而至於繁複；由較劣而至於較善；如形態之層序相承而不爽；皆其例也。此不僅實現於生物與人羣之進化，並見於革命者也。

生物之演進，由最簡而至於最繁。換言之，即由最幼稚之生物，而至於人類；乃經過重疊相承之形態。如蟲也，魚也，鳥也，獸也，皆進化之層序。人爲最高層之生物，而其至於此者，亦經過今昔之多層。換言之，即蟲魚鳥獸等其遠祖，此舉人類而言之也。人之個體進化，亦有類於此者。如人自胚胎之始，進而至於完成，其於十個月之期間，亦經過類於蟲魚鳥獸層層之狀態。此生物進化公例顯明之一端，人羣之進化或革命，亦有類於此者。

前已言之由簡單而至於繁複，由較劣而至於較善，形態之層疊相承而不爽，乃進化中生物與人羣共同之表現也。今以革命言之亦若是。以廣義革命言之，猶人類之進化。以中國革命言之，猶人之個體進化。人類之進化爲期長。人之個體進化（即胚胎中之演進）爲期短。然其簡繁精粗，與層序繼承，固相似也，革命亦然。

世界人類革命之演進，迄今數千年，亦可謂由簡至繁而愈精，層序繼承而不爽，與生物無異。茲列革命之性質與層序如左：

第一層 君主革命，或宮庭革命，或專政革命。（蘇俄專政亦第一層序中之一狀態）

第二層 民權革命，或國家革命，或政治革命。（民族革命亦第二層序中之一狀態）

第三層 階級革命，或財產革命，或經濟革命。

第四層 民生革命，或社會革命，或大同革命。

世界歷史中之人羣革命有種種朝代之更替，如湯武革命等，皆屬於第一層序；制度之改變，如法美及吾國辛亥等民權革命，皆屬於第二層序；階級鬥爭，如列寧試行馬克思主義之蘇俄革命。屬於第三層序；世界大同，如蒲魯東先生意中新世紀革命，孫中山先生意中之民生革命，皆屬於第四層序。

中國自辛亥以迄於今之十六年中，所經層序，亦與幾千年革命之層序相似。戊戌變法，帝后之爭，屬於第一層序；辛亥改元，三覆帝制，皆屬於第二層序；武漢政府進行俄化，屬於第三層序；上海護黨運動（附注）之擁護全民革命、發展民生主義，屬於第四層序。

以上所謂層序，其性質自未必至純。往往有此層而亦兼及他層之性質者。惟斷謂某層，蓋以某種性質為主，而其他附之。即如君主革命，亦未必不參雜政治經濟問題於其間，而究

以君權爲主要之性質。蘇俄革命爲第三層序，然亦兼專政與民權兩性質，其主要之點究爲階級爭鬥。國民黨之第二第四層序之革命，包含民族民權民生三項。第二層序，自重在前者兼及第三者。至第四層序，雖仍繼續前二者，而終將以全民之民生主義，或大同主義爲究竟。以上所言之層序，乃以科學之觀察，明進化之趨向，亦可謂由簡至繁而愈精，層序繼承而不爽。至其層序有一現旋滅者，亦乃生物之常態。人之個體進化中，尤爲通例。如於胚胎期中，雖現其較人幼稚之狀態而不固其形，至最後之成形則人也。

由以上之觀察言之，有可論斷者二

一 武漢之俄化政府，非中國革命演進中最優最新之層序，而乃諸層序中過渡之一，如鳥獸之狀態，一現於人之胎中也。

二 現在上海護黨運動注重民生之全民革命，乃較優較新之革命，乃將繼武漢而更替之者。如胎中之人形，繼鳥獸之狀而成也。

由以上之觀察與論斷，可略明革命之演進，與中國革命之趨勢。得此以爲標準，庶吾人

從事於革命者，可知正軌之所向矣。雖然，一二年來，中國革命潮流中，有左右派之聲，洋洋乎盈耳。今次革命之先後，爭辯自必愈多，不可無一言以及之。

近一二年來之所謂左右，其真實之性質，頗有待於考證者。因其所謂左右，非順乎自然之演進而成，乃由蘇俄之利用與製造而成，故不能以道途傳播之聲，為確定之性質。因蘇俄政府欲傾覆國民黨而代之以共產黨，故一面利用左右之稱以為毀譽勸誡；即一面以此為排擠非共產部份國民黨之工具。故恆失真實之意義。此中詳證，當另有論列，今不過舉例言之耳。

蘇俄式之共產革命，絕非世界革命，史中最進化之層序，由前表已可略見。更者重要之補充，則為蒲魯東 Proudhon 馬克思 Marx 主義之異同是也。蘇俄式之共產革命，乃由馬克思學派演進而來。故以『階級鬥爭』，『無產專政』，『政府主義』，『集權主義』，奪取政權等（附注二）為主義為方法。至蒲派則以『全民主義或大同主義』，『互助主義』，無政府主義，『地方主義』，『分權主義』，『社會組合』等（附注三）為主義為方法者也。馬派主張階級專政之

國家，完全統治於政府強權之下。蒲派主張全民之自由工作，而收政府之性質減縮於最低限度。蒲馬二家在革命哲理與革命史中，顯然為兩大不同之派別之層序。若定為優而新者為左，劣而舊者為右，則蒲派必定屬於左，而馬派必屬於右，彰彰明也。

吾謂武漢之共產運動為第三層革命，上海之護黨運動為第四層革命。二者相較，其性質固極明顯。若以左右為優劣新舊之代名，則武漢之共產革命為右派，上海護黨革命為左派，亦彰彰明也。

雖然，吾非謂上海之第四層革命即為蒲派革命。中國之第四層革命，乃應環境需求內容繁複之全民革命；乃三民主義趨重民生時期之革命，如前所云。而非較為單純之蒲派革命，固不必附會。但其與蒲派革命，有間接而重要之關係，亦無可諱言，申述之如左：

一 層序之關係 世界革命中，馬派之階級革命為第三層序；蒲派之全民革命，為第四層序。中國革命中，武漢之共產革命為第三層序；上海之護黨革命為第四層序。此世界之蒲派革命，與現在中國第四層革命，有層序相似之關係也。

二 性質之關係 國民黨之革命，乃全民革命，而非階級奮鬥；乃以民族民權為開始之方法，而以全民生為究竟之目的。就國民黨之歷史觀之，可知其具有寬大容納之性質，亦即尊重自由之表現。蒲派於全民革命民生主義相近之外，雖主張極端自由，遠過於國民黨，然二者可互相容納。其性質，雖有異點，而至少可以并存，且無抵觸與壟斷。絕不似馬派共產黨之專橫嚴酷，此性質相近之點也。

抑吾又有進者，則人羣之進化與革命，皆與其環境有密切之關係，亦如生物之演進。是故發現於東方者，與發現於西方者，各有不同，而不能強為移植。即移植之，亦須經過若干時期之後，仍必變化，以適應其環境。夫馬蒲兩層革命之方式，發現於歐西，應環境時代而成也。三民主義之發現於吾國，亦應環境與時代而成也。故適用三民主義之處，非能隨意而代之以其他主義，然三民主義發現較晚，故於各種現象及諸家學說，亦多所包舉，以適用於環境與時代之需求，而達此方民族適當之進展。

三民主義發現於環境廣大而繁複之中國，故其內容亦必廣大繁複，而後能適合於所在之



環境。三民主義，固包容種種革命性質於一。隨其所宜而爲適當之應用。

如當滿清與各國帝國主義方盛之時，自必注重民族主義。卽現今應付蘇俄變象之帝國主義，亦此種革命任務之一端。至民族民權主義時代之要求，俟其條件既有更易，而民生主義能爲充分致力之時，則必於此點特爲趨重。且所謂民生亦非一端，而各有因時制宜之需要。由此言之，是三民主義，若能運用適宜，且隨時演進，固能長久適用於中國政治而有餘，殊無須代之以其他主義，如蘇俄共產主義者。其他種種主義，足以供三民主義之參考取資者固多，但其廣大繁複之範圍，可以伸縮自如，適應環境與時代者，尙無能及之。此乃自然現象，非欲株守一家之言，而有所偏好也。

國民黨與三民主義，對於世界革命之學說，有如此之寬容。對於中國革命之實施，有如此之適用於環境。既得此觀察之結果，而後有護黨運動中第四層序革命之信心。既有此信心故吾人願奮勇當先，以與反動派第三層序之革命決戰，必求破除之而後已。此卽現今中國革命之意義也。

總之，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雖以環境不同而大異，然有一共同之點，即同爲反對馬派是也。關於世莽革命之歐西，馬克思列寧式之革命，與馬之第三國際，皆變象而加重之專治政體，變象而加重之帝國主義，實爲反革命派之尤者，必將代以蒲魯東派自由互助之革命。且蒲派之潛勢力，已有積極而普遍之進行矣。關於中國革命之實施，俄化亦爲反革命派之動作，吾人必將光復三民主義而代之。中國與歐西均各爲世界之一隅，今之世界已入於第四層序之革命時代，此又現今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有共同趨勢之表現也。

附注一 護黨運動，於民國十六年三月，倡始於吳稚暉先生。即衛護國民黨抵制僞共產黨奪取黨權政權之陰謀。因此共產黨對吳攻擊甚烈。國民黨無政府黨均同情於吳。

附注二 馬派 *Marxiste*；階級鬥爭 *Dutte de Classes*；無產專政 *Dictature Proletarienne*；政府主義 *Statisme*；集權主義 *Centralisme*；奪取政權 *Conquete du Pouvoir*。

附注三 蒲派 *Proudhonien*；全民主義或大同主義 *Reconciliation des classe* 或 *Conciliation Universelle*；互助主義 *Mutuellisme*；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e*；地方主義 *Regi-*

革命與反革命

一〇

onanisme ; 分權主義或合作主義 Decentralisation ou Fédéralisme ; 社會組合 Contra  
t social •

## 現今革命之意義（二）

李石曾

△革命政理與事實之趨勢皆由專制而達於自由

△舊世紀產物之專制：由酋長——王侯——皇帝——增進蘇俄式之專制國家

△新世紀產物之自由：由個人——地方——民族——推廣至大道爲公之自由  
世界

△吾人爲舊世紀專制之驅策者乎？爲新世紀自由之保障者乎？

革命之演進與現今之趨勢，已於前次同一論題之文中言之。但吾人之爲言，恆及於一而略於二，况現今革命意義問題之宏遠，自非一文所能盡，故有面面申述之需要，今爲此，亦卽多方申述之一也。

吾前所論，乃根據進化之原理，以言革命之層序。但事事物物之類別，皆不過強分，層序之分亦然；是故各層，遂不無聯帶之關係。如第一二層特重政權問題而其他爲附，第三層

特重經濟問題，而其他爲附；至第四層，乃爲自由民生之全體問題兼二者而言之也。

以立言恆只及於一，故前次以經濟之標準，列蘇俄之僞共產主義爲第三層序，故其似仍不失進化線前趨之地位。至若根據政理以言政權之演進，則蘇俄式之國家尤爲落後，此當於是篇申述者也（一）。（附註一）（二）（三）等皆仿此]

革命政理之趨勢，由專制進達於自由，已成不爽之公例。此歷史之明以示吾人者也。

雖然，久蓄未盡之專制勢力，仍日日謀其反動，或形而爲蘇俄專制，或形而爲『閔西斯特』，號召固異，實則無殊，皆不過由會長王侯皇帝之劣敗制度，另求改其形式而爲蘇俄式之專制國家，以圖於衰朽之餘，假返老還童之貌，爲最後之奮鬥，求過代之生存（二）。制度垂亡，亦如人之將死雖哀聲有動情感，而理勢終無倖存。故無論蘇俄閔意皆斷無久勝之可能也。

然今之迷信蘇俄閔意者正多其人，其故何哉？因其性質雖同於專制皇帝而能力則遠勝之故也。因其兼有理論與能力之狡強，故能使一部份人對之，有堅確之信仰，遂得強他部以服

從。由此言之，是其性質雖無殊於帝制，而其險惡則猶過之。譚組庵先生比蘇俄爲秦始皇帝。吾則謂蘇俄甚於始皇。亦可謂蘇俄爲改良之始皇。始皇之爲害區域小而時期暫，充其最大之野心亦不過行專制於世界之一隅而已。至蘇俄則欲實行夢想家全球一統之專制國家。若此偉大專制之國家果而有成，其害不唯過於始皇，實人類自由之末日矣（二）。以此言之，蘇俄或迷信蘇俄者之努力圖存，不唯不足以引起哀惜之同情，適可爲革命以求自由者嚴重之警告。若蘇俄式之專制果勝，人類之自由雖不能因此滅絕，而必沈淪於世紀之後，殆無可疑。故爲求自由而應戰者，其努力不容稍緩。但以歷史之演進言之，自由終必勝利，此又於死力應戰之中，可稍以自慰者也。

新世紀產物之自由，亦方興起，以與末日奮鬥之專制相搏。世界專制政體可謂爲舊世紀之產物。自由制度可謂爲新世紀之產物（四）。此亦衡諸事實，無可異議者也。既明此等趨勢與事實，自不難判斷蘇俄式之專制國家爲進之物抑退化之物矣。茲更舉舊世新世兩大大不同之制度與演進以明現今革命之傾向。

舊世紀產物之專制，始於酋長制度，進而至於王侯，再進而至皇帝；至皇帝時代，其權力擴大過於酋長王侯，自不待言；即於理論方面言之，皇帝之尊嚴亦頗極長期之榮盛。當時論者，無不認爲聖賢光大之坦途，正與今日誤認蘇俄爲神聖不可侵犯者無異。尊君之迷誤，既經幾千百年之演進而後人類乃將自由之初性，加以環境之陶融，以進於恢復自由革命之途徑。

現今世界革命中蒲派與馬派應戰，中國革命中三民主義與僞共產主義應戰，皆其現象之一端，即自由專制兩者最後之奮鬥也（五）。

新世紀之革命在謀人類之自由。如由個人之自由，地方之自由民族之自由，以至全世界之自由，皆由一線推廣而赴之，前進而隨之，無相左右，無相抵觸。求自由之個人主義者，同時爲自由之地方主義者，同時爲自由之民族主義者，同時爲自由之世界主義者。由此言之，求各種自由之蒲派與三民主義無相抵觸。至馬派之僞共產主義欲犧牲一切自由以營養假託平民假託世界唯一之專制國家，希成人類特殊之怪物者，誠與求一極端自由之蒲派與求一切

相當自由之三民主義皆不能相容者也（六）。是故中國現今之革命，求極端自由與求相當自由之各派均團結爲一，以與舊世紀人類怪物蘇俄之專制結晶相搏。此可謂求新世紀產物之自由而戰，殊非偶然，實順乎演進之趨勢而成也（七）。

今當中國酷愛自由與和平之國民與蘇俄專制國家對峙之時，今當力求自由之地方與一部份被蘇俄玩弄及壓迫之地方相持，吾人其孰去孰從？吾人其將效死爲舊世紀代表蘇俄怪物之奴隸乎？吾人其將爲保障個人地方民族世界種種自由而奮鬥者乎？吾人之自覺在今日。吾人之自決亦在今日！

自由者非單獨之名詞，非自利之意義。自由者非放縱之代稱，非破壞之表現。欲求自由之真諦，實含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兩立兩達之精神。是故言自由必兼言自覺自治與自生，必兼言平等，博愛與互助。是故於掃除蘇俄式專制障礙之餘，而復有於個人地方民族世界各基礎上求建全美滿之必要，此爲自由民生之問題，當詳言於另篇（八），然於此已可見自由之性質與現今革命力求自由真確之意義也。



附注一 參看本書第一篇『現今革命之意義。』第二頁有云『蘇俄專政亦第一層序中之一狀態。』第四頁又云：『蘇俄革命爲第三層序，然亦兼專政之性質。此爲是篇所欲特爲申述，以明蘇俄式之國家，以經濟言之，貌似第三層。若以政理與政權言之，實仍在第一層。』

附注二 過代之生存西文作 *Survivance*，猶云超過其應死之時代而尚未死者。生物至滅絕時代而尚未滅絕者，謂爲過代之生存。於此乃云專制已至滅絕之時期，蘇俄爲之求過代生存者。

附注三 以蘇俄式之專制比秦始皇，非僅理論，而乃事實。共產黨在湖南種種之殘暴行爲中，有因葉德輝富藏書籍殺其人而焚其書之舉。葉氏年六十七。又有湖南八十歲之名醫易麓泉者，亦爲共黨所殺。此猶不過一二舉例。無政府黨人被蘇俄殺害者不知幾何其最著之學者克魯泡特金之死，亦爲蘇俄拘禁虐待所致。或且謂爲毒死。至今真象未明。不獨克翁之書爲蘇俄所禁，即文學家托爾斯泰之書亦在禁例。此爲歐洲各國之所絕無。克

托著作在以自由平等博愛爲旗幟之法蘭西民國能自由出版流行，固無足怪。即在帝國主義最濃重之英國，與昔之德意志帝國，亦皆能出版自由。由此可見蘇俄專制較昔之始皇，與今之帝國主義者，皆遠過之。

附注四 蒲魯東有十九世紀革命之意義一書。其時言十九世紀猶云最新之世紀。是書極言自由爲革命之要素與平等並重，爲新世紀革命之所要求。蒲爲自由主義之代表，與馬克斯之專政對抗；蒲馬二派迄不相容，此爲略讀新世紀革命史者所共知。

附注五 參看本書第一篇『現今革命之意義』其大意爲世界革命，蒲魯東主義打倒馬克斯主義；中國革命，三民主義打倒僞共產主義。

附注六 蒲魯東主義並重個人與地方及全世界之自由。其實行之法曰社會組合 (Contract Societ)；曰地方主義 (Regionalisme) 曰合作主義 (Pederalisme)。

『社會組合』字在西文中與盧梭之『民約論』字相同，而實意則不符。盧提國權以抗君權，在其時固爲進步。然蒲說之社會組合，乃由人民自由結合，更大不同。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

義，固非極端自由，如蒲派之主張，然較盧說之國權，其自由程度又增進多矣。馬派政府主義 (Bentham) 及共黨持以誘惑國民黨之民主集中說皆與盧之國權說較近。至真正民權主義則與蒲派之自由的社會組合較近。民權與人權二者之意相關，人權者即保障個人身體與精神種自由之謂。蘇俄專制，只承認黨與國之自由，而極端否認個人之自由，實與民權人權之意義，相背馳也。

蒲氏倡地方主義即重地方之自由。地方之意，乃就此方對於與此方以外而言者。一省中有一省之地方主義，即縣鄉之自由。一國中有一國之地方主義，即省區之自由。世界中有世界之地方主義，即國與民族之自由。由此言之，三民主義中以縣為單位及民族主義，皆為注重地方自由之思想。

蒲氏主張合作主義，反對集權主義 (Centralisme)。合若干自由之人民為縣鄉，合若干自由之縣鄉為省區，合若干自由之省區為邦國，合若干自由之邦國為世界，此由合作主義達到自由平等之世界也。至集權主義，則欲以政府之威權統一國家與世界。無論其名為君主或

爲蘇維埃，其性質固同爲專制無異也。

總之蒲派學說，由個人地方以至世界，皆以自由貫徹之。此乃蒲派特殊之精神，與三民主義相近，與馬派相反之點也。

附注七 現今中國革命中，國民黨三民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團結爲一，以與共產份子應戰，實由於三民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基本思想相近而然。已如前所云，其他足以證之者亦多，此可參看王崑崙君之輪解表。以事實言之，亦足以證其團結。且爲其公敵所同認。本年五月七日上海字林西報載鮑羅庭之言，略謂『南京之事，由三個廣西軍閥與三個無政府黨與蔣介石作成。』彼之所謂三個廣西軍閥，實卽國民黨廣西三將領。然則國民黨之將領與國民黨之無政府主義者共相捍衛自由，以與專制惡魔應戰，又何足異哉？

附注八 繼此刊佈『現今革命之意義』文中，將申述民生問題。

## 分治合作問題

李石曾

民國元二年，國民黨人多主張聯邦制，最近於分治合作之意。多有謂中山先生與國民黨主張『專政集權』，反對『分治合作』者，殊與事實相去甚遠。中山先生對於黨員之主張聯邦制者，固曾有批評，其意略謂美國之致富強，並非由於聯邦制，一意也；聯邦之所以行於美洲，因先有分而後有聯，中國無須由未分之國，故求其分，既未分無所謂聯，此又一意也。此兩意就表面言之，多引以爲中山先生與國民黨反對分治合作之證據。實則不然。分治合作之關係至大，於今日之中國，乃存亡問題，非僅富強問題而已。故謂美國之致富強非由於聯邦制是，雖然不能視此爲反對分治合作之證也。國民黨本以分縣自治爲主張，（見孫先生建國大綱第十四第十八等條），是其分治合作之程度，尤遠過於聯邦。故絕不能以中山先生批評聯邦制與變象之聯省制，而以之爲國民黨反對分治合作之另一證也。

且中山先生爲創造國民黨之自然領袖，如父母之於家庭，絕非人爲之領袖可比。故吾恆

謂中山先生之於黨，之於民國。是父母而非皇帝，亦非教主，故先生死後不能有第二最高之領袖成立。

卽假定先生在日，專政式之統一制爲可能，如一家賴父母存在，維持其統一者然；逮先生既歿，是只有兄弟姊妹叔姪，而無唯一之父母，則除分治合作，亦別無他途。若欲於先生之外，更求有其他至尊之領袖，是不以父母待先生，而以皇帝與教主待先生。若先生死而有知，亦絕非其所欲聞。是故即使先生不贊同聯邦於前，亦不能以之爲先生死後反對分治合作之曲解。况先生明言美國有分而後有聯，中國亦有先分而後有合，此更分治合作之意義與事實，皆無背於先生也。

民國八年，中山先生與張靜江同志在滬論時局，已曾有分治合作之主張。其時非言『分治合作』四字，而其意則如是。靜江先生與其他在座同志，均能詳道之。靜江先生本早主張分治合作之意，於彼時與先生更爲進一步之討論，以當日之事實爲言，此後亦屢屢言及。其他同志同於孫張諸先生之意者固尙多其人也。

吾之言分治合作之意，與張溥泉先生略同，皆感受蒲魯東分治合作之思想。至民元已有此主張，至民八而益覺其必要，並與北大同人發表『分治的統一』之主張。除於報中宣佈，並曾以所宣布者寄中山先生，固未見其有反對之表示，由此更可見所謂國民黨反對分治合作之意之無稽也。

數載以來，數月以來，直接間接以此問題言於黨中多數之執監同志軍事同志者，將近百人。或則不謀而合，或則極表贊同，或則主其事而商其時，或則主其意而商其名，或則主其性質而商其程度，或則求其實際而避其嫌疑，（註一）至於根本的絕對的反對者，除共黨外，則無一人。其表示不能滿意於分治合作之意者，吾之所遇，不過一二人而已。

吾於革命論文中，附帶言分治合作之意，自本年四月起，數見於革命週刊。（註二）至近數週以來，則屢言於民生報，且爲上海各報訪問而發表意見，頗引起黨內多數人之注意。其批評言論當陸續刊布，於此暫不詳及。

先此『分治合作』問題而刊行成本中西文巨著者，亦不乏其人！戴季陶同志于民二有『

中華民國與聯邦組織」一書之作，民十三謝先生有法文本『中國聯邦論』巴黎大學博士論文，又有王先生法文本『聯邦憲法』巴黎大學博士論文，其他著作爲吾人所未知者，當尙有之。至西人名著，則更不可勝數矣。

其非黨中同志，贊成分治合作之意者，亦多其人，幾不可勝計。其最 者，則爲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曾有同類之主張，允以原稿見示。其極端反對而最有意義者，亦可得一良好之舉例，則爲共產黨之領袖陳獨秀。陳爲馬克斯列寧之黨徒，固以專政集權爲能事，以變象君主爲思想，宜乎其反對分治合作之主張。世界上政治思想有兩大顯明之派別，馬克斯主張專政集權；蒲魯東主張分治合作。於此言之，分治合作問題，非僅關於國內之思潮，抑亦關於世界之趨勢也。

西方之欲以強力統一歐洲與世界者，有俄之大彼得，法之拿破倫，德之維廉第二，與蘇俄之列寧。東方之欲強力統一中國者，有北洋軍閥與共產黨。至國民黨則以和平統一爲目的，故舍分治合作，恐別無途徑。中國人民其宜注意，不復爲代表共黨陳獨秀輩之所愚，而聞



接受其影響，亦今日最要之問題也。

註一：對於分治合作之意，反對者幾無其人，惟或則誤解，或則避嫌，所謂誤解避嫌，皆受『聯省自治』之影響。此名倡於張溥泉同志，初意並無可攻擊，至爲軍閥政客利用而污之，亦不能因噎廢食。省字固有未盡善處『分縣自治』自尤勝之。然以聯治曾遭反對於前，遂避一切分治合作之意而不敢言，則殊覺避諱之過當矣。

註二：見『現代革命之意義』兩文，與致汪精衛陳璧君書。

## 對於汪精衛銑電之感想

吳稚暉

人家問：汪精衛先生何以這一回還是跑去漢口，甘心受共產黨的包圍，甚而至於還做那雙簧裏面畫眼睛戴小帽的人物，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喊那『三大政策』，『聯合戰線』，在演台拚命，在電報上賣力呢，他爲什麼呢？

我答道：沒有什麼，斷斷不是有所爲而爲的，汪先生有他的真摯的人格，此其所以有汪先生的價值，故我四月五號上午十時在滬海道尹樓上對他說，我相信你終有一天來向我們相對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馬上加入我們一邊來。各位要明白：共產黨實在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狐狸精，若不是親自窺見過他的原形，儘你說他如何兇妖可怕，終不肯相信。被他已經迷到病骨支離，見他回眸一笑，還是立刻愛情濃郁，不顧生命的向他了。二是做闊老的，那裏會看見他們鬼鬼祟祟的把戲：他們伺候闊人，是比孝子順孫還強，說話又甜蜜，又爽快，把一頂偉大左派的帽子輕鬆鬆的套在你頭上，你終以爲什麼天大的把戲，都由我管得了的。三是一

年前的共產黨，同一年來的共產黨，還是那麼一個了嗎？然而汪先生去國一年，他只知道還是那麼一個共產黨，他疾病坎坷，久在歐西三十天內經過了木司科，接晤了一羣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個月的俄國火車，俄國輪船，伴送了回來，又一向有深刻的總理聯俄容共歷史，影在腦中，如何能在上海聽了幾個老朽朋友的一席話，就馬上突然變換了一個大方向呢？這不但汪先生自信力強到十二分的人做不到，便是誰亦做不到！所以六號早上，李石曾先生去了孔宅回來，他說『精衛說過要走，一定說好了才走，不料他竟昨天下午瞞着走了，那麼樣，他約十五到南京開會，靠得住麼？』我微笑道，開會不開會，止是那麼說着罷了。果然四月十八漢口的中央日報記事，他告訴人，他慮蔣要中止其行，故秘密登舟，候出吳淞口後，始致書與蔣。他至心誠意，還要去同那班狐狸精相處一陣，終要有一天眼見了原形，他才自動的想法子。我們難道從前不是同他一樣，也訑訑拒人過的嗎，何必以五十步笑百步，詫怪今日的汪先生呢？若說汪先生可以被他們做商標，來登廣告，這亦不過汪先生自己觸霉頭，還充他們一陣的傀儡罷了，於我們無損。因為共產黨賣空買空，專靠登廣告，造起空中樓

聞來，大擺其迷魂陣，老是這套把戲，西洋景亦漸漸拆穿了，人家知道汪先生愚得可笑。汪先生到底又不肯賣國，他們利用他亦不會長久的。所以前天有位戴君從長沙經過武漢東來，他堅決的說：汪先生已被他們暗中監視了，失却言動的自由了，這亦是可能的。因而有這個四月十六號的銑電，借他的口來詆毀蔣先生。別的不容先辨，他裏面說我們『謀開西山會議式會議，』這那裏像汪先生的話，并且那裏像人說的話。當他到滬之際，會議不會議，我們沒有半個會字，半個議字。我們其時方以為共產黨叛逆有據，事實俱在，那裏用得會同議呢？全是汪先生自己對李石曾吳稚暉等首先說要會議解決，更兩次在總理遺宅及滬海道尹署樓上對十許人說了又說；說了不算數，汪先生出了吳淞口，寄給蔣先生的信，又說：『以銘之愚，一線生機，惟在開第四次全體會議於南京；』又給張靜江先生的信說，『十五開會於南京，』旁邊又注云，『愈早愈好。』我們相信汪先生是個領袖，他的提議，必有根據，所謂南京，他必定知道第三十六條黨章中央全會必開於政府所在地，所以我們馬不停蹄的趕上南京赴會。到南京得汪先生元電，果說政府定在南京，又趕緊日夜不停的把政府籌設起來，好

使中央在南京開會。汪先生定十五開會，所以十四便由到會的委員，開了預備會。十五上午足足靜候了三點鐘，全會開不成，改開談話會。從此一天一天的候着開會，終開不成。汪先生好似開頑笑的，會是不來開，反在那裏說風涼話，累我們好似痴漢候婆娘，至今牢牢的候着。那個銑電不說我們上當，倒說我們『謀開』，是不是像共產黨潑皮賴人的口氣，那裏像是汪先生誠篤君子的說話呢？至於銑電裏面一篇大道理，說如何反共的不當，如何繳去工械的不對，全是似是而非，一種共產黨混同夾賬的聲口，也不像汪先生的話。若說汪先生還不會預備反共，亦不願定要繳去工械，汪先生自以爲體總理之心爲心，我們亦知道的。可是容共原是要他們來幫助革命，不是革命革命，連國民黨的命都革起來了。這個道理，汪先生亦應該清楚的。工人有了械，幫助國民革命是十分歡迎的。若拿了他的械，來助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這個叫做叛逆，汪先生四月三號在總理遺宅親口告訴白健生先生等要細起來的，（這句話，我沒留意，李石曾先生再三說聽得清清楚楚。）依汪先生把他們細了起來，他們的手亦沒有了，要械何用呢，不繳何待呢？我所謂汪先生體總理之心爲心，見汪先生四月五號

寄給蔣先生的信，有云：『改組之精神及其方策，實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而吾弟實左右之，銘不過追隨之一人。』又五月三號在總理遺宅汪先生親對蔣先生說：『總理改組國民黨，便是我與你同着仲愷三人，最深知之。』所謂苦心孤詣，所謂獨創，大約便是指要與俄國聯合，要容納共產黨，甚而於要行農工政策，定要武裝工人，就是共產黨現在把他吹得震天響，三大政策。那麼，我要敬告汪先生，我們並不是一隻牛，我們並不會連這一點靈性都沒有的，我們亦會把蘇俄當神仙待遇，亦會把共產黨當兄弟親過，我們亦口口聲聲說革命注重農工，爲了這個，我們亦得罪過多少朋友，可是同時却不會奉到總理的密命，說明蘇俄要把共產黨來消滅國民黨，亦應該同他聯到底，（其實事實上，還做不到，到國民黨消滅的一天，聯蘇俄的便輪不到孫中山先生了，）共產黨要革國民黨的命，亦應該容納到底，（是同一事實上便做不到，彼時他已不屑容納你，誰配你去容納他呢？）農工幫了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也應注重這種農工到底，（這就是孫哲生先生請幾個共產黨書記代搶，在交通部紀念週說的漂亮話，他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

才有黨。這無異說：農工要做共產黨，國民黨便不該存在，要存在國民黨，『這完全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路上。』這才聒聒叫的寧馨跨窺人物。并且父子至親，必有我們聽不到的耳提面命，在汪先生依了總理苦心孤詣的獨創，體他的心，來做自己的心，已是隔膜了，所以他會說出『細細叛逆民衆』的話來，何等不合革命的原理呢？故論起派別來，孫哲生方是真左派，汪精衛止合稱做準左派罷了。因為沒有總理密令，吩咐我們把國民黨可以送與共產黨，我們老實不客氣，自然『提出反共口號』；自然『圍繳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槍械』。那個替汪先生做銑電的人，（我想汪先生心地決不會如此齷齪，）糟塌我們，以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爲獻媚之資，然後我們要想免給汪先生這樣的糟塌，我們除了把國民黨送與共產黨，還有甚麼方法呢？就把汪先生自己的觀察來證明，（一）四月一號黃昏，我在孔宅當了蔣宋李三位之面，對汪先生說：『陳仲甫他言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共產國了；』汪說：『那裏要二十年呢！兩年罷！』（二）四月二號早上，在孔宅樓上當李蔡二位之面，汪先生說：『我過木司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們變的。』（三）同時又

說他們當什麼都是工具，就是他們自己的重要人物，不需要了，也就把他丟了。那麼他們是預定在中國要行共產，不肯改變的，是在汪先生曉得他一定的了。他們把國民黨完全算做工具，到不需要了，即便丟了，汪先生亦曉得一定要有丟的時期，陳獨秀說二十年，還是寬慰朋友的，其實只需兩年，汪先生亦曉得一定的了。然則所謂革命，便是替共產黨革命，『反共便是不革命，』亦是一句不客氣的實話。承蒙四月十二的漢口中央日報，稱我與蔡李『都是忠厚老實，但不知革命方法，』方法就是指武裝的工人，面子上逼帝國主義者來殘殺，算是反對帝國主義，其實又增加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大成功，愈把國民革命軍可以維持國民黨的勢力減縮下去，這又名為限制新軍閥，在共產黨成功他的革命，自然十分滿意了，在國民黨要想成功自己的國民革命，那就倒看千里鏡，愈弄愈遠了。這種革命的工作方法，或者就是汪先生所謂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的呢，還是別人苦心孤詣獨創了來斷送國民黨的呢？所以汪先生致蔣先生書，開頭有云：『抵滬以來，痛苦萬狀，今日散會後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汪先生所痛苦者，即為我等老朽昏庸



不知『革命工作方法』之故。但我亦套他調子還告之云：在滬見汪先生痛苦萬狀，今日見他的銹電，痛苦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我們所痛苦者，即汪先生誤認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革命工作方法，便算國民黨進行之革命工作方法。總而言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至佳，但我們反了他，讓我們自己來行，便是國民黨革命；若與他一同來行，便變了共產黨革命。工人武裝暴動的方法，亦是至佳，但我們不要工人歸到共產黨手裏，反來革我們國民黨的命，我們要武裝國民黨的工人，完成我們總理的工人革命，這是總理改組國民黨時苦心孤詣容納共產黨的意思，暗示我們到了他們要拿出共產黨手段危害我們國民黨便請他出去，這就是汪先生所謂獨創。我已尋到了總理親筆證據，請在下面申說，至於汪先生那種不願消滅國民黨，只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認為就是國民黨革命的成功，乃是汪先生個人的信仰，（共產黨革命決不會成功，當另作一文請教於汪先生，）總理並無此意，汪先生是總理唯一的信徒，不可謬誤至此。（汪先生在漢口寄李先生有『左派左派，寤寐以求之』等語；汪先生恥為右派，力爭左派，亦就可謂情見乎詞。

然彼誤認能上共產黨的當或共產黨自身是左派，固已錯極。（還有共產黨所加國民黨人左派之名，若觀其秘密文件，當作三日惡，此亦當另爲一文。）

當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之時，疑慮紛起，總理曾批示鄧澤如先生，其原文已另製寫銅板，今轉錄如左，且加按語，使總理之意瞭然大明也！

此稿爲我請鮑君（按即鮑羅庭）所起，我加審定，原爲英文，廖仲愷譯之爲漢文，陳獨秀並未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按據俄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人，是打成一片整個兒的，總理是包含萬有的心胸，那裏願意測度他們的表裏爲奸，到了今年四月五號汪陳都用領袖資格共發宣言，才知他們果有神鬼。）俄國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則各黨員至今仍不明三民主義之過也。（按何等沈痛，我們自反，真應愧煞，俄國黨人，無不深明其共產主義，故成功，總理的黨員，自有三民主義，却不願明白總理命他學步俄人，則又認共產手段，便是國民革命，三民主義還自己看做不時髦，仍謂至今所不明者，將終古仍不明矣，噫，嘻！）質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按：說得何等明白，一以

曉諭黨員不要把共產黨看作異類；即我國民黨亦此共產之一派，二以暗示黨員不要見異思遷，我的民生主義便是共產主義，誠把民生主義的專書一看，民生主義還是進步的共產主義，非如俄國共產主義乃是馬格斯病理的共產主義，是民死主義，不過其搗亂精神，亦可以節取者耳。）俄國革命之初，不過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及後與列強奮鬥六年，始知其用力之最者，實爲對於民族主義。此乃中國學生自以爲是，反用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按何如說汪先生勇於做左派，總理婉諷之曰過當，難道總理亦是忠厚老實耶？）其所以竭力排擠而詆毀吾黨者，（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自始至始，即與我們不能兩立，）初欲包攬俄國交際，并欲阻止俄國不與我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我黨爭衡也。（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與吾黨爭衡，是其唯一目的；至於包攬交際，正是俄國要他包攬，與我往來，也是俄國正欲往來，惟有今日共產黨遮斷農工不任與國民黨往來，乃是他們自樹一幟的唯一目的物。所以兩領袖共發宣言後，中國共產黨江浙區執行委員會，應和一宣言，有云：『中國國民黨乃中國各階級起來革命的惟一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工人階級革命的惟一政黨

黨，」馬上把全國無祖國的工人，一齊奪歸共產黨手裏去了。所以吳稚暉頂倒霉，廣州把跟着陳炯明造反的商團懲創了，許多反對國民黨的，大罵特罵，吳稚暉冒了不韙，形似不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那還算不冤枉，曾得了汪先生稱許。現在上海又把幫助着共產黨造反的工會繳了械，那弄到國民黨的汪先生也出來發火，罵那保護國民黨的軍隊，說是『無異甘爲民衆之公敵。』又說：『似此喪心病狂，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紀律具在，難逃大戮，』我覺汪先生現在的一味直覺，也與向日時事新報等漫罵殺商團同一有所拘蔽。吳稚暉本了汪先生綑綁叛工之旨，又冒不韙，又似不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大約目前定不得汪先生原諒，必要到了相對痛哭時，或縐眉一嘆。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爲此等少年所愚，（按共產黨與李闖張獻忠在實際上并無分別，所以像煞有價事，居然以主義名者，即文之以『學問經驗之人』，宜乎總理亦爲所欺，彼等是整個兒的，少年正爲所愚耳，那裏有鮑羅庭其人反爲少年所愚乎。）且窺破彼等技倆，於是大不以爲然，故爲我糾正之，且欲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按今日汪先生反要我們與他一致動作，

豈不與總理之意相反，『不與我一致動作，則當絕之，』總理說得明明白白，并且得蘇俄之同意，今乃曰『反共即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放屁都要還香，真總理之罪人也，此總理親筆之證據也。且又爲我曉諭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并非過去之遺物，（按，傷哉，總理之心，豈即汪先生漠然於做人工具之心乎？勸此輩少年勿做張邦昌吳三桂李完用，此所謂民族主義，正適時之良藥也；勸黨員不可聽其亡黨，又所謂民族主義非過去之遺物也，此數語乃總理批示鄧先生之中心要語也。）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於吾黨，（按共產黨覺悟了民族主義，乃許其參加吾黨，今汪先生乃恨軍隊得罪了無祖國的上海總工會工人，要行大戮，真咄咄大怪事！）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欲不服從吾黨，亦必棄之。（按總理親筆證據，大家看清楚，『如不服從吾黨，我必棄之，』何等說得斬絕，所謂共產黨背叛國民黨，定即棄之是也，今乃曰『反共即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狗屁之話，真總理之罪人也。）

準此而觀，汪先生銑電，幸而筆迹不類汪先生，我等對於汪先生之信仰乃可無間。至電

中又言：『對於兆銘假借名義，顛倒是非，』不知何所指。幸而我們終始未認汪先生知有是非，故我們還未曾有借重之機會也。總之，雙管不能齊下，掛一必且漏萬，當繼續貢其所知以明真相，故除上舉『俄國共產革命，必不能成功』『左派真相』兩題，當繼此而作外，又有『兩月內個人反共之歷史』『共產黨之賣空買空手段』等題，亦要寫出，參互讀之，庶無漏義。

## 初以確實證據與汪精衛商榷

吳稚暉

### 革命方法

#### △共產黨賣空買空之手段

精衛先生執事：自先生發銑電，弟已略有所貢，其中所言應行商榷之諸題，今當繼續進言之。先生之於共產黨，在總理提議聯俄之初，先生因向不滿於馬克斯之學說，故慶蔣胡等皆積極贊同，而先生獨致冷淡，此其一也。先生譬蘇俄如孫悟空，國民黨如豬精，孫悟空遁入豬精之腹中，盡量的翻筋斗，舞他的金箍棒，豬精毫無辦法；這個比喻，曾經告訴過廖仲愷胡展堂伍梯雲李石曾諸先生，及廣東許多同志，此其二也。先生於今年四月一號晚上，在孔庸之先生宅中，對了宋子文蔣介石李石曾三位先生，回答我所聽見陳仲甫要在二十年間實行列寧式的共產主義於中國，先生堅決斷定，不需二十年，止需兩年，此其三也。四月二日早又在孔宅樓上對着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告訴我們，先生此番經過木司料，才知道蘇俄的

政策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國民黨有什麼變更的，此其四也。同日又說蘇俄不但把我們國民黨當做工具，他把什麼東西都當做工具，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物，用不着了，也便丟了，此其五也。所以如果拿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來對先生誇張，先生必付諸一笑。因爲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見得極分明的，還有過於先生的嗎？然而我知先生，是決不肯背叛總理，賣黨與蘇俄的；既然如此，何以看清楚了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先生還是虛與委蛇，沒有蝮蛇相螫，壯士斷腕的勇氣，想出死裏逃生的方法，作個自己的結束呢？因爲那隻共產黨的狐狸精，他約略有三樣最要緊的法寶，引人入迷魂陣，幾乎無賢不肖，盡在其彀中。因爲一經成了術語，經千百人之傳述，無有不暫成爲法寶，把持於人心。有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當這種法寶的西洋景不會拆穿，那種殺身成仁，斷脰截足，前仆後繼，對着法寶的犧牲，還有一句情理好講嗎？其他如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天翻地覆，轟動了全個中國，同善社悟善社的入門禮，要磕若干頭，好好體面人，都恭恭敬敬磕去，無非都有法寶，足以擺他的迷魂陣罷了



。共產黨最重要的三種法寶：

一 是根據名理的，叫做『思想不可落後』。

拿一笑話做引子，便容易明白。這個笑話，有一報上，云出福州，其實乃在漢口。有一男女雜沓的大會，忽有少年好奇，對大衆拍一女郎之肩曰，我們交媾去罷，女郎面發赭，少年乃揶揄曰，你思想落後了，女郎頓卽怡然，起身隨之而去。本此原理，共產黨遂用左派右派，操縱其傀儡，所以引得汪先生此番到漢口，初則忿然以告新聞記者曰：『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繼又特函李石曾先生曰：『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這便是孫悟空在豬精肚子裏作怪，什麼是思想向前，那邊是左，猶之乎君爲臣綱，何以是綱，天王聖明，如何叫做聖明，都不必講，一味的妄自菲薄，隨着金箍棒方向亂叫。這不是本文的範圍，另有真憑實據，下次再貢獻。

二 是本乎道德的，叫做『什麼東西都是革命的工具。』

借國民黨的嘴，自己對這法寶叩頭，最是孫哲生先生旁邊兩個共產黨書記，替他發表

許多高貴的名言，如我上次所述，彼在交通部紀念週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又在第四軍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內云：『一部分的同志，因爲認不清革命的理論，以爲像現在這種樣子幹下去，即使將來國民革命成功，也不是國民黨成功，止是共產黨成功，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去努力，要去革命呢，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國民黨這個黨的嗎，如果是爲一個黨去革命，那就無異承認以黨來做一部分人爭權奪利的工具，這樣的黨，我們要他來做什麼；』這種非湯武薄堯舜的正論，在道德經南華經上，也不曾有如此精義。所以何物國民黨，汪先生孫先生皆有視同敝屣，應作工具之概念。再拿一件小事來證明，愈見工具之說，正是共產黨之家常便飯，古今宗教家之高尙情緒，均不是過。方寥案之發生，共產黨主要人物，恐怖異常，譚平山避不敢出，陳獨秀之子延年往責之曰：『此時正是宣傳之好機會，汝何故匿避，苟汝出而亦遭毒手，我等更增宣傳之材料矣，』人而願爲宣傳材料，固應崇拜，乃責其友而材料之，君子之愛人以德，亦可謂咄咄逼人矣。然而相形之下，其

意若曰，止有共產黨真爲民衆之黨也，即使殺盡民衆，亦爲民衆也，國民黨本非爲民衆者，姑息若干民衆，即非真爲民衆矣，小英雄妄自菲薄，看不起他爸爸，情見乎詞矣。而孫哲生何以見得國民黨其始即非爲民衆而產生？汪先生既然自始即不滿馬克斯之學說，曾否思量應做什麼革命的工具？這不是本文的範圍，也須另用真憑實據，待再下一次討論。

三 是贊賞能力的，叫做『革命方法。』

這個法寶，就是本文要引了真憑實據，先同汪先生商量的。汪先生不恤飲鴆止渴，賞贊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他所恐怖的，便是恐怕停止這種方法，可以把國民黨回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狀態。然而李石曾先生則相信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開倒車的方法。我有了最近三四個月的經驗，加以彼等在湖南的大試驗，又堅決相信張溥泉先生的話，他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我現在更替他說得顯明一點，可以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加些訓練，加些組織，是『科學的』李自成張獻忠方法。簡言之，亦可說是我們家鄉強橫乞丐，用薙頭刀剝破額角的方法。『我不曾肯蔑視他們的口頭主義，什麼取法於

馬克斯牛克斯，都是劉邦朱元璋等尊敬聖經賢傳的老把戲，他們說得好聽。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可以施給慈惠與閩人，無論這種烏託邦的理想，正與皇帝主義所謂子愛元元，帝國主義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一張不兌現之支票。況且無產階級既專了政，還有什麼閩人留在世間，候他們施給慈惠呢？他們在木司科，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十年了，爲什麼無產中的尤無產者，所謂乞丐，還是滿街是的呢？爲什麼男女社交已經公開，四千金子僅僅占有她們非產的天然性具，還要受經濟的壓迫而出賣呢？這種革命成功的羞恥，用殺人的方法，殺得光鮮的嗎？自開天闢地，到世界末日，什麼專政家的口惠，都是空頭支票。什麼革命，能少殺幾個人，終算一個指頭遮羞，可吹做方法的進步。否則白起坑降卒四十萬，黃巢殺人八百萬，終是開倒車的野獸罷了。」所以用共產黨的方法來革命，是把國民黨直縮到太平天國以前，被義和團都要齒冷的呀。我在民國十一年，從法國回華，忿極了，情願自己來做張獻忠，把中國人殺掉三分之二，於是床鋪也多餘出來了，米價也低落下去了，天下自然太平了，二十四史的承平時代，不都是共產黨那種方法造成的嗎？所

以共產黨的開倒車，還有什麼抵賴呢？現在先寫我的經驗，再舉他們的秘密證據，可以窺見他們方法的一斑。

(甲)我的經驗 去年九月由廣州遷學校於上海，本爲避廣州之囂，初無力佐助黨事。政治會議派余及鈕候諸君爲特務委員，其實主其事者止鈕君。侯紹裘爲共產黨健者，自亦盡力奔走。彼黨之重要人物，侯君外，若羅亦農，張曙時，汪壽華，林鈞，朱義權諸君，亦常往還於鈕寓。國民黨人來與周旋最頻者，湯濟滄楊杏佛二君而已。十月以後，漸覺汪君等時圖於國民黨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種革命勢力，以爲共產黨之地。我則並未知其革命方法之兇辣，止認共產黨又爲進一步之人類希望，故常勸彼等曰：『勿急躁，如國民革命完成，貫徹中山先生之遺囑，將來進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產者，（今知列寧共產黨，並無共產之意，特欲表顯其兇惡能力耳，）何必圖挂招牌，仍賣假藥，學上海書商輒賣預約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其時並有一二俄領事館之人晤面，余友告之曰：『中國人是有俠義的，你們如誠心助其革命，彼決不相負；苟伸縮操縱以待之，中國人亦甚機警者，土耳其之結果，必且

再演矣。」彼等輒曰，此已過去，可勿復論。我輒搖頭不信，深囑其注意。迨今年正二月，圖立工人市政府之意，日益顯明，且時言黨軍可以不必來。二月十九大罷工，至二十一晚間。因局勢愈急，遂議將特務委員會，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合爲一聯席會議，其實人數仍止朝夕見面，如上所述之諸人。是夜議及市政府，余遷就彼等之意，即議工會學生會皆應出委員，或且過半，彼等似亦歡洽。乃明日二月二十二早上，汪壽華忽集原有之諸人，加來王曉籟劉榮簡數君，議更設一市民革命委員會，其大綱則有反對孫傳芳，反對英國出兵之類七八條。余知有異，乃告之曰：罷工已四日。毫無結果，如欲開重要會議，昨夜已成聯席會，即商界學界，亦議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換湯不換藥之諸人，又欲別立一名目，難道國民黨還不夠革命嗎？倘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抵議。汪曰：『你是長輩，有話好說，不必生氣。』張曙時曰：此爲非常之時，故必另立非常之會，以處非常。吾曰正爲非常之故，吾有異於今之所爲，彼反對孫傳芳之類之條件，國民黨之吃奶小兒亦能知之，當此非常之時，何以用此尋常條件欲別立名目？維亦農乃覺之

曰，欲立此非常之會議者，正欲討論軍事等耳。余曰，如此，則尙有可說。卽共問鈕君曰，接洽之軍隊果如何。鈕對曰，今日必無着落，明晚或有一二處得回音，說不定遲至後日。又問羅君海軍如何，羅言今日亦來不及。於是遂決議早則明晚，至遲則後日下午，應有舉動，屆時再集議。乃二十二晚六時半，方食晚餐，聞砲聲隆隆然十數發，正疑怪間，楊杏佛來告曰：『共產黨極可怪，早間明明決議軍事動作應明後日再議，乃今日午後五時半，忽走告鈕君曰，海軍今晚必欲動，請發命令，鈕君甚怒，詰其何以午前不早言，然卒徇其哀請，下一命令，囑王允恭攜去，然此時砲已放，命令似未達到也。』余卽隨楊同至鈕所，鈕正對侯紹裘汪壽華發氣曰：『如此相欺，何能合作。』侯汪皆面有喜色，漫謝過。余止鈕君之怒曰：事已如此矣，亦可勿復有言，革命黨之急躁，常如此也。於是八時有人來告曰，高昌廟響應矣。九時又言曰，西門龍華，各有動作。至十時半，杳無影響，彼等皆氣沮。我曰，後當慎之又慎，如此無謂之犧牲，應當切戒，急色兒之情態，褲子不曾扭開，自己早已脫陽，豈不可笑，皆唯唯而散。其明日羅亦農特對我慰藉曰，此皆人民忿無可洩，故輕舉妄動。陳仲甫且

特致我一書云：

稚暉先生，前幾天本想和先生一談，以不大大方便中止，至爲悶悶。此時謠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萬勿輕信。在中國革命中，國民黨與西披，萬萬不可分離，西披決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即溥泉等如他們願意打孫傳芳李寶章，我們尚可與之合作，何況革命的國民黨。）我爲此言，誓以人格爲担保。望先生勿爲右派浮言所動，以至大家鬧無謂意見，而爲敵人所喜，并請先生將此轉達鈕惕生先生。西披爲上海事件，有宣言，諒先生早已看見。右派造謠，說西披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此種無稽之言，實不值識者一笑。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不得以此遂謂其有成立工人專政之意。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先生試看西披對上海的宣言，有什麼野心沒有？或者先生還以此宣言太平了一點，也未可知。然而西披主張止能如此。事稍定，尚欲與先生詳談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當不至疑我亦欺騙先生也。



二十三夜十時仲白。（按此信所謂『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乃無稽之言，』後來三月底四月初的總工會及市政府，有稽無稽，今且不談。因共產黨他們自有革命的大人格，至於說幾句誑話的小人格，本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載此信之意，止着重在『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執此數語，與他自己的秘密證據，載在下面者互相對照，便可見忍耐不住者，到底是否羣衆，海軍是否是羣衆所影響，所謂無窮錯誤，西披是否認作錯誤，還是認作『這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呢？西披的野心，還是人家歸怨他們的呢，還是他們在革命史上自己做成功的呢？哈哈，陳仲甫把左派領袖的高帽子，合在汪精衛頭上，叫他自己遊街，汪先生珍重那頂高帽子，還正言厲色替他罵朋友。正似吾鄉有一少年，忽然爲一雞皮鶴髮的牙婆所惑，親戚家人日日勸之不肯聽，一日其美麗賢淑之妻婉言以動之，少年大怒，批其頰而足踢之，且正告之曰，我儘可以沒有你，我決不能沒有她，與汪先生今日之情景相同。）

這件海軍放砲的事，我初以爲他們犯了幼稚病，（共產黨犯了幼稚病，是李守常先生常常太息的；其實就是蘇俄，也是犯了幼稚病，此意再在別一文字裏暢說。或曰，幼稚病者，列甯不諱言，正是他們長於伸縮，借幼稚病以文其奸險，觀於本文，亦有此一義，）也應該自己畧知錯誤。豈知當總工會市政府猖獗時，在報上狂吹，把去年十月暴動，（這件事更可笑，且絕不干西披之事，）二月海軍放砲，三月閘北巷戰兩晝夜，算做上海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民衆的三大成績。我本憤慨閘北之事，當時黨軍已到，北火車站上止有二百餘白俄，又有少數奉魯軍，『民衆』無可如何，必待薛岳去打。所謂民衆巷戰兩晝夜者，無非去奪取警察槍枝，因此一千餘幢房子，六七百條性命，遂算他們的犧牲品。然而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軍事當局尙承認民衆的幫助，逼住了獎贊他們。就是我深知就裏者，也以爲古今所謂勝利，本來終是這麼一回事，只索他們去吹成績，由他們吹着罷了。豈知得到他們秘密證據，把他們自認無窮錯誤者，竟算是無上革命方法。我才知賣空買空的卑劣行爲，原來如此。

（乙）他們的秘密證據，他們有所謂『區秘通信』的，有所謂『樞字通告』的，皆印以鋼筆板

的紅墨或藍墨，未皆署名『朱紳秘書處，』朱紳是否人名或術語，我們外人所不能悉。原稿當另用石印印發。今照錄三月四日第十二頭區秘通信六頁如左，則與本文革命方法最有關係者，並加以按語，以指其方法所在。（原稿橫寫右行，今改直寫。）

『區秘通信第十二號』

上海總同盟罷工與其前途（亦農同志三月二日在活動分子大會中的報告摘要）

（一）總同盟政治罷工，及二十二晚暴動之歷史意義。這一次我們終算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二月十九至二十四日的全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二月二十二晚民衆的武裝暴動，與海軍開砲，結果雖未成功，目下此運動正在開始繼續，談不到成功與失敗，但已激動了全中國革命的高潮，引起全世界被壓迫民衆之注意。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更見駭怕到萬分，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領事團聯名發表宣言，都是證明他們是如何的重視這次運動。

去年十月我們曾因孫傳芳在江西戰事失利，夏超在浙江宣布獨立，而舉行一次民衆的武

裝暴動，希望推倒孫傳芳在上海殘餘勢力，而建立市民的自治政府，結果是失敗了。這次的運動，是上次運動的繼續；是上海工人階級領導民衆革命的一種更堅決不投機的有力表現；與五卅運動工人階級領導民衆反抗帝國主義，有目標重要意義。

（按）放了幾砲，吹得震天響。似乎革命黨也都如此，何足十分責備。可異的，他們當時告訴『聯共』的朋友們，卻謙虛與忸怩，說是無窮錯誤；既然錯誤，何以又能有重要意義？既有重要意義，何又認錯誤，而且無窮？這個就叫做『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小二勿會偷』露出賣空買空的馬脚來罷了。天下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誠與僞，就判了高明與卑鄙了。譬如一樣的無謂犧牲，七十二個人打進廣東制台衙門，明知也是白送性命的，然而與這無窮錯誤而又有重要意義的海軍開砲比較起來，大家的感覺如何？又如汪壽華君曾有提議，當於某夜擇敢死隊陷李寶章之壁，同時於幾十處令人伏暗處施放邊砲，以爲疑兵，此同一詐僞，然無論何人，讀過演義三國志的，誰不贊汪君是一小諸葛？獨這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的海軍放砲，連深通革命方法的共產黨

領袖陳獨秀先生，却謙虛出來，認爲無窮錯誤，這豈非咄咄大怪事呢？不要性急，我來代他們告訴諸君。在共產黨自己，原一毫沒有錯誤，放了幾個便宜砲，居然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認明共產黨的價值，自然有重要意義，自然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但這件事，何以必要『如八股文章，好像差人的帽子，見得官，見不得朋友，』對了聯共的國民黨朋友，必定要謙言無窮錯誤呢？因爲共產黨朋友，就對我們頂天立地的汪精衛先生，還居老師的地位，是儼然『革命方法』的專門大師，倘教我們學生來放放邊砲，也還說得過去，乃至老師自己的重要意義，不過放幾個撒爛污的空頭砲造出來的，未免落小樣，便有惹吳稚暉嘲笑賣空買空的危險了。所以謙虛無窮錯誤，便叫做諱莫如深；諱莫如深，恐怕別名就叫做卑鄙。

(二)我們力量之表現。在這次行動中，我們力量之表現，終算十分薄弱。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罷工人數達三十萬，所有新式產業工人，城市交通工人，以及店員手工業工人，都聽從了上海總工會的罷工命令，而罷下工來。使帝國主義的機關報泰晤士報，不能不公

開稱許布爾札維克的力量之偉大，與手腕之靈敏，而有上海爲布爾札維克所有，抑爲工部局所有之題語。同時海軍之開砲，爲數年來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他們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鈕惕生說海軍的開砲是西披發了命令，不錯，是西披發了命令。

（按）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得到泰晤士報稱許其力量之偉大，手腕之靈敏，如此價廉物美，正卽列寧在『共產主義之幼稚』裏所發明之以少數操縱多數之策略。但沒有什麼神秘，我住永安公司後身一小醫院中至久，習見英華街邊小廬三，羣聚而稱三道頭無可如何，則力量偉大，姨太太手提包不翼而飛，則手腕靈敏，操業自不同，而情景之相似，實有不可諱者。且余非忽然蔑視共產黨朋友之人格，至於如此。則因連帶感想，實使我無從不輕蔑。蓋彼維亦農先生所稱『海軍之開砲，爲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這是陳獨秀做新青年時代所謂『什麼話』。鈕惕生運動海軍，就是給羅君經手的，約有九

千元，二月廿二夜間的開砲，便是羅君在九千元裏化了四千元，那麼鈕惕生運動不到，羅亦農運動得到，是怎麼講的呢？所謂『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更要笑倒了全上海人。不知道那共產黨活動分子大會的會員，是從什麼西北鄉裏來的，竟大家張開了嘴，聽羅同志向天瞎吹。那天開砲的，一隻叫做建威，是馬尾造的砲艦，大小是九百噸，一隻叫做建康，是德國造的，三百噸的驅逐艦。建康是旗先拉，然後建威響應的。共開十餘砲，是上海人耳朵裏都聽見的。只兩條船名，而且當夜在兩艦內捕住水兵二十八名，是各報載明的。何以會鬧七個軍艦一齊開砲的把戲來呢？這就所謂說謊話是載在共產黨的聖經第一章罷了。可憐汪先生一生清白，爲了革命要新鮮方法，因此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把無行盜妻，吸鴉片，吞沒工人撫恤金，口談新思想的人物，與他並做領袖，共發宣言了；把至醜無行動工儉學生的李龍枝，所謂至偉大的工會頭領李立三一類人物，也算做上客了。然而汪先生頭上套了法寶的時候，還可以反唇相稽曰：『我看見你們討厭，終不及他們嫵媚，』我等也正好權且慚沮而退。

總之，在十九至二十二晚暴動爲止，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差不多全上海全爲西披勢力所籠罩。西披說要罷市，商總聯會已通過決議，印好通告，快要散發。西披說要組織上海革命委員會，就馬上正式成立。所有國民黨左派鈕惕生吳稚暉楊杏佛等，資產階級領袖虞洽卿王曉籟等，都爲革命委員。西披且以公開名義，占得委員一席，爲全國從來未有之創舉。

（按）什麼籠罩創舉等等，他們吹他們的，大家也聽慣了，可以不管。只查最重要的一語，即所謂『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因爲罷工時節，最可慘痛的便是『李寶章的屠殺淫威。』然而在共產的心目中，不見什麼慘痛，只見『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罷了。這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便是那回罷工的大成績，這配叫做『歷史上很重大的運動』，是有『有目標的重要意義』。故於歷述次要之成績，如國民黨左派，資產階級領袖，都加入上海革命委員會之先，先把思重大成績，以淫威屠殺，激起民衆感情，是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共產黨活動分子人人皆知的，姑且『除



外」了，按下不表，這是何等輕描淡寫呢。我們所最可異而要向汪先生刺刺討厭的，便是感情這兩個字。汪先生有名言：『對反革命者言仁恕，即對革命者為殘忍』這就是共產黨所謂感情是最要不得。然而第一先問，所謂革命，為的是什麼？汪先生可說為的是表同情於民衆，共產可說為的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那麼明明都有了感情才革命。就算仁有婦人之仁，是要不得，何以恕字又要不得？所以第二便要問，何以共產黨要行革命方法，對了淫威屠殺，絕無感情，以冷血為可貴？反之又責備民衆，必要挾有熱血的『感情』，供諸公『激起』？這真是汪先生讀熟了共產經，連理性也暫時消失了。

(三)我們的缺點，及同志之表現，可見在這次行動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可寶貴的教訓與經驗，應得舉出來。(甲)我們黨一向缺乏武裝暴動的思想與準備。列寧說，西披要隨時隨地準備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又說，罷工開始，應立即繼以武裝暴動，因為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舉行一個武裝暴動，就可以民衆熱情，壓倒敵人的氣燄，而取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平時既沒有武裝暴動的思想，事前又沒有好好的準備。在二十二晚上，上海海軍七有艦開砲，而我們的羣衆，始終不能集中動作。尤其是浦東方面的二百人，是約好開小輪拖近軍艦，取得槍械，上岸攻打兵工廠者，結果一個都沒有。以致海軍單獨開砲，毫無效果。這都是證明我們事前準備之不週到，此爲第一錯誤點。

（按）共產黨犯幼稚病，雖共有兩解：一則變相的，乃貌似幼稚，而實則奸險；但一則原是正面的，幼稚便是幼稚，如汪壽華曾言有一千工人武裝，便可以逐去李寶章軍隊，現在羅先生又望二百人可以持械上岸，攻打兵工廠，都幼稚得可笑。或有人說，所謂二百人，乃並不是同廣州七十二人一樣，前去革命，止是請他們去送死，待天亮了，做一個血肉狼籍的廣告，利用民衆非常高漲的情緒，激起他們的熱情，整備有所壓倒罷了。那麼，名爲幼稚，實則還是奸險。所謂『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列甯真是精研科學，乃發明革命的藝術，安得不令汪先生拜倒。

（乙）缺乏羣衆政治宣傳工作。這次運動，羣衆與下層同志，多未明瞭同志的意義。後來

革命委員會之成立，大家更是莫明其妙。這都是因爲我們運動做事，祇是英雄態度，獨來獨往，沒有好好做羣衆政治宣傳的工作。此爲第二錯誤點。

(按)共產黨在暗中既要政治宣傳工作，而表面上又要抵賴共產黨有奪取政權之意，因此革命委員會之成立，連他們的黨員，還來不及宣傳，弄到莫明其妙。宜乎如汪先生一類的忠厚長者，更要忠告吳稚暉，共產黨想奪取政權，乃莫須有之事。吳稚暉當時却告訴他，共產黨在上海要立革命政府。汪先生更忍俊不禁的諍我錯誤，革命政府原是爲國民黨。現在他們自供出來，汪先生還莫明其妙呢？還稍有領略麼？汪先生跳向台上，高叫革命的向左邊來的時節，不自覺態度有些英雄麼？

(丙)時機不適合。這次運動與去年十月暴動，同犯時機上的錯誤。去年失之太遲，今年失之太早。要在北伐軍到上海的前一、二天舉行，最爲適宜。此爲第三錯誤點。

(按)共產黨也犯正面的幼稚病，至此已不能自諱。當罷工之先，再三勸他們候到北伐軍將到時舉行，他們不肯聽。當時還以爲在他們革命方法上，想來有重大意義，那裏

曉得他們也自認爲錯誤點。足見他們的方法，也不見得全是高明。

此外我們同志，在這次行動中，有不少不好的表現：第一是各級黨部組織之紊亂，部委沒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同志太胆小，在暴動以前，南北市大慘殺開始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負責同志，甚至反有躲避起來者。暴動後，負責同志多住在客棧，人都找不到，尤其是工會組織員，一大部分是不出來活動，願自藏匿去了。這實在是賣黨賣階級的行動，是亡黨的現象。』

（按）這一節是拆穿西洋景，有目共賞的大文章。但我要奉勸讀者諸公，爲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原諒。雖則號稱共產黨，應該具有三頭六臂；然而知道內容的，也還不過時世造成了新學說，幾個變相的斗方名士，做一種新鮮的鼓吹，於是一般煩悶的青年，換些空氣來發揚發揚。就是北冰洋邊的碧眼先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何況到底是扁鼻頭的黃皮兒郎。所以『賣黨賣階級。』『亡黨現象，』把重大棘刺的正義，羅先生板起了面孔教訓。羅先生是夜到底還坐在電燈如白晝的小洋房裏發號施令，所以沒跟了

民衆站在市街上去，說話也沒有多大效力。嗚呼，古今來革命方法的藝術，雖有新鮮與陳舊之分，說穿了，誰也不過爾爾。陳舊的方法，用錢來買窮苦的民衆去當兵，其結果，多費錢，而挾兵自豪的叫做軍閥。軍閥的大成功，便是太祖高皇帝。共產黨的新鮮方法，用高漲的熱情，來買無產階級去當民衆。其結果，用錢過少，而拔以衆自家的，叫做民衆領袖。其大成功，便是第三國際的委員長。公私度狹，當然有些兒不同，却難說有多大的差別。所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羣衆自羣衆，部委自部委，何等分明。又所謂『尤其是工會組織員，』，『工會自工會，組織員自組織員，又何等分明。所以爲羣衆而革命，爲無產階級而革命，戴上的面具，原同子惠元元，平等自由博愛，一樣的好聽。可惜汪先生付託陳獨秀李立三一類的大人物做起來，難道不是用羣衆來做工具，用無產階級來做工具，還有第二句話麼。所以買羣衆來當兵，還給他一些步伐，一這訓練，並勉力些，給他一些精良器械，然後叫他去當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機關槍，或者有倖。乃驅不費一錢的民衆，叫他站到街上

去，把熱情去抵當機關槍，除了部委躲起來，組織員藏匿起來，讓民衆去血肉橫飛的大慘殺，有什麼第二方法呢？若說借此血肉橫飛，就可以做大登廣告的方法；這方法，就是我們家鄉強丐硬討，開膛破肚的方法，這未免太陳舊了罷。

汪先生呀，注意方法的選擇罷。（這第十二號的區秘通信，還有兩段，因無關革命方法，當再於別處選引了。）

## 再以確實證據與汪精衛商榷

吳稚暉

### 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

△踏破鐵鞋無覓處

△却在人家頑笑中

左右派之分，爲各國議會中極尋常之名稱。大都在野而與政府黨爲敵者，卽爲左派。又挾理論過高，曲高而和者寡，常處於在野黨之左，卽所謂極端左派。所以左派是含有進步的，急激的，及革命的，或不妥洽的之意味。所謂右派，便有穩健的，妥洽的之意味。意味皆從比較而感生，到底左派真是前進，或是橫決，右派真是落後，或是適當，不能一言而定。况一涉氣矜用事，專以感情分左右，設有兩人於此，一則醉舜婆娑，一則凝思獨坐，卽無人不能定前者爲左派，後者爲右派，而左右尙何價值之有。今共產黨之分人左右，而國民黨之左右自命，大都如此膚泛。否則列甯史達林等右派也，何以執大權？脫落斯基等左派也何以

屏不用？則可見革命之進行，不必一味向左，而左亦止是更急於右，（或者犯了幼稚病），而不必意勝於右。

雖然，汪先生國民黨也。國民黨本是急先鋒，本是暴徒，果其偏左，自亦同輩所贊同。但是可憐極矣，如我上文所舉左右之理論，尙爲我等癡人說夢。若共產黨心目中中之左右派，不過一種開頑笑之分化作用。所謂第三國際者，嗾其無賴鮑羅廷陳獨秀輩，造作左右名目，鑽人豬精腹內，舞其金箍棒。所謂左派者，便同誰給什勇巴圖魯，誰賞三眼花翎。所謂右派者，便是誰爲名教罪人，誰爲斯文敗類。與滿奴侮弄我輩祖宗，同一可惡。我輩仍在外國鬼子之圈套中，陳獨秀等仍實做其張邦昌吳三桂而已。所以左右派之名詞，已爲不正當之名詞，若加以爲人所侮弄，誠有受之而不怒於言怒於色者，必非夫矣。遙憶汪先生對客揮筆，奮筆而書曰，『革命者向左邊來，』態度則英雄矣，情形實癡愚也。如其不信，請以他們的真憑實據見貢

他們所謂區秘通信第十四號者，題目則爲『最近全國政治局面及革命運動的趨勢，』不



知究有幾頁，所搜得者，止存前四頁，故亦不悉其月日，惟以詞意度之，當在三月上旬，黨軍正入浙境時也，其首三頁皆述當時南北情形，與本題無關，今止錄其後一頁之詞如左：

『因此，現時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已成爲革命中最嚴重的問題。國民政府之遷南昌，改訂省黨部選舉法，摧殘工農運動，種種問題，都是這個右傾潮流中最顯明的事實。我們處在這個右傾局面之下，必須拿出向右進攻的決心，無論任何方面，都不能讓步，因爲讓步就是斷送革命，而且必須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勝利後，才能剷除社會右派之內應，才能戰勝社會的右派。我們在這個鬥爭中，須注意下列二點：

(一)不可使這個鬥爭，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無論在任何鬥爭中，都要拉出左派，與左派聯合進行。

(按)說到理論，終是堂皇正大；一涉方法，便手段來了。若『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西洋景馬上拆穿，所以要請左派出來緩衝。天生左派，是他們掩護了進行的工具。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西披先生們自寤寐以求之矣，倒是汪先生替他們寐

寤以求之，得無報其『聯合』之雅誼乎，誠待朋友如此其忠且謹矣。

(二)所謂與左派合作，是要以我們作主體，使左派來幫助我們；不是要左派為主體，我們去助他們。因為左派的力量，現在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必須要我們去領導他們鬥爭，作他們的先鋒。以前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只是要左派出頭去幹，我們只在後面出主張，左派力弱，所以往往失敗。這不但使革命工作受了影響，而且是左派抱怨我們，今後務必改正這個錯誤。在鬥爭中，形式上是左派與右派的衝突，而不是簡單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在實際上要我們去衝鋒，領導着左派前進。』

(按)看了上半截，因為現在左派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替他衝鋒，真是一片好意；直看到形式上不是簡單如何如何，則骨子裏止是簡單的如何如何。左派左派，止待強硬團結起來，便供人家在後面出主張，形式上替人出頭去幹，而左派真上好工具。嗚呼左派。

『我們要領導左派向右進攻，必須要有具體的行動政綱，向左派領袖提出，向左派羣衆

宣傳。這個行動政綱，已規定下列七條：一，統一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二，繼續北伐革命的戰爭，殲滅奉直軍閥，召集國（以下缺）』

（按）規定七條，可惜只剩兩條，否則必又大有可觀。

在區秘通信第十二第五節，題目爲『我們的工作』，共分十款，今錄其二九兩款如左：

『（一）準備第二次武裝暴動。要對羣衆解釋，武裝暴動，是以擴大的民衆的熱情，跑到街市，隨時隨地以奪取武裝，以打倒敵人的勢力，建立自己的政府等意義。』

（按）建立自己的政府，請讀者記好。

『（九）加緊國民黨工作。甲，培養左派領袖；乙，發展國民黨員，以取得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

（按）小資產階級，乃是工人的同盟者；左派領袖，乃是西披衝鋒時同盟者；國民黨，乃是共產黨不能簡單出頭時之同盟者。同盟者，同盟者，都是進行之工具，圖窮而七首見，止是供他們做工人運動，建立自己政府。可憐國民黨，止配作小資產階級

的代表，不自慚形穢，真是汪先生常罵別人的所謂「無恥。」又有人說，共產黨遮斷工會，不令與國民黨作緣，亦在夾縫中躍然見告。培養左派領袖，培養得妙，想來用的方法，便是南京便宜坊的填鴨法，一笑。爲徐季龍鄧演達則得之，真難乎其爲汪精衛矣。

又有中央政治局致湘鄂贛等區委同志書，共五頁，第四頁上有一段，錄之如左：

『並且我們已有七千黨員，二三百萬革命羣衆，至少比右派的勢力大得多，毫無疑義的，可以站起來爭取革命領導權。我們若不肯當衝，而讓左派當衝，便是讓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小資產階級永遠不能領導革命。』

（按）好了，左派就算破產，不能領導革命，而且永遠。汪先生用九牛二虎之力，尙寤寐以求之，真所謂寤則立直了做夢，寐則睡倒了做夢，自覺氣順言宜，豈知貽笑大方。

以上零星摘引，左派之醜態畢露，讀之而不爲左派作三日惡者，必非人情。更有朋友，

於本年一月時，見西披朋友讀一報告訖，即隨手扯碎，置於字簾，此友俟客散，乃就字簾中取出，黏貼而讀之，則爲開會傳單一紙，區秘通信第七號兩紙，僅破裂十許字。今先錄傳單如左

『□□兄：

茲定於本星期六『元旦』上午八時在楊樹浦榆林路東首路北錦福里第二弄第三家（由外白渡橋乘公共租界八路或九路電車至老怡和紗廠下車往北直下步行直到會場約費二十分鐘）開活動分子會，望兄準時出席，并嚴守下列諸條件：

- 一、不准遲到或缺席，
- 二、不准穿西裝
- 三、不准在路上訪問，（老怡和紗廠下車後有樞蔚交通等候指示，）
- 四、路上遇見同學不准招呼，
- 五、老怡和紗廠下車後不准乘坐黃包車。

朱紳 十二月三十日

更把區秘通信兩大紙，一氣載完在下面後，再加按語。（原本橫寫右行，今改直寫下行）

『區秘通信第七號』

最近中口特別會議，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

我們黨內對於國民黨左派，有三種意見。一，中央以爲國民黨中實有左右派的區別，有許多仍然代表地主劣紳土豪等封建勢力的利益與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理想者，仍然徘徊於買辦地主與工農羣衆的利益之間，有時還偏向前者，他們對於民族運動，固然調子唱得還高，他們始終公開的，或不公開的，主張軍事獨裁，而不贊成民衆政權，在民主革命的意義上，這般人也只能屬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義上，代表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些最大多數民衆的利益與思想，而反對封建勢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爲國民黨中這兩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二，在廣東的同志，多否認國民

黨有什麼左派，他們的意思是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只有在爲民衆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奮鬥，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勢力，現在只種上層某人某人爲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們又說：『只贊成有解決土地問題的人，將來或形成左派，現在沒有左派；』他們以爲現在既然沒有真正左派，我們若因爲幫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當的事。三，十月中央聯席會議，黨團的意見，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粵區同志的中間，他們否認現在的國民黨有真正的左派，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可是同時他們却承認有所謂『準左派』，他們說：『過於忽視眼前上層的左派作用，於實際工作上許多難行之處，』『這種準左派的軟弱搖動不一致，是不必過分悲觀的，在沒有羣衆的時候，在上層自然只能有這種左派，而他們剛一組織的時候，更只能有這樣的東西，但這種準左派，對於國民革命，是有相當作用的，民校改組後，左右派之分化，促進國民革命之發展不少，因爲準左派與右派鬥爭，事實上不能不接近我們，而且不能在主張上與右派一致，而且有時爲着要得羣衆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較的站在民衆方面。』他們這些見解，確

有點與粵區同志不同。但他們所說『真正能夠負擔國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說一般被壓迫的學生商人農民市民手工業工人，』這一類的話，又完全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而却未曾拿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他們這些錯誤觀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現在不能拿贊成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因為土地還未有問題。目前的農民問題，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稅雜捐，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導農民從這些要求的實際爭鬥，到研究窒礙的土地問題，便是停止爭鬥。若希望馬上就有一個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左派出現，比希望現在的左派，能夠實際助農民目前爭鬥，更為幻想。我們對於國民黨左派的概念，只是其現在分子中，那些比較左傾些，而不是一個固定標準，高懸空中的未來派。若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會的左派，和國民黨左派的區別，更為可笑。

我們要記得，從興中會到現在的國民黨，他們的進化，是有時間性的。所謂左右，乃比較之詞，並沒有固定的界說。社會的左右派，和一個政黨內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贊成解



決土地問題的國民黨左派，現在又還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不必像王麻子張小泉陸稿薦一樣，嚴格的去分別什麼算真正左派與準左派。

爲什麼說他們不算真正左派呢？因爲他們沒有具體的政綱麼？十月聯席會議後，已經有了。因爲他們還未形成有確定政策的一派嗎？那麼根本批評起來，整個的國民黨，還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因爲他們時常搖動不一致麼？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永遠是搖動不一致的，因爲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汪精衛還未死。因爲他們沒有武力嗎？（據毛潤之同志報告在粵同志，有人說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這更是笑話，而且實際情形，並不像表面那樣簡單。因爲他們沒有羣衆嗎？不是他們沒有羣衆，只是羣衆和領袖離着。因爲他們只是一個傾向，而不是一個團體嗎？他們也和右派一樣，有領袖，有羣衆，而且比右派有更口羣衆，汪精衛一回，便會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團體。因爲左派現有的政綱，已不能滿足農口口要求麼？這顯然不是事實，農會組織，減租減息，武裝反抗

土豪劣紳等，左派的政綱，口是農民羣衆迫切的要求。因爲他們只是口頭上的左傾，在行動上不能站起來貫徹主張麼？這固然是現有左派的弱點，然而也不能說他們始終沒有左傾的行動，即令僅口言論上的思想上的左傾，已經在革命運動的影響上，在我們與國民黨合作的關係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爲什麼要承認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實，並且我們和國民黨合作的重要關鍵。我們當然不可口信現在已經有一個強固負責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們和右派間的緩衝，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認左派的結果，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隨着右派壓迫工農羣衆；一是由我們領導羣衆，直接和右派衝突。既然沒有左右派的分別，我們和右派衝突時，便表現出來是西披和整個國民黨衝突。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派，都願意我們走這兩條路。粵區同志現時所走的就是這兩條路，他們否認左派之存在，恐怕因爲特別幫助他們得罪右派而上當，自然不必特別和他們親密合作，他們感覺得我們走開了，也恐怕上了我們的當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邊去，來對付我們

，這是客觀上必然的結果。這種否認左派的謬誤理論，已在廣東收了惡結果。粵區同志若不即早改正，別的地方黨部若不即早防閒，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

因此，中央會議堅決的反對同志中否認國民黨現在左派之謬見，堅決的主張國民黨中確有左派存在，雖然他們動搖軟弱不一致，堅決的主張要努力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不是獨佔，）並且幫助他們獲得他們的羣衆。（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

至於怎樣幫助他們，應有上中下三層的幫助方法。第一，對於他們，幫助他們的上層領袖，是斷斷不可忽視的。我們要幫助左派的領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結合，有理論，有羣衆，有力量，有政權，有黨權，若只有左派羣衆，而無領袖，則仍然是C P的羣衆，而不是國民黨的羣衆，羣衆和右派衝突的時候，將仍然形成西披和國民黨的衝突，而不能明白表現出來是左派和右派們衝突。我們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三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須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尤其

是農工運動的實際爭鬥中，不可幻想他們能夠和我們取同樣的態度。我們對他們的讓步，畢竟比對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們有力量，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們要在社會下層中，即手工業工人店員及農民羣衆中，他們自身才有力量，站得起來和右派對抗，才能夠減輕他們覺得西披馬上就會奪他們的江山的忌妬與疑懼。並且有了左派羣衆，尤其是黨內的左派羣衆，才能夠推動左派領袖左傾，減少其軟弱與搖動。第三，我們要幫助左派造成中層勢力，做上層左派領袖和下層左派羣衆間口鏈鎖。即是幫助左派設立黨校，宣傳員講習所，工人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等，以養成他們接近羣衆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領袖與羣衆間之隔離。我們對於左派，這上中下三層幫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將來的左派，必然比現在更有力量，和我們聯合抵抗右派。

至於怎樣幫助左派結合，我們應取下列方針。一，我們贊成左派的結合，有獨立的政綱與章程。二，在左派未甚分化，須有顯然衝突的地方，或右派沒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數比較可靠的左派領袖之結合，我們幫助這些領袖，抓住整個的黨部，在中央左派領袖領導之

下，執行左派政策，不必進行左右派黨員羣衆的結合。三，在左右派衝突的地方，則宜用學校講習所新聞社學術研究會俱樂部等形式，結合左派羣衆的許多小團體，於左派領袖領導之下，不宜有整個的結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組織，惟可由左派領袖時常召集這些小團體的代表，開聯席會議，西披亦可正式派代表參加此聯席會議，西披分子不必公開的加入這些小團體。

現在左派的結合，已經有了幾種組織。一種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聯席會議後結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聯席會議的各省代表，散會後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員。他們有了聯共聯俄，反對西山會議派，擁護孫中山廖仲愷的工農政策，擁護汪精衛爲領袖，這四條政綱，而尙沒有組織的名稱和章程。又有一種是黃埔學生發起的『左社』。他們有獨立的章程，對於社員以外的人，須守秘密，有沒有獨立的政綱，十月聯席會議所決定的最近政綱，這個『左社』已在湖南湖北開始發展，加入了許多不得志的政客，帶了濃厚的地方性，在湖南『左社』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結合。我們對於口

□尙未反共的『左社』分子，應警告他們，不便有獨立的章程，不宜急於成立整個的組織，不必亂□□左派份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對於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應聯合未加入『左社』的分□，□以打擊。朱紳秘書處一月三號。』

（按）這一篇大文章，要知共產黨待國民黨之真相者，不可輕易讀過。雖此處彼處，披露其零星秘密之記載，其終究欲消滅國民黨之計畫，無不可以概見，然終不如此篇之詳盡。且他處儘管有言外之意，尙爲左派諸公慶幸，國民黨亡黨而後，諸公必可如螟蛉爲蜾蠃所負；豈知此篇所告，左派則爲小資產階級之代表，必不足當高明最後之一顧也。

共產黨之所最注意者則爲廠工，廠工彼之革命主力軍隊也。而彼所最痛心者則爲農。因農亦小資產階級，逼住列甯主義失敗，忍恥而以新經濟政策騰笑於世界者，即農爲之梗。故以被壓迫的學生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皆歸納於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連同農民，都算左派的羣衆；即所謂『並且幫助他們（左派）獲得他們的羣衆』

是也。更立表以明之如左：

國民黨左派的羣衆（皆被壓迫的或革命的）

城市小資階級——商人（店員）市民

手工業工人

智識分子——學生

農民

此國民黨左派的羣衆，亦即區秘通信第十二號所稱「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之同盟者。同盟者而已，共產黨並不認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學生，農民，爲他們本系之人物。同盟者之意，亦即如國民黨左派一樣，暫充緩衝之工具而已。

共產黨的羣衆

廠工

共產黨之苦處，未到時候，要拿出共產黨的旗子來號召，必遭羣起反對之危險，故必隱於國民黨之背後來進行。然要行彼之革命，必要把也有革命性，異乎彼之革命的分  
子滅絕，才可以毫無抵抗。所謂也有革命性的分子，又即國民黨。於是不得不將國民  
黨分化，就把國民黨的一部分，來打倒又一部分，屢次分化，屢次打倒，愈打愈少，  
迫時機已熟，便一齊打倒，把自己出頭。因而利用人之虛榮心，愛好心，立起左右派  
之名目，形成左派則如何高明，左派之界說，則取愈近於共產黨，或有利於共產黨者  
定之。於是凡使左派打右派，無異乎共產黨打國民黨，然而絕不可使人感覺真是共產  
黨打國民黨，故必要養成左派領袖，領導左派羣衆，以與所謂右派者對壘。尤深忌共  
產黨自去領導左派羣衆，以與右派對壘，表現出還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則時機不熟而  
行此，他們會致意粵區同志，『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即此次他們在上海犯  
了幼稚病，果然鬧出莫大的損失。幸而汪精衛還有左派迷，仍領導了武漢殘餘羣衆，  
替他們暫保餘喘。汪先生若果然看見了這篇區秘通信第七號的大文章，汪先生定然止



好自殺。即學生們戴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高帽子，得意洋洋，亦必羞死。他們文章裏最露骨的一語，便是『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說明合作止是時代，便顯出必有時代，終須不合作。到了他們要不合作，於是他們自問云，『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又自答云，『汪精衛還未死，』到了彼時，不許你有中心領袖，汪精衛果還未死者，亦只好自殺了。

所謂左派的把戲，竟惡作劇如是。真用得我向來作文之秘訣，借着批評之曰，『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汪先生還在漢口替他附會什麼總理協理的三大政策，並肉麻其分類之子曰曰：『（一）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二）革命之聯合戰綫，更加擴大而鞏固，』不知做什麼夢。汪先生果然已進了共產黨，我當翹一拇指而贊之曰，學舌還學得像，夠列陳獨秀之門牆矣。若猶止自稱爲國民黨左派，定當爲孫中山先生伸手一搥，跌出三丈外也。（並非懲罰，乃令跌醒頭腦耳。）

## 最近寄汪精衛書

吳稚暉

精衛先生執事：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再奉書於執事。如以私交言，將出不遜之言，自應求先生恕其冒犯。倘以公義言，則言之激直，有不敢不盡其詞者。今有慈父，殞於郊，忽以變殭屍聞，每夜必出殺人，行路裹足，則剖棺而視，白毛毳毳然，遍於體，非復慈父狀態，爲之子者其哀痛何如？又有愛子，隔日尙趨庭溫語依依然，忽明日由塾歸來，怒其目，擲書包，趨廚下奪菜刀執之，逐殺家人，不得已檻於書房，又日夜叫囂，伺隙則破柙出，較劇盜爲猛，非復愛子，爲之父者其哀痛又何如？我輩愛先生，敬禮則如父，期望則如子，而先生今日狀態，已變成殭屍及瘋漢，我等哭笑皆不可，痛苦極矣。弟等之所以有此言者，以前不必論，卽自今年四月一日相見而後，至於今日，先生之離奇怪誕，真使人莫名其妙。如先生果已歸化共產黨，不過借國民黨爲一種見客之面具，是則先生已服膺陳獨秀而爲之第二矣。先生居武漢三閱月，代共產黨恣意破壞國民黨，亦固其所。又如先生果如淺人之所測

，不過好爲領袖，貪聯共之策，植勢可深厚，故至于山窮水盡，又必詭言反共，而不忘倒蔣。是二者而果信，則先生僅僅變爲殭屍，原亦可言不瘋。

但最近一週前，七月十八漢口中央日報發表所謂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之宣言，詞氣之間，有所謂共產黨『決議案之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似乎主席團中的先生，絕非立在共產黨方面，而又灼知利用共產黨之不可能。然而何以又其勢洶洶，如欲率領張發奎之共產軍，願爲流寇，圖擾浙閩兩粵，爲最後之奮鬥？難道目觀共產黨禍湘禍鄂禍贛，慘痛不忍正視，復欲率此醜類，再禍鄰境，再禍鄉邦乎？汪精衛復何面目詆譏昔日之禍粵者，彼輩止楚弓楚得，以爭私利而已，而汪精衛乃率赤帝醜類，賣國劇盜，再據海疆，以便海參威之勾通，是先生將爲吳三桂猶不食其肉之舉動，豈非由失心而瘋，且厲氣所積，又變爲殭屍耶？

今且先載七月十八的中央日報政委主席團之報告於左：其言曰：『本黨於今年三月開第三次會議，議決本黨與共產黨開聯席會議，討論一般的合作辦法，尤爲本黨對共產黨之

誠意的表現。自有此決議以後，本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應邀集共產黨諸負責同志，開聯席會議，或每日一次，或間日一次，開會時間往往延至四五小時，對於國內外一切問題，皆提出討論，共同解決。政委主席團以爲如此辦法，必能使容共政策，得更大的效果。

『不幸六月初旬，政委主席團忽然由共產黨負責同志交給一個秘密決議案，這決議的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這一位負責同志的姓名，此時不能宣布，所可聲明的，這一位負責同志，不是以秘密形式，而是以開誠形式，來與本黨商榷。惟共產黨方面，立即將這一位負責同志驅逐出去了，其罪名是洩漏秘密。共產黨既然如此瞞神瞞鬼，所謂聯席會議，豈不是一種具文，此不能不令政委主席團大爲失望的。』

『今祇將這議決案的內容摘要宣布如左：

(一)關於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  
(政委案)這種主張，對與不對，姑且勿論。但這決不是本黨的主張，民生主義裏說

明『耕者有其田』的意義，但是同時說明『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總理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說耕者有其田的意思，再三叮囑，要求這種主張之實現，必須農民起來，在政府領導之下，以和平方法，得到解決。如今他們却主張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豈不是與本黨的主張大相違背？倘使共產黨方面在聯席會議上提出這種主張，與本黨商榷，甚至爭論，甚至決裂，尚不失為相見以誠，光明正大。然共產黨方面絕不提出這種主張。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軍民衝突事件發生後，共產黨方面也承認農民運動的幼稚與錯誤，也承認應加以制裁。却不道湖南農民運動所以有此幼稚與錯誤，完全是不受本黨上級機關之指導弄出來的，而這却是共產黨方面的主張。共產黨方面，如今却又以本黨制裁農民運動之幼稚與錯誤為藉口，而說本黨不要民衆了。

(二)在中央委員中增加新的領袖，將老中央委員代替了。

(政委案)，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須知中央執行委員是由全國代表

大會選舉的，如今却將新的來代替舊的，這豈不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織，豈不是根本的破壞中國國民黨？

(二)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

(政委案)，這種主張，更是荒謬，其破壞本黨之陰謀，可謂盡情暴露。

(四)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

(政委案)，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國民革命軍，而建設共產軍。本黨自實行總理容共政策以來，在武裝同志中，向來沒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的區別，每每對武裝同志演說，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無可分析，這是本黨負責同志所諄諄而道的。如今他們却偏要分出誰是共產黨員，誰是非共產黨員，要武裝兩萬共產黨員來消滅非共產黨員的軍隊。所謂工農分子，其名則美，既經挑選，其必為共產分子，不言可知。這種主張，如果實行，則國民革命軍與共產軍戰爭，必不可免，這真所謂大亂之道。

(五)以知名的國民黨員作領袖，(不是共產黨員)，組織革命法庭，處罰反動的軍官。(政否案)，這種主張，不值一笑。在共產黨看來，知名的國民黨員，不過是共產黨的劊子手。

『政委主席團自發現這決議案以後，因關係重大，不能不審慎考慮。既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又不能不為本黨生命及國民革命前途謀安全發達之保障，乃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正當審慎考慮之際，而七月十三日又有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對於本黨，厚誣醜詆，無所不至，並鄭重申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這是共產黨員破壞本黨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國民政府是本黨執行命令之最高機關，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乃偏說退出國民政府以後，仍在國民黨，於理論上實為矛盾。且國民革命及各級政府機關，都屬於國民政府統系，既然退出國民政府，則在國民革命軍中，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

『本黨既發見了共產黨方面危害本黨生命的議決案，又發見了共產黨方面退出國民政府

府的宣言，容共政策，已可謂破壞無餘。然本黨仍體念總理遺教，對於共產黨力求容忍。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曾於七月十五日通過決議案原文，與共產黨七月十三日宣言，兩相比較，誰是極意保持革命聯合戰線，誰是任意諉過他人，藉端攻擊，讀者必能一覽無遺的。

精衛先生，吳稚暉讀完右邊所載之宣言，最爲難過，從頂門麻起，麻到腳底，肉麻得耐不得者，就是『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也就是『既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爲什麼爲了這三句話，肉要麻到這般田地？就是把列寧的恨世，認做革命，尤其是把鮑羅庭那班賊強盜，算做革命黨，更十分叫耳朵吃虧，把陳獨秀李立三那班惡徒，也算做革命黨，同他們結起革命的聯合戰線來，還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何物共產黨，有如此魔力，能叫白面書生的汪精衛傾倒如此。汪精衛不知如何中了風，着了魔，如醉如狂，並香臭黑白，一切顛倒，竟放任那班惡徒縱惡了三年。中山先生的容共，批示在鄧澤如先生的呈文上，批得清清楚楚，止爲他們要借共產搗亂，妨害國民革命，所以收容到國民黨裏來，叫他們服從三民主義，停止他們錯誤的共產政策。精衛先生，你發什麼瘋，要同他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



結起革命的聯合戰線來呢？

所以先生在武漢綜合演講之詞，訂成一小冊，不久尙有此間報界的忠厚長者，同你對牛彈琴，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資產階級民主政體，辨論起來，他還諷示我應當辯駁。豈知我在一個月前，便大澈大悟，覺得先生不過癡人說夢，何必化了氣力，我們反來對質策，做史論，徒然叫那班共產黨的惡徒，坐在旁邊好笑呢。因爲主義政策，共產黨的實際，那裏有這麼一回事，我對旁人早說，汪精衛先生替共產黨辯護，若共產黨果有一毫實際，果然是無產階級專政，我當撲通的跪在地上，受共產黨的洗禮，其去馬格斯牛格斯更十萬八千里。共產黨，我在一個月前，尙信他們有合於張溥泉先生品題的，叫做強盜主義，我也曾經賞贊他，稱他爲有訓練有組織的李自成張獻忠主義。然而一個月來，我却大大以爲不然，那裏夠得上強盜，更那裏夠得上李自成張獻忠。強盜李張，都被共產黨笑爲英雄氣概的一種，他們還嫌強盜方法太老實。共產黨者，簡直是一個寡廉鮮恥，萬惡千刁的毛賊，如是而已。請以一事作證，自從反共以來，曾聞有捉到共產黨，臨死戟指痛罵，慷慨就死者乎？無不叩頭乞命

，聲淚俱下，以求倖免，此非彼等之卑鄙，仍是彼等之策略，苟僥幸得釋，而搗亂如故。所以凡稍有一知半解，具些少的人根人氣者，決不會成共產黨。凡成共產黨者，決然再沒有一毫人根人氣，能轉移其賊性。何以辨其爲共產黨，卽其人第一先要終身沒有一句真話，第二以能騙人爲第一種道德。所以他們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無產階級有產階級，什麼革命戰線革命方法，都不啻若自其口出，我輩最好惟掩耳不領教。猶之乎你替賄選議員去談國利民福，真算你的倒霉。汪先生還要替他們去結革命聯合戰線，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我連帶想到了那個鑿頭鼠目的陳獨秀，肉麻呀，真正肉麻。

先生若說我言之太過，我自然也原諒那班赤俄，他們止是遙遠的革命，綿亘了一百五十年，終不成功。眼見一票一票的人送到西伯利亞去死，所以積忿成恨，積恨成厲，遂變爲什麼當也不肯上，止要能達洩忿目的，什麼手段都肯用。因爲什麼手段都肯用，所以什麼說鬼話用騙術，都算做最高革命方法。至於共產主義，無產專政云云，都是說鬼話用騙術的材料。你看木司科，無產階級整千百的睡在火車站待合室的內外，那專政的，止是幾個說得鬼話

更像，用得驅術更辣的共產黨。所以蘇俄也居然要冒充世界革命黨，且倒慢些瞎說，何況要同他結革命聯合戰線呢。至於中國的共產黨，更是不堪，他們並無什麼忿恨，簡直閉了眼睛一想，都是造假鈔票的詹大悲，痞棍的李立三，無行文人的陳獨秀，一班頂骯髒的垃圾，成起來的糞堆罷了。

精衛先生呀，你何以至死不悟，還要率了瘟臭的小共產黨張發奎等，去擾亂父母之邦呢？你到底何時因天狗星經過你的睡床，你才變了殭屍？你飲了什麼狂泉，就失心的發了瘋？我細細追原，原可原諒你，因為你在北京看顧總理的疾病，太勞苦了，亘兩三月沒有好睡。陳頌平先生批評上海店夥，對客沒有好聲口，止為睡眠不足，肝火一旺，容易失去常度。何況你是數月不得好睡，嗣後且亦果會激發肝病。先生至今的如醉如狂，大約是肝火太旺。果然止是如此，願你在廬山為長時間的休養。我們哭笑俱不可，痛苦萬狀。話太激直，望你多見諒。弟吳敬恆頓首，七月二十六日。蔡李兩先生亦寄聲候候你。

## 讀了汪精衛『分共以後』的贅言

吳稚暉

(上)

此番汪先生到上海來了，已有十天，不比以前的匆促，所以他雖一樣冗忙，已有工夫，談論他的近見，發表他的政論。我們屢接他的言論，又看今天『分共以後』的文章，都滿意到十二分。一樣一句話，在他口裏說出來，格外精警，格外清切，是乃他的天才，別人本是及不來的。通國的人都相信他是個惟一的柱石，就是總理所謂知難行易，他是知得最透澈。

我今天還有一點要來做這贅言，就是爲了最近廣東的變動，引起我們重大的疑懼。若說他們不過是地方衝突，我們短視的同志，也不少這種衝突的錯誤。在我個人，雖然很盼望大家覺悟，然各人要做急色兒，騎着馬去尋馬，阻礙一點大局也只索由他們去自悟。說句腐敗話，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我們沒用的土老兒，且關了門，塞着耳朵，讓他們去鬧那一斤還是十六兩的笑話。再說那黃琪翔打倒黃紹雄，他們姓黃的一家人去火併，用得着我們去疑

懼麼？並且以最近的把戲而論，顧孟餘先生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會打起來，他在漢口，唐生智便被人打起來了，他到廣州，黃紹雄又被人打了。難道唐生智可以被人打，黃紹雄就不可以被人打，止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對黃琪翔張發奎便有異議，也就不公平了，如此，更何所用其疑懼呢？但是，簡單說是地方衝突，幾乎黨裏黨外的人，都相信不到一十二分。說南京去打唐生智，是第三國際的俄國人在後面發蹤指示，雖三歲小孩，也笑他滑稽。若說黃琪翔張發奎的舉動，在地方衝突之外，另有一些蹊蹺，連汪先生對我面講，也保不了他裏面沒有共產黨。尤其駭得我一身冷汗的，汪先生會要親去消弭他們的共產計劃。先生說，『消弭得快，便可無事，若逼得緊了，難保不逼他們到那條路上去。』阿唷，那種不南走越，便北走胡的人物，我們有多少消弭的力量，用得出呢。況且共產黨都可因為逼得緊，便居然做了，這種人連共產黨都會上他當的，我們有什麼誠意，會使用我們的消弭法，去請他們領略呢。就是連日李任潮先生發表的過去經歷，也有參考的價值，而今天何香凝先生亦言廣州盛傳張發奎去香港，曾與楊匏安等接洽，都沒有張發奎等告訴汪先生，止是反

對南京特別委員會，那種簡單。今天報上汪先生告訴新聞記者，用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態度，止把他們的表面文章說說。果然止是反對特別委員會，關黃紹雄什麼事，尤其關代表促開四次全會的李濟深什麼事，尤其關黃埔學校什麼事，都蹂躪到了。難道止不過恨了毛廁，拿便壺出出氣麼？汪先生是誠篤君子，不眼見，是不肯逆臆的，我們那裏敢來修正先生的談話，我們是懷了疑懼，不能不加贅言。

我們的疑懼，是生怕漢口反共，第三國際的俄人，已定下計劃，別尋道路。據近來杭州搜出來的共產黨秘密文件，頂注重便是廣東。因為俄國要先裝五萬枝槍，來武裝漢口的無產階級，是三數月以前的事。然而沒有海口可以輸入，所以攔在海參威，等候裝運。他們本盼望葉賀在汕頭成功，不料有那不識時務的黃季寬先生，把牠打散了。不到一個月，黃張却把黃季寬作爲新軍閥定罪，這不是一滴水剛剛滴在油瓶裏，不能不使人由詫怪轉到疑懼麼？

疑懼共產黨，是全世界公共的事，就是爲他手段凶惡，絲毫無革命意味。李石曾先生常說共產黨是極舊的右派，他們是幾百年以前的把戲，最近在宜興無錫，那種搶東西，殺老婆

子，全然是賊強盜的行爲，在浙東竟宣布要做流寇，果不出李先生所料，到三百年前去，同張獻忠携手了。他們常笑人有封建思想，有英雄氣概，他們要想做草澤英雄，封建他們做俄羅斯的張邦昌，此外還有一毫餘義麼？

現在一般人最錯誤的，便是說中國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我們起初誤認蘇俄是個革命黨，並且便是誤信了中國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那句糊塗話，便很相信加拉罕鮑羅庭的蠱惑，說『你們中國是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我們幫東方民族，止幫他國民革命，我們對歐洲，方去鼓吹共產革命，』這真是他們在那裏下部洩氣。什麼叫共產革命，種類也多極了。比那馬格斯牛格斯高明得多，圓滿得多的學說，也不知多少。就是馬格斯儘管淺陋，他說的資本發達，共產革命愈近，也有數分理由，美洲就天天在那裏實行，着着在那裏進步。難道革命兩個字的神聖意味，止是拿殺人放火來代表麼？猶太人是一種嘴巴最硬的民族，俄羅斯人是一種最專制的人種。猶太人是受了三千年暮氣，俄羅斯人亦經過一百幾十年革命，終不成功，於是結起一種怨毒，聚集在多數黨的身上，掛出羊頭。是什麼馬格

斯牛格斯，什麼階級鬥爭，世界革命，實在是賣他們的狗肉，便是欺騙無產階級，來幹殺人放火，達他們少數人的肉慾。便是汪先生『分共以後』裏說的，『共產黨叫得最響的，無非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以無產階級獨裁爲目的，要做成無產階級的國家，但考之實際，何嘗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不過是幾個無產階級領袖的國家便了，幾個領袖，各自以一般無產階級做背景，來奪取政權，一般無產階級，不過做他奪取政權之犧牲。』汪先生給我們，這種明快的判斷，我們便愈加明白。我再本了良心，進一層推講，凡從古到今，什麼獨裁皇帝，封建侯王，共和國家，都有欺騙的好聽的招牌，叫人來犧牲，然而他們遮羞的面具，歸結到一句不嗜殺人，叫犧牲的範圍愈縮小，沒有直把殺人放火悍然的作爲訓條，毫無忌憚，肆他們的獸慾，還成功理論的。這就是紅海印度洋邊一種原始人種，善造空中樓閣的把戲，基礎是築在無條件可以修正的自信力上，只是人類萬萬年原始神話時代，應經過的一段歷史，宗教是過去了，又要叫共產黨出來做個結尾。你看舊社會裏三個教主，兩個都是猶太人，一個菩薩，便是亞利安血系，鮮彌族的近隣，都像賣膏藥的硬嘴巴，當面欺人，沒有半句認錯。



但態度各各不同，佛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但猶太血較少，所以最溫和，止是說，你應信我，你不信我，也由於你，你終究還是信我。因此魔力亦最大，不需強力傳布，入其牢籠的更多。其次是猶太種的耶穌，一口不移，是三位一體，全智全能的超人，態度還溫和，是說，你不信我，並且害我，終有你末日裁判。就是爲這末日裁判，要行使最後的威權，所以有些熱心家，要想救免上帝爺爺的總算賬，便奔走流汗去傳布了。又是猶太的摩罕墨得。這位先生的歷史，還夠不上一個清白人，居然也稱起上帝的少爺來了。他的態度，便強硬起來，彷彿說，你不相信我，留心我刀下無情。結末又出一班猶太共產黨，勾引俄羅斯的專制霸王，抬出猶太人的馬格斯來做偶像，屢進列寧去三位一體，成功一種不可修正的新宗教。因爲他要冒充科學的，所以不好意思說上帝，所以拿無產階級來替代上帝名號。無產階級是無影無蹤的東西，所以代表上帝。馬格斯是有名有姓，代表耶和華。列寧是歐洲化了代表耶穌，他的態度，是止許相信，而且要殺却一部分人，把床舖空出來，讓他的信徒睡覺。（其實睡的止是幾個教士，教徒是沒分的，汪先生既經說過，不必再贅。）這個教叫是什麼教呢，便

叫做殺人放火教。我代他們簡括明淨的宣傳，無非對凡有五十元以上資產的人們說，你們也享用得夠了，我們來送你上西天。所以國民黨引他們做朋友，要想修正他幾條，來附會三民主義，這無異要拿聖經修正，切合牛頓學說，是愚妄極的。最可恥的，共產黨便是共產黨，還要說中國共產黨，還認識中國，這真是咄咄大怪事。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所以那種共產革命，惟有實業不興，民窮財盡之國，才鼓吹得出來。一部二十四史記載得很詳細，一到政刑黷亂，家破國亡的關頭，便殺人放火的強盜賊爺爺，跟着出來。只是極陳腐的老把戲，照中國這樣的混沌，是醞釀共產革命的最好地點。我堅決的說，他那種狗糞的騙人話頭，說他們要到歐洲美洲才鼓吹他們列寧式的共產革命，歐洲美洲難道中國人一個也沒有去過，如果在歐洲美洲他們能鼓吹得成殺人放火的革命，我一定撲通跪下去，受共產黨洗禮。所以我要勸有良心的中國共產小英雄，不要殺自己的同胞，來媚悅大俄羅斯，大猶太的野心家。雖則照我國民黨人搗亂如此，一般同胞愉悅如此，我與汪夫人同此悲嘆，恐怕殺機一定大開，共產黨定要大出風頭。不過他們替那個驅除，做起陳涉吳廣李闖張獻忠來，可憐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心中止以爲蘇俄是一萬年有道之長，成功的了，豈知歷史上佔據什麼三十二年，算做什麼。便是孫美瑤，占據抱犢崗，亦可三年五載。蘇俄也是陳涉吳廣，爲另開太平的一個驅除者。不過白俄還豎起皇帝的旗來，要把破銅爛鐵去對壘，一時櫬出他們的強固罷了。

所以共產黨實在是亂世降下來的天魔。到二十世紀已照例不是殺人放火的時代，所以看清楚了，要嚴格的消滅他。汪先生此次也贊同暫時叫俄國各處的使領，都下旗回國，說不到斷絕邦交。終之我們不要大開殺機，所以請他暫時離去。照這樣的情況，所以黃張續葉賀之後，又夾着共產黨在內，在廣東開放海口，做出那驚人舉動，怎叫人不疑懼呢。如何爲反對一個特別委員會，要如此小題大做。特別委員會本是九月裏汪先生也無可無不可的與聞的。沒有強有力把持，用革命方式構成，并且止是兩三個月的暫局。修正也可的，改造也可的。第四次全體中央會議，一致贊成以後，特別委員會又沒有哼半個字。至於他有『反特別委員會即反革命』的一句標語，那是受共產黨餘毒，是對多方面講的，想來并不曾留意挑動要開第四次全會人的惡感，想不過對於不受支配的作官話表示。這是一時經過和議告成的機關，

應當承認和議到底徹底告成麼，大家也不暇問。反革命是什麼罪名，動輒加上，是共產黨的把戲，所以我說是共產餘毒。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叫得震天響的要開，領袖的汪先生歡迎了來，他們所謂新軍閥黃紹雄的朋友李任潮先生，丟了槍，保護汪先生同來，何所不可耐，還要用兵諫作後盾？汪李兩先生到了上海，傳達他們什麼意思，大家都好像應聲蟲，一響便答一個是，為什麼還要逼住了汪先生通電承認他們設立中央辦公處？這些小事，現在我們都不責備，不過引着許多旁證，證明他們止是為反對特別委員會要用如此驚人舉動，未免說得過於簡單，至少還有地方的鄙陋衝突，也還不能不引起恐怖時代共產的疑懼。汪先生只番對天下後世，宣布得如此堅決明白。方二十二夜間，我稱述汪先生在漢口主張賢明政府，為鮑羅廷所笑，鮑以為主張賢明政府，便是不革命了，汪先生佻然不為動，主張賢明政府到底，曩夜汪先生笑應有之，且願造賢明政府，毫無疑貳，張溥泉先生即跪下連叩六七次，汪先生還禮不迭，大家歡暢。我說一個在歷史上的人物，也得擔任一些理論上錯誤。例如主張了賢明政府，救了中國，不曾犧牲了中國去從井救人，挽救世界，在理論上自欠圓滿。然而天下

後世查考當時，有否那種挽救世界的可能性，都還沒有，那就賢明政府雖平凡，斷送了汪精衛一生，也不枉了。人是繼續進化性的動物，本不是一個人能造成進化的全條線的，我努力們可努之力，又被信仰拘束，我們替中山先生實現主張，有什麼功罪可言呢？人類是萬萬年的，若說世界革命，止要用殺人放火，殺了一部分，留着一部分便永遠從此無事，有這樣簡單麼？就說世界革命，就止把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從中國賢明政府做起，幫助安南印度埃及也次第獨立了，做起賢明政府來，如汪先生所謂弄成沒有階級，用得着什麼鬥爭呢？拿那民死主義的階級鬥爭，來達世界革命的目的，無非教天下大家仇恨，要殺到至多剩了一個人才得。全世界人類共產共同，依我理想，有三條大路可以達到。

(一)是教育革命。望他速速達到大學校強迫。倘使舉現在共產黨所謂無產階級都受過大學教育，他們社會的組織，用得着什麼淺陋的馬格斯庸妄的列寧，代他們計劃呢。這大學強迫的一個希望，不是烏托邦。小學強迫已成了信條。歐戰後學齡要加增到十六歲，已近中學強迫。止要世界製造生產，夠安排學校，大學強迫，終有一地，預料在二百年

內可以實現。

(二)是物質革命。終得要達到什麼衣食住行的生活物都歸機器做了，而且做得好，做得多，簡直止用得少人工，於是止需一個分配均勻，馬上共產。(最可惡的是共產黨在叫化子身上打出冷飯團的革命，不說殺人放火的慘暴，就是弄到那物質不完全的醜惡來，有原人思想，便又舊到萬年以上去了。)

(三)是生育革命。這不是現在講節育主義性交主義人所能爲力，必要在科學上大努力，得到圓滿的方法，才真把生育限制了。否則殺機又不許開，生活又豐富，當然無限制的百姓造起來，死的又不肯死，地球又不能吹糖球般的吹大起來，那裏站得下呢，又非請共產黨來屠殺不可了。所以共產黨能在民窮財盡的國家殺點人，滑稽的說法，也是功德无量，因爲床舖一空，睡覺的人便舒服了，吃飯傢件砍掉許多，糧也賤了。終之宇宙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共產黨是主張把已成人的精蟲屠殺，我是主張不使精蟲成人，且不使性菩薩輕易製造精蟲。今日的節育法是屠殺精蟲，我還嫌他不圓滿，故我決不意共產

黨夾屠殺人。（正寫到這裏，褚民誼先生適來他說：「男子腎囊的卵子，生出兩種功用。一種使精神強固，表顯男子的態度，聲帶寬暢，鬚鬚翹然。一種便是製造精蟲。現在的反老還童法，就是把後一種截止功用，叫精蟲爺爺不從上帝處降臨，吾人一切營養，專門幫前一種功用來強固我們的身體，延長我們的壽命。從前的老公鹵莽滅裂的連根一割，連前一種功用也失了，又是不妥」。據褚先生所說，雖然我們理想的把精蟲老爺擋駕法，還要靠科學菩薩，得到更圓滿，更自然的方法，但也可見止要請精蟲不下凡，不要屠殺精蟲，不是甚煩難的空想，）

所以恆河沙數的精蟲，得到一個人身，談何容易，豈能容許輕易屠殺。殺人不眨眼的共產黨，怎麼可以容許他留種呢。深恐怕黃琪翔張發奎拿地方衝突，來做表面，便利俄國人來打通海口是結果，那就江浙躍躍欲試的要蠢動，湘鄂朝不保暮的要復活，流寇的局面，可以晚上睡覺，尚不知道早晨起來，已經阿呀。他們若拿暗引共產黨的計劃來直告汪先生，他們就大事去矣，自然決不肯說出。就是拿地方衝突，要想對深惡痛疾陳炯明做廣東王的汪先生

來獻媚，要想充做汪先生的八千子弟，亦必遭汪先生呵斥。惟有把促開中央會，反對特別會的表面大文章，來像煞有價事的欺朦汪先生。故鄙意以爲極宜留意。特別委員會的朋友，大半來開中央第四全會，應到第四全會的人，沒有一個持異議，是汪先生十日以來親眼目睹的，理應嚴辭駁復他們，不應拿這個題目來做弄兵的口實。

現在北伐如何因黨爭無從奮進，奉晉相持，如何危急，馮軍獨力支撐中部，如何困難，除非汪先生刻日同了蔣先生，邀同胡先生等，把賢明政府的責任肩起來，對於百姓的倒懸，趕緊解除，對於鄙陋的內爭，使他們解仇釋嫌，各得其平，於是北伐并方可早完成。李石曾先生所謂分治合作，他的真意，并非一種政制，即勸阻人決不要想大清一色力或小清一色，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如此而已。李先生的意思，據我所揣測者，（揣測者或者絕非他的也未可知）還有種種，當於下篇雜述。又因特別會而感想到種種，亦或有參考之價值，亦於下篇雜陳。我所以又敢如此曉曉者，我將吞炭爲啞，終身不復言黨國，故作一次之狂妄，以爲結束。我從未登台，並無下野可言。然再若走動政界，連狗都不如，已



於十月一號遷於武定路林宅。復將於十二月三號至五號，出席中央四次全會預備會一次，即裏足十年，不到黨部。所以必欲一臨預備會者，恐人將疑我不到會，乃用消極抵制法也。盡力黨國自有間接法，豈必措油去坐人家的白汽車，奔來奔去，算做盡力乎，一笑。

(中)

說起特別委員會來，據我個人感覺，是一件毛細得很的小事，擁護他也說不到，推倒他也不配。如果各方面都要拿他來做爭鬥的工具，從鄙陋一方面說，借打破醬油小碟子，來做分家當的理由，止有鄉下婆娘才開得出口的。從正經一方面說，搬場還沒有搬好，前後門都在那裏同打劫的綁票的相持，而室中又把家堂釘在那一間，鬧得不亦樂乎，也就是自尋死路了。所以把中央會開起來，修正他罷，改組他罷，均無不可的呀，他本來自己宣布是一種暫時的組織罷了。

特別委員會是好是壞，我是不曾參預過半句話。看見報上，曾經有人誤傳過，說這是肉

麻得極的所謂『五委員所主張，』四委員我不知道，若我這肉麻的一委員，從八月十四不見了人面，到十月十號才第一個看見李石曾先生，所以九月裏的特別委員會，連我的靈魂都不關事。淮南登仙，鷄犬上昇，當時經天緯地的人物，自然值得挽留，但把我這種鷄犬，亦夾在裏面掉龍杪，所以羞見親友。我這回四月裏跟上南京，供養在鐵湯池蘭花館三個多月，不是敢因緣時會，獵取富貴，實因我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出於我自己的見解，深恐反對的人造謠，說我自知說錯了，故縮頭不出，走倒鬧熱場中，以表挺身而出的意思。居然以鷄犬的資格，屢登要人錄裏。但我的受此揶揄不必說，我還惴惴焉替大家難過。自從國民黨趕走了七八省的軍閥，做出什麼改良。靠了中山先生的一分遺產，開起銀行，支票是發出去了，定期兌現，是沒有刻上。自然望這銀行開得發達的，也十分原諒。康有為解釋變法的混亂說得好，『就是小孩廢一副乳牙，也要發寒熱幾天。』當此發寒熱的時期，自然明白的人，覺得驟然來把孫傳芳來比較，齊燮元來比較，什麼廢銅爛鐵來比較，都是懶惰苟且。然而這張最可靠的支票，要趕緊兌現，經理人才有光榮。否則共產黨也可以發寒熱，說他們殺光了三

分之二，就可以現烏託邦。他們說不嘴饞的，就是現在蘇俄，工人失工的，比沙的時代還多，做工的做到十三四點鐘的也有，乞丐是遍地，窮人是睡滿在火車站上。物價與文明是正比例，紐約物價高，故工人亦家家各有汽車，是應該貴的。爲什麼木司科什麼東西，反貴過紐約。他們的柱石，乃領了掛着幾萬元的金剛鑽頸圈的老婆，在四十元一票的包廂裏看戲。什麼瘴臭的聖彼得堡，也學起來改做列甯格勒。還要到世界來煽亂不已，遺穢不已，所以被人到處趕回。我們雖然沒有那種闊大的規模，存心要造空中樓閣，然而以我黨人才的區區，要照着中山先生的担子，給同胞謀幸福，也不是孫傳芳齊燮元止要少刮地皮，便算功德，有那末簡單而容易呀。爲什麼還有工夫縱橫捭闔，互相出戲法，忘了整理兌現呢。若柱石來不及安放到蘭庭桂館去，將來逼住了，被人丟到毛缸引邊去墊腳，也就回想要人錄裏那種榮耀，與秦檜慶壽的煊赫，魏忠賢生祠的熱鬧，縱然事類不一，而情景無異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不能不喊悲夫了罷。因此一蓬風的說，我們從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後，才有今天的成功。成功是國民黨革命巨子富貴成功了，中山先生的主義，中國人的運命，還是寫在沒有最

近兌現日期的支票上。前天有位朋友來講，現在綁票的有三派。一是嶼縣派，據說有三百萬的大公司，組織非常嚴密，待肉票也非常優厚，所以他們常綁到大票，就是組織嚴密的成功。然而成功的什麼？是那一個的成功？我們倘不留意，錯認了成功，忘記了民國元年黨人的行爲，是否反要勝過現在，那就努力的，畢竟還是中山先生所說革命尙未成功呀。還仗這種成功，保障我們在要人錄裏出風頭，終應該羞不可仰的才是。我說這段空話，因為要把我所見特別委員會的起源，無非是縱橫捭闔，那一方面，都有出戲法的興致，才湊成功的。現在反對的，擁護的，細細回想，無不可自己都噴飯的罷。私人交際，全然要大家拿出誠意，我們不是鏡花緣上的君子國，我不敢說此廢話，但是略顧大局，又知戲法出不得，沒有不請君入甕，是我堅決的敢於判斷的。

然而人家是否縱橫捭闔，或者盡是我的夢囈，亦未可定。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請恕我罷，我是在門外瞎說，猶之乎拆字先生望文生義，拿孔聖人的金言出來勸人，所謂吉凶晦吝者生乎動者也，動是少動爲妙。

反共以前，共產黨的謀我，乃是當然的。陰謀且是他們的看家拳頭。反共以來，你一槍來我一刀去，各自大動特動，也是當然。所以若在四五月裏，漢口即大舉東征，也有什麼稀奇。在那個時候，倒是你也上鄭州了我也上徐州了，好像並行不害，各行其是的革命。可怪的，自從第三國際發出反共倒蔣的命令，漢口同志遂以清黨聞，一面各處的同志，那裏一封信，何人一個電，有想不到的懷舊親友，一面大張東征的標語於通衢，於是一方面也不得不將徐州的勁旅，變而為西守，真莫名其妙。

幸而冬電打來，齊電應去，雙方嘴巴緩和，以為從此可以無事。那知霹靂一聲，唐生智發出庚電，洋洋五千言，借共產黨陪襯，把蔣介石罵得狗血噴頭，都是極可笑夢囈。我當時便一定認他是一隻放屁狗且曉得他們一定執行第三國際反共倒蔣的命令。那裏曉得又有一班人上了當，八月十二開特別政治會議，大家因蔣先生辭職，居然主張暫時歇歇也好，且免唐生智的蹂躪。咳，我們自願竟把將同帥取銷了，雖有車馬跑，還下什麼棋呢。這種下棋，也沒有看爛了扁担頭的價值，唐生智終算天之驕子，此時不滾蛋到無何有之鄉去，更待何時。

故以上的把戲，是在池子裏看鑲邊戲所見，以下的，止憑着報紙揣想。

在報上看來，以爲文武水陸並進，浩浩蕩蕩，南京將要添着漢口的漢官儀，格外煊爛。豈知有些穿長衫的，却出象拔什，還要支撐殘局。着盔甲的，也因爲對面的車馬砲，反直向河界以外移來，變了態度。而不怕看着臭棋，曾經住過采薇山中的朋友們，經雙方邀請，也就出來湊熱鬧。這就是特別委員會產生的歷史。漢口也有分的，南京也有分的。現在反對的也忍氣吞聲的，像煞擁護的，也不是堅持到底的。若說這光是西山會議派的主張，是不確當的。

但是，天下不太平，止是不了解李石曾先生分與合的原理。喜歡西風壓倒東風，東風壓倒西風。看着臭棋的朋友，又忘了情，看得起緊一點，實在是不能免的。而且當時匆匆組織，把什麼客客氣氣的朋友，也好像無罪受罰，屏諸門外。所以出把戲人，終是手法太多，照應不及，反而漏洞太多，便撞到請君入甕的方面去了。

於是好的說，就有人受了毛廁的苦，把便壺出氣，遂要出呂純陽過海，大八套的大軸戲

來，把人兜屁股一脚，就跌出九霄雲外。這是黃琪翔張發奎兩名角所演。我在這裏求天拜地，沒有猶太人來做後台老板，才算恭喜大吉。

所以特別委員會那種不祥之物，那一方面，也願意燒個路頭，把他送到另室供奉。但是從此若各方不願意，未免再要把戲。因此第四全會亦止好適可而行，不可倚他爲萬能，什麼都要他決定，時間終不過三幾月，還有他的上司全國代表大會，自有能力，把全般都鬱貼起來，這是我望第四全會開成時注意的。

因爲特別委員會大家集矢到西山會議派，只也是臭蟲捉不到打秧糲。至於西山會議派，（我亦曾做過西山會議派，）這回整個兒的出來，我終不大贊同。如以法理而論，認西山派爲真，其他爲僞，則不經全國代表大會，便許僞者加入，自居亦不大圓滿。整個兒的逞着機會，拔茅連茹的起來，必有對方妄生吞併的疑懼。現在各方面幾個表面上的人，自然都無問題。至於大飯桶，中飯桶，小飯桶，大飯碗，中飯碗，小飯碗，一串的汲引，便無形中生出不平來了。況且最應避嫌的，就是尋常的見解，終好像將工作與功勞爲正比例。我們反共人的

功勞，究在何處呢。什麼七省八省，漢口南京，都是他們有槍的打下來的。並不因反共即多得一塊地方，止有反共以後，帝國主義者反愈加強硬。（只雖不這麼簡單，另可討論，然現狀如此）。諸公出來工作，雖另有旋乾轉坤的熱心，比我從前去住蘭花館，單純爲免人造謠，用意還要正當。然而當此失職者紛紛之際，誰還來講這許多。止以爲挾有勳勞而去，所以不如止以友誼的相助。如從前將急要的先出，抱膝長吟的隴中人物，可以待時而動。合法的合併，等候全國代表大會，現在也不必再說。這個總意思，還願意貢獻出來，做相忍爲國時的參考。

最平常的一條發達實業理由，沒有人敢堅持。其實什麼共產黨的發生，也止執了無產階級沒有飯吃，出來號召。我堅決的斷定共產黨沒有能力，會在歐洲美洲鼓吹出殺人放火的革命。也就是他們的無產階級，並沒有受機器的累，窮苦到同我們無產階級一樣。他們是得着機器的好處，尋常工人能得七百二十元工錢一月，上工去有汽車可坐，所以他們不願意殺人放火。我們總理的建設，明明注重在造港築路與大規模的實業，那裏所謂頭等人物，如汪精



衛蔡子民諸先生，皆貌合神離，什麼鼓吹研究，都是小孩哭耍皮老虎，買張花紙給他，叫他望梅止渴的頑意兒。這番大學院要注重國文，使我氣破肚。難道現在美的書店，善的書店，新呀月呀的書店，教人寫情書，上條陳，計畫陰謀，還不夠麼。胡適之先生拿出良心來，咬緊牙齒，教人要拿出拜金主義。別人替他橫打官司，駁他拜金主義的失詞。拜金主義的本身，原是不對，但胡先生不過借他的字面生辣，促人注意，要教人注重實業。前數年余日章先生帶了一把開壺，到各處演講，標明歐國有農工商仕好幾條出路，所以壺蓋不裂，中國只有做官一途，壺蓋到了一樣度數，就推翻到地下去了。

上面這條罵人，不是正文，那是驛說的，只是另有問題等我再轉胞胎時，再對未來的中國人討論罷。現在的本意，是要叫人留心官場飯碗，止有此數，大家不要拚命的爲所識窮乏者得我，把清一色的武器來慶戰。至於窮乏人，也應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不得已要隻飯碗，也不好鑿孔裁鬚子，背皮上開刀的盲進。苟有他途可想法抽得出那隻毛廁，最好，否則也要順乎自然。我常說，歐洲的買火車票，儘管人多，先到先買，後到後立，每分鐘至少可買二

三十張。中國人就不得了，大家塞在洞口，幾十條手臂伸得高高，小孩擠得哭喊。錢夾被扒手掏去，一分鐘止買幾張票，這是何等的不經濟呢。然而有否明白的朋友，我不敢知了。本還有重大問題，牽連着李石曾先生的分治合作。今且再分一篇，明日爲之，故把上面算做中篇。

(下)

中篇說到前事，似乎對於那一方面，都似嘲似諷，爲無理之取鬧，甚屬不當。然其意止欲懲前毖後，爲『有則改無則勉』之獻曝而已。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信諸公必有此度量。吾意無他，止有三事。一爲中國及世界的，若令蘇俄蓄類，猶太獸種，再得志於中國，附之者亦必爲最後之犧牲，而被其禍者，至少死人民三分之二，到頭這班魑魅魍魎，雖亦必同上斷頭台，然而中國幾不成中國，而世界革命亦受其打劫矣。（何也，世界革命不到倫敦巴黎紐約帝國主義的策源地去擒賊擒王，却來燒我們高粱杆子的房子，殺鄉下老婆婆，其無價

值如此，豈非世界革命之污點。其二是爲吾黨個人注意的，告武裝同志，若不就大局計算，不能抑其小不忍，始而倖倖極有理由，繼而巍巍並不自知，加以多方設防，積漸自大，於是上惡當，成軍閥，又進民國十六年中無數野鷄毛畜生之輪迴矣。一告長衫同志，若始而買了爆竹，必要自己放，遂爭地位，爭地位，固爲黨也，然而人禽卽由此分界，往禽界者由地位而要人，由要人而柱石，柱石築基於陰謀，即一落千丈，顯出原形，亦卽民國十六年中畜生道上策士之一矣。麻油拌生菜，各人心裏愛，由各人自便，這種老生常談，原不會勸醒過一個人。然這條死路，直往裏面鑽去，古往今來，毫無一倖，請將來各自到閻王簿子上去一查，便恍然大悟。

但不過這唉聲嘆氣，對小問題嘵嘵，原止是爲各個個人可惜。至於大局，就是把眼前的幾個人，自己糟蹋完了，中山先生的主義自在，中國的國運，也不見得靠着我們進退，殺豬屠戶死了，並會吃帶毛豬，自有相當的人物來收拾，落得我們做個驅除者，教人冷笑罷了。

現在據我所見，最要緊說的，到此圖窮而匕首見，我不能不直講。就是第三國際發生反

共倒蔣之命令後，我們有人奉他的命令沒有，我是不清楚。就是沒有，有一部分人並不注意到這裏，可以張開眼睛上他當，是不能免的。這班赤色帝國主義的畜生，他是海枯石爛，不能忘情於中國的。所謂反共倒蔣，反共乃是仍舊跑到國民黨裏來，打倒國民黨。倒蔣不是打倒蔣介石一個人，（我們老實的同黨，已經上過惡當，真相信蔣先生去歇歇，他們就算已達目的，豈知大大不然，）乃是打倒蔣一類人的反共兵力，換言之，就是打倒國民黨的武力，國民黨主要的武力是黃埔軍與桂軍。

他們第一步本想先倒黃埔軍，後倒桂軍。七月中，有許克祥的秘書蔡君對我說，湘中盛傳唐生智已與桂軍接洽，把軍官派大團結的名義來反共，止要消滅了第一軍，唐生智就可以爲所欲爲了。我笑不可仰，我說軍官黃埔，開個把會，各自懇親，當然這種同學的結合，猶之乎文人的北大南高，自然可以有，而且應有的。若說可以把這種名義來左右國是，那裏有此成例呢。唐生智同陳銘樞不是同一軍官派，何以唐的逼陳，必欲置諸死地，他再反面孔向那個同學去迷惑呢。況且桂軍領袖幾個人的堅決反唐，有一毫放鬆麼。那裏曉得，當時唐生

智靠了汪精衛先生一班國民黨到底反共的同志，便盛吹蔣之下野可以無事。當時北敵熾於北，唐軍逼於西，左右實難應付。且人家靠這位汪先生，最大人物，說一句算一句的，他最恨人頭畜鳴的共產狐狸精，拿撒謊做聖經，唐生智有此靠背，故大家息事甯人，恰恰蔣先生氣悶要歇歇，便讓他歇歇。這雖蔡秘書的預言，似乎證實了一半，然當時七軍挺身在前線，沒有退後讓一軍孤往，而且唐生智的急色兒，馬上佔據安慶蕪湖，連程朱諸軍，忍不住了，起來與桂軍左手右手的携着，打倒了老唐。於是所謂打倒第一軍，所謂軍官派，影響全無，都是唐的買空賣空。止苦了汪先生，恰恰由廬山重去漢口，若非如飛的逃得快，幾受了唐生智護法的嫌疑。猶之乎這番，也走得剛剛恰好。否則黃琪翔張發奎佯追葉挺賀龍，一根汗毛也不會撩到，黃季寬先生把他打得乾乾淨淨，在國家是有大勳勞，在朋友是遮了黃張無用之差，如何反稱黃先生是新軍閥呢，護什麼黨，護共產黨罷了。若汪先生不是早走一脚，被他們撐住了，他們儘託詞發表汪先生國民黨的議論，掛羊頭賣狗肉，汪先生左右為難，豈非是汪先生將為通國求生不得的人，受一度冤的批評嗎。只固然是汪先生洪福齊天，也是中國人的

不該遭殃，天老爺暗叫汪先生走早一脚。閒話少說，先滅黃埔軍，再滅桂軍的計劃，第三國的獸慾竟不遂了。於是十六兩還是一斤，倒過來試試，便是先滅桂軍，再滅黃埔軍。一半是他們以爲已經成功，黃張同唐生智一樣，又買空賣空，騙汪先生來重乘赴會，又騙李先生跟了最大人物同行，好像把汪先生押給李先生，是最靠得住。汪先生真倒楣，豈知他們馬上幹了不名譽的勾當，若非兩位李先生灼知內容，知汪先生還是被人欺騙的汪先生，否則李德鄰先生回想伏謁於廬山，李任潮先生自憶推尊於通電，我之待人，比於人之待我，對面崇拜的菩薩，果是慈祥愷惻的呢，抑是神通廣大的呢，則兩位李先生懊喪萬分矣，而一位汪先生亦叫苦連天矣。今皆幸而免，我代他們謝天謝地，但這種都是閒話，大家要問還有一半桂軍，再用什麼方法消滅呢。那造謠挑撥，耳鼓上不斷的響聲甚厲。豈知人雖至愚，上當不過上一次兩次。這是小學校教科書上所說，有獅子要想吃四條牛，四條牛聚在一起，却不好下手，於是獅子裝模作樣，叫四條牛自由疑成怨，由怨成恨，跑了開去，一隻被吃了，便隻隻無倖。這是很淺的詭計，誰還肯又上他惡當呢。凡外患愈亟，而內嫌盡釋，團結愈固，這是

一個通例。世界上有過那種人，從來不同朋友有牙齒高低的麼。一點小嫌，大家說了就算了。況俗語說得好，上個當，教個乖，共產黨用手段把我們拆得紛紛散，我們畢竟除了少數的異類，目前竟是大團結，徒然壞了他們自己革命道路罷了。

然而理論且勿講，目前事實，到底怎麼辦呢。反正止是我一個人在這裏瞎說。對不對，聽不聽，我都不管。據我意思，簡單極了。在這個方面，黨內的糾紛，自然早已大家取互讓的精神，第四全會開了，黨務讓中央會完全支配。有一部分人以爲拿住了黨務，才算根本放心，說不定組織部呀，特派員呀爭得要命，不肯放手，只真是受了共產黨迷信，才有此謬誤。例如今之特別委員會中人，就有這種誤想，於是南京在那裏堅持，湖北在那裏堅持，反惹得別人做反對的武器。有人對於黨，是掛羊頭，賣狗肉，拿來做宣戰武器的。例如共產黨幫國民黨爭黨紀，真是要整飭國民黨黨紀麼。若說擄在別人手裏，却不得了。老大哥呀，「不得了」何在呢。共產黨的組織，不嚴密麼，漢口容共時代的國民黨黨紀，不周密麼。然而兵力不夠了，海口封了，只好逼住了第三國際下反共倒蔣的命令了，黨的效力大不大呢。我不

是說黨是不發生效力，然而什麼後盾也沒有，煩惱強出頭，婆婆勿歡喜，偏要在婆婆面前拖鼻涕，弄得不好，也夾在裏頭縱橫捭闔，豈知於事非但無補，而且有害，所以黨事可以完全讓步，好漢不吃眼前虧，不要贏在嘴上，輸在腿上，拿火車站西洋買票的態度出來，倘然張發奎得到了海參威的五萬枝槍，或者別處還有暗潮，那個要來辦你們的黨呀！

其次我們磕頭求拜，會罷，請汪先生即刻把賢明政府的經綸拿出來，在南京大放光彩，鞏固我們北伐南征的後防，同時請蔣先生大禮告成，馬上把國事軍事，肩在肩上。現在一軍北伐去了，還請七軍在南京整理整理，商量或南或北。我想黃琪翔張發奎目的還是小醜跳梁，李任潮先生自能合了各方面的力量，不日使他們消滅。他們若別無作用，止是地方衝突，李先生本會容留過他們，如何悔罪，再看情勢。我以為目前東西並進，或者現在已經打倒，亦未可定。却不可如三國演義上劉備張飛聽見關雲長有失，憤憤不平，上了別種惡當。頭腦自應冷靜，計畫儘可周密。

於是仍聚全力北伐，使馮閻兩軍得以舒展自如，完成破壞革命，便急急開始努力建設革



命。我想現在必能津浦京漢分道並進，前面又有馮閻，力量甚不小也。

若問李石曾先生的分治合作，究竟用得我來詳細猜測麼。我本有個勇氣，現在又覺可以不必要。所以順便寫了下面幾段，即並收束，其詳讓他自講。

他的最大原則，就是勸人決不好企圖大清一色或大清一色。例如蘇俄的共產主義，有何高明。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又有何欠缺。他若真是朋友，真心爲世界革命，就應配讓朋友自己去按切環境，成就他朋友的一種革命，對中國便尊重中國人的意思，對印度埃及，什麼什麼，都要採納本地人意思，這就叫做分治合作。那蘇俄野獸，猶太獬畜，他們止想清一色，行他們殺人放火的專制，拿了一瓶萬應靈藥，什麼病都硬灌下去，所以他一定失敗。

這種分治合作，豈能叫他分賊辦法。那就可以說到內政，例如最近在南京，有一個時代，外間謠言，每每討論到馮閻將來問題。我說那裏有什麼問題，民國以來，死了一個袁世凱，便剩一個張作霖，賊子賊孫，倒又出一個唐生智，皆有無限制的野心，連吳佩孚都不是有無限野心的。馮閻兩人，愛國愛民，都是第一，所以才力雖雄，而野心剛剛爲所反對。我

同毛以亨先生討論及此，我說，北方的世界，我們完全仰仗馮閻兩人去處辦，我相信人民必愈得安樂。那裏有這個瘋子，必要將中國統一了，於是馮玉祥坐鎮北京，派張之江節制兩廣，派李鳴鐘封建江浙，爲所知窮乏如此出力，到底那個是他的朋友呢。況且功高巍巍，張李先生等自有他的寄托，自由他的給人尸祝，何苦清一色了，苦了人民，做這種騎馬尋馬的勾當呢。當時大家皆笑。我又說，在於本人，自應當叫他走就走，而在對大局想的對面人，却應該想念功勞，也是要的，人地相宜也是尤要的。有人把這一塊地方收服下來不說勞力，就是借他現成的威望，整理一切，容易得多。只是分贓辦法，只是順理成章，只又是李先生切望有的分合精神。所謂分，便是應教有功者治理。所謂合，就不應該子孫萬世，拚命計畫清一色。

所以寧漢合作前，我們發出的齊電，登在各報的，曾有請孟瀟同志收拾上游，請任潮同志坐鎮南中。我們很盼望唐生智能做一個人，讓他去撫綏共產黨殺下之餘生，不是給他地盤。我們對任潮同志，誠心串念他的功高，他在廣東，保得住海口，不會叫共產黨拿去。只回

葉挺賀龍，果然由他倚畀了黃季寬同志，把他們消滅，他不是佔廣東地盤，他也沒有陸榮廷等那種癡疑，至少還很有幾年需要他。若說張發奎黃琪翔會同他立功，一則這回大家看見，他是歡迎他們，自己放進一個敵人。若說黃張戰功甚大，而陳真如同志還不比黃張的功尤大麼。何以一再在漢口受黃張壓迫，至今閒散，他一句沒有話呢。我這段道理，前天曾請教過汪先生，汪先生亦動容。陳先生非但明白不可清一色，而且能退讓到極處，真是古之名將。（共產黨必笑這是英雄思想，可嘆。）

再拿一個道理講，常聞有以黨治國一語，雖再三聲明，以黨治國者，止是以黨義，並且以黨人。連担在中先生的意思，黨義亦未嘗不可弛張，所以最大國本，要開國民會議，最後定有憲政時代。所以暫時就是多幾個黨人，駕輕就熟，把那反側時代支持出來，同胞亦沒有什麼不原諒。所以現在什麼端人正士，高才博學，都在那裏壁上觀，他們不是被我們征服，乃是他們顧全大局，也不是許我們分贓。我們若悍然的自以為統治階級，要清一色起來，那就我們的末日到了，故我想我們的同志賢明的，儘可容納黨外賢明的同胞，倘國民會議開成

了，我們同志把什麼政權，讓給賢明同胞，都可以的。我這張支票會兌現麼，我却不敢必。但我據着李石曾先生分治合作的精神，說良心話，是能兌現的，大吉大利。

至於牽連了只個問題，必有同志以爲現在容納黨外的腐化分子，也就不少。是的，誠然多的。然黨內也不見得少，黃琪翔張發奎也正在那裏將共產惡化做陪襯，南京腐化做主要，竭力攻擊，此又不可不知。而且我的反共，既看清了他們的惡化，又恨極他們的腐化，所以不留情的要消滅他。江南之橘，逾淮爲枳，猶太共產黨黨紀雖嚴，惟要中國共產黨不腐化，他又做不到。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官與無錫起事，殺人放火之外，還要搶劫。清一色之難哉。腐化腐化，我們將如何善後。

就算完結。汪先生亦海枯石爛，不會去幫助黃張爲共產黨張目，我亦從此做啞子。

### 對兩個更正的答復

當我到馬斯南路拜望何先生時，張靜江先生躺在沙發上不開口，我但聽見何先生說，「還

有說張發奎到香港去接洽楊匏安的，都奇怪，楊匏安是共產黨一個大頭目，」我就以為何先生自己在那裏說。其實他聽了張先生的話，在那裏沉吟罷了。今天問過張先生，他說，這是李任潮先生告訴他的，李先生詰問張發奎，何以到香港要見楊匏安，張說「沒有什麼，看看他們動靜，」這是對何先生抱歉。

汪先生說共產黨頭上沒有字，自然，汪先生並不會舉出某人某人，他也不過慮着罷了。

汪先生第二節，同我意見一樣，他不過說得詳細點，我把消弭二字，包括了『不造機會』等，太簡括了，難免發生誤會。抱歉得很。

但是汪先生之言，張發奎既知共產黨要乘勢入寇，他把一個有力反共的黃紹雄，反誣做新軍閥，把勢力不易侮的李濟深，連夜推翻，剩他在那裏地方衝突，作無病而呻的護黨。機會誰送，千秋自有公論。他若輾轉要想把罪名卸在別人身上，未免愈弄愈拙，汪先生當力阻之。我筆我舌，自有相當時間再用，我現在不同張先生尋打筆墨官司也。敬復叩何汪兩先生道安。弟吳敬恆叩。十一月二十九日。

## 弱者之結語

吳稚暉

在七八年前。我在唐山教書，汪精衛寫信給我，問我時事怎麼辦呢，我絕不思索的回報他道，我買兩隻軍帽，一隻戴在你頭上，一隻戴在我頭上，就有辦法。到底都無能力實行，祇落得他懷了一腔孤憤，至今只好走狗般的去仰強者的鼻息，我也懷了一腔孤憤，也只好走狗般的去仰強者的鼻息。懷什麼孤憤，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也不是這裏有工夫分辨。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終是一個弱者。弱者來打筆墨官司，真是一件沒廉恥的事。所以我今天再放這一次，把肚子瀉空了，就告完結。

今天我們登在報上，請求察看汪顧陳三人的事。蔡先生會罷遇見我，他說他與靜江德鄰兩位先生臨時主張慢慢再提。我說提也好，不提也好，實在還是一個不澈底的辦法。蔡又告訴我，會終時戴季陶先生說，我看會議席上都是說假話，大家嚴陣相待，最好下次開會，先對總理靜默三分鐘，宣誓不說假話，然後開口。戴所說的意思很好。我是再不到會，亦不到

什麼講到黨國的人家去，所以我只好宣了誓，在這裏說下面的幾條。

(一)現在到會的人，約有五派，一是止注意共產黨的，二是注意共產黨，還注意別的問題的，三是不注意共產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分別，止是却不了雙方的情面的，四是疑心共產黨終覺比國民黨強，五是額上不雕字的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工具。

(二)現在額上不雕字的共產黨，與共產黨的工具，又來借國民黨的招牌催眠，造成一種空氣，要叫他像從前總理三大政策一樣，便是假裝說共產黨是惡化，除了他們，以外皆是腐化，惡化要不得，腐化更要不得。其實各人宣了誓說，惡化也是公共的，腐化也是公共的。所分者，惡化是沒有俄羅斯人利害，腐化是沒有中國人利害罷了。所以從共產黨或國民黨所謂左派眼睛裏看來，那非共產黨及國民黨右派，都是些腐化庸人，腐化愚人，腐化小人，我說對的。從非共產黨及國民黨右派眼睛裏看來，那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都是些腐化兇人，腐化惡人，腐化小人，我說他們自己也覺得到罷。

(三)然則從我個人主觀，腐化是一個會開不好的。若問如何不能不腐化，先從不說假話

始。此是後話，現在不提。要這中國且放在國民黨手裏，可以少一點殺人放火的事。若不幸放到共產黨手裏，一定暢快的殺人放火。分別在此罷了。

(四)我反對殺人放火，所以反對共產黨到底。如果這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爲的是要鞏固國民黨，而先決問題，終要把第四派第五派的人一起請他停止出席。我們中國人往往不明事理，有一種無端的恐慌，及無謂的敷衍。那麼，不澈底的辦法，也至少要把第五派的票人，請他不要到會，一個就是額上不雕字的共產黨陳公博，兩個就是共產黨的小工具顧孟餘，同共產黨的大工具汪兆銘。

(五)什麼是無端的恐慌，就是不知那裏來的一句笑話，說此次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不成，國民黨休矣。其實若照現在拉都路這樣的開成，國民黨便休矣。清黨清黨，清到現在，却開了大門，把整票的共產黨及共產黨的工具送進來，豈不可憐。國民黨開會，止應當同國民黨人開會，不應配拉票謀死國民黨的共產黨徒來湊數，假使照章定要過三分之二，倘一定不好變通，那不得不再請譚平山等來湊數麼。又假使天災流行。會員却死掉了三分之二，乃



就從此不開會，聽國民黨休矣呢，還是定要到閻王那裏去拉死鬼來湊數呢。我們承認他是共產黨，簡直當他死了，便是譚平山等的除名。我們有理由疑信他是那個東西，也權且當他死了，便是徐謙等的察看。該除名，該察看，不管他多到什麼數目，剩下來的，方是真正國民黨。不是三號第一次開會，有這個說法麼，剩下來止有二十八，那十五便是多數。那天雖取別一法，當日南京却曾行過。漢口當日自以為老牌國民黨，其實止賸一扇牌子，也只好這麼辦。所以賸了十個人，六個亦可開會。若說那麼別人廣州也可以去開會了。哈哈，這是一句極癡愚的話，難道共產黨的味道大家沒有嘗過麼，或者嘗了終於健忘麼。若聽憑他拿了金箍棒鑽進你的肚裏，如何能教他不攪，攪得難過如何不請他出去。與其將來有請不出去的危險，何如不請進來。例如有了唐生智，如何會叫汪兆銘顧孟餘不開他的自由政治分會。沒有了唐，他就走略。歡迎了張發奎黃琪翔進去，他便攪起來了。有了張發奎黃琪翔，汪兆銘陳公博顧孟餘之徒何等強硬。所以你若不好意思，他就拿了金箍棒直闖進來，你若覺悟了，他自然宣佈你的破壞罪狀，馬上回廣州，開他幾個人的始創第一家真正老牌合法全體會議。會場

門口亦許要掛隻烏龜出來，題曰冒牌者似此。幸而張黃也不日陪伴唐生智去了，那張真正老牌，便只好掛在善鐘路。不幸張黃到了南京，那我所提議的六個黨員的全體會議，也只好永遠開在拉都路了。若我們六個黨員方是真正國民黨，人數雖少，全體會議也有理由可開的呀。國民黨的休不休，那裏是廣州來了委員，才影響不開呢。這是共產逼了我們不能不變通的呀。

什麼叫無謂敷衍呢。因為現在的委員，那個不會主張容共過。是呀，容共上了當，儘可反共。所以漢口的人反共了，我們喜極而涕的歡迎的呀。中間有許多古怪的行動，我們尚以為止是『惟領袖是競，惟曲說自高』，這是人各有嗜好的一種小毛病。並且對方也未嘗不會弄着玄虛，止要開誠布公，在會議席上解釋了，以後大家不再做那『自殺』『殺黨』『殺國』的錯誤罷了。所以截至十一月十八，我們還是誠誠心心的盼望汪精衛帶了廣州委員來開會，開好會，誠誠心心的擁護他的賢明政府。那十八的晚上，就聽見了古怪的消息，十九一天明，報上宣傳張黃弄了把戲了。午間褚民誼先生來說，汪先生要來看你，我說不敢當，就同褚先

生同到汪家，看見汪先生神采煥發，後來來了李任潮先生，倒也是笑嘻嘻面不改色，我心中却老大不舒服，止在飯桌上罵了共產黨一頓。於是一天一天的周旋，無論磕頭求拜，汪先生好像張黃總是應該趕去黃李，然而聽他的反共言論，又是清清楚楚。我就知道說話太甘，手段太辣，這是我的共產黨徒定義，『談笑是溫溫和和，講到有關係處，說話是結結實實的不讓，做起來是惡惡辣辣，說鬼話是他們的聖經』，汪若不犯這個毛病，何以自相矛盾如此。於是力竭聲嘶的對他喊救命，做了些贅言，他却以為我是靠了衛戍司令逞威風。他給我的信說道，『先生連日在民國日報上大登特登一切冷嘲熱罵之文字，最挖苦的，便用最大的字刻出來，我可怎麼樣呢，我要登一個字，都要經淞滬衛戍司令檢查，我那能有和先生自由辯論之機會，林冲說得好，小人頸上有了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我幾乎想跑回廣州，去得一點點言論自由，但鑑於四月間覆轍，我只好戴着枷，捱先生罵便了，只是先生靠着淞滬衛戍司令的威風，來罵一個言論不自由的朋友，唉』。您想我的贅言上，明明說汪先生決不如此如此，倘然如此，那就糟了，此純是力竭聲嘶的喊救命，他却以為是冷嘲熱罵的逞威風。請問

衛戍司令尙許張發奎教訓李任潮，如何會不許汪精衛教訓吳稚暉。什麼匿名信呀，洪鐘報呀，罵我遺臭萬年，罵我老狗，倒躲了罵，怎及陳公博借了章太炎的話，罵我生疽補褲。衛戍司令却許他明登報上，我整備遺臭，整備惡罵，才把真話傾筐倒篋而出的。我無廉恥。靠了租界，是不能賴的。衛戍司令說話，却不曾。因爲在北京警察總監被李彥青靠去了，我也不會不在報上逞威風，總而言之，你的神氣不對，料你要如此如此，乃是不可諱言的。倘若不如此，久後我是遺臭萬年，我是老狗，我是生了疽，我是補不了褲，都是忍受的。你若竟如此如此了，我是在一號蔣宋喜堂裏，對李德全先生講的，我罵你賣國的汪賊，狐狸精，現在我連倒不值得罵你，讓你去流芳百世。可是我斷定你的行爲，恐是一個共產黨的工具，盡我監察委員的職責，請求把你察看，不要張開了眼睛上你的當。你說我與你有私怨，請舉出來，是什麼私怨。你是大有恩德於我的，就是我這監察委員，也是你把我抬成功的，我雖沒有託你，我是知道的。我止知道以直爲直，我不管忘恩負義，如有人不顧到殺人放火的慘禍，就是上帝我也反對。我懂不得有什麼保障，要敷衍，難道讓人開了會，拿着金箍棒鑽進了

肚皮，才算國民黨穩固麼。

(五)提高黨權，免造軍閥，那是黨裏黨外都跪起來求的事。然而怎麼樣提高，擺在那樣人手裏來提高，若說官話，就請中央黨部委員提高，這是委員裏共產黨工具聽了欣然贊同的呀。他們本來要如此，那末直截開了會議，取決多數，把大權都握在共產黨的工具手裏，又怎麼辦呢。若說不依，黨權何在。若說公意要共產，亦就止好共產，那我是造過反的人，不願意說這句話。三月裏他們開的第三次全體會議，就是這個頑意兒。四月汪精衛提開的第四次會議，也是這個頑意兒。這不是我們預先屈說他們的，那是汪公八月假反了共，自己認錯的。所以我們不接受他們三月的第三次會議，不盼望四月的第四次會議，他說我們造反，歷史上證明了我們止是救黨，我們老實承認，黨的權是至今我們無力顧到，當時武漢大部分忠實同志，要顧黨又要顧權，却也上了共產黨的當了，武漢是共產黨有權，國民黨完全無權。

於是我來在權字上，敘彼此的醜歷史。一是八月南京的事。八月十一開了中央黨部會議，蔣介石先生要辭職，大家自然堅留。他先走，臨了他說，「我服從監察委員會」，我們還

是不懂。到八月十二，聽見他走了，於是又開政治會議，武裝同志都說蔣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種其勢洶洶，我們兩面受敵不了，蔣先生暫且歇一歇也好。我雖然大不高興，那末唐生智要什麼便什麼，還有什麼正義呢。我主張大家到上海去挽留蔣先生，留不到，大家一了百了的滾蛋。我在車上告訴伍梯雲先生，說是兵變兵變，到上海，蔣先生跑回奉化了，我們也這索躲起來罷了。就不想到我們有黨權，我們是監察委員，理應出來詰問武裝同志，有什麼充分理由，可輕易臨時易帥，果然孫傳芳幾幾乎渡江，並且唐生智後來打得掉，何不早打，我們坐在權上，允許我們自由質問，我們不言，我止在八月十二會議席上，羞得了不得，覺汪精衛先生說我們靠了督軍團逞威風者，今日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家面孔沉了下來，我們只好滾蛋了。我雖車上毒罵，廣西人實在是不見十面的，他們忘了已是歷史上偉大人物，他到底有部落思想，把督撫看成巍巍，又認不清大人物，還震駭大人物。（當時我預先有湖南蔡君之言，我早知他們上了汪精衛的惡當。以上的話，不是今天才發表，從前聽見的，有胡展堂鈕惕生諸先生，可以爲證，前天不避冒犯，曾在南園親告白李諸位）。然畢竟

忘了黨權，拋棄了我們的職權，然而我要請武裝同志分擔責任，當時我們說了，會有效麼。所以我們另外敬佩一個武裝同志蔣先生，我們通電說，比我們尤高了，若武裝同志個個像他要歇便歇，服從我們監察委員會，黨是定會有權的，這借過去以望將來，結語是武裝同志服從黨權，黨權卽生。

又說一方面的醜歷史。不說別有包含，就是簡單說汪先生的促開第四次會議，長衫同志允許了不算，必要叫武裝的張發奎黃琪翔動兵，倒了催開會的李同志，作爲保障。汪先生口口聲聲，他們是正當，簡單是爲反對特別委員會，促成第四次會議，然則現在的會議，依舊是武裝的出來開成，這個黨權，有價值沒有價值呢。所以蔣先生今日對於軍人，愷切言之，長衫朋友無論共產黨的工具，搗亂者，政客，想植自己勢力的，報私怨的，終之還是一個趙孟能貴，趙孟能賤的弱者，共做走狗於強者，乃洗不淨的污點呀。止有軍人自己覺悟，蔣先生飄然引去過了，他給大家一個好模範，所以他在國民黨三字，已允許做最後的文天祥，不要在黨權，也正好讓他一個人做文天祥。

(六)但是我們堅決相信廣西諸位，通張作霖是不通的，附和共產黨是永遠不會的，唐生智那種無限制的野心，是決決沒有的，一個不留神，形成了一個小新軍閥，阻礙黨權，是要諸位於上了惡當後，大大留意的。所以這回會議，若居然會議出來，議決不應當代他們討伐張黃，乃是簡直無黨，豈但無權，是中了共產黨先消桂後消其他的計劃了。對於張黃，如有法證明他不是共產，無利用廣東海岸，與海參威通波之意，必應離去廣東，他把軍人來干涉開會，也得一個相當處分。

(七)什麼且不管共產不共產，開成會要緊，什麼附張黃通電的委員，皆當由監察委員否認其有出席權，以後可以否認議案，只種筆墨的無意識官司，打儘管打，那都是人防虎虎防人的辦法罷了。猶之乎汪先生得意洋洋，說監察委員會都被特別委員會取消了，還行使什麼職權，那末執行委員會也早被特別委員會取消了，開什麼第四次會議呢。終之口舌那裏爭得明白，反正後來的事實，他會出而證明，我終可以再不說話。順便登一個廣告，我以後親友的應酬信，亦恐沒有日子不間慢，倘失了答復，恕我罷。



## 相當時期的話

吳稚暉

廣州事件，不是意外，不過那些急色兒早點發展。到底有利無利，他們的詭計，淺陋如我們，無從測知。我們一方面說，應付得好，也可以叫他不利，應付得昏庸幼稚，就造成他們的全利罷了。我二十天以來，憂心忡忡的設想，恐怕他們天羅地網，已經布得很密，止要叫我們張開了眼睛，多進幾隻陷阱，四面一收籠來，三個月工夫，國民黨就可以完全沒有，十幾省的百姓慘遭大燒殺，就實行了。蔣總司令近來的話，句句都對的。惟有他們有力量的，安慰人心的一句話，據我們書生的見解，略有討論的餘地。他說，『共產黨亦不成問題，共產黨聲勢從前何等浩大，其陰謀鬼蜮何等毒辣，但吾人一言清黨，青天白日旗下各領域，或遲或早，一致起而剷除，彼等終於無尺寸立足地』。這過去的事實是對的，而將來的希望有蔣總司令調度，大家也相信定能照舊剷除，使彼等無尺寸立足地的。但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我們迂謬書生，不能不作無病的呻吟，就是據我們的淺見，現在的局勢，似有異

乎從前的，約有下之數點。(一)從前是他們驕傲，吃我們一個冷不防，現在他們是清楚了，如是如是，對付的周密，已布置了三四個月了。(二)從前是被我們冷不防的封鎖在長江上游，庫倫那條路亦不能通，海參威是更不用說了，簡直毫無接濟，加以湘鄂的貧瘠，現在是我們被他冷不防的，佔了與海參威自由通波的粵港，就在財政上，他們佔了一個十倍於湘鄂的富饒地域，我們比較四五月，却失了一半的款項。(三)從前是他們自以為將要成功，所以連我親眼目觀的共產黨，都充滿了腐化，止爭位置，現在他們都動心忍性，知更有槍殺的大利在後，決鬥非常努力，我們的同志正昏昏眊眊，各做功勞浩大的夢，你妬我，我忌你，全失了四月間求生不得的精神，文武都是如此。(四)從前雖有些跑不了的反動分子，他們也都忍氣吞聲，求免了災禍，已算僥倖，因為他們的朋友，正在那裏公開敵對，止有來拖累他，無從來掩護他，現在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躲在積極反共的旗幟下，弄得五鼠鬧東京，夜半捉賊，賊亦喊捉賊，賊却放了，把捉賊的倒打了一頓，甚至利用人的弱點，真個可以誘導捉賊的乘勢報復，捉賊的借賊自打起來。(近來有一個新聞，大家沒有注意，就是胡謙妻

呈控胡謙是被黃琪翔的師長李漢魂所殺，想來胡謙不甚見悅於各方面，事或有之，但他的確也是一個捉賊的，被人打了，人家如無其事，恐亦實在的）。（五）從前共產黨是存心要躲在國民黨後頭，叫國民黨掩護，乃是做給一般人民看的，現在他是止叫一部分人到國民黨裏來，專騙國民黨，使之貽誤，他們對一般人民，簡直赤裸裸的打出共產黨旗幟，用不着什麼國民黨，因為一則國民黨的招牌，也不是金字的了，二則習慣了他的名詞也就不算希奇了，三則燒殺的味道，實在是老祖宗一路講的，到反亂時節本來不能免的，革命革命之聲，充滿的不息，止知道革命就是反亂，反亂就是殺人放火，共產黨罷，長毛罷，白蓮教罷，料想是一樣東西，現在這種觀念的程度，被盜匪充斥綁票紛紜漲得更高了，是不可諱的，這也是替共產黨激增的保護色。諸如此類的今昔不同，不必盡述，這都可以貢獻給蔣總司令作參考。我望他劍及履及的起來，行使總司令職權，刻日先把廣州蕩平他。中山先生最偉大之處有三，公私分得清，責任拿得專，仇恨忘得快。什麼公私分得清呢，什麼飲食男女，都是個人的私事，文王的則百斯男，孔子的狐貉以居，並無關於社會國家。中山先生民國二年娶宋夫人的

時節，胡展堂先生曾要進言商量，總理馬上對他說，展堂，我請你同我計畫國事的，不會請你來處分我的家事，胡先生到止好無意而退。什麼責任拿得專呢，他把國事算做一個人的事，是黨人沒有不知道的，他從來不會說一句，黨裏要我幹就幹，不要我幹就歇，止是幹到底，剩了他一個人，也是幹，他於位置相當的，應做什麼，就做什麼。民國十一年，他要做總統，我同汪精衛陳獨秀陳炯明等都莫名其妙，後來只索五月五日做了總統了，他叫黃溥泉先生喊我去，對我說『當時外交，非用總統名目不可』，而且做了總統，反比大元帥時代輕車減從，與南京時代做總統一樣，還要簡單些，弄得捧總統的人名位都沒有，反而失望，方知他並不希罕什麼名目，止是爲對外的相當。什麼仇恨忘得快呢，無論什麼人，割他皮包罷，撒他爛污罷，過後再去見他，他一樣的信任他，如無其事，這又是黨裏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他生平吃了陳競存的虧最大，因爲幾乎喪了性命，然而十三年他在韶關，我去求和，他止要陳寫張悔過書，就無條件的把廣州讓給陳，他自己去北伐了，可惜陳是決不肯寫悔過書。因此閒話少說，到了如此的南北皆需應付，那裏好沒有一個總司令，今天報上見李協和先生的說

法，止要有實在，不必有名目，那是把名目看了輕，不會顧着相當了。總司令本值得幾個錢一斤，乃是蔣李兩先生見解相同的。然而發號施令的專不專，分別就大了。講到我們黨人，本把名目看得甚輕，誰做什麼，不過如扮戲一般，誰扮小姐，誰扮丫頭，止求相當罷了，在後台還是彼此相同，微微一笑麼，然而在前台，終要扮一個像樣才好。蔣總司令辭職，本來自始至終，不曾有一個機關允許他，現在又經多數執監委員催他復權，他本也諍不容辭。我望特別委員會，既然發見了不相當，也好像總理既不需總統，便辭却總統，到死止是一個大元帥，趕快即日解散，把黨的職權交還中央黨部，中央黨部止是一個機關，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同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機關，本來好好的在南京從前的省議會裏，文卷印信，完全在內，秘書處一向存在，各部也召集就到，執行委員監察委員本有少數出入其間，不過九月裏經了一個調停，將職權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代行罷了。若特別委員會把職權還了來，而執監委員到得少，就叫秘書處把公文可收起整理，請常務委員先到，便可日日先開常務會。倘拉都路的一齊到了，就開全體會議。至於常務會，既是寧漢合作，那麼寧漢從前的常務委員，

既未經第四全會否認，又決不聽特別委員會否認，他如何會沒有資格去開常務會呢。就是政治會議，也未經第四全會否認，也不聽特別委員會否認，如何寧漢的政治會議，不能暫行職權呢。所以黨的職權，乃是借題發揮的在那裏起閥，其實絲毫無什麼缺失。這都是目前的要圖。至於廣州這回事變，歸過在那一個，却止看見新聞報上張發奎說，『廣東弄至如此，我對廣東人不住』，却還不聽見汪精衛說過，汪止在前天報上說，他夫人言廣州共餓甚熾，似乎便是逼張發奎逼起來的，李任潮先生獨置此條而不辯，蓋張黃軍內有共黨，共黨日日伺隙，都是汪所自言的，既然如此，一不應聽憑僞為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予共黨以機會，二則共黨的趨勢，既如此利害，不應把一個有力反共的李同志反騙走了，乃交在無力反共的張黃手裏，這都是怪得不可思議的事實，那裏能把標語上有些打倒汪精衛字樣，就算事實證明呢。所以就無共產黨的嫌疑，這回汪精衛的輕視黨權的證據，及釀成共禍的罪名，也恐難逃罷，候慢慢的再說。

## 三民主義之認識

胡漢民

### 一、三民主義是以博大的無所不包的世界進化定律爲總樞紐的

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是從古今中外所有革命的歷史事實歸納出來的。先生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看出兩個要點：（一）世界歷史是依進化的定律而演進的，進化又是以爭生存爲中心的；（二）由爭生存這個中心，分演出各種的進化現象和事實，由進化的定律，分演出民族同民族爭，國同國爭，國內人民同君主爭，勞動家同資本家爭的種種現象和事實。這兩個要點，站在進化定律的立場看，是一貫的：這是先生的歷史觀。所以依先生所說：人類在世界進化中爭生存，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人同人爭，一定要到大同，才能解決。

在人同人爭的全部歷史當中，所發生的爭多得很。舉其最著者，如君權與神權之爭，君主與貴族之爭，君主與人民之爭。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殖民地與帝國主義之爭，國與

國之爭，民族與民族之爭。這許多鬥爭，並不是在全部歷史上分了顯明的階級的。許多著名的史家，因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把這種鬥爭，分做由神權與君權之爭，到君權與民權之爭，再到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的階段，這是不甚正確的，易引起誤解的。孫先生的學力之偉大處，就在於能把這種淺狹的時間和空間的界限看破，而一口道出各種鬥爭的聯屬性，總括的說：『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在人同人爭的全部歷史當中，君權與神權之爭不過是佔一極小的部分，推而至於民權與君權之爭，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民族與民族之爭，也都不過是各佔一部分。只拿一種鬥爭去解釋歷史，不但不足以盡人同人爭的全部，而且會走到和世界進化相反的末路上去。簡單的說，各種鬥爭，在歷史上有時是各別的發生，有時是混同的發生，有時是間斷的發生，有時是片段的發生，這都是由一時一地的實際因果關係所決定。但是一時一地的實際因果關係，還不過是各種各別的鬥爭的枝節因緣，而非全部人同人爭的總因緣。人同人爭的總因緣，就是以爭生存為中心的進化定律。

孫先生將歷史上各種各別的鬥爭，歸納為三種革命：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



。這三種革命，可以包括所有的歷史事實，故亦可以括盡人同人爭的內容。而且，在歷史上，三種革命也沒有什麼顯明的階段可分。我們要取十七世紀以來的世界史一看，就覈證明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是常常同時並起的。但是世界的學者，都是就一種革命的要求而發爲革命的思想，如盧梭天賦人權之說，專重民權運動，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專重無產階級運動，可爲明證。孫先生獨能超越於任何一種革命之上，而創立一個嶄新博大的三民主義，這是先生最偉大的所在。先生看到人同人爭的歷史的行程，是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由比較的各別發動而趨於混同發動，由比較的和緩演進而趨於急激展開，由比較的涉及於少數人而趨於涉及於大多數人。所以先生創造三民主義，就是應合這種歷史的行程，而成爲一個整個的革命主義。世界上無論那一派的革命主義，在理論上固沒有那個能如三民主義的完備，在實行上更沒有那個能夠跳出三民主義的範圍，這就可見三民主義之博大了。

結論：爭生存是進化的中心；進化是世界歷史的中心；三民主義是以世界歷史的中心爲綱領，其範圍則爲過去現在未來人同人爭的革命運動所莫能外。

## 二、三民主義的連環關係

現在是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同時急進化的時代，其原因就是全世界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充滿了世界歷史。從前各國有解決了民族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權民生問題；有解決了民權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生問題。縱有解決了民族問題或民權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生問題，也是落空。就時間上說，自古以來的世界，是這三大問題遞嬗堆積下來至今還未解決的懸案，尤其是到了現在必須一同解決的懸案。

就這三大問題亙古久懸不決一點上看，這就是需要世界革命的世界；就世界革命所要求解決的三大問題看，這就是三民主義的世界；更就三大問題成爲整個的連環的懸案看，現在就是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最需要的時代。在這個時候，世界革命的統一性與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必須保持首尾相顧之關係。換言之，各部革命要保持世界革命的統一性，但同時不要失却各部革命的特殊性；反之，世界革命要保持各部革命的特殊性，但同時不要失却世界革

命的統一性。這個條件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大關鍵。

能夠適合於這個條件，而可操世界革命成功之左券的，唯有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相互關係，正如三個小環扣合起來的一個大連環。以這一個大連環的普遍性和博大的性去滿足世界革命的統一要求，以三個小環的實行性去應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是最適用的，最切合的。

三民主義爲什麼最適合於世界革命，還可進一層從三民主義連環關係的本身認識出來。

(一)民族主義，必須要是民權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會變爲帝國主義。(二)民權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才不會變爲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才不會變成資本主義。要三民主義連環的實現，人同人的鬥爭才能終熄，大同世界就可實現。

結論：世界各國的民族，民權，民生問題有同時解決的需要，是爲世界革命的目標；三民主義因其連環的內容和關係，爲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適合的原則。

### 三、以三民主義批評其他主義

三民主義的整個性和連環性，既如上述，我們就可站在它的連環性上面，來簡單的批評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弱點了。

(一)國家主義，沒有世界革命的資格自不必說。固然，在求國家之自由獨立一個目的上，它也是要抵抗強權，因此它就可以牽合到民族主義的底下，但它却不是民族主義全體，尤其不是整個的和連環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全體，而況事實上發展到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那種國家主義，就成了帝國主義的代表。所以國家主義，一行到國際上頭去，就發生毛病，即近代談國際主義者也要反對，何況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其最終目的是做到世界主義的，還能夠不反對它麼？於此我們就可以說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至於在走偏到帝國主義一條路上去的一點上，國家主義簡直要變成民族主義的敵人了。

(二)無政府主義的最終目的爲無治，爲大同，與三民主義目的完全一樣；但其最大的弱點，在於沒有實現大同的方法。它有世界革命的願望，却無世界革命的方法與行動。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比無政府主義更博大，與無政府主義有同一之目的，而其方法則爲無政府主義之所無。因爲先生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由權與能之分開，由打破強權就可達到平權，由平權就可達到無權，無權就是無治。再加上三民主義之連環的實現，民族由平等而至無爭，民生由平等而至無階級無貧富，這豈不是世界歸於大同了麼？到了這一步，文化一定極優美，道德一定極高尚。所以我們可以說；無政府主義不過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纔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

(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這幾年被俄國和第三國際採用得來倡世界革命，便成了流行一時的舊骨董。但以馬克思主義爲世界革命的基本理論，其最大弱點有二：第一是不新；第二是不殼。不新不殼，所以就沒有成績。何以不新呢？馬克思的主義，是就七十年前的歐洲經濟現象所下的結論，不是就世界進化現象全部所下的結論，所以不是新的，而且是不適用的

• 何以不設呢？馬克思處處不肯失去其科學方法，這是他的好處，但正因其不肯失去科學方法，就證明其爲不設。因爲他的科學方法，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他所研究的對象，只是經濟生活演進的一段，這是時間的限制；研究的範圍，只是歐洲一二國的經濟材料，這是空間的限制。馬克思充其量不過是世界革命的學者之一，他的主義那能比得上包羅全部歷史事實和應合世界進化定律的三民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不設的第一證明。馬克思的第二國際之秘奧，全在拿階級鬥爭的縱的結合，去衝破民族鬥爭的橫的結合，所以他的口號是『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在歐戰時，第二國際更倡『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但第二國際統轄下的各國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大多數都爲贊助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失節，第二國際即因以瓦解。這可證馬克思一派人不懂民族主義的失敗。俄國革命，祖述馬克思，但是同時列寧就於馬克思『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之外，加了一個『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列寧的本意，在以階級的革命爲主，而利用東方民族革命爲輔。這是列寧比馬克思懂民族主義的地方，而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和第三國際之所以能夠維持到今天，還是爲此。列寧在階級鬥

爭之外，加用一點民族主義，本來已是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一派人却辯護說，這不過是利用民族主義。但是我們就知道。唯其不能不利用民族主義，正足證明他們非承認民族主義的事實不可。由馬克思和列寧兩派的經驗，便得兩個教訓：第一，歐洲階級革命便不行；第二，東方民族革命才行。但是俄國現在的列寧主義者還沒有覺悟，還沒有領悟這個教訓。因為第三國際還想借帝國主義的本身和對象以統治東方各民族革命；這正足證明其還沒有認識民族性之全部重要意義。總括的說，馬克思是不懂民族主義，致有第二國際之失敗；列寧懂了一點，遂收了多少革命的成效；現在第三國際由不懂民族主義而至於傷害東方的民族性，其錯誤必與馬克思同，其不足為世界革命的基礎亦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不毅的第二證明。最後，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是不願要民權主義的，因為它所要的是無產階級獨裁。民權主義的本意是自由平等；在世界革命的立場看，是沒有絲毫惡意的。但是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者，一定要把古代希臘的民主和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拿來做攻擊民權主義的材料，並且以此就來襯出獨裁是真的，民主是虛偽的。這一點我們姑且退一步承認，但是馬克思派又不肯老實

說獨裁是真的。還要拿『民主集權』『以階級獨裁消滅階級』一類的話來做掩飾，這豈不是承認民權主義是政治的極則麼？再就他們解釋階級獨裁的內容而論，說老實話，就是求一個階級的民主而壓迫其他民主，還不是承認了民權主義麼？馬克思派一方面攻擊民權主義為虛偽，一方面又承認民權主義的需要，是一個大矛盾點；一方面承認民權主義的需要，一方面又只接受民權主義的一小部分的是一個大弱點。但是在世界革命的需要上，不接受民權主義的全部，便不足以領導世界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不韋的第三個證明。由此三個證明，我們更下一個總結論，就是：共產主義在基本理論上不懂民族主義和不要民權主義，是犯了不韋做世界革命基礎的幼稚病；在實際活動上却只接受了一點點民族主義和一點點民權主義，故其結果，最多不過做到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哪能配談世界革命？既幼稚而又不澈底，便是共產主義的理論與方法都不行。何況馬克思為共產主義定下的結論，是七十年前就一時一隅的經濟現象所定的，已是陳腐不適用，怎能用以實現世界革命的目的呢？孫先生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這句話正因先生看到馬克思主



義的理論和方法全然不行，只有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才能實現共產主義所指向的目的。不懂三民主義且不懂共產主義的人，把先生這句話當做共產主義的護身符，實屬大錯。要曉得凡是講世界革命的人，最終目的定是相同的；但是方法不同，就關係重大了。誰的理論和方法證明是行得通的，誰就是真正世界革命者；誰的理論和方法證明是行不通的，誰就是不革者，甚且誰就是反革命者；所以孫先生『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一語，實不啻把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打到不革命和反革命的路上去，而一般人還想拿先生此語作護符，這真是自暴其不革命和反革命的醜態！

結論：國家主義，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上為不健全，其病在幼稚；在事實上發展成爲帝國主義，其病在偏爲民族主義之下的右派。無政府主義，在企望人人自由平等人人無權無爭的理想上爲民權主義的左派，而其病在於無實行的方法。共產主義，在階級革命和階級獨裁的理論與方法上，其病在幼稚；在不認識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於世界革命爲需要的全部意義上，其病在不澈底，強暴行之，且有自趨於反革命一途的危險傾向。

#### 四、總結論

從以上簡括的說明，我們更作一個總結論，就是人類以爭生存為中心，而爭生存就是世界進化的中心。從世界進化的行程，自古以來就生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革命者的唯一任務，即在於了解此三大問題之所從出，依其需要解決的企望，和客觀的實際所備具的條件，定出一完備的革命主義，以求全部澈底的解決。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即本此義而創立，故其博大悠久的適用性，古今中外實無倫比。馬克思主義，固不失為一種富有革命性的學說，然受時間和空間的制限，未能了解歷史的真正重心，遂失其領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能糾正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的觀念之錯誤的，最近固有一派，如美國學者威廉氏，即其一人，但其短處在昧於世界革命的急切需要，而不知世界進化實有日向激急的革命化之趨勢，故其學說不能逃缺乏革命性的批評。孫先生之三民主義，則兼具兩派學說之長，而無其短。這就可知先生眼力之偉大，學力之偉大，魄力之偉大，革命性之偉大。許多人以為現在只管國民革

命，等到國民革命的結果，~~大家~~已死在地下，共產主義也好，三民主義也好，橫豎管不到的，何不等後來人去爭個解決？說這種話的人，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懂得爲什麼有革命的需要，沒有懂得革命爲什麼要主義，更沒有懂得我們的世界是什麼世界，所以他就根本上把國民革命看做一回事，世界革命另看做一回事，這哪裏是忠實的革命者？哪裏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哪裏是孫總理的信徒？我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都應該了解總理的歷史觀和進化觀，都應該了解總理的主義之出發點和開展線，然後纔能了解國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之一致，纔能了解各部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必須爲三民主義的革命。凡我同志，當急起注意。

## 清黨之意義

胡漢民

中國國民黨何以有這次的清黨運動呢？要澈底明瞭其中的意義，必先要認清楚本黨的使命，本黨的精神，和本黨的歷史。

中國國民黨最初的組織是興中會，後來擴大為同盟會，民國初年改為國民黨，二次革命後改為中華革命黨，民國九年才改為現在這個名稱。

興中會成立於前清光緒二十年。先生自傳曰：『余自己西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定傾覆滿清，創建民國之志，……至甲午中東戰起，……乃創立興中會，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應者寥寥。』又興中會宣言曰：『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於他族。』我們再默念一下 總理遺囑裏所謂『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及『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的話，就可以了然 總理自組織興中會至於辭世的剎那間，~~……~~是喚醒錮塞的人心，並領導着他們去革命來實現三民主

義以救國家的危亡，爲自己的責任，同時也就是總理付託給中國國民黨的責任。

我們天天說革命革命，革命到底從那裏來的呢？牠不是從我們口中喊出來的，也不是牠自己會從天上掉下來的，牠是應環境的需要，從人民的心窩裏鑽出來的。時代不停地推進，文明踏着大步前行，人類的慾望和智識也似潮水般洶湧增長，而社會的制度，却是萬分頑固不靈，牠不管你說什麼自由平等，平等自由，牠只是閉着眼睛，掩着耳朵給你一個不理。舊制度不適用於新的環境，簡單的理論不能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新時代的人物忍受着無窮的痛苦，冷酷的制度只是板着老繃的面孔。可是一朝有個絕頂聰明，勇敢無畏的人登高一呼，革命的火燄就爆發了。在中國，這個人就是我們的總理孫先生。他不但敢挺身首先向舊勢力攻擊，把我們從夢中喚醒，他還根據着中國實際情狀的需要，世界思想潮流的趨勢，指示給我們一條革命的道路，就是三民主義的道路。

革命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做得成功的，必須集合信仰相同的同志來共同奮鬥，於是就有革命黨。因爲革命是以一切舊的腐敗的思想和制度爲破壞的對象，在初期革命的勢力尙未充分



的人，甚至不少自己的同志，都以爲本黨是一個政黨，和那些什麼北洋派，奉系，直系不過是派別的不同，並不是性質有什麼差異。這真是荒謬之極！不要說這些直系，奉系，北洋派等等根本上還夠不上叫政黨，就是真正一個完全的政黨也何能與本黨相提並論？一個政黨的根信條是承認目前的現狀。而本黨第一個大前題就是要破壞目前的現狀。這如何能說性質是相同呢？中國國民黨並不是坐在議會裏賣口才，博拍掌或是舉票，乃是站在戰場上爲一種看得見捉得着的理想——三民主義——而用積極的行動去奮鬥的革命黨。我們可以更明白乾脆的說，除掉了革命的精神就不成其爲中國國民黨，抹殺了三民主義也不成其爲中國國民黨。

我們說到清黨這件事，翻一下本黨的歷史，就可以看見乃是常有的事。民國二年解散了國民黨，另行組織中華革命黨，是第一次的清黨。總理自己說，是「恢復民國前革命黨的面目，而加以嚴格的訓練，」言外之意，就是不滿意宋教仁把同盟會改爲國民黨，引了許多腐敗官僚，滑頭政客進來，把同盟會的好份子也腐化了去，把活活的一個革命黨，弄成個不生

不死的政黨。第二次清黨，是民國十三年中的中國國民黨改組運動，這一次的改組運動，包含着幾種非常深刻而重大的意義。第一，牠把第一次清黨的精神更加澈底地實現出來，毫不姑息地去掉舊的腐敗份子，毫無限制地吸收新的青年學生；第二，牠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嚴密的組織，和注重民衆運動的新方針；第三，他重新確定了三民主義在本黨的絕對性，和本黨在中國的獨一性——以黨治國；第四，他在本黨的歷史上成了一個『托孤』的紀念，因為還沒有等到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的總理孫先生就長辭我們而去了。

從上面的觀察，我們可以歸納出下邊這幾個要點來，——

- 一、三民主義是孫先生適應中國的實際環境，根據着世界思潮的趨勢而創造的救國主義；中國國民黨是爲喚起民衆及領導着他們去實現這個主義的革命黨。
- 二、中國國民黨無論名稱如何更換，組織如何改變，而宗旨和精神是始終一貫的，不能更改的。他的宗旨始終是實現三民主義，他的精神始終是革命的精神。
- 三、中國國民黨爲完成他的使命起見，是不停地在鞏固他的基礎，嚴密他的組織，整肅



他的紀律，所以他隨時隨地都在清除他內部一切不良份子和各種的障礙。

現在再來觀察這次的清黨。我在前邊說過，民國十三年改組，加入了很多很多的青年，這裏頭有一部分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當時就有很多同志懷疑：一個媳婦有兩個家婆尚且不易對付，何況一個人同時做兩個主義不相同的黨員呢？李大釗以是乃在代表大會中鄭重負責當衆聲明：共產黨徒是純粹以個人資格加入來信仰三民主義，遵守中國國民黨紀律，實行做國民革命的工作的。這無異是說凡是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都是已經脫離共產黨的關係的。而且，實際上凡是共產黨員入黨也和普通人同樣經過一樣的手續；總理也始終未說過要對共產黨員有什麼優待。在總理的意思，以為革命乃是大家的事，救國更是匹夫匹婦的責任，這裏頭並沒有什麼權利可爭，來的人自然都是誠意來革命來救國的，我們為什麼先要存着卑鄙的心理去疑心人呢？所以總理雖未說過要優待他們，也着實替他們解釋過不少的。並且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人選，也給他們佔了不少的席數，中國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總算推心置腹，無以復加了。他們給我們的報酬是什麼呢？第一，就是給我們製造了一批非常

能幹，又會看風使帆，又會吃西陂口沫的左派；第二，又給我們製造了一批五花八門的右派，新右派新新右派，新軍閥，新官僚，工賊，昏庸老朽，老朽昏庸等等，似乎中國國民黨，除了這些就什麼都沒有了！幾年以來，到處聽見人說共產黨把持我們的黨部，破壞我們的基  
本組織，分裂我們同志的結合，如今看起來，真是一點也沒錯。拿各地清黨以後的情形看起來就知道了。這樣的情形呢？黨部是空虛的，民衆是紛亂的，上下是不相連絡的，這不是共產黨那三種陰謀所造成的結果是什麼？我們眼看着人家一面挖我們的心，一面吸我們的血，一面割我們的手足也不管嗎？管就得清黨。

我們爲什麼要保護我們的黨呢？簡單說：就是要救中國。共產黨爲什麼要破壞我們的黨呢？就是要害中國。要救中國就得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要打倒這兩個東西，第一步，就是北伐。我們要救中國，所以無論如何困苦艱難也要北伐；共產黨不要救中國，所以無論如何艱難困苦也要破壞北伐。否則，當我們未出師以前，還可說是怕實力未足，徒勞無功；然而當我們已下湘鄂，定閩贛，出師東向，和孫傳芳張宗昌數十萬虎狼之師血戰於沙場的時候，

爲什麼偏偏要散佈種種的謠言，什麼英雄主義，個人獨裁，什麼軍餉不清，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妥協等等來破壞軍事領袖的信用，搖動前敵將士的軍心？難道你們安坐武漢，才算是革命？難道你們斷絕軍需的接濟，置十餘萬武裝同志生命於不顧，就是提高黨權？不錯，幾時國民革命軍死絕了，共產黨自然就會把國民黨的黨權和中山先生的遺像抬到歷史博物館的六層樓上去了，那自然是很高了！

共產黨果然是真看得破。當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虎視眈眈，惟恐沒有藉口以實施他們武裝聯合壓迫革命軍，實力幫助軍閥的時候，他還要不惜犧牲所謂他們的農工羣衆，大暴動衝入租界，給帝國主義者一個藉口。本來在他們看起來，農工和國民黨都不過是貓爪，國民黨已可破壞，農工爲什麼不能犧牲呢？只要中國共產黨能存在，中國四萬萬人死絕了有什麼要緊？反正餓着肚子的俄羅斯人還多得很呵！中國亡了又算得什麼？反正中國共產黨還可以到俄國去呵！有人說，共產黨是要實行馬克思主義所以才破壞國民黨，所以才阻止北伐破壞國民革命。如果真是這樣，那到也不失爲馬克思的忠實信徒；可是他們的陳大領袖獨秀先生却

老實對吳稚暉先生承認二十年就要實行共產，縱然祇是掛掛招牌！

本着我們已往的使命，本着我們一向的精神，我們能容這個破壞本黨，犧牲國家，欺騙農工，背叛主義，只顧爭奪私人權利的中國共產黨嗎？不能的！（不但是我們不能容牠，凡是馬克思的忠實信徒都應該起來打倒這個假共產黨！）我們過去的清黨只是把不良份子清出黨外就完了，我們這次的清黨是要進一步把共產的死灰都要送還給俄羅斯，不能讓牠遺留在中國的。乾脆地說，這次的清黨，就是要消滅中國共產黨！

可是我們應該知道共產黨全國的黨員，據他們自己的報告說，不過八千，何以他以這樣少數的人就能操縱把持我們各地的黨務呢？這就是因為他們一方面利用中央的威權，當譚平山當組織部長的時候，在各地先立下一個基礎；一方面又利用各地的真正的土豪劣紳勾結着一切無賴份子。這樣的上下包庇，自然就可以橫衝直撞，鬧得真正的良民避之惟恐不及，還敢來入黨嗎？各地的下級黨部十有八九都是這種情形。這種黨員不要說三民主義不能了解，恐怕是連三民主義叫什麼還說不出來。本來當初要他們入黨的人，就只是想利用他們來投票

，他們也只需要張黨證來做護身符，或者還正不要本錢，樂得做個人情，他管你什麼三民四民呢。我們要消滅共產黨，非將他這基礎剷除不可。我們要清黨清得乾淨，非將這班無賴份子，土豪劣紳，及一切不知主義爲何物的黨員，一概清除出去不可。不怕每個地方只剩下個黨員，甚至沒有一個黨員也不要緊。我們清黨既不能單以黨證爲憑，也不能因爲他沒有共產黨嫌疑就算是黨員，我們一定要以了解主義與否爲去取的標準。說到打倒土豪劣紳，共產黨叫得比誰都響，但是有好多是『土其所謂土，』『非吾所謂土，』『劣其所謂劣，』『非吾所謂劣』的，我們在這種地方一定要分別清楚啊！

我常常想，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五六歲的乳臭小兒，中國國民黨却正當壯年經驗豐富有作爲之年，論份子中國國民黨多他百倍，論勢力中國國民黨也大他百倍，爲什麼倒被他這個小鬼搗得亂紛紛呢？雖說是人家挑撥離間的手段非常毒辣，然而上當不上當到底也全在乎自己。雖說很多都是敵不過人家威脅利誘而上當，然而歸根到底還是因爲對於主義沒有澈底的了解，故沒有堅決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種力量來抵抗引誘和威迫，因此，今天以爲三民主

義是好的，明天也許以爲馬克思主義更好，後天或者又以克魯泡特金的主義更好了。這如何能做忠實的黨員？這樣的黨員如何能夠團結起來？這樣的黨如何能不坍台？對於主義懷疑是頂要不得的，尤其是革命黨對於自己的領袖和主義信仰不篤，真是革命黨致命傷。因爲一生懷疑，就會變成反動。我敢武斷地說一句，我們的同志，就是常在 總理左右的同志，也多半對於 總理只有絕對的敬仰，沒有絕對的信仰；對於主義也只有口頭上的讚許，沒有真心的篤信。人人都以爲 總理的見解也不過如此吧，我的見解也不見得比 總理差吧。甚至於站在領導者地位的人，也居然說得出我們只要努力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成功以後的事，可以不必過問。這成什麼話！我要問問說這話的人是真糊塗還是裝糊塗？如果真是這樣糊塗，那就連黨員都不配做，不要說是領導者了！如果是裝的，那我們就要問爲什麼要如此不光明？是怕；還是故意不說，來迎合某種人的心理？跟隨 總理左右二十多年的人，還不免如此，何況一般普通的黨員呢？如何能怪他們不篤信 總理和他的主義呢？如何能怪他們抵抗不住威逼和利誘呢？啊，想起羅馬末年基督教徒信仰主義那種堅定不拔的精神，受了獸餐火燒種

種奇奇怪怪的酷刑而至死不怕不變的精神，我們真要慚愧死了！所以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企圖，就是要造成絕對統一的信仰。以我個人的經驗，我深知就是處理一件很小的事體，我們的見解都還不及 總理。我們不但是要敬仰 總理，我們簡直要絕對的信仰他和他的主義，甚至於迷信他也是應該的。吳稚暉先生說：六十年前中國會產生一個孫中山，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我們都應該有這種信念啊！譬如說到馬克思主義適合不適合於中國的問題，如果我們能澈底理解自然是最好，否則我們就應該相信如果是馬克思主義能適合於中國， 總理早就會採用了牠，（那裏還輪到陳獨秀去當領袖呢，）不用嘔盡心血來創造自己的主義了。我們須知 總理創造出三民主義來，不是為增光圖書館的，是要使牠實現的，（如果照中國共產黨的見解，是只有把三民主義放進圖書館去的；）而中國國民黨就是要用積極的行動去促這個主義實現的革命黨。但是黨員先沒有一個絕對統一的信仰，如何能有一致的行動呢？季陶說得好：『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我們這一次的清黨一定要十分注意於共信之認識，互信之確立的；否則，雖然把共產黨撲滅的干干淨淨，也沒有什麼多大的

意義。

末了，我們要認清楚的，就是我們每次的清黨，在行為上雖是消極的，而在動機和結果說却是積極的，進步的。中華革命黨比國民黨進步，中國國民黨比中華革命黨更進步，這是事實，不是空話。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希望，不但徒然希望而應切實去做到，清黨以後的中國國民黨一定比清黨以前的中國國民黨更要好，更要進步。而且論理也應該是那樣的。清黨以前還有共產黨破壞搗亂，清黨以後這些障礙都沒有了。做得到或做不到全靠我們了。我們要緊緊記着：清黨不只是要把共產份子，投機份子，土豪劣紳清除出去，並且是要把：

本黨的忠實同志團結起來！

本黨的基本鞏固起來！

本黨的工作表現出來！

本黨的精神發揚出來！

本黨的使命完成！



革命與反革命

本黨的主義實現出來！

## 青年的煩悶與出路

胡漢民

現今的青年都感着煩悶，尤其是覺悟的青年越感到煩悶。

煩悶的來由，固然有種種；政治的不清明，社會的不安寧，都直接間接給青年以重大的刺激。但這都不過是刺激罷了，還不是煩悶的總因。總因是：青年正在生理的發育最緊張的時期，血氣是剛強的，筋肉是飽滿的，天機是活潑的；他的生理的發育，使他時時刻刻起種種的衝動，而這些衝動是無目的的，無惡意的，無選擇的。簡單言之，他的生理上的要求，只是使他好動而惡靜，只要給他滿足了，就可算得是『得遂其生；』如果遇着環境的障礙，給他一個不滿足，他便不知不覺的起了心理的煩悶。心理的煩悶一起，他便不知不覺的埋怨一切的環境，詛咒一切的制度和習慣。我並不是說一切環境都是好的，更不是說一切制度習慣都是對的，我所着重的是：如果我們分析青年生理上的發育現象，就可以解釋他心理上的煩悶；從他心理上的煩悶，就可以解釋他對於一切環境的不滿。

因爲青年的生理發育最緊張，於是他的慾望也最亢進。就中國一般青年說，他們最普通的慾望有四種：（一）求知慾；（二）性慾；（三）佔有慾；（四）支配慾。這四種慾望，佔領着青年全部，而且支配着青年的全部人生觀。在舊社會的環境尚沒有改造成功的中國，青年這種慾望不能滿足，是毫無疑義的。不能滿足，便起煩悶，所以現在中國青年最感煩悶的切身問題，就是：

一、讀書問題。青年的求知慾是強烈的，讀書當然是求知慾必然的結果。有時讀書問題，在青年心目中簡直佔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把支配慾佔有慾性慾問題都暫且擱開，首先爲謀滿足求知慾而讀書的，這種實例倒是很多。好些青年，在求知慾最高的時候，爲了讀書，竟可以犧牲了戀愛，這種實例也不少。前幾年家庭問題鬧得最凶的時候，青年往往因爲要求婚姻自由，幾乎人人都要和家庭翻臉，而同時却有多少人並沒有和家庭翻臉的，其原因就是『爲了讀書，不得不要家裏的錢；要它的錢，就只好服從它；要服從它，就只好犧牲了婚姻自由權。』這種青年便是爲了要讀書而情願犧牲戀愛自由的。有人以爲這是一種缺乏奮鬥精

神的青年，實在是冤枉了他。求知慾支配慾，佔有慾和性慾，既然都是青年的慾望，而事實上又不能同時滿足，那自然就有一個先後緩急之分。求知慾比較強的青年，犧牲了婚姻自由，抑制了佔有慾，甚至忍受家庭無理的支配，而求達到讀書的目的；這豈是缺乏奮鬥精神所能做得來的嗎？凡是奮鬥，都要忍受幾方面的犧牲，而達到一方面的目的，都要忍受許多的缺望而滿足一個急切的需要。在青年心目中，有時讀書問題比任何問題佔的地位都高，有時戀愛問題比任何問題佔的地位都高，有時讀書戀愛都不覺重要，而求活動求事業的問題反佔重要地位，這都是隨着各人生理發育的程序和特性而差異的。當讀書問題在青年心目中比戀愛問題還覺重要的時候，失學的痛苦也許不減於失戀吧。所以我們只看青年在戀愛上努力而忍受了種種痛苦，或只看他在讀書上努力而忍受了痛苦，只看他的一面的努力而稱許他能奮鬥，或只看他的一面的忍受痛苦而批評他不能奮鬥，都不是對於青年合理的態度。我總認為青年是生理發育最旺盛的時候，如果他生理上是健全的，沒有先天的缺點和後天的殘廢，他一定是能夠奮鬥的。所以問題並不在那個青年能奮鬥，那個青年不能奮鬥，而在如何發展他的

天性和能力。青年要求在讀書上面來發展他的天性和能力時，只怕誰都要承認他是正當的吧。可是在中國現狀之下，青年要讀書，便要遇着種種困難，種種障礙。大多數青年，因於窮乏，不能求學和不能升學的，固是很普遍的現象，就是少數不受經濟壓迫得升學的青年，又擾於社會的不安，和政治的紛亂，不能安心求學。只看幾年來全國的大中小學，不是因為無錢停閉，便是因為欠薪罷課，不然就是因外交上的慘案罷課，再不然就因內戰陡起，交通阻隔，學生困在家園不能返校，或是學校受戰事影響不能開課。在這種種情形之下，教熱心求學的青年如何能不煩悶呢？

二、戀愛問題。性慾是本能之一。儒家說：『食色性也，』性慾與食慾並舉，實是一語破的。何況青年在血氣剛強的時候，色情的衝動，本來只有盲目的要求，那有自制的能力？而且在中國因爲一向把未成婚的男女關係，用『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約束得很嚴，就是男女婚姻，一向都是受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縱有怨偶，大家都歸之於天命以自慰，所以幾千年來，社會只把性愛納諸禮教的約束當中，却沒有成爲什麼大了不得的問題。自從自由

結婚的思潮流入中國，愛倫凱結婚必基於戀愛的話深入青年人的心，又因少數青年研究介紹西洋文學的結果，使一般青年都沉醉於戀愛的迷夢中，性愛問題便成了青年切身嚴重的問題了。這些青年人所接受，所信仰，所沉醉的一切，都是和中國一向的風俗習慣相背謬的。你要自由，老習慣叫你服從父母；你要結婚先有戀愛，舊風俗說，男女是授受不親的。社會既沒有承認男女的交際爲正當，青年人自然很難得有自由選擇配偶的機會。意中人尋不着，青年人是照例要發生『何處是我的歸宿』的悲哀的。就是偶然給你遇見了一個戀愛的對象，還怕是你自己害單思。即使有了雙思的條件，經過了相當時期的『弄情』，『英語所謂 love making』，彼此都有願爲配偶的時候，又許有家庭社會或其他無可奈何的障礙不容你們結合在一起。不少的青年人或許衝破了一切家庭社會的藩籬，老實做了舊風俗習慣的公敵，又往往遇着自由戀愛的毛病，結果爲求自由反而得着不自由。所以現在的青年，爲了性愛跟着舊禮教走的，固然有煩悶隨着新思想走的，也還是不自由。這就是因爲太不自由，和太自由，都會生出不自由的同樣結果。由這一個同樣的結果，所生的煩悶，現今的青年，有幾個沒有經驗過的

呢？

三、經濟獨立問題。這幾年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女子的經濟獨立問題，成了婦女解放問題的中心論點，而青年男子的經濟獨立問題，倒反沒有人注意。其實中國民族的生存問題當中。青年不能獨立謀生存，這個問題如果不是比女子謀生存的問題更佔重要地位，至少也應二者一樣的注重。一般人的下意識底下，只以為青年是受了教育的，有了相當的學問就自然謀生有路，所以就漠視了這一個問題。然而事實上青年所感受經濟不能獨立的痛苦，已經成了普遍的現象。青年入學的時候，幾乎沒有幾人不聽着他家裏發出一種『不能擔負學費』的哀聲。好容易湊得一年半載的學費給他上學去了，而家裏還要焦着心腸，給他籌下學期的學費。家裏既然如此的過了今日又愁明日，他到了學校裏想想家裏的窘狀，也是憂多於喜，那裏還能安心求學？這是一般家庭的窮乏，已足以引起青年心裏的煩懣了。進了一個學校，甚至得了升學的幸福，他自己還須得憂慮，因為究竟畢業之後，他是否能夠獨立謀生，還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問題。就一般的現狀看來，中國現在的學校，是不能給學生以獨立謀生的技

能的。教育的失敗，便是青年謀生的最大障礙。不幸中之幸的，就是我們社會的人才同時最感缺乏，所以畢業後的青年，多少還能遇着不被社會事業所遺棄的機會。然而因為沒有真實技能，或有真實技能而遭遺棄的，這種青年尤佔大多數。青年們的佔有慾是最強烈的，但是經家庭的窮迫，教育的不健全，和社會的不接受，他們的佔有慾就完全陷於失望的境地。由這種失望而生的煩悶，在二十五歲以上的青年當中，比任何煩悶都實在嚴重得多。

四、事業問題 青年要做成一件事業的心理，大抵起於支配慾的居多。但是我們這裏所當分別的有三點。其一，求知慾和性慾，佔有慾和支配慾，都是社會的遺傳，換言之，就是得諸模倣社會的習慣或環境的傳染。其二，這四種慾，在作用上都是交相連結的，不易分開的，所以青年的一種慾活動時，其他三種慾也常常夾在一起活動的。譬如戀愛時，支配慾和佔有慾都會跟着性慾一起活動的，這就是明證。其三，支配慾固然是和其他三種慾相通，但是如果經過健全的教育的訓練和改造，沒有良善社會組織的扶持和國家的利導，則只能成為自私自利的支配慾而已。青年的事業，本來要基於創造慾，才不至落到自私自利的個人主



義。因為創造慾發展的結果，如發明家，科學家，純然是利他的，是服務人羣的，是不希冀報酬的。但是在中國幾乎沒有教育沒有社會組織沒有國家建設的現狀之下，只能使青年發展支配慾而不發展創造慾。不能發展創造慾，就是民族建設的力量要衰落下去，而他方面支配慾發展的弊害，不是因為不能作出正當事業而起煩悶，便是因為失了一切藩籬而衝成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這兩種弊害，都不是民族生存上的良好現象；深切言之，其不良足以陷中國民族於絕望。眼前中國個人主義的普遍，引起社會的紛亂和煩悶已經不少；這種紛亂和煩悶，可以說得是個人主義者的支配慾成功的結果，和那些作不出正當事業的青年由支配慾失敗而生的煩悶結果，完全沒有兩樣。所以中國現在的青年，因為不是發展創造慾，而是發展支配慾，在事業上便生出兩種結果：（一）支配慾成功，便是個人主義；（二）支配慾失敗，便是消極主義；二者都歸結到社會和個人的煩悶。

青年們爲了這四個問題，都陷於煩悶當中；這個時候，於是有許多人爲他們說法。總合這幾年一般人對於青年的態度，約不外三種：（一）禁慾主義；（二）縱慾主義；（三）三民主義

。其他出入於三種態度之間而無系統的主張的，我們可以略而不論。

(一)禁慾主義者說：青年們好好地去讀書吧：讀書就是你們的出路，讀書你們就可以忘記了煩悶，讀書你們就可以得到了無限的安慰。求足了學問，你們就可以謀生，可以作事，可以得到愛妻，可以改造社會。所以，你們一定不要性急，求學的時候，只管求學，其他一切問題等你們有了學問再來管罷。這一派人的話，表面似乎把青年一切煩悶都信託於書，讓青年到書本子中去慢慢尋求解決，然而心裏却主張青年人是不應該談自由戀愛的，不應該憂慮將來經濟不獨立的，而且不應該憂慮將來沒有事做的；青年人所應該做的只有讀書一件事。試想青年們的感覺是靈敏的，天性是活潑的，感情是亢烈的，叫他們耐着心腸去讀書，就行的嗎？學校裏所教的，終是這麼幾本沒有進步的老教科書，所請的終是這麼幾個沒長進的老教員，所講的終是這麼幾本沒改變的舊講義。有些青年聽了禁慾主義派的教誨，書自然會讀的不少，可是人却是越讀越糊塗了，漸漸地只認識這麼幾本老教科書，只聽到這麼幾篇舊講演，而不知世界的形勢社會的變遷了。讀文學的只知有風花雪月，讀哲學的只知有唯心唯

物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汨沒了性靈，還要不認得世界和社會的實際，多數青年終於會有一天忍不住外來的刺激，禁不起心頭的煩悶，而不能不走向別方的。

(二)於是縱慾主義者就說：青年們來吧，來革命吧，讀什麼書呢？現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不是讀書的時候了；而且，讀多了書，就會變成反革命。智識階級多數是反革命的。我們革命，還要打倒智識階級哩！本來，讀書可以滿足青年的求知慾的。縱慾主義的共產黨深知中國的教育制度不能滿足青年的慾望，而且深知青年的慾望是什麼，所以就拿出一套足以麻醉青年的法寶，向青年工作起來。它的法寶是什麼呢？第一件，叫做誇大狂。青年的求知慾，是帶着一個畸形的好奇性的。如果你能滿足他的好奇心，他的求知慾也就可以不求真理的方向發展，而偏向求新奇的方向發展了。共產黨的誇大狂正是引動好奇心的嗎啡針。你要什麼知識呢？共產黨是用不着知識而可以征服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是沒有知識的，但是只要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大革命，就可以造成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了，那還有旁的人敢說我們沒有知識嗎？這一種口調，原來是反乎常理，但唯其反乎常理，才顯得

出新奇。有些青年因爲長久處在煩悶中，自然容易接受這種新奇誇大的宣傳。他們那裏會想到秀才造反，三年尙且不成，何況不要知識的人，豈能革命呢？又那裏會想到如果真要打倒知識階級，爲什麼共產黨不就先打倒發明這個口號的人呢？俄國大革命後，蘇聯政府規定全國一切機關工廠等的職員月薪，最高的不得過二百三十盧布。但是懸二百三十盧布的月薪，在俄國找不出一個專門人才來管理一個高加索煤油礦，蘇俄政府便不顧法律，却破例每月花了二萬盧布去請了一個美國技師來管理這件利益豐富的事業。這就可證明共產黨一面喊打倒知識階級，一面又要優待知識階級；共產黨這種對着衆人打自己的嘴巴的事實，中國青年們又有幾人知道呢？所以共產黨自己並不是不要知識，只是拿不要知識的口號去放縱青年好奇的心理同時也就騙到一般沒知識和懶於求知識的青年人去替它作犧牲。受其欺的，固然得以大大發洩一點好奇心和懶學心，然而欺人的共產黨也就大大發洩它的支配慾了。

尤其狡猾的，就是共產黨的第二件法寶，叫做性交自由。這個法寶的作用，簡直不僅僅可以投合青年的色情狂，並且足以麻醉青年的好奇狂支配狂和佔有狂。什麼裸體游行，男女

同浴，打破廉恥，在事實上雖不必共產黨的青年個個有此舉，然而以此作宣傳的工具，已足以誘惑一般人的好奇心和性愛慾。戴季陶同志前兩年對於施存統張春木的故事，很抱不平，而C P却認為對於C Y男女最妙的辦法。在莫斯科東方勞働大學和假借孫總理之名的大學當中，更是盡天下男女之奇觀。還有一次一個共產黨員強姦了同黨一個有夫之婦，雙方鬧到黨來審判，而裁判的人只說：『強姦人的固然是幼稚病，但被強姦的也未免思想落後！』所謂幼稚病，所謂思想落後的批評，真是再妙不過。共產黨來到中國，是奉旨犯幼稚病的，儘管強姦有夫之婦，算不上何種罪過，而怕受人思想落後的批評，就可任人強姦——這一段風流公案的裁判，令人想起在武漢被強姦的多少國民黨員。我相信柳子厚的河間婦人傳，是一篇懺悔的文字，可惜他們都沒有讀過。——中國一般人受了共產黨的渲染，性問題的文字也就越發風行。就中有個所謂張競生的，竟放着多少事情不去做，却窮年累月去研究這個與有生以俱來的舊題目，而一般人倒以為新奇。這種又幼稚而又思想落後的性狂家，却更遠在別具肺腸的共產黨之下了。或者老實一點說，青年是應該有相當的性智識，然而研究性智識教人

得衛生和優生也就夠了，何以所研究的又不特與衛生學和優生學的目的無關，並且只會把青年都葬送到肺癆病的窟中呢？只要看那些做共產黨而兼性狂家的人，如蔡和森瞿秋白之流，無產階級專政尙未成功，癆病却已到了第三期。縱使他們把中國青年犧牲了一大半，做到了無產階級專政，也只怕是癆病鬼專政吧！

末了，共產黨的第三件法寶是捧場，而第四個法寶是收買。青年的支配然和佔有慾是後天發達的居多；而且青年人最得意的也不過是初出茅廬；懷着支配慾和佔有慾的，比較還是希望不奢；但是共產黨却盡量地給CY一個超過奢望的捧場和酬報，青年人那得不爲所顛倒呢？馮煥章同志告訴我，說陝西的農民協會委員長不過十幾歲。上海工友都知道李立三等都發了大財。陳獨秀不知個中玄機，還在CY開大會時，說『中國的CY不該竟做了CP的工伴』，無怪共產黨說他還是右派。共產黨如此激進青年的支配慾和佔有慾，幾個青年人能夠不入彀中呢？許多人都曉得說：理想中的共產，須得要支配慾和佔有慾低減到消滅的程度，才能實現。現在共產黨却以虛榮和金錢去誘致青年，激進他們的支配慾和佔有慾，這那裏是

走朝着共產主義的理想所走的路呢？這一說雖可以顯出共產黨的作偽，然而我們也要看透共產黨所以用虛名厚利去勾引青年，其目的並非推行共產主義，實是要取得民衆，擾亂社會。因爲列寧的秘訣是：亂，大亂，才是少數黨徒能夠奪取政權的唯一機會。

總括地說，共產黨的縱慾主義，是要縱好奇慾，縱淫慾，縱名慾，縱利慾；這無一不是以獸性的個人主義爲出發點，亦無一不是以獸性的個人主義爲歸宿點。縱慾，才能迷惑民衆，迷農人迷工人，迷青年男女；縱慾，才能生亂，亂人性，亂家庭，亂社會，亂國家，亂世界；這就是共產黨的所謂革命戰術。從重重疊疊的亂當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奪取政權，這便是共產黨的最終目的。爲了共產黨少數人這種主觀的目的，於是生出種種造亂的主觀策略和戰術；爲了要施用主觀的策略和戰術，於是採用了一個投合個人主觀的縱慾主義或快樂主義；結果，無論共產黨成功或失敗，天下人都要生出普遍的主觀的痛苦和悲哀。所以，青年人從禁慾主義中被勾引了出來，却又要死向縱慾主義中去；所謂工具的犧牲，還有過於此的嗎？

以上這一切，都是卑之無甚高論。只是這樣討論下來，我們得了三個主要論點：其一，就是青年的慾望不滿足而起煩悶；其二，就是禁慾主義者不滿足青年的慾望而使青年別尋出路；其三，就是縱慾主義盡量激增青年的慾狂而陷青年於死路。於此，三民主義者，就不能不救救青年了。

(三)在三民主義者的立場，我不是主張像禁慾主義那樣否認慾的存在，或認其存在而認定凡慾都是惡的，更不是主張像縱慾主義那樣純以利用人們的獸性為造亂的工具的。其實禁慾主義和縱慾主義，二者都是謬誤的，其謬誤可以舉二事來證明。從前孫少侯學佛，坐關三年。他不僅是禁慾，簡直是斷慾。但是他經過坐關之後，在還俗的那一年之中，犯了九個女子。這是在一個時期性慾獨強的故事，可見凡慾都不是人人平行發展的，而且因為斷慾，慾反橫決起來了。孔德少時，愛了一個女子，經兩次的求婚，都被拒絕。過了多少時候，她就死了。他因此就將他的愛情升化起來，轉而用於求知，遂造成他的哲學統系，為社會學的先覺。這又可以證明人生的慾，是可以變移的。三民主義固不否認慾，但是認定慾是隨人不



同，慾和慾的發展，其次第不同，其強弱亦復不同。不但如此，慾是可以變移的；譬如以發洩性慾的精神去求知，以發展支配慾或佔有慾的精神去求創造發明，這都是合乎今日科學的教育的精神。孫總理說：『古人所謂天理。其實屬於人。所謂人欲。其實屬於天。』又說：『人的本源便是動物，所賦的天性，便有多少動物性質。換句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自然不至於作惡。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高尚，所做的事情，當然是向軌道而行，日日求進步。』這段話，就認定人的獸性和人性都可以改造的；慾改造而成理性的進步，理性造就而求社會人類的進步，這才是革命的教育的最高目的。

從禁慾主義和縱慾主義的種種相反的差別當中，還可以看出這兩個主義有一相同的短處，就是二者都是歸結到個人主義。因為禁慾的成功是獨善其身，而其末路便是反動的放縱。至於縱慾主義的成功和失敗，更不必再說了。縱慾禁慾，都是利己。唯三民主義承認凡慾都

有其相當的功用，而在乎調理造就之得其道；得其道，就可以利人。總理說：『我們把人類兩種思想來比對，便可以明白了：一種就是利己，一種就是利人。重於己者，每每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此民權革命以前之世界也。重於利人者，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亦樂而爲之；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禁慾主義是消極的利己的，所以成功不過獨善其身，失敗則無補於世亂；反之，縱慾主義如共產黨之所提倡，則簡直是總理所謂『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而『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以返於『民權革命以前之世界』的了。三民主義者却是總理所謂『重於利人者，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以謀他人的幸福。』三民主義所以提倡利人而反對利己，就是由於觀察過許多歷史的事實，深知人慾是天然的；天然的就原無所謂善惡；由天然而生的人欲，於一個時代適於社會的生存和需要，則人欲也就是善，善就是道德；於一個時代有害於社會的生存和需要，則雖天理也是惡，惡

就是不道德。所以利己的欲望，如支配慾，佔有慾，放縱起來，便會危害社會的生存，違反羣體生活的需要。然而天然的欲可以造成人爲的理，所以三民主義提倡把利己的慾改造成爲利人的理。依中國現狀的需要，支配慾和佔有慾是要改造的；依生理學衛生學和優生學的指證，性欲是要節制或糾正的；更依我們中國的需要和科學知識的貧乏，求知欲是特別要提高的。總理說：『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有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爲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爲宣傳家；不知不覺者實行家。此三種人互相爲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總理這一個發明，是他對於人性的觀察社會的建設和國家的建設之總結的一段話。我們看這段話，就可知三民主義對人性是持着一個多元的認識，於教育上是主張依三種人不同的天賦而發展其才能，以供社會人羣的需要，於政治上是要依三種人的才能，組織一個使『此三種人互相爲用，協方進行』的國家，以求發展人類的文化。所以我於此更要拿總理關於平等精義的話來勸告今日的青年和革命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從此以後，要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爲目的，而

不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生理發育正盛的青年們，用不着煩悶吧。只要認識自己的聰明才力，向三民主義求出路，那就一定不會走上禁慾主義者所給你們的絕路和縱慾主義者所給你們的死路了。依三民主義所指示的路徑，在這個革命時代的需要，青年必須要發展他的創造慾；要給一切慾以正當的出路，也須得以創造慾的發展爲鵠的。分別的說，創造是求知慾的直捷目的。求知須得求於一個時代的需要有關的知識，求足以供一個社會的實用的知識。離開了社會需要和時代的實用，便沒有求知知識的意義和價值。前幾年有句很通行的『爲學問而求學』的話，被大家誤解了，反而變成一句反對『求學以致用』的口號。不知當初說這句話的蔡子民先生，因爲看見了中國人一向都是『爲做官而求學』所以才說出『爲學問而求學』這一句話來糾正大家向來的錯誤觀念。他所以要打破向來『爲做官而求學』的觀念，就是因爲這個科舉時代的舊觀念是不適用

於現在；歸結起來，他的話何嘗是反對『求學以致用』的話，變為『不學以求用』的精神。他們不要青年求知識，但要青年求新奇，而是否適用則完全不管。不求知識，專務新奇，便使一般青年們見着極腐敗極復古極陳舊的事物也驚為新奇。前年鄧演達在俄國見我，拿出了他在德國同幾個不知名的女子合拍的裸體照片，說道：『你看這是多麼文明！』我當時就答道：『你若說是多麼「新奇」，多麼「自然」，多麼「美麗」，或多麼「野蠻」，都還說得上，若說多麼「文明」，則你還比不上牛馬豬狗那樣「文明」。因為你脫掉衣服，還只是一時的事，而這些獸物簡直是長期天然的裸體，豈不是照你說，牠們都比你「文明」多了麼？』人在古代野蠻的時代，就是沒有穿衣服的，這事原是極古極舊的，而鄧演達反以為新，以為文明，這豈不是笑話！這一事，就可以證明共產黨的方法，只是要塞塞青年的理智，使之不辨菽麥，然後才會跟着少數專制階級去指鹿為馬。照這種辦法，一定會弄到青年們連自動的求新奇的能力也會漸漸汨沒了。因為共產黨是新式科舉主義者，目的在使民衆閉聰塞明，不知道自身的真實需要，社會的真實需要，所以才採用離開一切做人的需要的新奇品，去迷惑青年的肉眼。這樣

，肉眼是迷了，但是智眼也同時塞了。共產黨如果成功，青年又如果弄到這樣地步，中國民衆當中先智先覺者固要絕滅，連後知後覺者也要絕滅，剩下來只有大多數無領導無發明無指揮的不知不覺的愚民，到了這種地步，就是連那當初靠愚民政策成功的少數共產黨專政階級，也要如古代專制皇帝的子孫，一代一代就要退化下去，成爲昏庸頑魯，以至於倒塌，而中國民族的生死存亡就更不堪問了。所以，青年們要趕快覺悟：爲求新奇而得的新奇不是學問；離開社會和民族需要的，不是學問；本着民族和社會的需要而創造科學的真理和實用的發明，才是新鮮的學問。青年是可以做先知先覺者，尤其容易做後知後覺者。有了這兩種人，合起聰明才力低下的不知不覺者，共同努力，我們的民族才有繼續生存的大希望。總理把這個道理曾經反覆的說過：『天下事業的進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三種人的身上。……但是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所以世界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

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分；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分；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分。『我勸青年們都來頂受總理這個教訓的洗禮，在三種人當中創造一部分的事業，擇定一個位置呵！』

創造慾發展是求知慾的發展，可以明白了。然而所最忌的是創造慾受支配慾和佔有慾的支配。因為創造慾如果不能勝過支配慾和佔有慾，其結果便是個人聰明才力，不以服務社會為目的，而以奪取為目的。要打破這種個人主義，唯有提高革命的人生觀。劉蘆隱同志在他起草的國民黨的宣傳方略上對於革命者的人生觀有一段話，大意是說：革命者必須這樣認識自己：一切都不是我的所有，我生時不是我要生的，我死時不是我要死的；一切都是社會的，我的智識是因社會而有，我的才力是因社會而用；要看破我的一切所有，才能成就社會的一切所需。這話真是能夠表現三民主義者的革命人生觀，然而同時也是今日青年應有的人生觀。因為要有這樣的人生觀的人，才能破一切造成個人主義的私慾，而發展為社會和人類謀

公共福利的創造慾。在我們革命者今日所負的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責任上，總理已告訴我們，先知先覺的要有一分，後知後覺者要有一分，不知不覺者也要有一分。全民族的人既然都負一分責任，那就在這一個總合的負責救國負責建國的工作當中，還容得個人主義的存在嗎？

然而同時也要知道，三民主義者提倡創造慾之發展，而打破個人主義，並不是對於支配慾佔有慾和性愛慾持禁慾主義，而實是把後面這三種慾通過創造慾的展進之路，而獲得正當的擴大和實現。三民主義，我視為可以稱之為唯民主義。民族主義之目的在民有；民權主義之目的在民治；民生主義之目的在民享。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全民一切慾望的總擴大和總實現。個人主義的禁慾固夠不上說到這一個大目的；就是個人主義的縱慾，也倒會破壞這一個大目的。唯有三民主義，對個人主張把一切慾歸到創造慾的發展上面，或把一切慾調理到不妨礙工作的限度，然後人人都能對實現三民主義總目的各負一部分創造的責任，三民主義實現了，則全民族的生存目的也達到了。這樣，就可以說得是：以個人的創造慾，去滿足全民



的生存慾。全民生存慾滿足，則其所滿足的，就中自然有人人的慾望的滿足。青年們只要過細把三民主義研究貫通，就曉得三民主義的社會，人人是有權的，人人是各因其才能而有用的，人人是衣食住行四項需要都有着落的。這樣一個新社會，還愁有人生的煩悶麼？

要實現這種新社會，青年們就要知道努力的方法。禁慾主義教人只管讀書，不管革命；縱慾主義驅人只管革命，不要讀書。這都是大錯。總理說：『除了革命，沒有學問；』又說：『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凡是有志的青年，都應該在這個教訓之下來努力，才不至走錯路。因為要在這個教訓之下，我們才曉得革命和求學是並不相妨的，而且在中國尤其是要同時並行的。青年當中往往有句錯誤的話，就是做了事就不能讀書，讀着書就不能做事。對於這一個錯誤指摘得最透澈的，有朱執信先生『讀書與做事』一文，希望一般青年去過細讀讀那篇文，一定可以受到很深的感動。總理一生，就是我們大家的模範。他除了革命就是讀書；無論在軍中，舟中，車中，只要一得空，就拿着大本的書，一頁一頁的看。無論任何青年人的生活，難道還有比總理繁忙的嗎？總理一面做事，一面讀書，而許多青年說做了事，

就不能讀書，豈不是自欺欺人？所以青年努力的方法，應該是讀書與做事並重，這是第一點。做事，現在重大的就要做革命的事；求學，就要求革命的學問。革命的學問就是一切能增加我們革命效率的學問。不能增加革命效率的，和那與革命風馬牛不相及的學問，是不要去學的，免得消耗我們一分有益於革命的光陰。所以總理說：『革命以外，沒有學問』。但是他又怕我們誤解革命就是片面破壞的事，所以又告訴我們說：『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這就是說破壞是為建設而始破壞的，學問是為建設而求的。沒有高深學問，三民主義怎樣能夠實行呢？所以，求學是為要增加革命的效能，其意就在此，這是第二點。在三民主義的建設上，最需要的學問是科學。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沒有一項計畫或理論是沒有科學在裏面的。青年要負得起建國的責任，決不能像以前讀死書而可以擔當得起的。世界上唯美國的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的教育最普及，但是它的社會科學教育却沒有進步。所以有人批評美國是跛行的教育。我們中國向來求學的趨勢，却正與美國相反；偏重於社會政治文學哲學一類，而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却只有退步。美國教育是跛行，而中國教育直是斷了一個

足。我們以後補偏救弊，直當以東方民族的革命精神去求美國的科學知識。這是青年努力所應注意的第三點。

總結說來，青年的煩悶，問題並不在慾望不遂，而在不知所以遂慾之道，只爲求遂慾，必至犧牲生以殉慾；所以縱慾主義，不特不是遂慾，並且不能遂生。反之，只爲防身以制慾，少數人或不失爲獨善，而大多數必至益禁慾而慾益橫決；所以禁慾主義終必爲縱慾主義所乘。爲個人之生以遂慾，不如爲全社會之生以遂生；爲全社會之生以遂生，便當發展個人的創造慾，求社會生存能力的增加。增加社會生存能力，是全社會分子人人的責任，而不只是少數人的責任。人人依其聰明才能的高下而服社會之務，就是社會生存能力增加的唯一之路。青年應從增加社會生存能力的路上前進。以個人創造慾，充實社會的生存，便是青年們得着慾望的協調，生命的擴大。但是社會的生存之充實，必待科學的發展。有科學，纔能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在這四種努力當中，才見着青年們條條都是生機蓬勃的出路！

# 國民黨民衆運動的理論

胡漢民

## 一、一般的觀察

民衆運動，在中國已由多年實際的試驗時期進到理論的確立時期。經過多年試驗的行程當中，我們應該把民衆運動一般現象作一個總觀察，從觀察當中，估定它的內容和價值。

先就它的一般現象說，我們知道凡是民衆運動，其起因總是由於社會的大變或國家的危亡。民族間戰爭的失敗，外人的欺凌屠殺，軍閥官僚的賣國殃民，少數特權者的荼毒壓迫，都是直接製造民衆運動的原料。沒有這種種原料，民衆運動的火燄是燃燒不起來的，縱燃燒也不長久，也不普遍。在中國，軍閥的迭起，帝國主義者的相繼掠奪，續續供給我們民衆以運動的燃料，而我們的民衆運動因之也有備具永久性的可能。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民衆運動是最富於狂熱性的，其所感受的刺激大，其所發的刺激亦大。巨風怒雨，固然發了天地間不平之氣，然狂暴的傾向，也隨着而來。所以凡是個人批評的理性，一到羣衆的狂熱裏面

，就最不容易表現，而反常的行動，往往隨狂熱與俱進。這種民衆運動的現象，便引起了世人兩種的批評：一種認定民衆運動是最富危險性的，是不應該有的；一種認定民衆運動是最有力量的，最能促進社會的改造的；前者是法國心理學家呂邦的態度；後者是革命者的態度。但是社會不能避免罪惡，不能保證不遭危險，則民衆運動自不能保其不發生。所以問題並不在民衆運動是否應該有，而在如何使民衆運動成爲有益於社會生存的利器。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點。民衆運動，結果往往歸於失敗，歷史上這種例很不少。而且失敗的結果，往往引起社會民氣若干時的消沉。究其失敗的原因，不外幾種。如果是由於目標太多，或問題太複雜，則民衆到了認清一個總的最大目標，或找出許多問題的一個中心問題的時候，還會運動起來。如果失敗是由於民衆運動當中起了野心家，那末民衆不久必將轉移他們的目標，向着野心家掎擊。如果失敗的原因，在於敵方的壓迫太強大，那末民衆勢力一時屈服，不久必將再起，而且再起的力量必將更大。假使失敗的原因，由於思想錯誤，方向歧謬，則民衆因失敗而受的教訓和覺悟，比什麼教育制度所生的效果還要更大而更敏捷。這是應該注意的第三

點。

依第一點說，民衆運動是挽救國家危亡和保障社會生存的一個力量，是應該鼓勵的。依第二點說，民衆運動便如何始可使之成爲有益於社會的問題。依第三點說，民衆運動，失敗和成功，都於社會有很大的影響，而我們的問題，便是要如何纔能使它成功多於失敗，及如何使它好影響多於惡影響。總括地說，民衆運動一定是以救國救社會爲目的；要保證它的成功和好影響，自然要有必具的條件。這些條件當中，第一須有不拐騙民衆的忠實領導；第二須有強固的組織；第三，須有共同的信仰。這三個重要條件完備了，民衆運動纔有不可搖撼的基礎和不可抵抗的力量。

這幾年來，在民衆運動當中奮鬥的，表面上都是一個國民黨，而暗地裏冒國民黨招牌做非國民黨工作的，却有一個共產黨，或不僅是共產黨。這種現象，便是拐騙民衆的第一義；因爲挂羊頭而賣狗肉，主義上政策上也就隨着換了內容，便是信仰上起了裂痕，這是拐騙民衆的第二義；信仰被搗亂，招牌被假冒，組織上也自然生出許多衝突而矛盾的系統，這就是

拐騙民衆甚至拆散民衆的第三義。共產黨拐騙民衆的罪惡，我不要在這裏細數，我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依這三種事實的綱領，可以更指示出一個原則來，就是：凡是民衆運動，只能以一個黨爲中心，只能以一個信仰爲目的，而且只能以一個黨一個信仰爲力量的總發動機。所謂一個信仰，須得要基於民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所謂一個黨，須得要以民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爲努力的總目標。信仰統一，民衆相互利益就要由黨來企求；黨的組織統一，民衆一切組織就要以黨爲中心，而一切活動就要由黨出發，一切政策由黨透過，一切工作由黨分配。更深切地說：民衆運動，沒有以全體的利益爲歸宿的主義，便沒有精神；沒有全體對於主義的信仰，便沒有組織的可能性；沒有組織的可能性，便沒有力量。必須拿得定主義，固執着信仰，集中在一個黨的組織裏面，然後民衆運動就可以把國家的權力和社會的權力打成一個氣，把國家的政治機關和社會的公衆機關連成一個脈脈相通的血流；必如此，民衆運動纔可以成爲改造國家和社會的偉力，纔可以成爲處在次殖民地苦境的中國的生力軍。

依前述的原則而批評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可得許多極有興味的觀察，而且此種觀察，很

可爲前述各原則的印證。第一，共產黨的主義是不敢告人的，而其不敢告人的證明，就在於假借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名義向民衆接觸；反面的說法，就是共產黨若不冒國民黨的招牌，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得民衆的信任；共產黨沒有東西，就是拿不出真實以全體民衆利益爲歸宿的主義來；沒有真正以全體民衆利益爲歸宿的主義，而冒他人的黨和主義以騙取民衆，其原因乃在共產黨另有其不可示人的鬼胎，而視民衆爲其鬼胎的工具。第二，共產黨是主義的寡情者，然而策略的迷信者；牠也曉得民衆運動是起於國家社會之發生大病症，然而牠却犯着主觀病，其主觀病的沉重，乃至不問國家社會所生的是什麼病症，不求引導民衆把病症救治完好，而只一味的施用策略以造亂：國家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牠却要引帝國主義來壓迫得更甚；社會是已陷落在貧困瓦解的境地，牠却要引社會由貧困瓦解之境而趨於破產流離之境，由破產流離之境而趨於自相殘殺以至於滅亡。第三，共產黨以爲亂子，就能激得動民衆，引民衆趨向搗亂就能革命，這樣就符合於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了，殊不知牠在事實上做起來，牠的兩大對壘的階級鬥爭便要成爲同一階級分裂爲多少職業，同一職業分裂



爲多少派別，同一派別分裂爲多少小組，同一小組分裂爲多少個人，分裂愈多，鬥爭愈多；天下哪有把全個人類全個民族分拆到極點，鬥爭到極點，而可以說這是爲人類爲民族爲個人謀得幸福的革命方法呢？所以共產黨在中國活動起來，牠不但不能做兩人階級團結的鬥爭運動，並且不能做團結中國民族和帝國主義鬥爭的運動；前者是證明其不能作馬克思理想中的階級鬥爭；後者是證明其不能作中國所需要的國民革命運動；二者都不能，牠還作什麼民衆運動呢？第四，證以過去的事實，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在軍閥統治之區，却沒有做着破壞工作，而在軍閥已被顛覆之區，倒盡量襲用俄國共產黨的破壞方式，這足見客觀的環境需要破壞的，牠倒不破壞，而不需要破壞的，牠却破壞到民不聊生；且因此而知共產黨所用的唯物史觀，並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乃是廣東俗話所謂『勢利』觀，——軍閥對牠不留餘地，倒到柔順得很，國民革命軍所到之區給牠活動，牠倒搗亂起來，——結果就是需要解放的民衆却不解放，已經解放的民衆倒又被牠做了試驗品，而受盡不能忍受的苦痛，這只是叫民衆掘自己的墳墓，何嘗是爲民衆開幸福的新路？照第一個批評，共產黨是拐騙民衆的。照第二個批評

，牠是施策略，將民衆做工具，還以之戕賊民衆而滅亡社會的。因爲害民衆，害社會，所以歸到第三個批評，牠不能作階級鬥爭，就連農工運動也不能作；牠不能作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就連國民革命也不能作。何況牠把社會國家弄到破產大亂的時候，適足爲軍閥及帝國主義造機會，所以歸到第四個批評，牠的民衆運動，只可說是民衆掘自己墳墓的運動！

經過共產黨的試驗，中國革命的民衆，應該到了覺悟而轉向共產黨掙扎的時期。這兩年之間，中國民衆經驗了自來未曾有過的經驗，受了自來未曾受過的教訓，如果依照殘忍的唯物史觀的說法，這許是中國民族不可忘記的教訓，然而犧牲也太大了。再檢點民衆運動的成績，可以說完全失敗。經過重大的犧牲，精神上所得的只有痛苦，物質上是毫無成績，中國民氣，目前遂有回復到從前不緊張的那樣傾向。然而共產黨，軍閥，帝國主義，中國民族生存上這三大惡魔，都正在醞釀着新形勢，計畫着壓迫中國和破壞中國的新方式，我們中國民衆是決不容鬆懈下去的。我敢堅決地說，這三大惡勢力不打破，中國民衆便一日不能不集合在三民主義之下作普遍的團結和奮鬥。三民主義本來不只是消極的爲打破這三大惡勢力而設

，只是事實上正遇着這三大惡勢力的存在而猖獗，那就證明三民主義越發是打破這三大惡勢力的唯一利器。這不是誇口的說法，歷史的行程是決不會欺人的，大家且耐着心兒看吧。

## 二 舍三民主義外無民衆運動的理論

何以三民主義必定是中國民衆運動的基礎呢？這問題有兩種答案：一是從中國實際的需要上來的；一是從各國歷史的教訓上來的。爲容易明瞭起見，我們且先看各國歷史的教訓罷。

歷史是有兩面的：有縱面；有橫面。橫的一面，牠有各種民衆運動的事蹟。拿破崙的時代，在中歐各國有民族運動，在非洲有回民的宗教運動，同時在歐洲也發生經濟的鬥爭運動。到了現在，各國間的民族運動，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更是同時並起的普遍現象。這一切運動，實在都是民衆運動，因爲運動之所以起，乃起於和多數民衆有關的問題，而其所有的目的，乃在解決民衆切身的苦痛。不過各國的民衆運動，有的是爲經濟鬥爭，有的是爲民

權鬥爭，有的是爲反抗外力壓迫的運動，而都是各爲各的特殊問題而起，各依各的方式進行，而且各照各的預定主張而謀問題的解決，所以各種運動橫的一面沒有連屬，縱的一面沒有相同的步驟，結果往往沒有多大的成績。

從各國歷史上這種種民衆運動事實看來，無論那一個民族，它的問題，總括不外三類：一是屬於民族的問題，一是屬於民權的問題，一是屬於民生的問題。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所以有世界歷史的根據，所以備具了適用於世界的特長，都是爲此。然而在過去歷史上，各國對於這三類的問題，都是遇着特殊事故發生了之後，隨時來謀解決，沒有像孫先生這樣博大的眼光和精神，能預先爲一個國家定出長治久安的大計畫來。所以各國解決這三類問題，各有各的歷史因緣，而大抵都犯了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毛病，結果連一個大問題都沒有解決。如果再把各國歷史縱的一面看來，我們更可以明白這三類的問題是不能各別的或任從一個來單獨的解決，同時也就可以明瞭我們的民衆運動，爲什麼要以三民主義爲基礎的道理。

英國在歷史因緣上是首先注重民權問題的一個最好的例證。從十四世紀起，英國的民衆

運動，直可以說是由貴族僧侶反抗君權之爭，到中產階級反抗貴族僧侶的特權之爭，由中產階級反抗貴族僧侶的特權之爭，到近代平民選舉權之爭。英國民衆解決民權問題的方法，就是一貫的要求一個代議制度。他們的歷史彷彿告訴我們道：只要代議制度一鞏固，民權就可逐步的解放出來；只要民權問題有了解決，其他都不是根本問題了。固然，自從代議制度成立以來，英國誠然對於什麼問題似乎都能迎刃而解了。然而英國在歷史上曾經遇着一個宗教和政治相衝突的問題，牠的代議民主制就經了百多年而找不出辦法。後來找着一個辦法，叫做『政教分離，』凡是宗教的信仰問題，任個人自由決擇，國家不去干涉，而個人就再也不必把教爭混入政爭。其實所謂『政教分離，』何嘗是什麼辦法？這不過把宗教之爭與政治之爭劈開，而宗教之爭這個問題仍還存在着。這是民權問題解決而其他問題不能解決的一個證明。到了近代，社會經濟組織大變遷，代議民主制就更遇着困難。國會是要有大多數議員贊同一種政策，才能維持政府的，而議員却代表了許多不相同的經濟利益。要維持政府，代表各種不相同的經濟利益的議員，便不能不有種種隨時的新結合。議員一方面是和政黨有密切

的關連，一方和社會經濟團體有密切的關連，他們的隨時結合，當然就是政黨間和社會經濟團體間的隨時結合。但這種種結合，又並非依照階級屬性為標準的。譬如一個主張私有財產權的農民團體，事實上遇有必要，就不能不同一個反對私有財產權的工人團體聯合起來反對一個資本家的團體；這種結合，不適合於階級經濟的理論可知。即在勞工組合當中，雖然彼此都以同樣的社會主義原則為基礎，而彼此間利益的衝突，往往比勞工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劇烈的多。遇着保護政策提出到國會的時候，棉紗業的工人和織布業的工人間，其鬥爭常常比棉紗工人和棉紗資本家之爭還更凶些。在這種經濟團體交相衝突的情況之下，英國的國會不啻分裂為多少經濟利益互相水火的集團，誰也不能長久地聯合誰，誰也不能長久地分裂誰，但總是合不能好好地統治全國，分不能澈底地改革社會。所謂兩黨制，雖沒有完全僵死，可是代議民主制已不復有兩個以利害感情完全相同為基礎的政黨來運用，而有時時被多少利益衝突的經濟集團所拆裂的危機。代議民主制是從前許多人認為可以解決民權問題的，而英國又是代議制的祖國；牠現在被事實證明，是以解決民權問題始，而將以不能解決經濟問題

終。但是經濟問題是近代政治問題的中心，經濟問題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也當然不能解決。英國的民主，到了近百年來所以無進步，而只落得一個虛偽而不澈底的民主之批評，其原因就在此。依英國這個歷史的例，我們就可知凡是一個國家，要想單獨解決民權問題，而同時不想解決民生問題，是決不成功的。英國歷史是從民權問題着手的歷史，現在牠却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問題，而且不能澈底解決民權問題，這豈非民權問題和民生問題有連鎖關係的最大史例麼？

其次，有的國家，其歷史的發展，並非沿着一條解決民權問題的線索而來的，換言之，就是沒有民權發達史的因緣，而一到現在工業發達的時候，各種經濟團體的鬥爭便成了國家的最大問題。奧國就是這種國家的一個最好的例證。奧國各種經濟團體是有組織的，所以牠的民衆運動，顯著地是經濟的鬥爭運動。國中各種經濟團體的力量，是勢均力敵的，而在政爭上也就不相讓。不消說，奧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就是利害不同的經濟團體有組織的長期鬥爭。這種鬥爭，不但資本家與資本家爭，並且勞動者與勞動者爭。因為經濟團體的分野，

事實上並非依階級的差別而分，乃依各項工業相互的利害衝突而分，所以表現在政治上的分野，就更加複雜。一個經濟團體的主張和政策，不能強其他團體的贊同，國家就因之長在各團體相持不下之中，而陷於僵化的政局裏面。這種國家，當然是沒有敏活的進步，所以在實際上尤其要受英法意和國際聯盟的支配了。這一個例，就可以證明凡是一個國家，若任經濟的行程自然發展，到了階級之間不但有衝突，而且同一階級同一職業之間也有衝突的時候，不獨民生問題是不能解決，就是民族問題也無法解決；可知民生問題和民族問題也是互相連帶的，要解決這個，就決不能拋棄那個。

站在歷史的總樞紐上觀察現在的世界，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如果單獨把權給與人民，把富給與幾個資本家，這種國家是不能稱為民主的；一個國家，把富和權都只給與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却一無所有，這種國家是決不能存在的；如果少數國家，對內把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的爭端解決，對外却強人忍受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的壓迫，這種國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罪人。現在的世界現象，正是如此，可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是今日世界的三個



連環問題。將這三個連環的問題縮小到一個人的生存上說，就是人不能有財產而無自治權，也不能有自治權而無財產權，更不能有自治權和財產權就自視若天之驕子，而施壓迫於他人。倡無治主義者，理想在於破個人之被治，而心裏何嘗否認個人之自治；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者，理想在於破除支配他人之財產，而心裏何嘗否認財產之享用；主張國際主義者，理想在於破除統治他民族的強權，而心裏亦何嘗否認各民族之自治？苟明此義，則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實人類全體的問題，也就是個個人的切身問題。在這三大問題不能同時解決的社會當中，個個人便都有發起或參加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的必要！

這是根據世界歷史的教訓所下的斷案，然而再看我們中國自己的實禍，這三個切身問題，尤其是急迫多了。孫中山先生早已和我們說過：中國民族所有的禍害，一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一是受外國政治的壓迫，一是受外國經濟的壓迫。這三種壓迫，不是僅僅一小部分中國人受的，也不是一大部分中國人受的，而是全中國人受的。全中國人切身的三個大問題，就在此。我們受外國帝國主義這三種壓迫之外，再加上民心渙散，沒有抵抗強暴的團結

和能力，是自己第一種積弱；帝政遺毒，流爲軍閥，竊奪國家政權來塗炭生靈，而人民却沒有管理國家事業的權力，并且沒有抵抗軍閥的能力，是自己第二種積弱；機器發明了幾百年，而我們還是生產落後，天然的富藏，自己不知享用，而任人佔取得去做吸收中國人血汗的資料，弄到一種全國皆窮的景況，是自己第三種積弱。這三種積弱是內部的，那三種壓迫是外來的。內外的禍害兩兩比合攏來，便成爲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個總問題。所以我們中國的需要是馬上就須得解決這三個總問題，否則，國要亡，種要滅，到了那時，四萬萬人是要同歸於盡，決不能倖免的。

但是我們要解決全國民衆人人有切身關係的三大問題，我們就決不能走各國歷史所走的路。照以前世界歷史所給與的教訓，我們不能像英國那樣只從解決民權問題入手，而不同時解決民族和民生問題；我們更不能像奧國那樣任個人資本生產制度自然的發展，結果就連社會國家都分裂成多少經濟的團體而長相衝突。我們的問題，須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在同一計畫中謀整個的解決；這就是說，我們中國民族的自救運動要有整個的解決三個問題的計畫

做中心。整個的計畫是什麼，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作用，在於消滅中國外來的三種壓迫和內部的三種積弱。詳言之，民族主義，在打破外來的人口壓迫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而恢復中國民族獨立自由的地位和權能；民權主義，在打破帝國主義和軍閥兩種政治的掠奪，而建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政事的一個國家，使人人都有自保自養的能力和機會；民生主義，在打破帝國主義軍閥及其他特權者的剝削，而以國家的力量來扶植生產交通事業的發達，以滿足人民衣食住行的四大需要。孫先生的建國大綱，更把三民主義具體的表現出來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治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國際平等，國家獨立。』在這三民主義的具體方案之中，孫先生完全沒有為什麼

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一類的特權階級預留餘地，而只有純粹的爲民衆的福利打算。所以三民主義，就其作用說，實在是唯民主義：衣食住行的需要爲民而謀，政治知識和權能的需要爲民而謀，國際平等獨立地位的需要亦無不爲民而謀。我們民衆除了這三大需要而外，還有什麼更切身而更急迫的需要呢？我們四萬萬人所受的壓迫，可以總括在一句話裏面，就是受着這三種需要的窮乏的壓迫。在這一種總壓迫之下，我們的民衆運動，當然是爲反抗這個總壓迫而奮起，而進行，而非達到目的不止。以世界各國的民衆運動的歷史比較起來說，我們的民衆不是要像英國只一貫的做了民權運動，也不是要像奧國只等到資本生產出了毛病纔來做紛亂的經濟鬥爭運動；換言之，我們做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是民族運動政治運動經濟運動三種合而爲一的運動，而其所以必須合而爲一的原因，是事實上中國的地位民衆的苦痛所決定的，而非任何人空想所決定的。再比照一切民衆的原則來說，唯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是備具了永久的可能性，是社會生存的唯一利器，而且是備具了成功的條件。如果真實依照三民主義目的來作民衆運動，除却一切個人的錯誤和缺點外，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決不會使民衆

受欺騙而失望，決不會使信仰不一致而組織上起分裂。過去民衆運動失敗的反證，世界歷史的教訓，和國家實際的需要，在在都肯定了，唯三民主義纔是民衆運動的基礎，亦唯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纔是真切的民衆運動，無論何種阻力，都不能防止其成功。

### 三、民衆運動的三大程序

根據中國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有整個解決的必要，和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的原則，我們既然明瞭民衆運動必須以三民主義爲基礎，那末民衆運動就非依據三民主義而定出整個的進行計畫不可。由此要點，遂產生一個根本原則，就是：

三民主義之實現，必須依總理手定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革命程序，在此三程序中，革命的和政府和民衆運動必須相互的密切的聯合一致以並進；此其要義，蓋在舉國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團結爲一種大力量，而急速的完成破壞和建設雙方的工作；但在國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之間，其所賴以溝通雙方團結爲一個整個大力量者，必須忠實健全的中國國

民黨，故黨必須一方爲民衆團體的訓練指導，使其能自由對於國家社會問題表現其意思，貢獻其能力，一方爲政府的監督指揮，使其扶助民衆相互的利益，其權力得爲民衆的權力，其政策得爲民衆謀福利的政策。基此根本原則，我們且將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革命期內民衆運動的方針，定明其概要如左：

一、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方面用革命的武力掃除國內的障礙，黨的民衆運動一方面必須派訓練成熟的人員到各縣指導民衆，做三種主要工作：（一）協助革命的武力；（二）訓導民衆團體之組織及其發展；（三）宣傳革命的主義，和軍政時期的革命政策；

二、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爲訓政開始之時，在此時期，黨的民衆運動，必須備具大規模的計畫，爲建設的訓練，率導人民依照建國大綱的訓政實業計畫，而扶助其使用直接民權及解決民生問題的知識和能力之發達，以協助各縣自治基礎的創立；尤當注意的，就是在此期內的民衆運動，對於本省訓政基礎之確立與全國軍政統一之促進，兩種工作必

須兼顧，而尤其對於民衆的訓政工作與政府的訓政方法保持密切的調協；

三、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一省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則爲制定全國憲法時期，在此期內，民衆運動之目的，在於完全養成民衆運動直接民權和參預國家政權的自動能力，宣傳訓政憲政兩期內的成績，以求五權憲法和直接民權在實際運用上收完滿的效果，同時對於民生主義的具體建設，必須使人民與政府協力共謀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之大規模的進行。

這三時期民衆運動的方針，我們更可詳細說明其內容。第一、軍政時期，民衆運動必須確立於集合全國人民的力量以掃除障礙之基礎上，故除以革命的武力奠定新國家以外交方式廢除不平等條約外，必須以政治法律的力量規定公共的度量權衡及一切法令，禁止阻礙改革的惡制度和惡風俗如釐卡陋規苛捐雜稅販賣人口等；保護民衆團體組織的自由；製定訓練民衆團體的方法；防止高利盤剝的壓迫民衆及階級鬥爭的行動；禁止引誘或脅迫民衆團體離開黨與政府的指導訓練而破壞革命之進行；確定民衆團體在地方的基本組織之完成，以植訓政

時期縣自治的基礎，其在基本組織未臻完善以前，非得黨與政府之認可，民衆團體卽不得任意組織上級機關以免奸人截斷民衆樹立民主的自治之根基而利用之以爲破壞革命的工具；而尤須解除非屬於革命武力系統之一切武裝，使民衆完全受革命的武力之保護，庶不復有共產黨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挾武裝以魚肉地方人民的危險。總括的說，軍政時期的民衆運動，在於確立民衆團體的組織，以爲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之基礎，協助革命武力的破壞工作，而防制任何惡勢力破壞革命之展進。第二、破壞工作完成，須接着開始做建設工作，所以訓政時期的民衆運動，須養成民衆使用直接民權的知識和能力，扶植其使用科學方法以改進各階級民衆的生產，而增加其購買力，調查地方人口及農工業的實況，贊助生產和消費合作事業，測量縣市的土地，整理農田經界，以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準備，改革地方的警察衛生及農村工廠衛生等，使民衆直接享受社會生活的實際利益。故此時期民衆運動的主要目的，在培植社會的基礎，使民衆的保和養兩件大事得以由鞏固而趨於發達，纔能直接進於國家大建設的憲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民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實力已有基礎，國家就可進而實施三民



主義的大計畫，如五權憲法的頒布，和實業計畫的施行等。這時候民衆運動完全要以民衆已經行使熟練的民權和已經樹立基礎的經濟能力，促進國家建設各大計畫之實施。凡土地生產力的增加，鑛產的開發，交通的建設，水力的利用，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等項大規模的公共事業，都須民衆督促政府，合國家與人民之力共同進行。總合言之，此三時期民衆運動，在第一期爲破壞惡勢力，在第二期爲確立新社會的根基，在第三期爲完成國家的建設：三者分言之必須步驟不亂，合言之必須精神一貫，而每一時期的進行，必須民衆與政府一致，政府與民衆一致，然後民衆運動纔不失爲三民主義的運動，纔能步步取得不可磨滅的成功。

我們從這三個時期的方針和內容裏面，可以看得出中國民衆運動，決沒有適用階級鬥爭理論之餘地。我們首先看軍政時期，其革命目的，在掃除國內障礙，換言之，即掃除帝國主義軍閥和社會固有的惡制度惡習慣。這種種惡勢力是全體人民不分階級的公敵。在掃除一切惡勢力時，決不容人民分裂爲兩個對壘的階級以自相殘害，而轉爲帝國主義軍閥所乘。要曉得階級鬥爭的作用，在於把已成的資本制度的社會拆成碎片，造成大紛亂，而非集中社會的

力量來革命的。我們中國的惡勢力，非資本制度從社會內部長成起來的，是一方面帝國主義由外壓迫過來和國內舊日封建社會沒落後騷亂起來的，所以中國革命所取的方式，不是把已成的社會根本搗碎，是把已碎的社會根本改造，不是把社會的力量拆散，是把社會的力量集中。階級鬥爭的社會，它的社會是反革命的，只有少數人是革命的，所以拆散社會就是革命；我們中國現在既貧且弱，生存之機日微，所以社會是革命的，只有最少數人是反革命的，所以集中社會力量，就是集中革命力量，而拆散社會力量便是反革命。因此之故，階級革命的口號只是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實際上無產階級聯合又只是工人的聯合，而我們中國的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階級革命分子聯合起來，』而各階級聯合且具有整個社會結合在革命線上的趨向。我們不能一方面喊着『各階級革命分子聯合起來，』一方面又把社會力量搗散，更不能一方面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一方面又叫農工陷入階級鬥爭的空途而破壞正在建設的國家。明白了這個要義，我們可以站在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的立場，把階級鬥爭的民衆運動作一個較深切的批評。

#### 四、階級鬥爭的民衆運動之批評

依階級革命的理論，只有工人可以革命，因為它們受着資本階級的壓迫。既然只有工人可以革命，所以唯有工人纔是革命的主力軍，而農民不過只能做同盟者。從這一個原則裏面，我們可以首先注意階級革命的理論，一開始已陷在一個很狹小的立場，而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事實上已受了制限，——限於工人階級。既然以工人爲主力軍，以農民爲同盟者，於是民衆運動就全然依此目的進行，換言之，舍工農運動外，便無運動了。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和列寧可謂大體是一致的，都認定農民是爲別一個階級的同盟者。然而精密地研究起來，馬克思和列寧兩人乃大不相同。馬克思的理論是：大農經營是優越的，資本一到農村，其結果與城市資本一樣，釀成兩個對壘的階級，一方是大地主之成形，一方是中農小農之瓦解或沒落。他推測客觀的事實如此，所以他對於大農主張防制，對於中農却無主張，對於小農只說是『自然會沒落。』法國馬克思派社會黨曾有保護小農的主張，而恩格斯就說：『我們對

小農既不應該說促其消滅，也不要說保護他。」可知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根本上認定了中農小農是自然會沒落的，而其沒落就必定是農業自然集中在大地主手裏的結果。要防止大地主，馬克思在共產宣言裏面就提出了四個政策：（一）廢止土地私有，以地租充國費；（二）以共同計畫，改良開墾土地；（三）編成產業軍，尤其對於農業；（四）將農業工業的經營結合起來，漸次消除都市和農村的區別。從這四個政策上，我們知道馬克思的目的，乃在將農產業和工業做到同一基礎上面，——工業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面，——而農民都變成工人，至是都會和農村的區別也消滅了。至於列寧，他所有的對象，是俄國的特殊實情。俄國貴族就是大地主，而同時工業尚未發達，沒有西歐那種大資本侵入農村的現象；所以他的農業政策，乃分為三個時期：（一）在開始革命時期，主張土地農有，目的在引動農民贊助革命；（二）農民得了土地，便發生小資產階級意識，這時候就須使農民中立，換言之，就是使農民失却與工人同盟之地位；（三）到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對中農仍使之復為工人的同盟者。這時候，蘇俄就由國家給以幫助，使合作社發達於農村，引農民向社會主義的建設之路。

馬克思和列寧不同之點在哪裏呢？就上述兩人的思想和政策說，彼此不同之點有三。第一、馬克思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和列寧所謂農民階級同盟有別。蘇俄的農民階級與無產階級聯合在一起，對帝制和資本階級作戰，因無產階級革命而得土地和自由，所以牠是做無產階級預備軍的農民階級。列寧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就是做無產階級的預備軍。這一種農民階級，和馬克思所指的在西歐資產階級革命之間，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聯合在一起作戰，從資產階級而得土地，做資產階級預備軍的農民階級，當然是大不相同。馬克思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就是客觀事實上認定農民階級做了資產階級的預備軍，而農業之發達，一定是大資本侵入農村，大地主之成形，和中小農階級之沒落。第二，蘇俄的農業和西歐的農業，也有區別。在西歐，農業發達，是依資本主義通常的軌道，一方面是巨大的地主和資本主義的巨大地主，一方面是在貧困窮乏及所謂賃銀奴隸極顯著的分化種種關係之下，完成所有的農業。馬克思以這種事實做背景，所以他推斷農民階級衰頹沒落，全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蘇俄的事情却不同，農業因蘇維埃政權成立，和重要生產方法之國有化，阻止了西歐這樣的發達，所以

就不能不另闢途徑。所謂另闢途徑的方法，就是列寧的合作計畫。史丹林在他去年出版的『列寧主義是什麼』一書裏面，曾扼要的說明他的合作計畫之目的：『幾百萬中小農民的合作組織，由國家給之以有利的信用而得以支持的合作社，便發達於農村。我們的農業新途徑，乃由合作社引多數農民而趨於社會主義之建設。以集合主義的原則徐徐施諸農業，即先侵到農業的販路方面，次侵到農產的生產方面。……販路的合作組織化，經濟配給的合作組織化，以及農業的信用和生產的合作組織化，是農村幸福向上的唯一途徑，從貧困零落中救出農民羣衆的惟一手段。』史丹林解釋列寧這種合作計畫，先以蘇俄國營工業的社會主義的性質爲前提，以表示蘇俄合作社之性質不同於他國，遂謂列寧的合作制爲合理，然而合作制不能到共產主義，列寧派自己也曾承認過的。這且不說，我們所應該注意的，還要看馬克思和列寧的農業政策的異點。第三、將列寧的政策與馬克思的比較，就曉得馬克思以爲西歐農民階級自然會沒落，所以他的政策，意在幫助這種沒落的傾向，而消滅農村和都市的差別，而列寧則並不作如此想，所以他還極力用國家的力量，施行農業方面的合作社組織化。將這三個

異點下批評，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城市資本集中和中產階級沒落的原則，事實上已經不是如此，但還說得像；至於以這一個原則推斷農村階級對壘和中小農階級沒落，現在事實上簡直說不上了，而列寧採用大規模合作組織於農業，也就是並不認定農民階級有沒落趨向的反證。然而列寧的土地農有和合作組織化的政策，一個是意在引動農民來革命，一個是意在引農民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預備軍，總言之，就是以農民爲工具罷了。

因爲馬克思和列寧的政策不同，理論上就包藏了爭點。列寧死後，托羅茨基，辛諾維耶夫，加米尼夫三人因此就和史丹林起了大爭論。托氏一派，主張估量大農的力量，課以重稅，以打消他的過剩的力量，對中農使他中立，對小農就予以幫助。史氏一派就反駁說：你們估量大農力量過大；我們對中農不只是要他中立，兼要和他同盟，對於小農，在國家力量不穀的時候，不應該去挑撥他，托氏一派，當然是懂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然而史氏一派却完全守着列寧的革命策略，並且引證列寧的三個時期的農民政策，只是引中農爲同盟，對小農就無幫助。我們對於馬克思派和列寧的農民政策，可以簡括的更下兩個批評：第一、農民爲

工人同盟者的策略，在打破封建土地制的俄國還比較行得通，在封建土地制沒落了許久的國家，尤其在以農業生產爲主的國家，就還不設，其所以不設的緣故，就是因爲他只是政治上的策略，而並非純粹爲農民幸福打算的社會政策；第二、農工同盟，如果不能朝消除都市和農村區別的方向走，或事實上不能到那種步地，則所謂『中立』『同盟』，簡直是爲握政權者利用操縱的代名，於農民實際毫無半點利益和進步，這是俄國現在農民的實況，在在可以證明的。

中國共產黨在兩湖所用的農民運動的政策，就更不成話，總括的說，他們是運動地痞流氓，而不運動農民，更不是農民運動。他們說是叫貧農與佃農爭鬥，佃農與自耕農爭鬥，自耕農與小地主爭鬥，小地主與中地主爭鬥，中地主與大地主爭鬥，實際就是地痞流氓把農業社會完全搗成粉碎，在這種情形之下，哪裏還有什麼界限分明的某種農民與某種農民的種種鬥爭呢？他們說是給農民以實際利益，而着手於米價的規定，初則規定『不得過二元半，』後來又規定『不得過二元，』實際則社會被搗亂，米價只會一天一天的增高，而空文的規定



，是決無補於事實的，何況米價定低，其他商品市價增高，農民更是吃虧不小呢？本來農產品消售問題，在俄國共產黨是很注意的。在十月革命前，大農受政府的徵發，而結果便是農民不願多生產。在施行新經濟政策後，蘇俄便設政府式的合作社，代農民買賣農產品，結果雖然可以稍稍增加全國農產的總量，然而事實上仍是中農小農吃虧。這些都不必說了，我們所應該注意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農民運動，簡直是俄國共產黨施諸中國的策略。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就老早說過，他們向歐洲進攻的五條戰線，都已失敗，唯有向中國進攻的一條戰線是有多少把握的；所謂有把握者，即看中了中國農民，可以挑動起來大搗亂。鮑羅庭一到中國，就不願有各種勞動法，不贊成合作社，而只要提出土地農有的口號，其理由都因勞動法和合作社於C P 搗亂不方便，而土地農有，挑動農民棄耕作而起騷動，是於C P 搗亂最便利的。布哈林現在却更明瞭中國的情形，所以就主張在中國只要提出『減租』一個口號來，就有辦法。有人反駁他說：『減租豈不是要大大的減少國家的收入嗎？』布哈林說：『對呀，國家不能減收入，農民纔好反抗國家呀！』又有人駁他說：『減了田租，工價便越增高，豈

不是農民更苦麼？」布哈林說：「這都不錯，但唯其如此，就好叫農民反對資本家呀！」這就可見他們的策略，是要提出極不合經濟原理的簡單口號，同是又是羣衆不能理解但覺極合感情的，叫民衆向走不通的方向去硬撞，撞不通了便歸罪於共產黨所要打倒的國家和階級身上，好激起更擴大的騷亂來。中國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在工人當中和在農民當中，所用的方法，完全是如此。

孫總理的農業政策又是怎樣呢？概括地說，他的政策，理論是純然以農業社會主義爲原則，而其體方案是完全適合於中國的實際情形；所以他主張『平均地權，』是對於城市土地預料其地價必日見增高，而以高率的稅額及國家收買兩個方法以截斷大地主的發生，同時主張『耕者有其田，』就是對於田價必欲使其平，庶幾農民易獲安定的生活，而城市工人，自願改業者，亦可退而業農；這也就可知孫總理注重農民問題的精神了。但是總理的政策，是要以國家的力量去幫助農民，而不是以國家的力量去搗亂農民。以國家力量幫助農民，則就中國實情而論，只要國民革命經過軍政程序，政府保障耕者有其田，并設農民銀行以使其低

利率之借助，而免土豪劣紳之高利貸，設合作社以便其農產品之銷售，而免奸商之操縱盤剝，開發水利以便其灌溉，而免天然之災害，資以科學知識以利其農具之改良和肥料之利用，而促進其產額之增加，如此，農民的福利也就可以增進，哪裏用得着共產黨搗亂的方法呢？列寧實行土地農有的政策，在原則上原亦與耕者有其田同一理想，但在策略上却全不如此，因為他目的在引動農民來革命，一方固然要打破俄國貴族的大地主，一方也要使農民來把波希維克推上政臺。等到他握了政權，他就說農民得了土地，有小資產階級意識，又把農民來挑撥拆散，使之永無反抗波希維克的力量。有人曾經批評列寧，說他『土地農有』政策，實在是違反廢除私有財產的原則，因為把田分給農民，就是使人各有產。列寧就說：『你却不知道取得農民在政治上是若何的重要；我們失了共產主義的原理，却得了大多數的農民呀！』可知列寧式的農民運動，全然是重在政治作用，並非重在經濟理論；此與布哈林的減租革命論，同是不講經濟原則的證明。這種農民政策，目的不過為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手段，全然是利己主義，也就是害農主義，與我們總理唯民主主義的農民政策，相差真不知有幾萬里程途。

依以上的批評，我們就明瞭共產黨和國民黨民衆運動的區別了。共產黨的農工羣衆運動，顯然只是爲C P爭奪政權的工具，而國民黨的民衆運動，在農工兩方面，都是要造成全國的經濟組織之發展。我們總要從毫無健全社會組織的紛亂國家裏，把民衆引上三民主義之路，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程序，使民衆由社會組織化，進而爲政治的自治組織化，由政治的自治組織化，進而爲經濟的組織化，乃至使民衆組織同時備具社會政治經濟三種性質的基礎，中國纔有鞏固發達的希望。總結的說來，三民主義是唯民主義，民衆運動是要三民主義自實現的；共產黨沒有真實爲民衆而謀的主義，只有奪取政權的策略，它的民衆運動是要拿民衆做工具，而爲它奪取政權的犧牲品的。唯民主義的革命，是革命黨自己犧牲去換取革命的成功，而以利益付之民衆；共產黨的革命，是要引動民衆去犧牲，換取革命成功的利益，是要歸之共產黨的。共產黨的革命成功，只有黨是成功，而民衆是犧牲了一部分，所剩的一部分，縱使大亂之餘能夠共一點現成的產，也是有限。國民黨的革命成了功，黨的損失必大，然而民衆却能站起來行使自己的權能，同在三民主義下獲得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

利益，而其所獲的利益，是創造新的，不是瓜分現有的。有人曾經批評過俄國共產主義說：『現有的經濟的生產，就是收到國家手裏來重新分配，縱使分得平均，人民也所得無幾，必須從新造產來分配，人民纔所得無窮。』所以孫總理說他的民生主義是造產的，『是要共將來，不是要共現在，』其所含的真理，實不僅僅施之於中國實際情況而適合，乃放之世界而皆準的。由此一義，也就可以區別共產黨的民衆運動，是困在現狀裏面混戰的，而國民黨的民衆運動，是引向未來新社會創造的。中國革命的民衆，努力向三民主義的創造之路來啊！

## 三民主義的連環性

胡漢民

### 一、世界反革命的勢力

現在的革命，無論世界的，抑或部分的，很顯著地要掙擊的目標是相同的。這目標，分別說，一曰軍國主義，二曰寡頭政治，或虛偽的和階級的民主政治，三曰資本主義；總括說，就是帝國主義，分的爲各民族平等的生存，總的爲求世界大同，都要打破這三個反革命勢力或其總結晶的帝國主義，纔能造起新的基礎。

軍國主義，寡頭政治，資本主義，所以成爲現今革命的三個障礙，就是因爲它們互相關連的成了三位一體的罪惡。人類供這三位一體的罪惡展轉相循之犧牲，已經有五百多年，而全世界三分二的土地和人口，到現在都受着了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之支配。以人口和面積論，英帝國主義的成就，實居俄法葡荷比意日美諸帝國主義之冠。若單以人口爲比例，英帝國主義所統制的各種屬地的人口有四萬萬一千七百萬，平均英國的男女老少，每人有黃

纓黑各種的屬地子民十人。若單以面積爲比例，法帝國主義的各種屬地共有四百一十三萬六千方英里，比法國的面積多了二十倍。葡萄牙雖然在各帝國主義當中爲最弱，却也有九十三萬六千方英里的殖民地，較它本國的面積，多了二十二倍。比利時，在各帝國主義當中爲最小，却也有屬地九十三萬一千方英里，而它的本國面積不過是相當於八十分之一。這些例，就可證帝國主義的勢力，靠着軍國主義寡頭政治資本主義三種桎梏，把人類大多數細縛起來了。

要是追尋一個解釋的根源，我們可以採用個人主義爲說明這三種反革命勢力的基點。因爲，如果我們暫且把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的一面保留在後面來說明，則我們這裏可以說，帝國主義的內心，完全是個人主義中支配慾之擴大。所謂支配，就是把自己的慾望壓倒他人的慾望，自己的權力壓倒他人的權力，自己的生存壓倒他人的生存。這種支配慾最易活動的處所，無過於政治社會和經濟社會。在社會的公共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裏面，纔有支配人們的最大機會。我不是說政治和經濟的生活當中，只容許人們的支配慾發展而不容許其他人性的

發展。科學家政治家的創造慾，離了公衆的具體生活問題，就再沒有造福人類的處所，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但是最足誘惑支配慾發展的，也是政治和經濟，在封建時代，支配慾的表現是貴族爭雄，諸侯爭霸，土地兼併，豪強侵奪。到了近代，支配慾的表現，便更充實的組織化，其裹挾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力量結晶起來，便是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主義這三個東西。

第一，軍國主義。它是強大的國家武力組織，其作用在於屈服本國人和外國民族，迫到它們違背自己意願而供它的犧牲。以前十七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以爲到了資本制度全興的時候，戰爭和黷武主義都自然而會消滅。這種迷信樂觀主義者的預言，却沒有顧慮到機器一經應用在工業上面來了以後，一般野心的個人和國家都拿經濟的力量和工具做擴大陸海空軍權的主要根據。這種武力擴大的趨勢，不久就成了一種支配人們的桎梏，而軍國主義就成了一種變相的野蠻主義。人類本來是用武力以自保的，但是軍國主義的武力是用以侵害人的；武力用得其當，就可以禦暴而衛弱，可以保障權利，可以擁護公理，但是武力一到了軍國主



義的形式，它就不問正當不正當，都是要濫用，而一國的執政者，甚至國家本身，都變成暴力的犧牲者。這種事實，在國際文書上，也就居然公開的承認，所以民族和民族間，國家和國家間，自己要分別的說你是幾等幾等的『強權；』如果它們結條約，它們就要自稱『締約的強國；』遇着它們聯合的來壓迫什麼弱小民族，它們就成了『同盟的列強，』而它們彼此相對的關係，就叫做什麼『列強的均勢』或『國際聯盟！』一個國家到了能用強大的海陸飛行軍表示威武之際，它縱是從前非常微弱，現在也要尊稱『大強國！』人羣間的接觸往來，到了不以人之所以爲人的共同性做標準，乃以武力的強弱做標準，而少數國家獨自稱曰『大強國，』這實不啻顯示國際關係間一切新舊道德之絕滅。孟德斯鳩在十八世紀中葉，也就曉得說：『現在一種新病症已經傳播於歐洲；它纏擾到我們的君主，使他們成立了無限制數量的軍隊。這種病症自有其危險性，而且一定會變成流行病。因爲只要一國增加了它的所謂武力，他國也馬上就要增加它們的。所以，沒有一國得到好處，只是大家陷落在共同的絕境。個個君主都怕他的子民有滅種的危險，所以都把所有的武力設備起來，於是這種大家互相對抗的軍備競爭

，就叫做和平。」孟德斯鳩的話，到現在還是適用的。只看現在世界所謂幾大強國，哪一個不是沉迷在軍國主義之中，它們哪裏不是兢兢於維持其互相擴充兵備的和平？它們爲什麼如此呢？自然，掠奪他民族的土地和財源，是它們軍國主義的顯著目的。但是同時，民族間之互相猜忌，執政者尋求名譽和虛榮之野心，不同血統的種族間之互相仇恨，乃至一般宣傳文化者之欲強迫未開化民族接受其自視較高的文化，都是和軍國主義有不解的因緣。總而言之，自他人有了支配慾作祟，什麼宗教問題，種族問題，經濟問題，都可以利用得來做發揚軍國主義的導線。所以軍國主義，本身就是一個支配人的強有力的武力組織。

第二，資本主義。簡單一點，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個人利用財產做支配工業商業財政和政治的工具，而這種支配的範圍，不獨施之於國內，抑且施之於國際。在農產社會時代，財產支配力還不十分橫暴。可是經過十五十六兩世紀的海航進步，東印度和美洲的海洋交通既開，和機器生產制開始立下根基而後，財產遂變爲權力支配的中心。什麼商業，製造業，航業，財政，鐵道，和大規模的組合事業，到處都以資本主義爲原則。在這種種事業中，個人主

義的支配慾乃大大的獲得滿足發展的滋養料。於這種社會當中，多少人拿着資本制度做工具，便可以支配其他多少人或階級的生產力，而所得的結果，就成了他們自己不必下相等勞力而歸他們私人享用的財產。本來，財產也是和武力一樣，本身並沒有什麼惡處。人如果不求生存則已，要生存就須得有一部分適用的物質來養活。而且人在文明的社會裏面，不但是養生的物質，就是足以供節省勞力的工具，也是不可少的。無論是誰，要做一個自由的人，應該對於天然界的財源，對於人爲的需要品，對於人類智識的總體，都要有一分，纔能實現他自己的創造力。總言之，要在機會平等的世界裏求自由人格的生存，一分財產的使用權是非有不可的。但是像資本制度底下的財產，就不只是培養個人創造力的工具，乃是支配人們的工具，或僅僅是滿足個人佔領慾的工具。只要你參加到資本制度裏面去，不管你是生產者也好，資本家也好，你一心一意所企求的是要爲你個人一方面獲利益，你的勞力既非爲創造而勞力，你的生產品也就並非爲人們服務而生產。若論各人共同對於生產上貢獻了相當能力就取得相當的報酬，不管報酬的形式是工銀也好，租金也好，利息也好，贏利也好，只要這種

報酬用意在於保養全部生產事業當中勞心勞力的分子的生產力，這未始不是一種很經濟的方法。然而資本制度底下的浪費和種種不勞而獲掠奪，則完全是個人主義支配生產的惡果。要是生產事業實際上一天受着個人主義的支配，則支配者必一天只是爲自己獲利打算，決不會爲人類幸福上謀最經濟的生產和分配打算。只要支配者一天爲自己獲利打算，而不爲人類最經濟的生產和分配的福利打算，則爲社會而生產的原則，和爲獲利而生產的原則，便一天不能調和，而少數人假經濟的力量以支配大多人的現象，便一天不會中止。

第三，官僚主義。無論何國，官僚變成一種通常而永久的特權階級。官僚主義，論其只講究政權的因襲而且只求維持其特殊勢力於不替的特點，它是一種傳統的職業；論其本身不事直接的生產，唯謀操縱政柄而爲各種特殊利益的工具，它是一種寄生的勢力；論其裏挾立法司法行政各種事權，佔取一國吏治上下交連的系統，而一切濫權罔法徇私包苴舞弊的勾當皆所優爲，它是一種掠奪的制度。這種以官爲業的制度當中的人，自有其特異的心理。他們自己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或社會利益，但是代表其他特權階級的利益，便是他們的利益；他

們自己沒有治國經世的主張或理論，但是阿附人家已成的理論，尤其標竊民心所歸的現成主張，便是他們的主張；他們爭選舉爭政權時也有政綱政策，但是他們口裏所講的和手裏所做的是不一樣，而心裏所想的和口裏所講的更不一樣；他們所着重的只有戰略。也許有人說這是說到共產黨了，但是講戰略的官僚政客，古今中外都老早很普遍，而共產黨還不過是拾其餘唾。他們的戰略專以維持個人權位的升降做出發點，換言之，就是以做官爲出發點。他們崇拜權威，崇拜金錢，崇拜武力，崇拜對外侵略。因此，絕對的國家主義，黷武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都是他們的宗教。他們崇拜這些，不只是迷信，而且是利用。在羅馬帝國全盛的時代，羅馬的官僚階級強逼人民要崇拜羅馬帝國如上帝。羅馬帝國是不可分的，是永遠不可磨滅的。近代普魯士主義之下德國官僚，尊崇德意志的帝國主義，也有同樣的神氣。就是現在英日各國的帝國主義崇拜者，又何嘗不是一樣。他們都對一般人民這樣的想着：我們就是帝國主義的柱石；我們扼守自己的海關，洞開他人的門戶，擴充強大的海陸空軍，佔住各洲的殖民地，鎮壓一切弱小民族的喧鬧；這纔是我們的偉蹟和威權，你們還敢不躡伏麼

？如果你們要反對我們，便是反對國家的權力；你們須得向我們致敬，須得肅靜須得懂！這就是古今中外官僚階級的最高思想。在這種最高思想基點上，軍國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都是同官僚階級沆瀣一氣的。他們簡直是心心相照的連合在一起。除了這三種惡勢力外，還有什麼國家主義保守主義干涉主義保護主義等，都和它們息息相通的。自然而然地，什麼法律家宗教家教育家慈善家新聞記者各種守舊的勢力，都和它們做了同盟。這些守舊的勢力，我們不暇再來分析但就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主義三者而論，我們已分析夠了。這三種主要的和其附屬的各種反革命勢力，其間不知有多少複雜的連環關係。現在還須明瞭它們的連環關係，然後可以洞澈今日國際帝國主義就是它們相互促成的集合體。

## 二、世界反革命勢力之連環

我們已經明瞭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幾種主要反革命勢力的共同點，是出發於個人主義的支配慾。但是且讓我們再來看這些反革命勢力的連環性。

官僚資本家和軍閥，根本上氣味相投，這是很顯明的。官僚，不管他是佔國會前席的政治家，或閣員，或議員，或各都行政官吏，或政黨的政客，他們的政策和主張，都不是着眼於人民全體的幸福，而是着眼於鞏固他們的政權。要鞏固他們的政權，遂不能不引資本家的勢力為後援，而政策和主張，遂亦不能不靠資本階級的利益來決定。他們要控制本國的商場，要保護地主，商人，製造家，和財政家，要實行保護稅制，以鼓勵本國個人主義的生產事業；為的是必如此他們的後援勢力纔能日見雄厚。他們支配選舉，任命官吏，為的是要選擇可以溝通經濟階級的人來佔取議會和地方行政機關。他們直接間接支配一國的教育機關，言論機關，所為的是要製造有利於特權階級的思想習慣，以防止人民對於彼等發生危險的反抗，纔能維持他們官僚和資本家的勢力。這些事實，都表明官僚主義者乃息息通脈於資本主義者，而離却資本主義者的利害感情，便沒有站得住的官僚。通常歐美各國一般人攻擊政府官吏閣員議員輩代表資本家的利益，而我們就常常聽見此輩不肯自承，但是近代歐美政治組織完全是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則不必是馬克思主義者也都一致的公認。在各國殖民地政府

中的官吏和屬於外交系統之下的領事官商業參贊之類，尤其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是純粹代表資本家利益的官僚階級。所以官僚主義直接勾連於資本主義，是極顯明的事實。

官僚主義直接通連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則直接通連於軍國主義，尤其是近代歷史中彰明較著的線索。資本制度未發達的時候，一個國家要實行全國皆兵的制度去向外侵略，是財力上不可能的事。但是近代資本制度發達了以後，個人主義的大生產，固然增加了一國的經濟力，同時也增加了一國的戰鬥力。資本主義，在它的特質上，需要盛大的軍備為後援，而且依賴盛大的軍備為前導；要是不然，資本主義便在國內不足以防患，在國外不足以進取。固然，軍國主義者本身好大喜功，自有其獨立的企圖，然而黷武主義發展，資本主義也就佔着了利益。當德意志帝國新興時，普魯士的統治階級實行軍國主義，而舊的封建制底下的地主。和新的生產制底下的資本家，都竭力舉剩餘的財力以贊助德意志軍國主義之進展，所為的是地主和資本家都需武力來保護他們在國內的利益，都需武力去向國外發展，同各國的資本主義競爭。真的，凡是資本主義者，因為都要利用軍國主義者去奪取原料和開闢市場，就



樂於予軍國主義以物質上的供養和精神上的鼓勵，這固不必德意志的地主和資本家纔如此的。英法意各國的殖民競爭史，總言之，實是資本主義者利用軍國主義者最得力的成就。資本主義者掠奪殖民地的方法有兩種。其一，資本主義者組織私人經營殖民地之公司，如東印度公司，南阿非利加公司，東阿非利加公司等，欺騙弱小民族的君主或酋長，或以條約，或以合同，或以金錢，取得某一領土內的經濟權之後，遂在其地設立殖民政府，將其主權漸漸侵蝕過來，而這種經濟侵畧，同時就帶着一切軍國主義行動的因緣進來。其二，如果用不到締結條約或收買的地方，資本主義者就施用移殖僑民的方法；等到僑居商人漸漸增多，這便穩定了武力割取的根基。英國之於印度，埃及，南非洲等地，法國之於突尼斯，安南等地，從前德國之於非洲東部及其西部等地，就是施用第一種方法的例證。英國之於加拿大，澳地利亞，和以前德國之於喀麥隆，多哥蘭等地，便是施用第二種方法的例證。日本對於朝鮮南滿等處，則兩種方法是同時並用的。在各國殖民史的歷程當中，往往資本主義首先向外發跡，而軍國主義隨之以進，這是資本主義直接勾連於軍國主義。只要資本主義抓着一塊可以發

展的土地，軍國主義就很容易尋覓把它征服下來。但是在軍國主義方在躍躍欲試的以前，外交政治家們早已對於那一塊土地內的人民和政府，高唱『保護外僑生命財產，』侮辱了我們帝國的尊嚴，『要教訓那些野蠻民族來認識白種人的文化，』種種挑戰的言論和政策，都喧嚷起來。這便是軍國主義復直接勾連於官僚主義。由官僚主義又通連到資本主義，便回復到我們前面所說的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沈澀一氣的關係，而完成我們所要分析的大連環。

### 二、帝國主義是反革命勢力連環的結晶

這一切，都不過將官僚主義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三者的連環性作一大體的說明罷了，還不是精深地分析。但是這樣一種本體的說明，正是爲下面精深的分析作一點準備。前面已經說過，官僚主義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三者，總合言之，就是帝國主義。所以我們要看看這三種反革命勢力的連環性，最緊要的是要考察這三種勢力在帝國主義的結晶上是有若何的相互關係，換言之，就是要檢查帝國主義的歷史根源如何，內容的性質如何。

帝國主義的歷史根源，實隱伏於十五世紀歐洲各國向海外尋求殖民地的運動。在那時候，歐洲情形，經過了幾百年十字軍的戰爭而後，上層階級已是財力竭蹶。然而內部各國專制君主，仍是自相攻伐，斂財養兵。他們養兵而外，還要窮奢極慾。同時，意大利和沿地中海等處的城市漸漸勃興，而當時最有利的商業，就是金銀香料食品等物。但是金銀的原料歐洲已告缺乏，而香料食品是由東方輸入的。意大利處在地中海的中心，所以它就扼着歐亞交接的咽喉，而當時敲剝歐洲各國君主貴族僧侶軍人平民的唯一商業民族。各國君主主要免除內部的窮乏和意大利商人的剝削，於是就急望另求金銀礦的新地，和直接與東亞通商的新航路。葡萄牙首先在尋求新航路一方面成了功，因為它的航海家於一千四百九十八年繞過非洲的西岸，南經現在的好望角，直抵印度，裝載了香料食品等物回來。自是葡萄牙人對於這條航路的商業就專利起來，和地中海專利的意大利商人競爭；葡萄牙王遂密派艦隊保護葡萄牙商人的商業，在非洲沿海波斯海灣印度沿海都設起商埠，荷蘭，英國，法國等處的商人，都向里斯本的葡商販買貨物。葡王每年所收入的商品稅額，據說有七八十萬磅，而葡國的貴族官僚商人都

一天富似一天了。各國君主看到葡萄牙開了致富之路，當然不肯讓人。西班牙自一千四百九十三年就發現了美洲的金礦，終十六世紀西班牙宮庭的財富，西班牙王國的威權，在歐洲各國當佔一個極重要地位。荷蘭自一千六百零二年設立東印度公司後，無新航路可關，就把葡萄牙的非洲好望角商業權搶奪而去，從此遂壟斷東方和東印度羣島的商業。英法兩國，殖民地的發跡雖稍遲，然而天天總想取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海外利益而代之，於是加拿大東部和美洲中東兩部的殖民營經，也漸漸興起。所以我們要明白後來帝國主義所以有伸張的地盤，不能不推始於十五世紀以來航路的發跡和新領土的發現。然而沒有當時各國君主的窮奢黷武，便沒有十五世紀那種航海的競爭，沒有這種殖民競爭，便沒有相因而起的商業競爭。只要從這一段歷史的因緣看起，我們就曉得帝國主義在它發源的時候，已經有貴族軍人商人三種勢力為推進機了。

但在當時，沒有取得壟斷東方航路權或沒有取得金銀礦地的國家，要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諸國競爭，便不能不另求所以致富之方。譬如法國，在當時就是不能和葡萄牙等國競爭的，

它就要另想方法，講求自足的國民經濟，十七世紀法國政治家黎塞留 Richelieu 就是主張自足的國民經濟的人。他主張法國必須要自造本國所需的商品，而不必靠荷蘭等國之輸入。他以為要這樣，法蘭西纔能夠『吸收他國金錢。』和他懷抱同樣思想的，有當時歐洲經濟學家約翰底韋特 John De Witt，勒黎 Raleigh 蒙克里天 Moncreien 蔡爾德 Sir Joshua Child 諸人做代表，而其所主張的中心思想，就是『殖民地，商業，製造業，三者缺一，即不足以富國強兵。』這種思想之普遍，可以實證於英法瑞典丹麥各國之向海外尋求殖民地，扶植航業，獎勵工業，發展對外貿易。在法國魯易十四一代，著名的苛爾伯特 Colbert，尤其是以國家的力量扶植本國工商業和殖民地發展最力之人。十七世紀這種以國家專制的權力作殖民競爭航海競爭工商業競爭的歷史的潮流，在法國遂得了苛爾伯特主義 Colbertism 之稱，而通常經濟史上所謂商業主義 Merchantism 者，就是指此。這種商業主義，背後挾着君主專制的權力，而且還有國家的財力和軍力做後盾，其結果便非純然為鞏金式的葡萄牙西班牙海外商人所能抗爭。簡單言之，十五世紀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向外經營，其目的不在殖民，而在

販輸東方及西方的貨物以售諸歐洲，或取得海外的金銀輦回本國。十六十七世紀的英法等國向外經營，却是君主國家比較有計畫有組織的對外侵略。它們不但把本國的軍力和財力去殖民海外，而且要在殖民地以內樹立政治宗教軍事經濟的一切基礎起來。英法兩國拿這樣的商業主義去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諸國競爭，所以就一步一步把它們本來捷足先得的殖民地併吞了。我們不必將各國爭殖民地的經過敘述出來，然而即此足以使我們樹立一個根本論點，這就是：商業主義是十六十七兩世紀歐洲各國殖民的商業政策，而這種政策的發展，就成爲今日帝國主義的雛形。

然而商業主義沒有其他的力量來培養，也不會變成今日的帝國主義。要曉得十六十七兩世紀是商業主義的時代，同時也是開明專制發展的時代。當十六世紀的末葉，強國的君主政體是風行歐洲的。雖然德意志和意大利還被專制王侯割據而不能統一，但是西班牙實際上已成各國君主所傾慕的專制國家。英國詹姆士斯圖亞特 James Stuart 則公然宣言王權與上帝而俱尊，而英國君主之獨裁，亦以十七世紀爲特甚。將近十七世紀時，法國君主權力的伸張

，且漸漸變為歐洲各國的最大而最強者，這個時代的趨勢也可想而知了。這些君主都是野心勃勃而好大喜功的，而其操縱外交軍政的重要官僚，也往往抱着馬基雅弗里 Machiavelli 的思想，務以權謀術略以與他國爭雄長。當時君主與君主有爭，貴族與貴族有爭，而在英國則平民和君主又有爭。各國君主既然都是黷武為務，軍費較前更增大，軍械軍餉的需要增多，而兵士也較前成爲一種固定的職業，非復如十五世紀以前未經訓練的游民了。除此而外，海上要增造商船和兵艦——雖然都不如現在的精巧，——又要供給殖民地政府一切的需費。君主的耗費既然增多，所以就不能不更謀有效率的海外商業礦產之開發。因爲當時君主的耗費都希望取給於商業上的稅金，和海外礦產事業上所抽取的贏利。這就可見純粹的商業主義之外，還有風行當時的君主專制；這兩種勢力展轉相因的關係，纔結晶而成後來帝國主義的基礎。

然而帝國主義，尙有待於十八世紀的機械發明，纔能繼續發展。以前歐洲各國雖已覺殖民地 and 工商業發達的必要，然沒有機器的生產方法之發明和應用，帝國主義就不能大踏步的

猛進。十五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在海外首先獲得的殖民地，到十七世紀就大部分給君主專制最強盛的商業主義的國家英法等國搶奪去了；然而這些搶奪而來的殖民地還是不穩固，假使沒有十八世紀機械生產方法之發明再給它一個最有力的保障。英國是首先應用汽機的国家，而它的機器生產也首先發展。產業革命首起於英國，從歷史的立場看，實非偶然。因為產業革命，不啻為英國決定了一個殖民的工業的国家領袖的地位，從此以後，英國不但能夠鞏固已得的殖民地，而且能夠從其他殖民的国家奪取新尾閭，不但能夠求自己國民經濟的自足，而且能壓法葡荷等國的工商業，使它們不能不讓英國在政治上經濟上佔國際最強有力的地位。當時英國差不多獨得機器生產新方法之秘，其他国家都望塵莫及，所以由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的紡織棉紗鋼鐵等業，簡直沒有誰能同它競爭。甚至在一千八百七十年，英國所冶的鋼鐵，過全世界產額之半；它所產的棉織物，也差不多佔全世界產額之半；它的對外貿易，比任何競爭的工業國多兩倍。直到十九世紀末葉，法美德諸國新發展的工業，經了長期的培植，纔忽然起來同英國抗衡。這時美國鋼鐵產額之銳進，竟佔第一位，



而德國的產額也把英國壓在第二位。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十年間，美國對外貿易增加四倍，德國增到兩倍，而英國不過增百分之四十五。

這種新興的資本國家加入到殖民的商業的競爭裏面來，便發生重大的影響。英國的局勢，從獨霸的工業國的地位，現在進到同法德美諸國競爭的地位。它們彼此競爭，便引起了絕大的變動。在經濟上，它們要做生產過剩的競爭，資本過剩的競爭，交通壟斷的競爭，和更劇烈的市場和原料之獲取的競爭；這一切競爭之劇烈，是從前英國獨佔工商業的時候所無的。這一個大變動的重要意義，可以拿十九世紀末葉以前英國的自由主義和十九世紀末葉以後歐洲的國家主義兩相比較，就能表現出來。從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起，亞丹斯密士 Adam Smith 發表他的名著『國民之富；』邊沁 Bentham 發表他的『道德和立法的原理；』李嘉多 David Ricardo 發表他的『經濟及財政之原理；』這些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都主張放任主義，反對國家干涉私人手藝的經濟的生產事業。這個時候，政治上有底斯累利 Disraeli，葛拉德士吞 Gladstone，哥布登 Cobden，和伯萊特 Bright 輩主張自由貿易政策，准許各殖民地

自治；這都是力反以前殖民的商業主義的政策。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美國獨立，實當時殖民的帝國根本變革的先導。繼其後者，有一千八百一十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的南美洲脫離西班牙獨立的革命運動。這些事實，所顯示的歷史意義，就是當時一種反乎十七世紀商業主義的離心運動，實在深入人心。杜爾孤(DuRoi)在十八世紀中葉有一句名言說：『殖民地如生長在樹上的果實，果到熟時，蒂就落了。』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加拿大發生革命後，英國對於殖民地也就一個一個的給它們以自治權。葛拉德士吞在一千八百七十年也就說：『等到殖民地自己發展到相當程度，它脫離母國而獨立，乃事實之所必然，不應相強也。』總括言之，十九世紀末葉以前，在英國獨佔了歐洲工商業的優勢之下，它的自由主義或放任主義，曾經一度的緊張，而從前由商業主義傳統下來的政策，如羈絆殖民地，保護稅則等，差不多一掃而空。但是十九世紀末葉以後，這種自由放任的趨勢忽然中止，而歐美政治的經濟的浪潮，又回復到一種嚴重的干涉主義的地步，使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的帝國主義，直接繼承了十七世紀的商業主義的傳統世界，這一個事實的大關鍵，就完全是由於十九世紀末葉美德法諸新興的資

本國家之勃起。英國遇着這幾個機器生產的新國家起來同它競爭世界殖民地和工商交通投資事業的霸權，彷彿從夢中驚醒，遂竭力以求與各國相角逐。這種競爭一起，遂把所有的自由主義放任主義一齊攔開，而其他各國也就互相準備，以求角勝。在這個時候，各資本主義的競爭，便成了國家的競爭。半世紀以前，自由主義者主張個人主義的經濟事業，用不着國家來干涉，而現在則國家不但要來干涉個人主義的經濟事業，並且還要用權力來扶助個人主義的經濟事業之發展；半世紀以前，國家干涉個人主義的生產，大家就說是恐怕走上了帝國主義的路，而現在則各國的政治家不但怕他們的國家走上帝國主義的路，而且唯恐其帝國主義不成功。這一種由放任主義到干涉主義由自由主義到帝國主義的大轉變，完全是十九世紀末葉三十年間發生的。不過三十年的時間，前後的趨勢就大不相同。這種大轉變是什麼東西促成的呢？是美德法各國新起參加資本生產制和殖民地發展的運動，和英國來互相爭衡這個事實促成的。因為這一個事實之促成，遂使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的世界，一方面遠紹十七世紀商業主義的傳統，一方面也繼承十七世專制主義的精神；自是而後，一方面是經濟的帝國主

義之積漸強大，一方面是政治的帝國主義之日趨完成；前者是資本主義衝破一國的國界而壟斷全世界的生產，後者是資本主義的階級專政而防制他民族的民主運動；而二者的真髓，遂結晶成了一個風行於十九世紀以來的國家主義。我們只要看在前面所述的兩種歷史的趨勢正在開展的時候，歐美各國的國家主義的精神也是同時開展的。假使十九世紀後半期如果有所謂時代精神，則舍國家主義外是沒有第二個時代精神的。這個時候，日耳曼民族在俾士麥的赤血和黑鐵政策之下統一成德意志帝國；意大利由一個自羅馬末代以來分裂的民族而造成一個統一的國家；美國由南北戰爭的分裂統一成個完整的聯邦，自此以後，中央集權的思想戰勝，而哲斐生那種邦權超越國權的地方分權主義也從此失勢；俄羅斯開始實行它的俄化國家政策；波蘭的一千八百六十三年獨立戰爭，雖然失敗，但是於波蘭國家主義運動總得一個有力的證明。至若巴爾幹各民族的革命運動，引起近東百年來種種的風雲，法國經普法戰爭後國家主義的精神勃興，和奧匈聯邦內被統治民族的蠢動，都是國家主義同時開展的史例。國家主義，是以民族求獨立自主為其本意的，而帝國主義是以白種人征服有色人種為其本意

的：這兩種主義在理論上固有其不能相容之點，但是自有經濟的國家主義發展的事實做了十九世紀的重心，則本來求政治的獨立自主的國家主義，便很容易地轉為侵略他人或防制他人獨立自主的帝國主義。在這一事實的樞紐轉移的時候，歐洲的經濟學也起了轉變。從前代表自由主義和放任主義的英法正統派經濟學，如英國曼徹斯德學派等，現在就變為受一般國家主義的經濟學者之抨擊。代表這新興一派的國家主義經濟學的，就是德國李士特Friedrich List。他的中心思想，力言自由主義之不當，而着重國家的永久性和整一性，從而推論國家的安全和福利，必須健全的經濟政策管理私人的工商事業。個人的利益必須聽命於國家的需要；所以保護政策，實為培植工商農業而使之平衡發展的必要手段。李氏這種學說，實與當日的時代精神相調協，所以他便成為歐洲大陸經濟學派的創始者。與這種學說同時風行的政治現象，在勞動方面，起了勞工立法的要求；在資本家方面，有保護稅制的呼籲；在社會方面，有社會改良運動的勃興；這一切，都是見露了帝國主義猛足的進展。可是經濟的和政治的帝國主義展進，軍事的帝國主義也展進。在英國，有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保守黨的握政權，

而其領袖斯累利則明白宣布帝國主義是保守黨的最大政策。英國控制蘇彝士運河，管理埃及財政，維多利亞皇后兼領印度女皇的頭銜，俾路支變為英國保護國，非洲德蘭士哇兒被英國併吞，英俄法三國對近東的干涉行動，這都是十九世紀末葉英帝國主義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最大成就。在法國，東方則兼併西貢交趾支那和安南，非洲則吞滅阿爾幾尼亞及突尼斯。德國俾士麥也同時向近東非洲遠東等處發展它的帝國主義。俄羅斯為要在帝國主義的路上競爭，亦盡力從波羅的海地中海及太平洋三方面尋求海口，直接與英法日各帝國主義周旋於政治的商業的軍事的鬥爭之場。而這些帝國主義的鬥爭，集總在中國一方面的，便有自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以來的種種侵略。這一切歷史的事實，總括起來說，都證明一切壓迫人類惡勢力皆結晶於面目猶怪的帝國主義。我們如果把上面所述這五百年來歷史的行程作一個總結算，就應該曉得在這五百年間佔最強盛的地位的，除帝國主義外，是沒有第二種支配全人類的力量了。

根據這五百年的歷史，帝國主義的性質也就很顯明。簡括地說，它是十五世紀的殖民運

動，十七世紀的商業主義和開明專制，十八世紀機器生產方法之利用，和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所匯合而成的。它彷彿是一條大河，在時間上每次向前流了一程，便與某時代支配人類的強有力的制度方法和勢力相匯合；匯合的愈多，它這河流的泛溢力和衝進力亦愈大；到了今日，這河流的衝泛力幾於湮沒了全世界，而且這河水所含的污積物，亦有如海洋之水的一般鹹苦；人們在它浸淫沐浴之中，幾於尋不着超出苦海之路。但是帝國主義是人造的鎖練，人造的鎖練，終須人力來鉸斷的啊！

#### 四、連環的三民主義打破連環的世界反革命勢力

依以上詳細的分析，我們曉得了反革命勢力的造成，經過五百年的歷史行程，其總結晶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核心有三個：一是軍閥主義，二是官僚主義，三是資本主義。這三個核心，在十五十六兩世紀發為各國的殖民競爭，在十七世紀發為專制主義和殖民的商業主義，在十八世紀發為資本的生產制，在十九世紀發為經濟的和政治的國家主義。到現在二十

紀呢，固然一方是五百年來積下的帝國主義佔領了全世界，然而一方在帝國主義的積惡之下也養蓄了革命的潛勢力。這革命的潛勢力，雖然還沒有能夠表現完全推翻帝國主義的力量，雖然年齡還沒有帝國主義的多，但是至少也潛伏了三百多年，而全世界十五萬萬人當中，至少也有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和這革命的潛勢力有份的。這種年齡尙幼而人數最多的革命潛勢力，只要得着適用的革命方法做指導，一定有推翻帝國主義的最大可能性。在這三百多年的時間，革命潛勢力爆發過多少次。舉其最著名的，第一次是英國革命，第二次是美國革命，第三次是法國革命，第四次是中國革命，第五次是俄國革命，第六次是德國革命，第七次是土耳其革命。在這些革命潮流湧進之中，有兩個重要意義是值得注意的。英國革命，克林威爾把查理士第一殺死，距美國革命一百多年；美國革命距法國革命則不過十年；法國革命後則全歐洲的革命思潮便一天盛行一天，推而普傳到東方各民族；中國革命則爲東方民族最先發動的，而我們革命不到六年就有俄國革命；俄國革命是歐戰所觸發的，而同時革命的就有德國和土耳其：這樣，歷史指示我們革命的勢力是進一步便快一步，愈到後來愈推進行得快，這是



第一個可注意之點。英國革命只殺死查理士第一，而其君主政體，至今還保存着，在革命的立場說，真是毫無成績；美法兩國的革命，雖脫離了君主立憲那種最不徹底的軌道，然而還是階級的民主，有了階級政治便是帝國主義的產胎；俄國革命雖然推翻君主政體打破資本階級，比美法兩國的革命確是進了一大步，但是理論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事實上的史丹林個人專政，最大限度也終不能逃過階級政治的批評，何況它的共產黨的帝國主義，完全沒有拋棄前俄帝國主義的精神；土耳其革命，單就目前的事實說，是脫了君主專制和階級政治的痕跡，而同時也沒有帝國主義的企圖，但是它的生產制度會不會逼成將來的階級政治和帝國主義，此時還沒有多少事實給我們作精確的判斷；至於我們中國的革命，在推翻君主專制一點上，比美法的革命無遜色，在努力打破軍閥政治而使一切階級政治的基礎都建立不穩一點上，則比美法俄三國的革命都進步，而在依據三民主義的理論和計畫以求革命目的之實現一點上，則比所有已得多少革命成績的民族，都是最進步的，最徹底的。

何以中國革命必須依據三民主義而進行，何以三民主義是革命理論中最進步最徹底的革

命主義？這問題是從幾方面的觀察肯定下來的第一，從前面所述五百年來世界歷史的趨勢看，現在是一切反革命勢力集中在帝國主義下的時代，要打破這一個陶冶一切反革命勢力的帝國主義，這時代正需一個對準一切反革命勢力而予以迎頭痛擊的三民主義為武器。第二，現在帝國主義全力所注射的是中國，而我們革命力量所注射的，一定是要打破侵略中國的這一個總合的帝國主義。旁的民族起來革命，儘管可以提出破片的單純的理論為目標，而我們中國就舍三民主義外，沒有旁的革命理論可以適合於集矢於中國的一切反革命勢力的環境而一齊將它擊破。第三，三民主義是近代幾百年來革命的總結品；一方面帝國主義在那兒發育成長，一方面革命的各種理論和趨勢就發育起來，經過孫中山先生的審思明辨和博學篤行的努力，遂成爲一個完全無缺的革命主義的大系統。帝國主義在五百年前發跡，到十九世紀大告成功；近代革命在三百年前發跡，到今日二十世紀，事實上則在各國的革命都受了阻障，思想上獨在中國經中山先生集了大成，樹立了一個三民主義；有思想上集了大成的三民主義，近代革命潮流，其總匯歸必由是引起，而在事實上一定會衝破歷史的阻障，重新展開，使二

十世紀在將來的歷史上爲三民主義革命開展的新世紀，而二十世紀的世界爲三民主義的世界，這是可以大膽預斷的。總括這三點來說，目前這一個時期，是三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已經開始決鬥的時期，在帝國主義那一個壁壘方面，一切反革命勢力，正如上面曾經論述過的，都已有連環的結合。在三民主義這一個壁壘裏面，各國革命潛勢力，必將爲實際的需要所迫，逐漸依皈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大家都在同一的三民主義之下連環地結合起來。但是在各國革命的潛勢力連環結合之前，各國革命者必須了解三民主義的連環性，而且遲早也自然要被迫的來研究三民主義的連環性這也是可以預先斷定的。因爲各國革命勢力在錯綜的和帝國主義交鋒之際，遲早必定要發見各種反革命勢力錯綜的連環關係，而共同感覺應用我們具有連環性的三民主義之必要。所以我們爲革命前途一般的發展，澈底認識三民主義的連環性是當前革命者的最大責任。

三民主義的連環性是和一切反革命勢力的連環性針鋒相對，大體上既已肯定，於是我們就要分析三民主義的連環性的基點是如何。

第一個部分的基點：三民主義是從民族出發的，不是從個人出發的。換言之，三民主義的革命，在於打進帝國主義的營壘，將它個人主義這一個核心革去，另換一個以民族福利為出發點的核心，從新建造革命的文化起來。我們開始已經分析過帝國主義系統底下的反革命勢力，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人類自衛的武力，本來不壞，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就壞了，而其極端便變成掠人的軍國主義。物質的享用，凡人都是需要的，但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則生產分配都變成了吃人的資本主義。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生存，便不能沒有政治生活，但是個人主義發達，便把人的公共管理權轉移到少數人的手上，結果不是個人獨裁，便是階級專制，從君主到資本階級專制，從資本階級專制到無產階級專制，簡直看遍了的官僚政治，總不離個人主義在骨子裏作祟。這個人主義，簡直是西方幾千年文化的老根，要西方拔掉它的老根，另換新種子，不是容易辦得到的；只有東方，自從它的文化發生以來，都是壓制個人主義，偏重社會道德，纔有培植文化新種子的資格。東方近幾十年稱讚西方，要是稱讚它的物質文明，還有可說，若論它的文化基礎，則它那種鐵骨森然的個人主義，實我們東方

素所鄙棄的。孫中山先生說，西方行霸道，東方行王道，霸道本於武力，王道本於自然；這已指明東西文化之大較。西方的武力，完全建築在個人主義上面，所以國家是強有力的個人造成的，而一個國家裏面併吞了若干弱小民族，尤其表明個人主義超越於自然力所結合的民族之上。至於東方，個人主義完全被自然力所柔化，便不能如西方個人主義那樣露骨。譬如中國人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這已比個人主義進了一大步；可惜限於物質文明的不發達，這種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未曾擴張成爲國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然而中山先生就說，我們中國要恢復民族精神，比西方要容易得多；因爲西方是以個人爲單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則個人和國家中間便是空的，而我們中國是宗族爲單位，個人和宗族之間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爲單位再聯成國族，便很自然，很容易。由此可知東西文化的基礎，迥然兩途！西方以個人爲單位，所以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制度都是掠奪的工具；我們要以東方固有的天然團體爲單位，擴張起來便要以民族爲單位，一切制度都要從此點出發，纔不會落到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那條路上去，我們以三民主義來打倒帝國主義，根本上就是站在民族的單位上打

破個人的單位。三民主義的連環性的基點，就在起首即以民族爲單位。民族主義，固然不必說是以民族爲單位的，就是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也是要以民族爲單位的。如果不以民族爲單位，而以個人爲單位，則民族主義便變成國家主義，民權主義便變成階級政治，民生主義便變成資本主義，這是五百年來歷史所予我們的鐵律，絲毫不能逃過的。許多人不認識三民主義的連環性，而且不認識這連環性的基點是民族不是個人，所以妄心盲目地詆毀三民主義是國家主義階級政治和資本主義，我只稱許這種人滿腦裝着帝國主義的思想，絲毫看不出他們有什麼革命頭腦的。現在這種滿腦裝着帝國主義的思想的人，還天天自命是最革命的，我只好說：『革命革命，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啊！』

第二個部分的基點：三民主義的作用或目的，就是求生存。所以孫中山先生說：因爲求生存，人類就有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不過求生存的方法，是各個時代不同。一個時代的情形變易，求生存的方法也要變易。譬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洪荒時代，人同獸爭，所用的是氣力；神權時代，人同天爭，所用的部

落酋長的權力；自神權時代到君權時代，都是少數個人的力量。但是我們現在的時代，個人單位必須要打破，民族單位必須代之而興。因為現在個人的生存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民族的生存。所以合攏第一個部分的基點和第二個部分的基點，三民主義的基點是求以民族為單位的生存，而不是求以個人為單位的團體或民族或國家的生存。這一個基點是非常重要的，不能隨便誤解的。因為以個人為單位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組織，都會生出壓迫者和被壓迫的兩種壁壘，甚至生出一層壓迫一層的無數壁壘。如果以民族為單位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組織，那便沒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分別。現在世界上所有壓迫人和被人壓迫的組織和制度，經過幾百年來革命的掙擊，有的已經消滅，有的還是存在。然而即此就可以曉得世界進化的趨勢，已向消滅壓迫者和被壓迫的方向前進，而這一個進化趨勢的新紀元，必定是以民族生存為出發點，而不復以個人生存為出發點。三民主義，就是樹立在以民族為單位的生存問題的基點上。以民族為單位，所以才講民族主義，才講世界民族一律平等；以民族為單位，所以才講民權主義，中國要四萬萬的人民都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同時世界各民族的人民都要有自己

管理自己的權；以民族爲單位，所以民生主義，不但要中國民族的生計問題圓滿解決，各民族的生計問題也同時要圓滿解決。革命的文化，一切都要在民族的單位上面。認定民族的單位，則革命必定要掀翻一切以個人爲單位的帝國主義的思想和制度，要掀翻跨着若干民族而組成的國家，要掀翻掠奪若干民族的生活需要品的經濟制度。不但如此，認定民族爲單位，則革命必定要實行連環的三民主義，而實行連環的三民主義，其要義就在：（一）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二）實行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三）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

這三個連環的意思，我們可以引孫中山先生的話來說明。先生說：『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他又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又說：『不能有，焉能治；不能治，焉能享。』這已扼要地說明三民主義的連環關係了。我們要曉得，中山先生是站在以民族生存爲單位的立場，



而統籌革命的建設計畫的所以民有民治民享當中包含了三個連環的意義：第一，從民有的立場看，民有是目的，而民治民享是手段；第二，從民治的立場看，民治是目的，而民有民享是手段；第三，從民享的立場看，民享又是目的，而民有民治是手段；而總合起來，共有共治共享都是以民族生存為基礎的共有共治共享，不是以個人為基礎的共有共治共享，更不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共有共治共享。

這三段意思，須得分別地說明。何以說民族主義是目的，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手段呢？一個民族的力量，靠着兩個條件而發生的：一個是政治的力量；一個是經濟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要怎樣纔是效能大的呢？從前君主專制的力量，比起階級專制的力量，當然小得多，所以世界上有兩種趨勢：一種趨勢，把政治權力集中在資產階級手裏；一種趨勢，把政治權力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兩種趨勢的擁護者，以為兩種階級政治的力量都比君主政治強得多。但是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民權主義，政府有能，而人民有權，權能分工，就是充實民權的最經濟的手段，而使民權成為民族的民權。這種民族的民權，力量就要比一切君主政治

階級政治力量大得多了。換言之，民權必須充實全民族，民權的力量才大；民權的力量大了，就是民族的力量大了。所以民權主義，在充實民族的力量上，是一個必要的手段。可是民族的力量，同時還要靠經濟的力量發展。要增加經濟的力量，必須要全民族人人的衣食住行；各項需要滿足，沒有大富和大貧的區別，只有人人各依其聰明才力之不同而為社會分工的區別，人人為社會分工而服務，則這樣的民族，必定是世界經濟效能最大的民族。所以民生主義的效果，能夠充實一個民族的經濟力量，是任何科學家所當公認的。這是從民族主義一方面看，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增加一個民族的力量最大工具。

但是從民權主義一方面看，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又成為發展民權主義的必要工具了。為什麼呢？第一層，民族思想不發達，民權思想也一定不發達。人要曉得自己民族的生存要緊，才曉得自己個人對民族有什麼責任，如果沒有對民族的責任心，便沒有要求民權的必要性。權是因責任而生的；沒有責任，權也沒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我們革命者主張人民要有權，不是要人民有權去謀個人的私利，乃是要人民有權擔當對人類的責任，而起點就要擔當對

民族的責任。如果民權是爲個人謀私利而設，則民權也老早要和君權遭人們的深惡痛絕了。所以要求民權，始意就在把對自己民族的大責任放在人民個個人的肩上。認識這個對民族的大責任，便是民族主義精神。爲求能夠擔得起對民族的大責任，所以就不要再民權。所以民族主義，實在民權主義的責任之對象；要民族精神濃厚，民權精神才隨之而濃厚。這是理論上的關係如此。在事實上，則近代歷史中，民權運動，往往伴民族衝突而起。每一個民族脫離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而獨立，成功則民主政治是它的新國家組織的根據，不管它的民主主義在事實上的成績如何，失敗則民主思想的潛勢力越一天一天的膨脹，也不管它的民主思想的實際如何。至於孫總理的三民主義，是要中國民族精神恢復到足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一切壓迫，然後才能負得起實現民權的思想；而同時也要中國人民實行民權主義，才能完全表現出中國民族的能力；這兩方面的密切關係，是互爲因果，不能分離的。第二層，民權主義，要靠民生主義實現，才能有實際，這也是很顯明的。所謂『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固然我們講民權不是講禮義，但是這句話所含的道理，如果改換字面來說，『衣食住行足而後民權興

，」就不錯了。以中國民族現在窮乏的情形而論，假使沒有軍閥，沒有內亂，民權也還是不能充分發達。爲什麼呢？因爲四萬萬人大多數是大窮，少數比較好的，也是小窮，大家都窮，還有能力來行使民權麼？不能的。所以要民生主義實行，把中國辦到家給人足，民權主義纔能普遍地充實地發達。再就歐美民權的現象說，它們是實行了一點代議政治，人民不過享了一點選舉權，比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可謂差得遠了。然後歐美這一點民權，還是不能普及，最大的原因就是有錢的人纔能行使選舉權，而沒有錢的人就沒有心思去行使選舉權，就要把應有的一份民權放棄。可見要衣食住行足，才能希望民權充分地發展，否則就是理論是理論，實際是實際。民生主義所以要與民權主義同時實行，個中道理，正是因爲要靠民生主義的實行，來把民權主義的理論和實際打成一片。像歐美各國那種民權發達史，它們的民權是跟着經濟發達而來的。它們的資本生產制發達，民權只是資本階級民權；在資本生產充分發達以前，民權便只是中產階級的民權；在中產階級未發達以前，民權便只是貴族僧侶騎士的民權。它們的經濟發達史，是沿着一條邊走的，所以跟着經濟發達而來的民權史，便也一

條邊的民權，而不是普及全民的民權。這一種歷史的意義，是很足予我們以深刻的教訓，這就是：民權是隨着民生發展的力量而發展的，民生制度是階級的制度，民權便一定成了階級的民權，民生制度是全民的制度，民權便一定會成全民的民權。中山先生的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的民族，其中個個要衣食住行滿足，個個要行使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這四個直接民權，所以民生主義和民權主義要同時並行。總合前後兩層意思，就是我們從民權主義的立場說，民族主義有提高民權主義所含的責任心的作用，民生主義有充實民權主義所含的可能性的作用；三民主義的連環作用，這是很顯明的了。

再從民生主義一方面看，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又成了發展民生主義的必要手段。在今日世界經濟生活複雜的時代，要計畫一個民族的生計政策，發展一個民族的天然富源，扶植一個民族的農工商業而管理保障之，並非可以同其他民族斷絕關係就能夠做得到的。就世界的範圍說，帝國主義的鐵爪伸入五大洲，海陸空交通線突破了一切人爲的和天然的藩籬，資本流通尤其是無孔不入，而生產品消暢的市場，簡直是星羅棋布的遍於全世界，我們中國怎樣

能夠鎖閉國門來講民生主義？就中國自己說，我們沿海腹地的險要門戶，被帝國主義者洞開了；我們的礦產鐵道，被帝國主義者抓住了；我們的海關被帝國主義者扼着了；另外還有許多不平等條約，把中國束縛起來，要我們單純地講民生主義，怎麼行呢？由前之說，中國是不能在國際上孤立而可以行民生主義的；由後之說，中國是不能在國境內單純地行民生主義的。合而言之，中國非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同時並行不可。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講演裏，已經說我們中國民族所受的禍害，一是受政治力的壓迫，二是受經濟力的壓迫，三是受列強人口的壓迫。這三種壓迫，其所以壓迫的是政治問題範圍內事，和經濟問題範圍內事，而受壓迫的，却同時又是民族問題範圍內事。我們要解除這些壓迫，要靠民族主義來抵制外力，要靠民權主義來組織內部，然後纔能靠民生主義來發展自己經濟的力量。所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從這樣看法，彷彿是三條戰壘：民族主義所以固外防，民權主義所以固堂奧，民生主義所以固後方。撤了一壘，其他二壘都受牽動。我們要民生主義中的實業計畫實行出來，先就要撤消扼着中國交通要塞的租借地，廢除各種不平等條約，這是民族

主義的事；次要實權歸自治計畫，使人民皆受四權使用的訓練，這是民權主義的事；這兩種事業辦到相當的程度，然後土地的歲收，地價的增益，公地的生產，山林川澤的利益，纔能有成績，這就歸到了民生主義的範圍。就這種關係看來，民生主義一定要三民主義者來實行；因為我們是不能拋却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而能夠希望民生主義的成功。拋却民族主義的民生主義，甚至假定它能夠成功，也是外國人來替中國發展經濟的力量，這就叫做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拋却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又假定它能夠實行，也是君主，貴族，軍閥，官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這一類少數人來掠奪國家的經濟利益，這就叫做受特殊階級的掠奪。所以民生主義，換任何一種不要民族主義或不要民權主義的人來講，他不是要變成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便是要變成特殊階級的家奴，二者必居其一。

總括地說，三民主義的連環性，其特點是：民族主義需要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來充實它的力量，成爲一種對世界擔負責任的民族；民權主義需要民族主義來牽繫它的責任心，同時需要民生主義來推進它的實在性；民生主義需要民族主義來衝破它的前途的障礙，同時亦需

要民權主義來保障它的敏活的實施。綜括三民主義連環相通的關係，我可以引述劉蘆隱先生前幾年的話來說：『三民主義，彷彿是一個三稜角的水晶體，一面是民族主義；一面是民權主義，一面是民生主義，而三面都是同一個基礎，這一個基礎就是救國主義。』他又說：『我們更要曉得三稜角的水晶體，是面面通明的，由任何一面都可以看透到其他二面；尤其要曉得，由任何一面看時或由三面一齊看時，都不可忽略三面同體的底邊是一個亮晶晶的救國主義。』這兩段話很簡明的說出三民主義所具的三面一體和三面相通的連環性。但是我要替他補充的，就是：這三稜角水晶體的頂點，是貫着世界進化的定律，而其底邊，小而言之，是救國主義，大而言之，實是大同主義。由頂點直貫到底的中心，是生存的要求；沿着生存的要求這一個中心的，便是人的努力，而其努力的階級，起點是博愛，過程是救國，終點是世界大同。我們要曉得三民主義的連環性，其總作用正是引導人們沿着進化定律而努力，由博愛起，經過國家的階段。而終底於世界大同。這一個根本論點，我們就在下文來說明，同時亦可以把三民主義的連環性，闡明其較精深的含義和內容。



## 五、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

孫中山先生說：『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種族絕不能爲他種族所壓制；民權主義，即人人平等，絕不能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這話是孫先生用世界的立場來說明他的三民主義的最高概念的。換言之，孫先生這話，便不僅僅是以中國一個民族爲實行三民主義的對象，而且是以全世界各民族爲實行三民主義的對象。我們引申孫先生的思想的含義，就是：由一個民族做到共有共治共享的境界，到世界各民族做到共有共治共享的境界，由世界各民族做到共有共治共享的境界，到世界人類共有共治共享的境界。世界人類共有，這就是世界主義的極則；世界人類共治，這就是無政府主義的極則；世界人類共享，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極則。何以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能夠做到這種境界呢？我們答案是，因爲：（一）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二）無政府主義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三）共產主義是

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這三個答案也須分別的闡明，而本節且先從第一答案着手。

世界主義，在古代即爲人類所有的理想。就古代的理想所經過的史跡，大概可分下列幾個時期。第一爲宗教的世界主義，古代波斯印度希臘埃及的宗教，都含有世界主義的理想。第二爲哲學的世界主義，自希臘斯多噶派 Stoics 和拍拉圖 Plato 到中世紀湯麥士 Thomas of Aquinas 和但底 Dante 一輩，都是代表哲學的世界主義。他們一方面帶着宗教的采色，而一方面又受着政治制度的影響，所以他們的世界主義仍是空想，無足稱述。第三爲近代的世界主義，其間派別就不遑枚舉，概括地可分爲法學派，經濟學派，唯心派，和唯實派。法學派的世界主義，實在不是世界主義，因爲他們目的只在於研究國際間平時和戰時的交際成規，而與世界將來的政治組織，關係非常微小，所以我們可以完全把它撇開，經濟學派着眼在近代世界經濟的實在現象。近代世界經濟現象，頭一件可注意的是輸運的發達。現在輸運的工具，鐵道，公路，輪船，飛機等，把從前人跡不到之區，都開發起來了，而旅行和貿易的速

度，比一百五十年前快過十倍，結果就是：生產品不限於銷售一個區域，而可以銷售全世界；資本不限於流通一國，而可以流通到任何有利可以吸收的國家；勞工也變成非常流動的，可以到任何國境尋工作；財政商業，都不是地方的，而是世界的，其次可注意的是交通的進步。從前幾個月纔能交通的地方，現在有電報，郵政，電話，無線電等，只要幾個鐘頭就可達。因此，一個地方政治的消息，財政的變化，智識上的新思想和科學上新發明，瞬息可以傳遍全世界。這些事實的結果，便引起經濟學派的世界主義：貿易是世界的，買和賣是以贏利為基礎，不以國家主義為基礎；金錢是不管國界的，甚至可以說是不愛國的，因為金錢之眼，只看着厚利走，不看着國界走；智識是人創造的，不是國家創造的，甚至你說它是國家創造的，但它却不是國家享用的；科學是自然現象的定律，但自然現象又非國家所得而私，乃到處一樣他供人們考察的。這一派的最終結論，總是根本上希望生產最發達的若干國家或民族，結合起來成一個世界的聯邦，從而統治了全世界。這一種世界主義，實質上不管是世界帝國主義，而其短處也就用不着過細的批評。要是以學理的眼光批評它，那就兩句話就

夠了，這就是：此派只看見現代經濟的複雜生活現象普遍於全世界，却不了解這種普遍於世界的經濟複雜現象是世界帝國主義而不是世界主義。它的根本錯誤，在於只看到世界的表面彷彿一切都準備好了給世界主義登臺，却不看見世界的裏面是個人資本主義搭起來的臺柱！

唯心派的世界主義者，又稱爲演繹派的世界主義者。這一派的學者和實行家很多，我們不必細舉，其根本的出發點，總認定世界人類無國界無種界無戰爭爲一種無上目的，而在這一個大前提上面，各從其所能的方面，努力以企其理想的實現。遠的不必說，近世如盧梭，孟德斯鳩，邊沁，康德，都發表過對於世界主義的意見。盧梭的根本意思，以爲國家組織是不得已的事，並非合理的事，最好是能夠不要人爲的社會，而返於自然的世界。因爲人 and 人是天生相友愛的，只因了人爲的制度習慣，人同人就不能相處了。但是他對於國際公共法庭的制度，又認爲是各民族平等結合不可少的基礎。孟德斯鳩主張世界的聯邦，而以君主統御之；然而這都不能供我們以世界主義的真實光明。邊沁比較具體一點，他主張廢除帝國主義，實行自由貿易，要各民族組織世界會議，限兵備，頒布國際法等；然而他這種論調，究竟

是限於當時情形的說法，沒有多大價值。康德在『永久和平』一文裏，贊同世界聯邦組織，減少兵備，而並不否認國家的存在。他以為世界上每一國家必須建立民主的政府；人類共守的法律，必須由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共立一聯合機關做後盾；各自由民主國的人民，要有世界民的資格，人人可以自由往來於全世界，但不得在外國享受土地所有權。康德這一個思想，他以為是直接可以防制帝國主義之勃興的。他以為人的天性，既能愛，亦能恨；所以人在社會中，一方有社會性，同時亦有反社會性；這兩個傾向互相磨蕩，便可致人類於大同之境，而他所懷想的世界組織，便是適合於人類的矛盾性，因矛盾性的互相磨勵，使他們朝大同的方向進展。但是這些唯心派對於世界主義的概念，大體上都可以說並無系統的理想，所以值不得什麼批評。可是近代國際間政治的經濟的衝突愈多，世界主義的思想愈加激增，除了宗教家政治家科學家勞動家資本家都各有其懷想的世界主義而表現於種種國際團體和活動外，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唯實派或歸納派的世界主義者。

唯實派的世界主義者指摘國家主義的弊害，不遺餘力。他們分析國家主義者所有的原則

和辯辭，都是含糊的，籠統的，而且往往和實際不相干的。所謂「國家的尊嚴」，「國家的光榮的傳統」，「維持列強的均勢」，「人性不移」，「強者生存」，「在太陽中爭地位」，「戰爭是一切的基本」，「白種人的責任」，「黃禍」，「黑禍」一類的思想，都是感情作用的濫調。人們對於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只是當作真理去接受，絲毫不肯懷疑。國家最高主權論及其演繹出來的理論，結果只能導人類於戰爭，所以非嚴格地限制它不可。限制國家的根本理由是：國家阻礙人羣的進步；人類應該有其共同利益所藉以保障的國際法，而少數國家就搶奪國際法的假面具，作壓迫人類殘害人類的行爲；國家唯一的基礎是武力，然武力是不可靠的，所以國家也是不穩固的，因爲武力最強的，終敵不過二個以上較弱的國家聯合起來的武力，假使武力可以奠國家永遠的基礎，斯巴達何以滅亡，羅馬何以滅亡，拿破崙何以滅亡，最近威廉二世何以倒塌？國家主義現在與人類生活的實際不相適合：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人已經是世界的公民；只有政治生活還是國家性的，其原因就是由於國家是藉法律的概念來護持的，法律概念落後，而人類實際生活向前，所以國家還是包辦了人羣的政治生活，把人羣

阻止着而不得前進。國家主義者以爲人性是不可改變的；戰爭是人類的天性，所以須得軍國主義來發展勇的本能和自衛的本能。世界主義者就說：人性是可以改變的，否則古代原人的野蠻，何以今人不同他一樣？如果勇是人的本能，自衛是本能，黷武主義何必怕它在和平世界衰歇下去，難道你又承認人性是可改的麼？國家主義者以爲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到人都變成安琪兒的時代；但是人性既不能改，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主義者說：死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服了毒藥；但是服毒藥是可避免的。同樣地，戰爭不是人性的結果，是國家的制度存在而強迫人性向那一方面去工作的結果，換言之，是朝着相互仇視的國家制度，而這種國家制度是暫時強定的，是過渡的，不是永久適當的，更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國家鬥爭的觀念，爲民族互助的觀念所替代，戰爭便不需要，和平便是需要，只是一轉移間的事，而人性絲毫不必有什麼變動。美洲十三州的殖民地，本來是互相突衝的，但是合衆國造起來之後，和平就在新的環境當中實現出來，而並沒有經過人性改造的必要。許多不同血統不同言語不同宗教的民族合在一起是可能的；強定國家的疆域，叫它斷絕交通是不可能的；商業

和財政純是世界性的；對外投資，得利的是少數資本家而不是資本家同國的一般人民，然而在國家制度底下，一般人民却被迫要做投資者的後盾，甚至替他犧牲：這就足以使一般人懷疑國家主義的實在價值。像此類的理論，歸納派的世界主義者是滔滔不竭的，我們也引述不盡。他們比以前各派世界主義者都優長的地方，在於不是呆笨的認定世界主義為一種最高目的，但只認定它是自然的，合理的，而且是人類其他種種目的和活動的，必然結果。他們的理論，多批評，少建設；長處在前者，短處在後者。因此，我們可以說他們只見到世界主義的可能，而不能計畫其必能。除了此一派而外，還有無政府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世界主義者，讓我們留待後面來批評。

我們總核以上各派的世界主義者，曉得他們有幾個共同點：第一，掙擊戰爭；第二，反抗現在的國家組織；第三，除正統的經濟學派的世界主義外，大多數抨擊資本制度。而這三點，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我們前面所分析各種含義的帝國主義。這是世界主義者對現在的批評。在理想的未來建設方面，他們抽象的概念，也有幾點可以肯定的：第一個總概念是



希望無種界無國界無戰爭無階級衝突的世界之實現，第二個概念是各部分的民族都有民主自治的組織，第三個概念是各民族的民主自治之上，一種世界的政治總組織終於非有不可，無論這種組織的方式如何。我們把這種積極的概念和消極的批評總括起來說，世界主義的理想是和三民主義的理想相同的；所不同的，就是世界主義只有理想，而其實行的方法，可謂毫無系統，若三民主義，則由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同時並行的民族主義，就是實現世界主義的有系統有計畫的方法。中山先生說：『我門受屈的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因為『世界主義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如果丟棄民族主義，去講世界主義，……那便是根本推翻。』這段話，就把實行世界主義的方法扼要說明出來了。因為世界主義如果不從民族主義做去，則世界主義終歸是理想，而不能實行；要實行，就要了解世界主義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根源，而從根源上着手去實行，才能達到世界主義的理想。所謂從實行民族主義着手，就是要先把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

恢復。要把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便須內部人民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族才是自由，才能同其他民族平等。如果不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這種民族便是受屈的民族，所以孫先生才說：『受屈的民族，』是不配講世界主義的。』換言之，要做到了個個民族不是受屈的民族，世界主義才能真實地實現。所謂個個民族不受屈辱，即世界各民族的平等，亦即實行人民有四權而政府有五權的民權主義之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亦即實行滿足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的民生主義之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這樣做到全世界各民族平等的方法，就是實現世界主義的方法。

## 六、無政府主義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

中山先生說：『民權主義，即人人平等；』又說：『民權主義，就是政治爲人民所共管。』把先生的意思扼要地說，就是要一個民族以內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推而至於全世界以內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所以民權主義的起點，是以民族爲對象，而其最後目的，

是以全人類爲對象。無政府主義，是全人類爲對象的無治主義，所以它的目的，和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相同的。

無政府主義中，有個人的無政府主義和共產的無政府主義兩派；英國維廉哥德溫 William Godwin 法國蒲魯東 Pierre Joseph Proudhon、美國波士頓無政府主義者和德國喜密次 Caspar Schmidt 等屬於前者；巴枯寧 Michel Bakunin 和克魯泡金 Kropotkin 屬於後者。我們且先將兩派的思想引述一下

哥德溫以爲我們個人的無上上道是全體的幸福。以什麼爲全體的幸福標準呢？『由幸福的本質而定，即由心的本質而定。』因此，『幸福是不變的，與人類尙爲人類的期間，同其繼續性。』他以爲人類除了極少數人，因天授的弱點和愚昧，不能作理性的生活外，大多數人都能自處其最善的幸福生活。所以他說：『每一個人，都應該是聰明到能夠自治的，而不需任何強制的約束和干涉；因爲政府，甚至是最優良的，也是一種壞東西，所以我們就應該極力減少對於它的需要，直到維持社會和平的可能限度爲止。』在我們個人一方面，『義

務是行爲的方式，而爲全體的利益，規定個人能力之最善的適用。」在社會一方面，哥德溫否認法律，否認國家；但在現有社會裏，因爲少數的愚昧和弱點還存在，以小社會組織之連合，防制罪犯，並抵禦外侮，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機關，到了以理服人而不以力制人的時候，也可以消滅。

哥德溫的出發點是個人的幸福，和邊沁的思想的出發點，同帶英國政治理想的采色，這是很顯明的。蒲魯東則和盧梭有相同的一點，以爲人是天然平等的，人的權利就寓於天然的平等之中。但是他認定每人的權利，只有各人自享其勞力的結果，平等的實際就在此，舍此而外，人就沒有其他所謂權利的，這就與盧梭分道而馳了。他由這一個根本思想所生的推論，就是工銀勞動者甚至在已得工資之後，對於生產品，是還有一種自然的財產權存在的。所以地主和資本家於生產品是沒有份的，有了份便是掠奪，因此，他所下的定義，就是『財產即劫掠。』他把人的一切活動納在產業當中，所以無政府制度，是將政治的職務吸收於產業的職務之中，社會的秩序，順着單純職務之實施，而自然保持。到了這時期，各人可以說：

『我是我的主權者。』他闡發哥德溫的理論，而分析的力量和辯論的才具，爲哥德溫之所不及。人是天然的有社會性的。這和亞理斯多德所說的意思相同。社會性於何表現呢？於三種程度表現的：第一，人與人的同情心；第二，人與人之間人格平等的互相承認；第三，人同人之間的待遇性，起於各人聰明才力之不同，而其表現，則聰明才力較優者能以慈悲待人，而以犧牲待己，聰明才力較小者能以恩誼敬意相報。三種不同程度的社會性，於合理的社會生活是極需要的。但各人的人格平等，被財產制度所毀，而政府的基礎，即建築在財產制度之上。所以蒲魯東反對財產制，尤反對政府制度，最反對的君主專制主義。他分別無政府主義與民主的政治和共產的政治，他說：『共產主義，是以總體統治總體；民主主義，是以各人統治總體；無政府主義，是各人統治各人。』依他的批評，自從財產制度發生，人就不能不向平等裏面找尋人格；自從政府制度發生，社會就不能不向無政府主義裏面找尋秩序。因此，他就憤激地說：『安那其——就是各人頭上不戴什麼主人，不戴什麼統治者——這是我們一天快似一天要眼見實現的政府的體制，只是人們頭上慣於奉戴一個人做了主人，把他一

人的意志奉爲法律，便反而把安那其當作騷亂的代名，登峯造極的混沌。」不是的，無政府是唯—真正的自治政體。在無政府的社會裏面，人只要循着科學的實在真理爲社會生活的指南針，而並不須遵從任何統治者的意志。人民處置其公共問題，應該像社員處理其社務，而一切都取決於科學和統計。所謂政府，不過產業管理的選員。所以產業的管理權，應該在共同勞動於其產業全員的手中，無政府主義之特殊目的可以說是以人民直接政治，替代了專制政治和代議政治。這樣的組織，其共同生活，自然非分立爲小團體不可。但是從其小團體的意思，而爲團體間的同盟，也是自然的結果。所以蒲魯東的結論是：唯一公道而真實的社會組織，是自由集合，自由——其唯一目的在保持生產的工具平等和交易的價值均等。政治是研究自由的科學。最完善的社會，是秩序和無政府並存的社會。」

個人主義的無政府理想，蒲魯東尙非極端派的代表。代表極端個人主義的要算德國喜密次。他著有『唯一者與其所有』*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發表他的極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他說：『人類不帶有什麼使命，沒有固定的事業和職業，恰如動植物不帶有什

麼神命一樣。人類沒有使命，但只有力。力是於其所存在，表現自己。『蒲魯東的個人主義，尚容許真理，權利，自由，人道等等存在，喜密次的個人主義就連一切都排除了。只看他更進一步的說：『沒有存立於我的面前使我服從的真理，以及權利，自由，人道。』若果因人類是人，有非捧獻其生命與力的一個真理存在，那麼，人類便是服從一種規則，支配，法律的奴役。』因為『你如果信真理，你便是不信自己，你是一種奴隸，奉教者。祇有你是真理，不，你還在真理以上，真理在你之前受裁判的。』他以為人類是祇為自己的幸福而建設社會的生活，對於各人無上至道，是各自的幸福。他說：『我愛人，不止愛個人，而且愛各人。但是我愛他們，是以利己主義 *Egoism* 的意識去愛。我愛他們，是於我成為幸福的緣故。』他的主張走到這樣極端，真可以說得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不如此，他差不多要併中國的楊朱莊周為一談！

但是他究竟還要肯定社會的生活，不問他的出發點如何。拿他比較巴枯寧等的共產無政府主義，則他是標揭利己主義的意識的，而巴枯寧和克魯泡金，於肯定社會生活外，還進一

步主張自由互助的社會。在這一個基點上，巴枯寧等不但自別於喜密次，而且自別於一般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八六八年巴枯寧在瑞士創立『國際社會民主同盟』，其黨綱大略是：（一）我同盟宣言自己是無神論者，希望廢止一切宗教，希望信仰由科學而消滅，神之正義由人之正義而消滅；（二）希望廢止政略的，宗教的，法律的，以及資產階級的一切制度之結婚；（三）我同盟在萬般事物上，澈頭澈尾廢止階級，同時各個人無論男女皆得政治經濟的社會的平等；（四）要求禁止遺產相續制，而將來各人對於其勞動之結果，同等享有各個人的利益；（五）要求土地，勞動所用的機械，其他一切的資本，都成爲全社會的共有，只是勞動者，即耕作的和製作的團體，始得使用之。巴枯寧對於具體的主張，除此而外，幾不多見；其原因就是他的實際活動，多於文字的宣傳，而且實際活動的結果，牢獄生活多於自由的生

活。幸而他的思想，給他著名的門徒克魯泡金闡發得較詳盡。他們倆的中心理想是自由互助的社會，而克魯泡金尤其努力提倡互助。巴枯寧認定團體不應該社會或政治的強制，而要自由任意的集合，克魯泡金就本着一個理想，而設想從互助的實行上求其實現的方法。在他



所著『農場，工廠，和製作所』及『麵包之掠奪』，克魯泡金努力證明的，就是如何可以使各人做最快樂的工作而全體獲得最適意的生活需要品。他說：『革命不只是政治組織的破壞，而是包含人類知識之覺醒，發明的精神之激進的；要放射新科學的新曙光；與其說制度的革命，毋寧說人心的革命。』所以他認為如果生產能夠更科學一點，更組織好一點，各人只須做時間比較短少的適意勞動，就足夠全社會的人口得着安適的自給生活。如果文化和進步要與平等共存，那麼，平等就不應該包容各人每日為區區一點生活需要品而作長時間的苦工。人類沒有閑空從科學和美學中求進步，則科學和美學都要絕滅，而一切進步都不可能。所以克魯泡金以為只要人的生產力的量和質，得着科學的新方法幫助，必能大大的增加；只要各人的生產力的量和質增加，則無政府主義便不致視為烏託邦了。對於工銀制，克魯泡金主張根本廢除，而其理由就和許多共產主義者有別。因為他們以為各人的勞動，應該基於團體實際的需要，而得報酬，纔是合理。克魯泡金就更進一步說：無政府的社會，是沒有勞動之必要和責任的，而全社會各人都平均享有一般事物。沒有作工的責任，沒有報酬，但是工作却人

人願做。因爲克魯泡金所見的無政府的社會當中，實際上人人都寧肯勞動而不肯曠閑的，爲的是那時候的勞動，既非過分的，又非奴役的，且亦非如工業主義所產生的過分專門化的職業之限於一種特殊的工作，但各人不過每日作幾小時勞動的活動，舒展舒展各人的自然創造衝動罷了。這種勞動，是快適的，各人幾乎不覺着是勞動。沒有絲毫的強制性，沒有法律，沒有政府使用任何強制力。一切社會的行動，皆基於人人普遍的同志，而非基於多數人的強迫，不，連最小數受強迫的人也沒有。由此種見地，克魯泡金不贊同馬克斯派的權力集中主義和集產主義，是無足怪的。但是他比馬克斯派物質幸福主義，還進一步爲經濟的平等，他說：『我和勞動者及其同情者親密交際之時，便看見他們尊重其個人利益，不如尊重其人格的自由之更真切。去今十五年前，他們爲交換其物質的利益，想賣自己的人格自由於統治者，——不問統治者是什麼，便是帝王，也是想賣，——現在可沒有這樣事了。『人格自由』是馬克斯派著述中不容易遇見的，有時還要拚命的反對。

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幾於水火不相容，這是許多人都曉得的。他們非難無政府

主義，大抵不外兩點：（一）以之爲個人主義；（二）以爲是空想。其實除喜密次一派極端個人主義特別揭醜利己的意識之外，如巴枯寧，克魯泡金，何嘗否認社會？他們所主張的自由互助的社會，這理想是無論如何看法，不能說它有惡意的。本來從人類之自治的生活方面看，人是以個人而獨立地存在的；而從協同的方面看，則人不能以個人而獨立生存。從自治獨立的方面說，有個人主義，則其短處在於以破片而夢想全體；從相互的方面說，有社會主義，則生出只知有社會不知有個人，和既知有社會亦知有個人的兩條理路。如克魯泡金一派，與其說它是『共產的無政府主義』，無寧說它是『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或『無政府的社會主義』。所以拿個人主義一點來抹盡無政府主義，實在過於單簡。

社會主義者如英國的哈因德曼，德國的李布克內西，都以無政府主義爲狂暴的個人主義，極端的和它反對，但是列寧一派自命爲馬克斯的正統的，却不如是，列寧的『國家和革命』，『舉馬克斯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差別』，大要有三點。其一，兩者雖同一期待國家和政治權力的廢止，惟馬克斯主義主張以社會革命最後的結果而國家死亡，無政府主義則立刻要求其

廢止。其二，馬克斯主義於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之後，還代以無產階級的機關，無政府主義祇要破壞國家，不言以何者爲代。其三，無政府主義否認馬克斯派於所謂過渡期間的利用現在國家權力爲無產階級準備革命以及革命的獨裁。簡括地說，兩派的爭點，並非理想的差異，而是方法的差異。馬克斯主義不欲陷於無政府的空想，所以不贊同其主張。但是兩派方法上的差異，所引起的劇烈爭辯，完全是主張強權與否的問題，恩格斯稱蒲魯東一派爲排權主義者，說他們反對任何一種威權，任何一種秩序，所以他駁詰他們說：『試看工廠，鐵路，輪船，就應該明白，凡是以使用機械及多數人之規律的共同作業爲基礎的複雜事務，非有種種權威和勢力，便不能運用適宜。如我舉出這種證據，則排權主義者只能這樣作答：「不錯，這裏不是爲的威權，我們的代表，乃是給予他以一種使命。」這種人以爲名義既變，事實也就不同。』如果將來社會的組織，僅僅是產業條件不可避的制限以內，許有權威，那麼他們可以諒解。但是他們關於一切必要權威的事實，總沒有看見。他們只對於威權一個名詞，做夢也是反對。』恩格斯挾着階級意識又說：『排權主義的先生們曾見過革命的事嗎？革

命，無疑地是最要威權的。革命，是人民的一部，用着鎗砲，即用着最有威權的手段，強制別一部人民意志的行動。得勝的一部，須掌握政權，予反對者以恐怖，剝奪其權利。假使巴黎公社不是靠着武裝的民衆，恐怕立刻維持不住。我們不是還把不能充分使用這種權威，去非難巴黎公社的麼？排權主義者如果不懂這些，就只有陷於混亂；懂了還要辯，那末便反叛了革命的階級，總之，在這兩種情況之下，他們總替反動的利益努力而已。」這是列寧一派人所認爲攻擊無政府主義最適愜的理論，不是其他社會民主黨所能拿得出的。列寧說：「社會民主黨向來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批難，只是說：『我們真要國家，無政府主義者不然，』這自然使有革命思想的勞動者聞而憎厭。但是我們稍微勘察一下，恩格斯究竟是一面之詞。他說無政府主義『反對任何一種秩序，』已說得過分。就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派的蒲魯東，尙且說過『無政府主義與秩序並存，』何況主張無政府的社會主義的克魯泡金呢？至於將工廠，鐵路，輪船的管理事權，比例一切權威，真是『方寸之木使高於岑樓！』馬克斯斯和恩格的辯證唯物論，最歡迎科學家『由量變質』的名理，如上所述恩格斯的權力論，把蒲魯東

一派的『使命不是威權』只當作是名義上的變換，直是把質和量一概抹煞，而不必用着分析比較。他說無政府主義者做夢也記得反對威權，難道他自己却是做夢也記得主張威權嗎？

第一國際勞動協會分裂的原因，就是關於將來社會的政治組織問題的意見不合，其問題是革命之後，應該維持絕對的中央政權呢，抑應該廢止呢？在馬克斯指導下的中央統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主張以綜合的財產與勞動生產組織而成立的社會主義時代，沒有萬能的中央政權，就到底不能建設維持。權力的主體，任用何種名稱，在所不問，但是必須要有最後處分萬般事件的權能。以巴枯寧爲領袖的無政府主義者就說：這樣的組織，乃是重演古代專制制度與奴隸制度，而更加以一種極端的形體。巴枯寧派，根本上固是主張團體自由任意的集合的，當然不贊同馬克斯派的權力主張。馬克斯派又說：這是維持自由競爭，而使之更加劇烈，因而陷此世界於最惡的紛亂中。所以巴枯寧派常詬厲馬克斯派爲國家主義者，爲羨權的市儈，而馬克斯派則說蒲魯東是小商人，又說無政府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

我們且不必管這兩派的互相詬厲，可是因馬克斯派的批評無政府主義，我們也就可以拿

三民主義和它比較，雖然詳細的討論只能留在後面來說。巴枯寧和克魯泡金根本上着重平等的原則，以爲自由是要從平等上求的，所謂『人不能不向平等裏面找尋人格的自由，』這話完全和孫中山先生『如果不得平等便無從實現自由』的思想相同。蒲魯東對於社會性的分析，三民主義也都承認。我們如果把克魯泡金所描繪無政府社會中的人生，認識其個個各願依其創造的衝動和能力而勞動的境界，再看中山先生所說：『人人當以服務爲目的，而不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造千百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爲平等了，』那就應該曉得三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平等精義如何的相通了。這是第一點。無政府主義以爲自由須靠平等去把它解放出來，解放了之後，自由便是有兩面的意義：從個人一面看，就如哥德溫所說，自由，便是各人的聰明，至少能夠自治；從社會協助一面看，自治，便成了如蒲魯東所說的人民的直接政治，和小團體的自由集合。也使

成了如巴枯寧所說，澈頭澈尾沒有階級的差分，沒有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再加之以生產工具如土地資本之爲社會所共有，但爲直接生產者所使用，則此種理想之與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復有何別呢？這是第二點。經濟的組織，無政府主義所要求的是廢除一切壓迫，甚至工作本身的壓迫也要盡力除去，使勞動時不覺着是勞動。爲免除貧富的壓迫，土地和資本是要共有的。在這一點上，無政府主義如巴枯寧和克魯泡金，便與共產主義及三民主義同其理想，而此一理想的根本來由，都是由於看到私有資本的發達，變爲壓迫人的專制威權。這是第三點。由這一點所引出的政治問題，便生出社會主義的正統派和無政府主義的吵鬧。社會主義的正統派以爲如果國家是唯一的資本所有者，則個人便可自由。無政府主義就說這不過是重演古代專制制度，把人類變做奴役，遂發生我們前面所引述過的爭辯。但是要曉得，歷史的經驗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就是，土地能壓迫人，資本能壓迫人，威權也能壓迫人，以資本歸諸國家所有，則資本和威權併爲一體，其壓迫人將尤甚。因此，無政府主義反對正統派社會主義的威權論，實不僅僅是反對現有國家的威權，而且是反對資本和國家併爲一體的那種最強大



的威權。正唯如此，我們就要公認無政府主義之反對，其理由是十二萬分的充足。但是國家的威權，一味否認它，是否認不了的。要設出方法來，把它節制，把它分開，分開了要把它向適當的地方配置住，使它不爲少數人或階級所可得而挾制以壓迫人，纔是最善的辦法。三民主義所以優於無政府主義，就在於不落到感情作用的空口否認國家權力的論調上去，而從實際上打算權力的分配。權力的分配，就要把政權和治權分開，再把政權分開並治權分開。政權直接在人民手裏，這就是無政府主義所主張的直接自治。但是如何直接自治，無政府主義者除以自由集合的小團體爲理想外，就沒有具體答案。三民主義就有了具體答案：直接民權，是要分爲選舉，創制，複決，罷官的四種。這四個民權，如孫中山先生自己所說的，「就是四個放水制，或是四個接電鈕，我們有了放水制，便可直接管理自來水；有了接電鈕，便可直接管理電流；有了四個民權，便可直接管理國家。」我們更引申說：直接管理了國家，便不怕國家專橫，因爲國家的政權分散在人民手裏，國家就不能爲暴，而人民就又能自治。無政府主義的目的，原亦要求廢除國家的權力而同時各人又能自治的；但是於無政府主義

就只有這個要求，而於三民主義則有滿足這個要求的方法，豈不是三民主義明明優於無政府主義麼？這是三民主義不同於無政府主義的第一點。無政府主義和各派的社會主義，從來有一個通病，就是往往把國家和政府兩個名詞的意義混爲一談。這不必引述旁的證據，只就無政府主義本身說，它的總目標是不要國家的，但是通常都只當它不要國家又不要政府，其實甚至個人主義的蒲魯東，也說『將政治的職務吸收於產業的職務之中，』就明明還不否認政治的職務之存在，何況講自由互助社會的克魯泡金，哪裏還離得掉政府，不過它是另具一種形式罷了。我們既然將國家和政府分別清楚，則無政府主義所要求廢止國家的一個問題，也就容易解決。國家是什麼？如果把政府撇開，它就沒有什麼具體條件。土地是國家麼？人民是國家麼？當然不是，雖然一般政治學者亦往往把它混亂起來。着實說，國家是抽象的，除了政權，它就沒有意義。中山先生把政權和治權分開，便是把國家和政府也分開了。所以依權能分別的原則，國家的政權給予人民管理，政府的治權給予五個有能的機關替人民作事，那麼，人民就是權的管理者，國家便退處於無權的地位，換言之，國家本身就沒有東西了。這

豈不是實現了無政府主義廢止國家的最好方法麼？因為到了國家本身沒有意義的時候，廢止不廢止，簡直是不成問題的事。而這時候，所剩下來的都是有能的而替人民作事的五個政府機關。不但如此，它們亦直可以說是人民自己作事的自治機關。爲什麼呢？因爲這五個有能的機關，其職務是人民所分配的，其人員是人民的考試機關所挑選的，其執行事務所經的程序，是要受人民的監督的。簡括地說，它們是人民的公僕，但却不是人民的奴隸，是人民的五官，但却不是人民的機械。這樣，甚至於在做人民公僕的，也是有其自由的人格，和其他的社會份子，全體都在自由的人格上來爲公共幸福努力，這豈不是連無政府主義對於人格自由的理想也都能實現麼？所以在政治問題一方，無政府主義只有理想，無辦法，三民主義則不但有理想，而且有辦法，這是三民主義不同於無政府主義的第二點。總合以前的三點，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是與三民主義同；總合以後的兩點，單是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就比無政府主義爲優，因爲民權主義實現大同的方法，是無政府主義之所無。我所以說，無政府主義不過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纔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

## 七、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

共產主義，從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到歐文 Robert Owen 和聖西門 Saint-Simon 一派，都是烏託邦的理論，直到馬克斯，纔是專從歷史的行程，發見共產的社會之實現，是資本制度自己造成的趨勢所指向的必然結果。馬克斯自己的學說，可以總括做三部分，即唯物史觀，資本集中，和階級鬥爭。他自命是用科學方法，持客觀的態度，把歷史的定律，資本制度發展的行程，和其最終趨向共產社會的變遷，一一實寫出來。所以，受物質條件支配的歷史是好是壞，資本制度是好是壞，共產社會是好是壞，馬克斯都不下主觀的判斷。他自己很知道，如果下了主觀的判斷，便犯了烏託邦主義者的毛病，而他平日對當代社會主義所下刻毒的譏評，就要變成打還自己的嘴巴了。但他雖不肯自落烏託邦派的恆蹊，却自命要做個預言家。所以他費了一生的精力，用實寫和分析的方法，發表他的全部著作。他的理論，入手就先證明一切社會現象，都是經濟制度所決定，所謂政治，法律，宗教，文學，哲學，美術，都不

過是經濟組織的產物。經濟制度起了變化，纔決定歷史上所有的一切政治變動或社會變動。過去封建的生產制度之崩壞和資本的生產制度之代興，引起中產階級對封建制度的革命。同樣的，現在的資本生產制度孕育了未來崩敗的條件，等到這些條件成熟，共產制度就也要代之而興。在共產制度未成熟之前的過渡期間，勞動階級必起而對資本階級革命，其方式就是與歷史中同形不同實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到階級專政成了功，由無產階級的勝利就自然會到階級之消滅，由無產階級的國家集產，就自然會到社會共產，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自然會到國家的消滅。這是馬克斯的整個思想之總體。這些思想，在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年底為德國共產同盟所草的宣言，就已完全公表過。直到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距共產宣言發表後二十年，他的最重要著作，第一卷資本論，纔現露於世。再經二三十年，第二卷（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和第三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資本論纔先後發表，而第三卷還是恩格斯續成的。我們只要仔細追尋他的思想生活的行程，就可以說馬克斯並不是胸中全然無主觀，不過努力搜求歷史的客觀事實，把主觀鍊成一種『科學的』鐵律，而他乃以預言家的態度，反

覆指證社會勢力必然的運命，就自然使勞動階級狂熱地生恨，資產階級也倉皇無主地發抖。馬克斯的煽動方法在此，而其煽動所以生出了大力量亦在此。

但是馬克斯學說的本身，有歷史的事實作證的部分，不過是限於歐洲一隅的觀察，沒有事實作證的部分，即關於共產社會實現的部分，還只是預言。預言就不是科學的，而是意度的。所以說到馬克斯的共產主義，還是不離烏託邦的本質，並沒有科學的實在和具體的方法。

然而從馬克斯主義所生出革命運動來說，馬克斯的革命力量，全靠他的預言。因為許多人相信他的預言是不錯的，所以大家朝着他所預言的目標而努力奮鬥。於是問題就在：如果他的預言不幸錯誤了呢？根據他種種預言去奮鬥的人們，不就要白費力麼？但是他的預言究竟錯了沒有呢？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裏，就證明了馬克斯不但預言錯了，連他所特以為預言的根本思想，即物質是歷史的中心這個思想，也完全錯了。先生說：『人類要求解決生存問題，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馬克思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以

階級戰爭爲因，社會進化爲果。』其實『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足見社會進化是因，階級戰爭是果，而社會進化的因，又是人類求生存的果，人類因爲不能生存，其結果便起戰爭，所以馬克斯倒果爲因，『祇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因，所以馬克斯祇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因爲馬克斯倒果爲因，所以他預料世界勞動階級必定要不分國界種界的聯合起來，這種預言，到了歐戰便事實上證明其錯誤。推究他的預言失敗的原因，就是由於他不知道民族主義，是事實上不能被階級鬥爭所打破的。民族主義是縱的力量，階級鬥爭，不過是民族以內的民生問題起了病症的結果，是一部分的橫的力量：馬克斯研究歷史，連民族這一種偉大的力量都沒有見到，所以弄到歐戰前後凡相信馬克斯預言的社會主義者，便起內訌，陷於分裂。因爲馬克斯倒果爲因，所以他預料資本發達到極點的國家，老早應該消滅的時期，但是從他至今有了七八十年，資本制度不但還沒有消滅，而且發達到極點的國家也沒有起革命，倒是生產落後的俄國，反而共產革命在政治方面成了功，可見他這預言又錯了。他預料資本集中的方式

，是互相併吞，城市資本如此，農村資本也是如此；預料資本要能夠多得盈餘價值，便須減少工人的工資，增加工作的時間，抬高出品的價格；預料資本家先銷滅，商人才能夠銷滅；預料工業只有大資本有好出產就可以賺錢；這種預言，都被經濟的事實證明了大失敗。這些預言失敗的原因，孫先生都已經解釋過，我不必重費篇幅來引述。但是先生却有一句重要的話，就是：『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用功幾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一點都沒有料到。』所以，我們說他的革命力量，全靠他的預言，預言錯了，他就再沒有領導革命的力量。

俄國列寧派自命是祖述馬克斯，但是俄國革命是靠依照馬克斯的預言成功的呢，抑是違反馬克斯的預言成功的呢？依馬克斯的論斷，要資本生產制發達到某種形式中，它的產業關係變成了生產者的桎梏，而它所孕育的<sub>二</sub>新生產制之物質條件成熟，於是就到了社會革命的時期。俄國的資本制度，不但<sub>二</sub>說發達到馬克斯的名理所斷定的那種時期，且亦<sub>二</sub>說不上和歐美各資本國家現有的地步比擬，難道俄國革命是馬克斯所說的社會革命麼？差得遠啊！而



現在事實上，列寧之所以成功，一是由於利用俄國人民反抗君主專制的心理，一是由於在馬克斯『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之外，加上一個『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而尤其重要的，就是由於協約國派兵壓迫俄國東境，封鎖它的西岸，激起俄國民族的精神緊張，可知列寧的革命，是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事實助其成功，何嘗是社會革命的成功呢？列寧固自知他的成功和馬克斯主義相差太遠，所以取得政權之際，立即施行土地國有禁止私人買賣諸種政策。甚至土地國有，實際上祇是實行了克倫斯基政府原有土地農有的口號，任農民分得貴族的土地，尙非列寧新創的政策。然而這也還說得像煞是共產主義的開始，都不管他。可是俄國畢竟是生產落後的國家，於施行共產主義的經濟的條件和工具，缺乏得太利害，所以不久就改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從共產主義的觀點，是倒退了多多少步，但從俄國經濟情形的觀點，是用國家的力量，一方面限制私人資本的發展，一方面扶植合作事業的擴大，而同時又是政府直接辦理生產和分配。所以就俄國的生產落後的地位說，新經濟政策可以說是一種俄國的民生主義之初步，因為它用了孫中山先生一點民生主義的意思，而還沒

有用到民生主義的方法。所以我們這樣檢查俄國革命的事實，在經濟的立場觀察，完全不是馬克斯主義的革命，倒是事實上暗合了我們三民主義的革命的一點意思。

但是列寧的革命既然沒有適合於馬克斯的經濟理論，難道就絲毫與馬克斯主義不相干麼？也不是的。如果因為經濟方面違反了馬克斯主義，就斷定列寧一派人的革命完全與馬克斯的理論絕了因緣，這却於事實和邏輯都不容許的。本來馬克斯的革命理論亦可大別為兩部分，即除了單純經濟的理論外，還有政治的理論。前面敘述他的全部思想概要時，我們已經提及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一點。馬克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以階級鬥爭為基點的，而其講階級鬥爭，也就完全是採取客觀的態度，專從經濟關係上說話。到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馬克斯就只說是那時候無產階級自己就是統治者，可是資本階級既已經過革命而歸於銷滅，那麼就是事實上沒有階級的差別，無階級差別，也就無國家了。講到這一點，馬克斯就沒有下文。換言之，就是馬克斯到了無國家之後，他的意思就和無政府主義相同了。但是馬克斯之信徒，却怕無政府主義者譏笑他們的創始祖在最終的目的上投降了無政府主義，於是

就設出方法來替馬克斯彌補漏洞。德國的考茨基就摘取馬克斯的共產宣言上一句『把無產階級提高到統治階級的地位，去奪取為德謨克拉西而戰的勝利』的話，而加以解釋，說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目的，在求德謨克拉西。但是列寧就說這樣的解釋，愈解釋就愈糟，因為德謨克拉西的意思是包括全民，這便失却了階級革命的立腳點。所以列寧在他的『國家與革命』一書裏，就老實不客氣的說：國家的統治權是一個階級拿來壓迫他一階級的；所以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是成了功就不要國家，却是要拿着國家來鎮壓反動。這便和恩格斯所說的同一意義：『革命，是人民的一部，用着鎗砲，即用着最有威權的手段，強制別一部人民的意志和行動，得勝利的一部，須掌握政權，予反對者以恐怖，制奪其權利。』據這樣說來，考茨基固然替馬克斯不但不會補好漏洞而且多開了一個漏洞，可是列寧和恩格斯又將馬克斯關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扉以內，永遠不讓他向共產主義的路徑而去。史丹林下了列寧主義的定義，就更把馬克思主義截成兩斷，留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一段，而拋棄共產主義的那一段，截取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段，就放在列寧主義裏面做中心，所以纔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

論與策略，嚴格言之，即無產階級專制的理論與策略。」可見俄國的列寧一派，和馬克斯主義的因緣，僅僅乎在於截取了無產階級專制這一點而已。

就以上的分析，歸納下來，便有兩點的結論。就俄國說，列寧的革命成功，和馬克斯的預言無關，換言之，它就不是社會革命，而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成了功馬克斯的主義却失敗，這是第一點。就共產主義說，列寧派只截留了馬克斯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拋却了馬克斯的共產主義，階級專政成了功，共產主義却失敗，這是第二點。因為第二點，所以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克魯泡金的遺書就說：『現在蘇俄的革命，儘着殘虐，以其狂暴，殺無數生命。不會設想破壞什麼？向何處行？而祇一味破壞。』馬克斯和列寧主義者，儘管說，『只反對二十四小時內的拋棄強權；』儘管說：『共產主義社會之最高形態，也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然而行在蘇俄的，自始至終，還祇是一個無產階級專制的理論和策論，把人道，正義，自由，平等，互助，一切人類社會的機能，拉雜摧毀，而蘇俄革命後的政治，就完全證實了巴枯寧說的，『重演古代專制制度與奴隸制度，而更加以一種極端的形體！』

俄國雖然把馬克斯主義關於共產的理想截斷，但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又怎樣呢？我們研究馬克斯主義的本身，曉得它到了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在政治的最高目的上是和無政府主義相同，在經濟的最高目的上是和一般的共產主義相同。馬克斯關於共產的理想，多少言語，歸納下來只說了『廢除私有財產』一句話，而其正面的說法，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與無政府的共產主義實在毫無二致。可是問題就從此生了，這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理想，究竟和原人時代的共產制度相同不相同呢？換言之，我們所希望的共產主義，實行起來，是退回到原人時代的共產社會去呢，抑是朝着一種新共產社會前進呢？這問題如果不辨清楚，那麼，共產主義是進化的還是開倒車的，就無從確定而且共產主義的意義也就永遠只是一種恍惚渺茫的空想。所以這問題不弄清楚。就是實行共產主義的大障礙。孫中山先生曾有一個精確的觀察，依他的觀察：金錢發生，打破了原始共產社會；有金錢才有自由買賣，才生商家；可是機器發明，有機器的人，駕乎商家之上，便打破了商家；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便生出貧富相懸的兩個階級，便生出階級鬥爭；這種鬥爭必要到新共產時

代，才可以解決。由此可知將來的共產，是由人類競爭一步一步向前進所達到的共產，而非退回原始時代的共產。到這種新共產社會的時代，人同人爭才可以解決。所以孫先生說：『所謂人與人爭，究竟是爭甚麼呢？就是爭麵包，爭飯碗。到了共產時代，大家都有麵包和飯吃，便不至於爭，便可以免去人與人爭，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我們國民黨所提倡的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

共產主義的思想，是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和三民主義所同具的理想，這已經很顯明了。老實說，這一個理想，並不是馬克思所發明，也不是無政府主義和三民主義所發明，乃是人類老早就有了的一個共同理想。但是理想是有了，而方法却未曾有過。所以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裏，就說『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其用意乃在指破共產主義在理想上並不是誰人能夠獨標以自異，要在實行上有適宜的方法，纔能見出革命建設的本領。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在實行上便有兩條總綱，一是平均地權，一是節制資本。這兩個方法，許多人因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有『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依『原則』二字解釋下去，便成了『民生主義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這就絕似依照史丹林解釋列寧主義的理路，可以說成『馬克斯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制的理論，』豈不令人捧腹？其實『原則』二字，乃指民生主義的實行方法上的『總綱』，簡言之，就是『方法。』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不過是實行主義的兩個方法，而不可以總括主義的全體，更不可以代表主義的理論全體。此點既明，則我們歸到本題，就是中山先生看到近代社會問題，都是起於土地和資本，所以先拿出這兩個辦法，一要來打破土地和私有制之發達，一要來打破私有資本制之發達，這直是打中資本主義的要害，使它永遠不能演成吃人的階級鬥爭的形勢。在此一點上，民生主義的方法比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要經過階級鬥爭，實在是有力量得多。因為馬克斯為歐美已經發生的階級形勢所逼，便取妥協的方法，要順着階級鬥爭的趨向，再來想銷滅階級的辦法，中山先生就預先看出階級鬥爭是必有之趨向，所以就不待階級鬥爭事實之來，

就以革命的方法，打斷其來路。所以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論，如果借用列寧派常用的名詞來說，實在是階級的尾巴主義，因為他這個理論是跟着階級鬥爭的現有事實의 腳根來的。民生主義的辦法，却是跑向階級鬥爭的前面去了的。這一點的關係，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辦法不同，隨辦法連帶而起的政治組織的形體也就大異。依馬克斯階級鬥爭的辦法，它必須要經過無產階級專制一個階段，才能再說共產。一到階級專制，就不管它是個人獨裁，階級獨裁，或是共產黨獨裁，歸根揭底總是專制的復古主義。這只可以說是開歷史的倒車，距人類所希望的共產主義更倒退了幾百年。跨上了專制復古的虎背，儘管馬克斯主義在後面狂喊着『趕快向共產主義之路走呀，』這隻饑虎終於是向赤血河邊和白骨堆裏縱步狂奔的。所以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們，如果一定要跳上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虎背，便一定要向腥風血雨之鄉而去，永不回到共產的幸福之路而來。

要是不走死路，走生路，則唯一的生路，就是實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中的兩條方法，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不過是防止社會生出階級鬥爭的病症，還不是培養社會的生理的方法



。所謂培養社會的生理，用什麼方法呢？這也是中山先生已經計畫好了的。先生說：我們單靠預防的方法，是不夠的，還要製造國家的資本。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發展國家實業的門徑有三：第一是鐵路；第二是工業；第三是鑛產。這三種實業都發達，每年三種收入都是很大的。要是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那麼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所以先生就說：『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共產。……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照這樣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止是共產，甚麼事都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要甚麼事都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此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 八、三民主義的世界

我們依以上的觀察，且來下兩個總結論。第一個總結論是：三民主義與世界主義，無政

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最終目的是相同的，在實現目的之方法是不同的。相同目的是什麼呢？總括地說，就是無國界無種界無階級的一個全人類共有共治共享的世界之實現。對於現在的世界，它們所揆擊的目標亦是相同的。換言之，就是揆擊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主義這幾種反革命勢力，而尤一致地揆擊帝國主義。它們對於現在的世界之不滿和對於未來世界的理想，既是相同，在情理上就應該是聯合一致，共同向改革現在和創造未來的目的奮鬥的，但是事實上又何以不然呢？其原因就是由於各種主義的方法不同。方法上的差異，在實行上是一個重要關鍵，其重要實遠過於理想上之差異。譬如十五世紀的時候，歐洲人都是想同東方通商的。意大利所經的路線是由地中海東岸而達波斯再抵印度。達加馬 Da Cama 的路線是出了吉不羅爾托海峽向南航行，繞非洲好望角再向東行而抵印度。哥崙布出了吉不羅爾托海峽就向西航行，而他相信亦可以直抵印度的。他們往東方，目的相同，但是所經的路線不同，結果也就大不同。不同的結果是什麼呢？因哥崙布而發現美洲，因達加馬而完成非洲的發現，兩人所發現的都是新世界，而且所引起的世界大變動也特別重大，只有意大利商人只

知走舊路，不肯闢新路，於是從此失了海上的地位。這一個例子，就證明天下事許多目的相同而方法不同的。其結果也就大差異。因此一例，也就可以曉得目的之實現，於方法之選擇實有重大關係。許多人在政治上往往主張爲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其結果亦往往遭大失敗，也就是一個道理。就世界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理來說，前二者是無完備的實行方法，後者如馬克斯一派，雖提出階級鬥爭和階級專制的方法，然他這方法就如意大利商人通東方，只曉得走舊路，不曉得闢新徑。看到階級鬥爭是現成的，便以爲這是唯一實現共產理想的方法，而不曉得階級鬥爭只是社會的病狀，而不是社會的生理，只是搗了資本主義的亂，却不能造出共產的新世界。三民主義的優點，不但在於目的和其他三個主義相同，而在於所指示的新途徑，不僅可以消滅資本主義，並且可以創造新世界，這是兼達加馬哥倫布航海新路之特點而有之，換言之，就是兼三種主義之長而無其短。依三民主義的方法，不但可以消滅資本主義，不但可以消滅軍國主義，不但可以消滅官僚主義，並且可以實現世界共有共治共享的積極目的。這正如達加馬和哥倫布的新航線，不但可以通東方，並且可以發見新大

陸。因此，我們就問：三民主義所能實在創造的世界是怎樣的呢？這問題的答案，且讓我們下了第二個總結之後，來詳細說明。

第二個總結是：從根本說，三民主義是整個的唯民主義。民族主義，依中山先生的簡語，是民有，民權主義是民治，民生主義是民享。但各個的意義，實皆有三層。民有，只是在民族意義上的民有，而且是在民權和民生的意義上的民有。政治上人民不能自己有權，不得謂之民有。經濟上人民不能自己利用天然的富源，不能自己管理生產分配的條件，也不得謂之民有。民治，不只是在民權意義上的民治，而且是在民族和民生的意義上的民治。換言之，人民要自治，不僅是要有自治其縣，自治其省，自治其國的權，而且要有能力發展其民族所具有的特點，如語言科學美術文學哲學優種學等，都要能夠自己創造，自己發展，始得謂之民族。同樣地，在民生的意義上，人民要自治，也不只是盲目地要求衣食住行各項需要之滿足，要能夠自己管理生產，自己分配平均，始得謂之民治。至於民生，也不但是人民經濟上的慾望滿足就謂之生，要同時政治清明民族不受壓迫始得謂之生，要全民族以內個個

有擁護民族獨立的能力有發展文化的能力始得謂之生。就人類生存的立場說，求生存就是求生命的充實，不是求生命的空虛；空虛的生命，是不滿足的生命；充實的生命，才是幸福的生命。然而在生命上求充實，要從個人有自治能力個個人有生活要需滿足個個人有民族獨立性表現這幾方面去求。帝國主義在民族間所具的壓迫性，官僚政治和階級的經濟所具的壓迫性，一方面構成壓迫者罪惡之充滿，一方面引起被壓迫者生命之窮乏，二者都是表現自由正義平等互助的空虛。革命的目的，就在於把自由正義平等互助這種種人生的價值來充實民族的生命和個人的生命，而將一切的壓迫性和被壓迫性根本掃盡。要負起這種使命，就當找出現有世界罪惡的根源，和人類所具有的力量，再拿人類的力量，去拔除世界罪惡的根源，重新造起一個充滿生命價值的新世界。但是世界的罪惡的根源是經濟權力之不平和政治權力之不平等，所以在民族以內就有貧富的差別，有軍閥官僚等少數人包攬多數人的政治權力，在國際就有經濟的政治的帝國主義的攻忤兼併。要打這種種不平而使之歸於平，就要充實大多數人和大多數民族的經濟力和政治力，而其努力的方法就要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一齊下手，要

從個人和民族兩方面通盤打算。三民主義所以不是其他破片的狹隘的主義所可比擬，三民主義所以是全人類所當共同努力實現，也是爲此。

在實行方面，三民主義所以優異於其他主義何在呢？三民主義所要創造的世界又是怎樣呢；這問題就歸到兩個論點：其一是政治組織，其二是經濟組織。

這兩個基本論點是相連的。但是爲便於明瞭起見，我們可以先從第一論點入手，以見三民主義何以優異於其他的主義。就三民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目的說，它們都是要做到共有的境界，換言之，就是要實現共產的理想。但是在方法上所發生的關於政治組織的問題，便是：共產是要怎樣一種社會來共呢？無政府主義主張要自由結合的小組織之聯合的社會來共有；馬克斯派共產主義者主張要階級獨裁的國家來共有；三民主義則主張要民主的國家共有。但是三民主義所要的民主國家，不是歐美正統派社會主義者所要的那種民主國家，因爲它們是主張代議制的民主，而三民主義則主張直接的民主，所以馬克斯主義無政府主義可以非難代議制的民主，却不能非難三民主義的民主。無政府主義非難馬克斯主義的國

家權力過於專制，而以小組織之連合的民主爲能，實現真正民主的目的，三民主義的國家則沒有階級專制的毛病，而又能實現無政府主義所懷想的真正民主的理想，所以三民主義在此點上面具有無政府主義所長而無馬克斯主義之所短。馬克斯主義非難無政府主義不用革命手段去推翻現社會，而主張不妥協的革命，三民主義則在此一點上又備具馬克斯主義之所長而無無政府主義之所短。無政府主義非難馬克斯主義者只知奪取威權，不惜犧牲民衆的自由互助平等人道以徇之，而馬克斯主義即非難無政府主義只知厭惡威權，而不知威權乃所以保障新社會於不墮，三民主義於此則兼具兩者之所長而無兩者之所短。總括言之，馬克斯主義着重於破壞現社會的經濟組織，結果則歸宿於絕對的威權論；無政府主義着重於銷滅現社會的政治組織，結果則並維持經濟的自由互助社會的安全之權力而亦無從鞏固；三民主義則兼具二者之長而獨排其短，能使國際和民族兩方政治的和經濟改造，同等注重，多方並進。所以三民主義的實行性，爲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所不及，正非自誇之談。

但是我們現在更具體一點來討論三民主義對於經濟改造的方法。我們既然知道，經濟改

造是要從土地和資本兩方着手的，而其原則便要做到共有的地步。於此我們所要揭破一般人的迷惘的，就是要曉得土地和資本之共有，有的是社會，而對於土地和資本加以工作的還是靠人，其所產生的結果還是給人享受。土地和資本如果徒然給了社會公有，社會不加勞力上去，便是沒有生產。所以共有的問題，實在不僅是土地和資本歸了社會，就算完事，最重要的還有生產力如何組織和生產品如何分配兩個連帶的問題。所以單就共有這一問題，我們也看得出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來，因為：（一）土地和資本歸公有是共有範圍內事；（二）生產力如何組織是共治範圍內事；（三）生產品如何分配是共享範圍內事。現在且分別來說明這三點。

（一）土地和資本要如何共有 依三民主義的觀察，私有土地和資本之所以能成爲壓迫人的工具，在於土地資本權過大。如果把土地和資本的權力方法削平它，那就私有制度的罪惡完全可以銷滅。因此，三民主義對於土地的入手辦法，主張平均地權，對於資本的入手辦法，主張節制資本。依中國尚無外國那種大地主及大資本家的實際情形打算，則平均地權，須由政府規定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己報價，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如果地主以多報少，政



府則照價收買，如果以少報多，政府則照價抽稅，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的改良社會的進步而增加地價，則所增加的利益歸諸地方人民，原主不得歸私有。至於節制資本，則歐美各資本國家，已實行徵收累進稅的辦法，而三民主義以爲這種辦法實在不足以銷滅資本制，所以主張把國家的生產事業，分爲國家經營和個人企業兩種：凡小資本小組織的企業，可以任個人經營，但爲防止其資本積漸擴大故，政府當施行直接徵稅的辦法，將小資本企業所獲的利益百分之幾，歸諸社會；但是凡各地的天然富源及大規模的工商事業，則歸政府經營，而其所得的利益，完全歸諸社會公有。除此之外，政府的經營，還要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的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的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的各種房屋，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政府對於這種種國家經營和個人經營所獲的利益及所抽的賦稅，除用以經營人民衣食住行的四大需要外，還須用以發展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及其他種種的公共需要事業。總括起來，我們只須就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兩種辦法，即可以看出民生主義的根本要義是：（一）將土地權和資本權分散在個人和國家的手裏，既不是集中在國家手裏促

成國家資本主義以壓迫全體人民，也不是集中在少數個人手裏以養成個人資本主義以壓迫多數人民，前者是流於馬克斯的國家資本主義，後者是流於歐美個人資本主義，二者都是人類經濟平等的公敵；（二）由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入手，到社會共產的境界，要靠政府與人民共同協力，凡土地的歲收，山林川澤的利益，皆歸全社會所有，這樣，則所共的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共現在的產是有限，共將來的產纔是無窮；（三）衣食住行各種需要，要政府便宜供給於全體人民，但是同時還要人民都樂於為社會盡義務，使個個人都能盡其勞力，然後社會纔能不斷的以便宜的需要品供給人人。

（二）生產力要如何組織到共治境界 生產力的組織，要以能使人人樂於盡其勞力為標準；要使人人樂於盡其勞力為標準，便須做到全體人民勞動的時間減少而物質的生產額增加，纔是最善方法。但是問題就在：我們能不能做到這一步呢？以前關於這問題的學理有兩派。其一是馬爾塞斯人口論所代表的，此派以為世界人口依幾何的速率增加，而物質的需要品則只依數學的速率增加，所以此派的結論，就是物質的生產額少，人口的增加額多，其結果便

是人口增加額因受物質生產額之制限，而只能增加到物質生產額所能給養的限度。依此派的結論，人類勞力時間減少而希望物質的生產額增加是不可能的。其二是正統派經濟學者引起了一種普遍的議論，以爲人類如果要使生產額超過於生活的需要額，便須大多數人做長時間的苦工，不令留下什麼時間去休息和娛樂，才能辦到。所以這一派的偏見，也認定減少勞動時間而增加生產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兩派的理論，到現在經科學進步的證明，已經失了效用。而且科學進步的力量，一定能夠使人類工作時間減少而生產需要品反而增加。三民主義就認定科學方法可以使減少勞力和增加生產兩件事同時並進的。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和孫文學說裏面已經舉例不厭其詳，我們不必引述。但是這裏所要指明的，以科學的方法，來增加生產而減少勞力，這是三民主義所努力追求的。如果這一件事做不到，生產力便無組織，便無銷滅個人資本主義的能力，便無建立經濟平等的社會的希望。究竟這一件事做得到做不到呢？做得到的。何以說做得到呢？以科學目前的進步而論，世界文明國家應用科學而增加生產力的事，實在是很多。譬如英國，以它區區三島所有的原料地方人力，如果不靠

科學的生產方法，一年之中所生產的物質品，便不穀給養它現有的人口三個月，不到三個月便要起饑饉。日本也是一個島國，如果不用科學的生產方法，它一年的生產，不夠供養它的人口到十個月，不到十個月便要起饑饉。德國和日本一樣，如果不靠科學的生產方法，它一年的生產，不穀給養它現在的人口到九個月，不到九個月便要發生饑饉，但是英日德這些國，現在應用了科學的生產方法，便不愁饑饉。以它們現在生產糧食的增加額而論，它們不但無饑饉，並且很富足。但是這些所謂文明的國家，還是野蠻，因為根據現在的調查，它們應用科學方法的生產事業當中，尚有一半是軍用品的生產，換言之，全世界所謂文明國家，所有的人口，有一半是從事於武器的製造業，而只有一半是從事於真正生活需要品的製造業。假使世界完全改造過來，這一半從事於武器生產的人，都用之於生活需要品的生產之途，則科學的生產方法不必再求進步，世界做有用工作的人即可馬上增加一半，全世界文明國做工的人增了一半，便是全世界文明國的工人工的時間可以減少一半。如此，則從前各國工人每日做工八小時，現在每人每日做工四小時便穀了。這猶不過就可能的方面立說，至於事實的

方面，用科學方法增加生產而減少工作時間，是已經很普遍的現象。因為科學方法的主要作用，在於減少人力的作工，而增加天然力的作工。現在工業和農業的生產，用天然的汽力火力水力電力來替代人的氣力，是大家都知道的。譬如用火車運貨送貨物，一個火車頭的力量，可以替代一萬個挑夫的氣力，一日火車所走的路程，可以替代一萬個工人步行十天的路程，一次火車所消耗的費用，可以比一萬個工人做工減少十倍的費用。其他如耕田織布做房屋的工作，用科學的方法，都有節省人工增加生產到十倍百倍的效果。中山先生說，我們如果把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用新方法來發生電力，大約可以發生一萬萬匹馬力，以供全國火車電車，和各種工廠之用，並且可以用來製造大宗的肥料。以一匹馬力等於八個強壯人的氣力計算，有二萬萬匹的馬力，便等於八萬萬人的力量。以一匹馬力一日夜工作等於二十四個人的工作計算，那便有二十四萬萬個工人來做工。假如中國四萬萬人，除了老幼不做工，大多數女子不做工，和大多數少年強壯的靠分利不靠生利的人不做工，真正做工的人實在是最少數。中國有最少數人生產，所以中國全個民族都是窮。如果利用天然力來替我們做工，只須

利用黃河長江的水力一項，就有二十四萬萬個人的生產力。中國有了二十四萬萬個人來生產，則不但可以變貧爲富，並且可以使現在的四萬萬人個個都不必做什麼勞苦的工作，而可以獲得很安適的生活。所以生產力之組織，用科學方法來利用汽力水力電力火力，可以減少人類工作的量而同時增加生產的量，這是絲毫不足懷疑的事。但是依照減少人工增加生產這個標準，我們就應該應用科學方法到農業和工業上面去，纔能達到目的。依中山先生的計畫，我們對於農業，有七個增加生產的辦法。第一是用機器。中國幾千年來耕田都是用人工，沒有用過機器。如果用機器來耕作，生產上可以加多一倍，而費用可以減輕幾十倍或百倍。向來用人工的農業，農民每日做工十幾點鐘，才可以養四萬萬人，若用機器生產，則農民只須每日做七八點鐘工作，而其生產力就可以養八萬萬人。第二是用科學方法製造肥料。中國向來所用的肥料，都是人和動物的糞料，和各種腐壞的植物。化學肥料，自來便沒有用過。製造化學肥料的原料，不外硝質磷質鈣質三種；這些原料，中國隨在皆有。除此而外，近來還有用電來造成人工硝，像我們中國瀑布河灘的水力是很多的，如果用來製造人工硝以充肥料

，農業的生產自然可以大大的增加。第三是換種。這就是一塊土地，今年種這種植物，明年改種別種植物，或同是一種植物，今年種廣東的種子，明年換四川的種子。用這種交換種子的方法，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產力便要增加。第四是除害。農植物之害有稗草，有害蟲。如果用科學方法，稗草可以利用爲肥料，害蟲可以銷滅，生產額才能增加。第五是製造。農產品要銷運到遠方，必須經過造製。無論魚肉果蔬餅乾之屬，不是曬乾，便是鹹鹹，要經過這一類乾製方法，才能保存長久，銷售遠處。第六是運輸。農產品銷售，要靠便宜快捷的運輸方法，而運輸就要靠實用科學，把鐵道，運河，和公路開闢起來，使各處的出產能夠以有餘而補不足，而各處的人民始不至憂不足而棄有餘。第七是防災。防水災就要修河道，造森林；防旱災就於造森林之外，彘婁築水閘，和利用抽水機。這七種科學的方法，用在農業方面，於國家就可以增加生產，於人民就可以減少工作時間。至若工業方面，我們主張利用科學，以增加生產，而解決民生問題，則有中山先生的全部實業計畫，乃專是爲此而作的。除了輸運，交通，鑛業三部分的基本工業，純然用國家的力量，利用科學的工具和組織來發展

而外，還有五種工業，則須由政府與人民協力經營，同時也是要盡量施用科學的生產方法的。這五種工業，第一是糧食工業。在這一部份工業當中，除原料的生產及食物的製造，我們已在農業範圍內說及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己製造農業機器，不必靠外國輸入；次要的是茶葉和黃豆二種工業，前者須採用新法以改良其品質，始足恢復中國的茶葉商業，後者須以新法製成肉乳油酪輸入歐美，可使品質極佳而價值低廉。第二是衣服工業。這一部份工業，可分為絲工業，麻工業，棉工業，毛織工業，皮工業，和製衣機器工業六種。凡蠶絲之改良，棉麻料之織製，羊毛獸革之製作，以及製衣機器工場之設置，都須以最新科學方法為之。第三是居室工業。這一部工業範圍甚廣，由建築材料之製造，以至於燃料，電光，電話，火爐，自來水種種家用之供給，尤非施用科學新法製造不可。第四是行動工業。所謂行動工業，就是要建造公路，製造各式自動車，如農用車，工用車，商用車，旅行車，輸運車等，以利人民的行動。依中國人口四萬萬計算，每四百人至少需要公路一英里，全國至少需要公路一百萬英里。如果我們能實行縣自治計畫，則每縣以每四百人造一英里的公路，全國一百



萬英里的公路必可以最短期內造成。此種公路造成，同時即可設立製造各種自動車的工場，以供給全國人的要求。如果以大規模的計畫來進行此種工業，實於政府與人民兩得其利。第五是印刷工業。現在中國對於紙料墨膠印刷機及印刷物，實在需要甚急，但是自己的印刷工業不發達，而一切印刷紙料和機器，皆取給於外國，所以每年損失經濟的利益也是不少。以後要挽回這種利益，當趕緊設立關於印刷業之主要的及輔助的工業，以新方法來經營管理之。以這五項工業，合起我們的農業，都由政府和人民協力來運用科學的生產方法，則我們整個民族的生產力可以增加到十倍百倍，而人工生產的勞苦也可以減少到相等的程度。到了那時，生產之豐裕，簡直什麼都可以共產，像現在各人死板板的為謀生計而勞動的時間可以大大減少，而適應各人的特長和興趣的工作可以大大增多。那末，除了廢病殘疾的人而外，凡人都願做特別有興趣有專長的事，凡人都不願專做一種工作而願兼習一種以上的工作。這種社會，便是克魯泡金所懷想而不得的社會，因為在這一種社會裏面，才是像他所說的，『人都是心力兩方面的自由工作者，個個心力健全的人都是勞動者，而且個個人做田間的工作』

也能，做工廠裏的工作都能』。不但如此，在這種社會裏面，凡屬衣食住行各項生活需要品，因為是科學的製造和科學的管理，都能做到像現在的馬路一樣，人人可以自由公共享用，則凡人的聰明才力，不必盡為蠱略的工作所消磨，而可以為高尚的文化和美的人生而努力。總括地說，我們由應用科學方法的生產，便一定做到應用科學方法的管理；由科學的生產和管理，便一定做到生產增加勞力減少的境界；到這個境界便是各人舒展其聰明才力而毫無物質的憂慮的一種最自由的世界。

(二)生產品要如何分配到共享境界分配問題，本源上要從土地和資本分配做出發點。但是我們已經說過三民主義的社會，是要把土地和資本的所有權削平，於是所剩下來下的分配問題便是單純地一個生產品的分配問題。本來，從根本上作一個總打算，生產品之分配，只有兩條可能的路線：一條是經過工銀制度的路線而生產品便由私人的賣和買當中分配了出去；一條是廢除工銀制度而另造一條由政府或公共產業機關分配出去的路。因為只有這條可能的路，便引起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之差異。嚴格的說，社會主義者由溫和派以至

於馬克斯派，都以為人人須得勞動，不勞動就不得衣食。在這種制度之下，工作仍然是強迫的，雖然它是受國家的強迫而不是受個人資本家的強迫；一種相當形式的工銀制度仍然是存在的。雖然它的形式完全和現在個人資本制底下的形式不同。唯有無政府主義者則極力堅持根本廢除工銀制度的理想。他們的主張是：一切生活需要的產品，都給社會上人人自由的享受，正如自來水的一般用之不竭的。克魯泡金在他所著『無政府共產主義』裏說：『不管我們這一世紀的商人生產怎樣引動公眾人的自利心，共產的趨向是不斷地湧現着，而且繼續地侵入到公共生活中來。從前收過河錢的橋，現在已為不收錢的公共橋所淘汰；從前取過錢的私路，現在已為公路所銷滅。同一的精神，已表現在其他無數的新制度上面。博物館，公開藏書樓，義務學校，公園和娛樂場，修造如水平的而且有電燈照亮的街道，都是給人人自由的享用；自來水可以供給到個人的住宅，而且不必問每人所消耗的水量究竟是多少的趨勢；公共電車及火車已開始採用賣季票的方法，或是繳納一種劃一的稅金，這可斷定它還有更進步的可能，如果電車火車一旦由私有的財產變為公有；這一切都表明社會進步正是朝着一

種什麼方向走的，而且可見進步是如何可能的一件事了」。克魯泡金認定無政府共產社會裏面，凡是生活需要品都可以無限量的生產，所以就可以任人各取所需。即是產額有限量的物品，如奢侈品之類，也要平均分配，而不取資。所以無政府主義的分配方法，只是簡單的「各取所需」一句話就可以盡其全部意義。我們依三民主義的立場來觀察，無政府主義的分配方法是很可能的。像克魯泡金所舉的例證，有許多生產品確已達到「各取所需」的地步。如果科學再進步，許多其他生產品也一定會達到共享的境界。不過這種分配方法，根本上要靠幾個條件，而這些條件在三民主義當中已經有詳細的主張，第一個條件，要輸運和交通都由政府經營管理或監督，要做到這些分配的基本工具便宜而敏捷，然後自由分配才可以逐步達到目的，第二個條件，就是一切生產力要科學化，而且大規模的科學化，這已經在前段說過，**不必再贅**。第三個條件，除社會所經營管理的基本分配機關而外，政府和人民要盡量發展合作制度的分配組織，使生產品的分配全部歸於社會化，而免除商人的分配制度。因為商人的分配制是以賺錢為目的，而社會化的分配制才是以便利消費為目的。中山先生的實業計畫和

民生主義，關於分配問題，總括起來，就是：要以科學發展我們生產的工具和條件，然後生產力增加到各種需要品都非常豐足的地步，一切生產品就可以分配到人人共享的境界。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生產條件和工具必須是科學的，生產力必須是科學的，生產組織和分配組織也必須是科學的。所以共享的世界，唯有科學才可以把我們引導進去，科學的進步愈快，我們進共享世界的速度也加快。我不相信工銀制度是唯一可行的生產品分配的路線，雖然在科學尚未發達的時候，工銀制度和商人分配的效用還於事實上不會完全消失。一般人以為金錢制度要銷滅，各人因聰明才力之高下而得不同的工資現象也要銷滅，才是真正的共享，但是如果生產分配都能隨科學的進步而進步，則人類不須做苦工而可以得一切物質的滿足，只須各盡所能而可以各享所需，那就已經達到共享的目的。

以上三點，依經濟組織方面共有共治共享的意義，說明三民主義對於經濟上的實行方法。將三民主義對於經濟改造和政治改造的方法總合起來，則除上述土地和資本方面的共有，生產組織方明面的共治，和分配組織方面的共享這三種意義外，我們不可不回復到三民主義

本身所具的共有共治共享的意義，而具體地作一個總結論。我們以前已從原則上分析三民主義的連環關係，但是經過上述經濟方面具體方法之說明後，我們在下面就要從實行方法上來總合三個主義的連環性，而舍去我們所已考慮之各種主義理論上之比較的批評。

在一切實際問題的考慮之中，我們所不惜反覆估定的，就是軍國主義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所結合而成的帝國主義的環境。我們的革命，開始即要衝陷到這樣連結而成的帝國主義的壁壘裏面去。要想衝進帝國主義的壁壘，把它的三個柱石各個擊破所以就不能不有一個相當連環組合的三民主義。這並不只是說，用民族主義去打破軍國主義，用民權主義去打破官僚主義，用民生主義去打破資本主義，就可以根本推翻帝國主義。不是這麼單純的。因為軍國主義是連結了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而造成的，官僚主義是連結了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而造成的，資本主義是連結了軍國主義和官僚主義而造成的。這三個反動勢力，缺其他二個，便不足以構成其一個。因此，三民主義所以能把這三個反動勢力打破，不單單是以這邊一個革命的主義去打破那邊相對的一個反革命勢力，而是以三個有互相連環性的革命主義，才可以打

破三個有互相連環性的反革命勢力。所以在革命的壁壘裏面，民族主義是要靠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連結成功，民權主義要靠與民族主義民生主義連結成功，民生主義要靠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連結成功。這三個革命主義，拋棄了一個，便不能成就其他二個。有了三個連環的革命主義，才可以擊破三種反革命勢力連環結成的帝國主義，才可以創造一個替代帝國主義環境的三民主義的世界。

這一個根本立場，是三民主義的實行的一切步驟和方略之所從出。我們最初的革命方略，以前第一步定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不料做到推翻滿清之後，建立民國是只做到一個空名，平均地權就完全沒有這回事。所以孫中山先生後來就說一切的失敗，都是不實行革命方略之過。我們現在的革命方略，仍是孫先生所定的革命方略，而依此方略所定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等，內容更經先生一人盡了畢生的精力完成了。依先生之所昭示，我們對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建設，必須同時並進，決不能任意利用一部分而拋棄那一部分。誠然，以三民主義之無所不包的這種博大的革命主義，無論何人，都能割

取其中一二點以爲驅取政權的工具，但是割取一二點而成的政治運動，決不能成爲整個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孫先生逝世以後，中國革命，已流爲破片的三民主義之革命，而非整個的三民主義之革命。我們以後要繼續承先生的遺志，非用全力恢復整個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不可。如果不然，大家只是割裂三民主義的片段，互相拿來策略化或手段化，結果一定只見若干反革命勢力各爭雄長，決沒有整個三民主義的革命一氣完成。所以我們此後的責任，不僅在於固執三民主義各個的原則，尤其在於堅持三個主義同時的實行。於此，三民主義連環實行的方法，乃今後進行革命最當注意的事。

孫先生規定了革命的程序，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在這三時期之間，本不說是三民主義中那一個實行在先，那一個實行在後，只教我們在進行革命的時候，去認識三民主義中那一件事和那一件有同時實行的必要，就依着步驟去做。然而我們至少也究竟要明白三民主義當中各個建設計畫和政綱互相連帶的關係，才曉得那些是應該先做那些是應該同時的做，那些是應該分別的做。我們在軍政時期，開始做打倒軍閥的工作，當然非有革命武力不可。但



是專靠武力就能打倒軍閥嗎？如果不從地方扶植民權的基礎起來，即使軍閥倒了，就能擔保它不再生嗎？這就曉得以革命的武力去北伐，和以革命的黨員去指導地方人民做行使民權的準備，二者在打倒軍閥上各佔一半的意義。但是打倒軍閥，固然是實行民權主義的第一步，而軍閥所藉以爲後援的帝國主義，不能不同時解決它，解決它的第一步，就要斷絕軍閥和帝國主義的政府間之結合，這已是引到民族主義的關係上面去了。但是要斷絕軍閥和帝國主義間的結合，於民族主義的意義上還要根本廢除從前一切不平等條約。此種不平等條約，乃帝國主義所藉以利用中國軍閥官僚從事內亂的門徑。同時，外國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亦藉不平等條約爲根據。所以不平等條約之廢止，不獨在民族主義觀點上當如此。並且在民生主義觀點上尤當如此，因爲以後發展國家的實業，鼓勵個人的企業，都須有待於各種在條約上已失的經濟權利的收回。但是要在民生主義上做到收回各種經濟權利，必須革命的政府能夠確實樹立整理內政的基礎，換言之，就要在民權主義上掃除積弊，如官吏之貪婪，差卒之勒索，鴉片之流毒，抽捐之繁苛，都能一概掃盡，尤其要規定公共度量權衡，製定訓練

民衆團體的方案，確定民衆團體在縣自治之下的基本組織之完成，以及開辦各地自治的市政，才能取得外交上的威信，使外國無所施其抵賴而將各種不平等條約上經濟利權久假不歸。總括地說，軍政時期，於破壞方面，在民族主義的意義上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國內經濟能力，發展之自由的地位，而截斷軍閥與帝國主義間的連鎖關係，在民權主義的意義上要打倒軍閥政治，掃除一切傳統的弊政，禁止官邪，剔除公共機關營私舞弊的陋規，杜絕胥吏差卒的勒索，在民生主義的意義上，要廢止一切苛捐雜稅，防止高利盤剝，嚴禁一切以個人地位或團體勢力及土匪強盜魚肉人民的行爲，使共產黨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土匪都不得凌虐一般的民衆；於建設方面，在民族主義上，須喚起民衆對於中國民族目前經濟的地位和政治的地位之危險，和將來民族獨立所必須共同努力的方向，同時於可能的範圍內，分別實行本黨所定的對外七大政策，在民權主義上，須保障一般民衆團體組織之自由，而使之實行『民權初步』所具有的社會建設，並以法律和政治的力量造成民主自治在地方的真實基礎，而永遠杜絕官僚政客之勢力之再生，在民生主義上，須調查過去社會各方面的經濟狀況，施行社會測

驗經濟測驗土地清丈人口統計，扶植各種合作事業，宣傳農工業之科學的生產方法和組織，提倡保護國內的新興工業，保障農工，改革財政及商業金融的制度，並籌備公共濟貧救災的事業。如果軍政時期內能像這樣確定三民主義的指向去努力，則革命的軍人就不至變爲『新軍閥』，革命黨員就不至變爲腐化惡化，整個革命的勢力就不至力量向內部互相抵消。

到了革命的武力完成統一之後，軍政時期所應做的工作，都做好了，才談得訓政時期。這兩個時期的過渡，實事上固然不能如白紙上畫了一條黑線一般明顯，但總要革命的權力對內對外都鞏固了，縣自治所有訓導直接民權的工具或條件都齊備了，民衆也組織好了，人民所受過去制度風俗習慣和弊害的痛苦也解除多少了，然後訓政時期才展開。以革命的總過程來說，訓政時期是最緊要而最嚴重的時期。因爲一切建設的事業，都是這個時期內立下深厚的基礎。對於以前的軍政時期，要緊接待住，對於未來的憲政時期，要開創得穩，所以訓政時期實在是繼往開來的最重要關頭，在這個時期，我們於民族主義方面，就不能單簡地專從外交上求淺薄的零碎的好處，要從內部建設上充實我們民族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如果內

部組織有了成績，便是民族對外的力量。內部建設的步驟，我主張要採用經濟上『分工合作』的意義，確定各省於軍事上『完全底定之日，則爲訓政開始之時，』由各省長官負責實施『建國大綱』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內政策』的全責，而由中央策勵其成績。詳言之，各省必須於民權主義方面，對於地方要提高人民的政治知識和能力，這就是要訓導人民以行使選舉權罷官權創制權複決權的知識和方法；對於地方政府，要有『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人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察衛生各種事項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得有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對於與縣自治完成有連帶關係的政策，如『實行普通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爲標準之階級選舉，』『釐訂各種攻試制度，以救選舉制之窮，』『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之完全自由權，』『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勵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

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等等政綱，均須與中央協力合作的實施起來。於民生主義方面，必須於縣自治開創之時，『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並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當爲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同時必須確定凡『土地之稅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士林川澤之息，鑛產水力之利，皆爲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衛生等各種公共之需要；』至於『各縣之天然富源，及大規模之工商事業，本縣資力不能發展興辦者，國家當加以協助，其所獲純利，國家與地方均之。』當各省負責實施這種政策之際，中央則必制定關於縣自治的訓政法，選舉法，勞工法，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地價稅法等，以謀訓政上之統一；黨則必領導全國人民走上真實建設的途徑，引起各項人才的事業心，使全民族在實際工作上事事能夠求最大的效能，而矯正一切務虛榮而不務實際，只知盲目地活動而不知集中精神能力以求一件社會事業之成功的惡習。如果黨與政府及各省負責同志和民衆都能向訓政的大路

共同努力，那麼一切革命過程中所有的困難，都能逐一打破。因為天下事，不進就是困難叢集，進則一切支節就無從橫生。現時革命所以流為非整個三民主義的革命，其原因固然有其他非人所期的過去事實造成了一半，但是各省經過軍事底定之後，不知緊接做訓政工作，也居一半。如果各省同志負責實施訓政時期的工作，則黨的精神和力量，就能以實際的建設，去銷滅一切無聊的紛糾之微菌。但是這時候，趕緊着手做訓政的準備，還是不遲。因為民衆正是希望，等待着，唯恐時局不由軍政時期而展入訓政時期，只有天天看各方互逞小刀細工的權謀術數，那才使民衆生厭。現在有知識的民衆，確是如此的心理。我們革命而不向民衆所期望所心向的光明之路前進，則縱使全國的軍事上成功，革命還是要失敗的。反之，能於各省軍事過渡期間，即着實施行訓政計畫，則不必待北伐之完成，而革命建設的風氣，必能預先傾動全國的人心，確定革命前途的勝利。

訓政工作既然有了相當成效，於是相因而至的便是憲政時期的開始。那時候，在民權主義方面，必須從縣自治的直接民權的基礎上，樹立中央五權憲法的政府。憲法未起草以前，

必首先依照建國大綱的原則，檢查訓政時期的成績，如一省之內，是否『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的程度，是否可以組織『國民代表會，選舉省長，以爲本省自治之監督，』各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是否能行使『直接選舉官員之權，直接罷免官員之權，直接創制法律之權，直接複決法律之權。』迨全國有過半數的省分確有依照建國大綱辦理縣自治的成績，而入於憲政開始時期，則憲法即可本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的成績而着手起草，並開國民大會決定而頒布之，同時關於中央統治權如何行使，地方與中央權限如何分配等問題，悉當依本民權主義建國大綱及實際需要來規劃清楚。在此時期，民權和民生的基礎，經訓政程序之後必已鞏固，所以最重要的工作，在於完成五權憲法的國家組織。只要國家的組織完成了，然後大規模的『實業計畫』纔能合國家與地方的力量逐步來發展。

總合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步驟，我們須得認識幾個深大的意義。第一，一切破壞和建設，是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作的，不是爲逞個人或階級間的私憤而作的。在破壞時，我們要打倒軍閥，爲的是要除去民治的障礙，要廢除不平等條約，爲的是要除去民族和民生兩方建

設的障礙。離開了三民主義的意義，一切破壞便是造『亂。』我們革命所以能夠把社會已成的風俗習慣制度和人物加以罪名，完全是由於用了三民主義去鑑別風俗習慣制度和人物，而詳細審判過那些是三民主義的障礙物，那些非三民主義的障礙物，是障礙物的，便要破壞它，非障礙物的，便撇開它。我們的軍隊打仗不能說因為我們是軍人，就要把一切非同類的軍人通通殺死，或把一切非軍人都來殲滅，天地間斷然沒有這樣的道理。我們開調出去的時候，打仗是從非軍人當中認定一部敵人去打的，是從非同類的軍人當中認定一部真正的敵軍去打的，斷沒有逢人必殺逢軍必打的怪事。同樣地，革命只是破壞實行主義的障礙物，而不是要把一切文化和制度，不分好壞都一齊毀滅的。到了建設的時期，亦復如此；我們要認識那些是主要的建設，主要的建設我們負責作起來，其他次要的建設，就自然有人會跟着作起來；那些是應該建設的，應該建設的我們作起來，不應該建設的就不要枉費精力財力，而就擱了正當建設事業。這許多話，歸到一個原則上，便是我們破壞也好，建設也好，都要死心塌地依照孫中山先生的主義和計畫去做，不能添加一分，不能減少一分，要是逞個人的奇才異



能，來獨出心裁，妄事增減，事實上只有勞民傷財的結果，而終久還是要讓孫先生手定的主義和計畫來把你剔除。這是第一個意義。

在實行三民主義和其計畫上，我們要認識，實行的出發點是整個中國民族，不是那一個或那幾個個人，更不是那一個團體或那一個階級。民族是超越一切的力量，在政治的觀點上如此，經濟的觀點上亦如此。由實行的力量說到實行的方法，則科學是超越一切的方法，在論理上如此，在事實上尤其如是此。我們三民主義者，如果不承認民族是超越一切的，不承認科學是超越一切的，那根本上就是三民主義的叛逆者，更說不上來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作什麼工作，出什麼力量。我相信無論任何個人團體，任何學說，凡蔑視民族的，蔑視科學的，都是要被自己民族的力量壓倒，都是要被現實科學的力量壓倒。我把這些話歸納下來，又即是：世界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都只是非科學的哲理，即自命為科學的馬克斯主義也不能逃出例外；它們所以只成為哲理，是因為科學的進步把它們原有的內容逐漸排壓到哲理的空想的地位而去；至於它們的目的，唯有民族的力量加上科學的實施才能達到；三民主義

所以十二萬分自信可以達到它們所共懷的目的，完全是信賴民族的力量，和信賴科學的方法。所以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上，我們能否由起點奮鬥到終點，完全靠我們能否喚起我們民族生出大力量來應用科學的方法，把我們民族做到共有共治共享的境界。然而這又要靠負革命責任的同志們，信賴自己的民族，信賴現實的科學；個人的力量，要向充實民族力量這一方面努力，個人的智力，要向科學這一方面去發展；如果自己沒有充實民族力量的可能，沒有追求科學智識的可能，那至少要虛心扶植有這種力量這種智識的青年們來做革命的基本力量；如果自己又沒有這種虛心那麼革命前途是無希望的，民族前途是再不見有光明的。前是第二個意義。

總理手定的實現三民主義的程序和計畫，本身是有科學的穩定的基礎，但只是備具了一種博大的綱領，而其細節是須一般同志們和專門人才的補充，而且要在實施之際隨客觀的需要補充。因為如此，所以三民主義之實現，細節上不能單憑學理的成見，要靠實際的考驗。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拿實用主義的精神來鼓勵全國各種人才為三民主義之實施努力，要以思想

落實際觀察務真切做事求效能三個要義訓導後起的青年，要以破除一切從個人主義權謀主義愚民主義出發的治國平天下的政治道德，澄清全國的空氣。玩弄虛玄，戕賊人才，愚弄民衆，都是三民主義實行上的最大仇敵。這是第三個意義。

千言萬語，也許總不抵下面這個總意思：人是社會的，生存努力的基礎，總須得從博愛起點，經由三民主義的各個和總合的途徑，而底於大同世界。本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三個東西，與其說是思想，莫如說是力量。因為由互古以及於無窮的將來，這三個力量實在是人羣歷史的發動機。孫中山先生在人類文化上所佔的一個中心的地位，就是在於首先發見這三個力量是推進人羣歷史的力量，而總名之曰進化的重心，更由發見這三個力量而定出一個經由此三個力量連環紐結的總計畫，去指示人們向世界大同的目的大踏步前進。在朝着世界大同這條大路前進的時候，人類所賴以燭照前路的，不是武力，不是金錢，不是權謀，不是宗教，不是哲學，而是科學這個唯一的火把！三民主義的信徒們，要大家提着科學這個火把來革命呵！

## 對於第二期清黨之意見

蔣中正

△清黨之目的：爲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而清黨——爲擁護農工利益而清黨

△黨員今後之責任：要嚴密組織遵守紀律——對跨黨份子檢舉要嚴重處分要審慎——

### ——要繼續努力革命工作

『待敵人慈悲，即待同志殘酷；』此爲共產黨告戒其黨徒對待敵黨不嫌殘忍之信條；『不爲同志，便爲仇讐；不爲信徒，便爲叛逆；』此中正數年來自勉以勉同志之規箴；在此次清黨運動中對此二者，不能不深自惕勵。

在國民革命尙未成功，北伐軍事尙待急進之際，吾人因共產黨徒之搗亂謀叛，遂不得不於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以外，兼作此次清黨運動，此吾黨之不幸也。向使本黨同志，爲真正信仰三民主義之同志，自始卽有明確之認識，堅決之意志，強固之組織，嚴密之訓練，全體一致，努力工作，深入民衆，無懈可擊，共產黨徒雖極險狠狡詐，亦未必能售其操縱破壞之

奸；故今日之清黨運動，實由本黨同志自種其因。自中央監察委員會揭發共產黨徒逆謀以後，各方同志忠勇奮發，齊起奮鬥，卒於最短期間，舉共產黨徒數年來陰謀搗亂之布置，悉摧陷而廓清之，則又明示吾人以本黨同志在平時雖不免有渙散鬆懈之弊，而一至本黨生死關頭，渙散者團結，鬆懈者緊張，此又吾黨之大幸也。雖然，得失相倚，禍福相伏，往事皆然；清黨之爲禍爲福，亦在吾人之自求而已。吾人若以爲清黨運動已有相當之成績，黨之生命已立於至安全之地位，而今而後，又可偷一日之安，則渙散鬆懈之弊終不得除，清黨之效果將等於零；又或有鑒於共產黨徒之鹵莽滅裂，遂矯枉過正，不復深入民間，則將使黨之生命，癱痿以亡。故吾人今日必須認定，清黨以後，方爲本黨真正生死關頭。今日以前，共產黨徒寄生黨內，挾其詭秘之黨團作用，把持操縱，無所不用其極，因而激起本黨忠實同志之義憤，苦心衡慮，以謀救黨；今日以後，共產黨徒不復能在本黨作祟，本黨同志苟存莫予毒焉之心，一念驕矜，足使全黨墮落，清黨之效用，充其極只能使共產黨徒不爲我害而已，不能保障我自身之決不腐化也。今日以前，共產黨徒劫持本黨，愚惑民衆，懸羊頭而市狗肉，以致

本黨主義未能普及，黨綱政綱未能實現，其咎可由共產黨徒尸之；今日以後，本黨以黨治國之障礙既除，存亡治亂，一切責任在本黨，民衆執黨義以相繩，苟有差池，無可復諉；又或黨員行動，無異官僚，青天白日之下，陰霾如故，則怨謫所歸，將不在個人而在黨，黨之信用墜，而黨之生命亦危，又何能保共產餘孽之不乘隙而起也。吾爲此懼，乃不辭瘠口曉音以告我同志曰：清黨之事業猶未完成，清黨之精神必須持續。第一期之清黨運動，在以極敏捷嚴厲之手腕，撲滅共產黨徒之逆謀，屏除共產黨徒於黨外，其事猶易；第二期之清黨，則必以至大至久之恆心與毅力，肅清潛伏之共產分子，絕其根株，同時確立本黨之新生命自強不息，使一切危害本黨與腐化本黨者咸無從立足，此其事蓋甚難也；我同志能深知其難，而又有不畏難之決心，鏗而不舍，以求達此目的，則黨事其庶幾矣。茲更分舉清黨第二期最應注意之點，與我同志商榷之。

(一)各級黨部之組織必十分嚴密，黨員必遵守紀律。共產黨徒寄生本黨，以數量言，當不逮本黨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勝多，操縱如意者，其組織之嚴密勝於我，其黨員

之尊重紀律亦過於我也，共產黨之陰謀固可誅，共產黨之組織則確有可採者。本黨在民國十三年改組之時，本已採用蘇俄共產黨之組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總章，自區分部而上，系統井然，其於黨員義務，亦有明白之規定，無如本黨同志多不耐嚴格之訓練，往往視黨章爲具文，甚或不知黨章之所制定者究爲何事，而各級黨部乃徒爲跨黨分子壟斷黨務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今既有清黨運動，必注意於黨員之訓練，入黨之審查勿濫，工作之考核宜嚴，一切投機及腐化分子，咸宜屏除，務使本黨之組織視共產黨更爲堅強，本黨之紀律視共產黨更爲嚴整。凡共產黨組織之特長，足補本黨黨章所未備者，咸可擇善而從，而黨章則尤須實力奉行。真正堅信三民主義之同志，當有鐵的團結，以黨之生命爲自己之生命；而欲維持此鐵的團結於永久，非有極嚴密之組織，其道無由。清黨之真正目的在此，清黨後之最重要工作亦在此，凡我同志，幸各努力。

(二)第二期之清黨，應注重根本消弭之方，對於跨黨份子之檢舉，不容稍寬，惟處理必求審慎，且須切實防止挾嫌傾陷情事。第二期之清黨，有與第一期不同者：第一期之清黨，

爲緊急處分，其時共產黨徒謀叛正亟，非各地同時採用極嚴峻之手段，無以遏抑亂萌；第二期則爲根本整理，肅清共產黨徒之根株，勿使復活，此必有待於縝密統一之方案。第一期之清黨，自打倒共產黨領袖及其著名活動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狀皆甚明顯；第二期則須遍及一般跨黨分子，其證據比較難得，挾嫌誣陷者易施其技，辦理稍有不慎，將增加人民之恐怖，斲喪社會之元氣，而黨務進行亦大受其影響，此不可不注意者也。現在清黨運動，已由中央擬定統一辦法；各地同志對於跨黨分子，如有發見，急當盡量檢舉，惟審查決定，必須遵照中央所定辦法，執行處分之權，尤應統一於中央。吾人對於跨黨分子，苟非搗亂謀叛具有證佐者，祇須停止其黨籍限制其自由，予以警告，促其自新。無論湘鄂共產黨徒仇殺國民黨員，如何慘暴，吾人絕不必存報復之念，效其所爲，對敵人固不宜慈悲，亦不必如共產黨徒之殘酷也。若夫懷挾私怨，攘奪權利，誣人以莫須有之罪名，則尤非本黨同志所宜出；不幸有之，則清黨之結果不特將治絲益棼，且有摘瓜抱蔓之憂矣。

(三)清黨運動應認清題目，吾人非爲帝國主義者與資本家排除共產黨，對於打倒帝國主



義與擁護農工利益之工作，仍須繼續努力。吾人何爲而清黨，以共產黨徒搗亂我國民革命之陣線也；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平等者，惟帝國主義；故打倒帝國主義，爲國民革命最切要之工作。帝國主義與國民革命勢不兩立，證以最近英帝國主義之行動而益信。自國民革命軍在江西與孫傳芳以重創，連克閩浙以來，帝國主義者飛機砲艦，絡繹不絕，如臨大敵。彼時猶得曰防止共產黨攻擊租界也；今我黨自動的肅清共產黨徒，國民政府之外交方針，已布告於世界，而英帝國主義非特無撤兵誠意，鐵絲網沙包之妨礙我商業如故，飛機砲艦之任意游弋如故，甚且在江陰鎮江開砲轟擊居民，飛行機助渤海艦隊在吳淞示威；英帝國主義歷年以來，援助陳炯明吳佩孚孫傳芳以抗拒我國民革命軍，無役不敗，今猶不悛，又轉而援助張宗昌矣。因帝國主義之援助軍閥，與本黨爲敵，故本黨必須領導全國民衆，打倒帝國主義而後已。本黨爲民衆而革命，民衆之最大多數爲農工，國民革命本爲解除農工痛苦而來。共產黨徒既遮斷本黨與農工之聯結，且任意欺騙農工，故本黨欲擁護農工利益，必先打倒共產黨。打倒共產黨，乃爲農工謀真正之利益，爲國民謀產業之發

展，調節勞資，使農工得在三民主義之下，自由滋榮。吾人固不高唱打倒資本家之呼聲，然若資本家誤認共產黨打倒以後，本黨不復爲工人保障利益，彼等可任意虐待工人，則此等爲富不仁者，亦非打倒不可。我同志必須認清題目：吾人絕非爲帝國主義打倒共產黨，亦非爲資本家打倒共產黨；吾人正因爲要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農工利益，方不能不打倒共產黨。吾人爲實行三民主義，貫徹以黨治國之宗旨，更不能不從速鏟除共產黨。清黨既略告段落，工作應加倍努力，此至明顯之理也。

凡茲所陳，初無高論；然而清黨之成敗，實繫於此。昔孟子欲息邪說，正人心，歷述舜禹以來至於孔子一治一亂之局；吾初不解天下何以治而必亂，由今思之，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無黨的團結，以爲持久之奮鬥也。清黨運動，本非一手一足之烈，清黨以後，黨員能萬衆一心，以黨之生命爲己之生命，奮鬥不懈，有同志而無仇讐，有信徒而無叛逆，國民革命由此完全，世界大同由此開始，此總理創造本黨之微意，亦我同志擁護本黨之職志也。中正不敏，願與同志共勉之！

## 擁護黨與擁護個人之區別

蔣中正

要知道爲什麼要擁護黨，便當先明白爲什麼要有黨。人類的社會，自有歷史以來，就有種種集團的組織，但是這些組織，往往局部的或是限於某項特殊關係的。一國的政治組織，是人類進化到極複雜民族結合到最大集團的時候的一種產品。雖然他也是一種爲特殊目的的集團，但是這種集團却支配到其他一切的集團生活，而關係全個民族或國家的生存。因爲他支配到各種繁複的集團，影響及最大範圍以內的民衆生存，所以不能不有特殊的政治重心，以指導他們前進而爲他們滿足生存的幸福。不然，非特運用不靈，并且無路可走，弄到死亡而後已。譬如整副新式大工廠裏的機器，必定有一個總發電機一樣。這就是政黨。政黨是近代政治所必需的；在渙散的中國裏面，尤其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過程裏面，要全個民族有生路可走，黨更是必需的。所以中國必需中國國民黨。

個人不過人類和民族中間的一份子；不靠集團，他的能力幾乎無法可以表現。在種種的

社會組織裏都是如此，在民族的政治組織裏尤其如此。不然坐視民族滅亡，也無法可以挽救；天天說是爲民族或人類謀幸福，却沒有可以着手的地方。所以有志爲民族謀生存，人類求幸福的人，不能不有黨。所以我們當有中國國民黨，並當擁護中國國民黨。

黨是一種主義的集合，按着正大精確堅定不移的主義，定下政綱政策，去爲民族謀生存，人類求幸福的。個人易受感情與好惡存心的支配，或利祿權位的引誘；主義却不會因這些事而變更。個人可變更到使人無所適從的地步，但是守着主義的黨，便可常時以主義做大家的指導。

個人是受生活期間及其他生命上的定律所支配的，但是黨却可以長久常在。無論個人如何忠實努力，但是以全體民族的生存，託在他一個人有限的生命和精力上面，豈不是大危險嗎？難道民族中的各個份子，便不當自己謀生存，祇把命運託付在一個人身上嗎？在舊式的政治裏面，往往有一個所謂英雄豪傑死後，他全部的事業跟着他的生命崩頹；如亞歷山大一類人，死後尚且如此；但是在近代的政黨政治裏，却是不然。傑佛生死了，根據他主義的美

國民黨，仍然存在；黎塞耳死了，由他孕育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仍然存在；列甯死了，俄國共產黨仍然存在；孫總理死了，遺留下的中國國民黨不但存在，而且本着他的教訓，一天一天的光大。這更可以看見擁護黨和擁護個人的分別了。

無論什麼智者也不能不有千慮一失；無論什麼能者，若是把什麼事都要他幹而不讓大家有參與練習的機會，不但會發生危險，而且與現代民治的潮流是違背的。但是運用民治的不靈敏——尤其是在大國裏的不靈敏——當民族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也須顧到。對於現在民衆這樣散漫而無組織的中國，在國民革命的過程裏面更當顧到。一面要大衆有參與和練習民治的機會，一面又須在民衆裏面，有一架完善的發電機，使其各部分能運用靈敏。這就是黨治；這就是『集中的民治；』這豈不是對於中國最切要，爲世界最近代的政治組織，而且超過於任何個人的政治嗎？

況且擁護個人更有危險，就是一方面養成個人的驕妄心，一方面養成民衆的依賴性。歷史上有許多能爲國爲民的英雄反變成害國害民的梟雄，他們自己固然不能脫卸罪惡，但是擁

護個人的環境心理，也當負一部分責任。有法國宮廷阿諛的環境，就會產生路易十四『朕即國家』的謬妄觀念。就是連梟雄資格還不夠的袁世凱，敢於妄冀帝制自爲，一部分也是當時『非項城不可收拾中國時局』的般愚蠢心理促成的。在擁護個人的人，不知道結果的危險；在被擁護的人，也不自反省；到自己陷於極危險的地位，還不覺得。至於養成民衆的依賴性，使他們忘記自己的天職，祇知靠着個人，這樣對於民治前途的危險更不必說了。就人類普遍的的心理而言，凡事涉及個人，便有種種嫉妒愛憎的成分夾在裏面。這面若以人來號召，雖然存心的爲是事，但是對面往往以人的問題來作搗亂事的目標。況且這方以人來號召，那方也以人來號召，弄到結果，豈不是大家祇知道有人，而不知道有主義嗎？中國的紛亂，也大半是這樣釀成的。所以爲國家計，我很不願意大家以中正的名義來號召。大家應當祇知道有黨，祇知道有黨的主義！主義是人人應當遵守的，黨是人人可以參加的，人人可以爲黨中的一份子，此人却不能爲彼人中的一份子。這點心理的深微處大家應當了解！

明白以上五層擁護黨與擁護個人的利害區別，便可明白我們這次清黨不是擁護個人。

擁蔣」的口號，是不當與「清黨」並提的。如果提「擁蔣」的口號，就失却清黨的意義了。微論中正的才德不足以當大家的擁護；就是大家有推愛到中正的地方，也祇是因為中正，是忠實的黨員之一，盡力為主義去奮鬥，這是中正個人的責任和本分，並非有任何可以被擁護的地方。如果各同志誠是推愛中正那應該要督促中正，規戒中正，來擁護本黨，實行主義，豈能提出「擁蔣」的口號。同志們！我聽聞「擁蔣」的口號，或看見「擁蔣」的標語，使我惶愧無地，還不如看見「倒蔣」的標語，使我可以警惕自反，盡忠黨國。況且中正不過是黨中的一份子，大家愛黨不但把愛中正包括在內，而且是大家的自愛。中正一息尚存，自當繼續不停的為黨為主義而奮鬥；中正也希望大家認清黨，認定黨的主義，不停的向前奮鬥，祇知有黨，不知有個人，才可以救中國，才可以完成國民革命的大功！在民治的國家，領袖是事實上不可廢的。但是領袖的意義，也祇是為奮鬥前進的過程中，他能夠不避犧牲，站在前面，大家跟着他，協助着他一同前進。為主義的實現，大業的成功，大家自當服從領袖；但是大家也祇是為主義，為職務的本身而服從領袖，不是為領袖的個人而服從領袖。這點黨與個人界限的認

定，是中正願以極誠懇的心，和同志同胞們互相勉勵的。

我們不要忘記的，就是現在是中國國民革命進展最積極的時代，也是中國民族新生命產生的時代。中國國民黨是領導國民革命，就是領導中國民族求生存，爲世上一大部分人類求幸福的惟一革命政黨。他本着過去光榮的革命歷史，求實現三民主義；他的奮鬥，是爲中國全個民族的，是爲人類的，不是爲個人的。所以凡是忠實有爲，立志爲民族求生存，人類求幸福的人，不但是本黨同志，就是全體民衆，都應拿出犧牲奮鬥的精神來，擁護中國國民黨



## 我們爲甚麼要打倒中國共產黨

陳銘樞

附記：這個題目，是中國目前唯一的重大問題，是人人所當注意，所當明瞭，且須得一個解決的。我前應金陵大學之邀請，曾標這個題目說過一回，因爲我不會演講，未能將胸中所蘊條達明顯，深爲抱歉。茲再用文字表出，貢獻於國人，願關心國事者，留意觀覽，且進而討究，幸甚。

世界不論那一國的政黨，雖不許有破壞或侵害他黨的不道德的行爲，然而排他性是共同的：這是一點。其次，孫中山先生所創的三民主義，是中國唯一的救國主義；本諸三民主義所建立的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的救國黨；本此信念，所以國民黨有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主張。既然國民黨是主張以黨建國以黨治國，那自然只許有這一個黨而不許有其他的黨的存在，這是極明白不容懷疑的。但是我們今日之所以要打倒中國共產黨，尙不關於政黨普通的性質與國民黨特有的性質。

中山先生創立了這個唯一解救國家民族的國民黨，因見近年來中國一部份知識幼稚的青年，漸漸盲從共產黨，深恐其認識不清，徒滋紛擾，致礙國民革命的進行，因此毅然決然把他們各個的收容到國民黨來，好受國民黨的指導，從事國民革命。而這些黨徒，當時亦自知非投進國民黨來，天地雖寬，實無他們立足之所。所以宣言放棄其自黨的活動，來作三民主義的信徒。是則共產黨實被翼卵於國民黨之下，沾國民黨的恩惠，蒙國民黨的指教，宜如何忠心不貳，翊贊本黨！想不到他們心懷不軌，不特加進本黨不是出於誠意，反是預定了計劃，來假投降。孫先生非吳王夫差，他們要來做越王勾踐，契丹非我族類，他們要來做石敬瑭！忘恩負義，棄德背信，這是何等的可恨！何等的冤仇！如其不將他們掃除，豈特國民黨不能生存，便世界上那裏還有正誼人道！但是我們今日之所以要打倒中國共產黨，尙非出於報仇雪忿之情。

然則我們今日之所以必要打倒共產黨，究竟爲的什麼？我可以說有極明顯極重要的兩個理由：一是他們破壞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二是他們破壞我們中國社會的基本組織。

第一，破壞國民革命。本黨爲求三民主義之實現，語其政策，是不一的。語其範圍，是極廣的。語其路程，是極遠的。而其爲時代環境所急切需要須首先完成者一事，國民革命是也。國民革命所以爲目前最急切的需要，其原因，就是因爲我國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軍閥的摧殘，致令民族失了自由，民權不能發達，民生無法講求。我們相信我們的國民革命一天不成功，我們便一天陷在泥犁地獄裏面，并且還相信我們的國民革命，如其再要耽擱下去的話，將來并沒有實行國民革命的可能。因此我們對於國民革命，其期望之殷，掙扎之苦，實在有許多不能以言語文字形容出來的地方。起初我們以爲中國共產黨徒，同是國民一份子，他們既表示放棄自黨的活動來爲國民革命努力，想必對於國民革命的要求，也同我們是一樣急切的。那曉得被盧布收買的漢奸——共產黨，他却口是心非，專門作的是破壞國民革命的工作。我現在且把他們處處怎樣破壞國民革命的行爲，分作五項說明於下。一是製造階級鬥爭。原來國民革命是全國民除了已經成爲我們革命對象的敵人而外，其餘無論士農工商，都需要的。既然如此，那我們就應該集中全國國民的革命力量，下一道總動員令，向

一個共同的目標進攻，斷不宜在我們聯合戰線之下的各部隊裏面，自己火併。可是第三國際的走狗——中國共產黨，專門煽動階級惡感，鼓吹階級鬥爭；挑撥社會上各業的人民，令其互相衝突，互相水火，務令全國民衆於國民革命可能供獻的力量，一齊消滅。大家試想這種毒辣的破壞手段，是不是比敵人的甚麼砲火還厲害！二是搖動青年們的信仰。凡屬青年，他的智識本來很淺，加以青年時代的生活，他的一切行動，都是感情的，衝動的，直觀的，耽於空想而不切於實際的。因此對於社會有責任的人們，其於青年，應該如何慎重指導，一面既適應其蓬蓬勃勃的心情，一面更與以着着實實的見地，這庶乎於青年自身有利，於國家社會同時有益。那知那個狐狸精似的共產黨，一味利用青年們的弱點，專拿那些足以動人感情好像是春宮圖一樣的宣傳品來誘惑他們。把打倒帝國主義作爲純社會革命世界革命的問題，而否認我們國權恢復運動。把打倒軍閥作爲只是排除無產階級的障礙問題，而埋沒我們政治上的要求。把列寧式的暴民專政，作爲本黨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真諦，而掩蓋其民主精神。又復斷章取義，毀謗三民主義爲不澈底，且曲解中山先生的主張，甚至污蔑他的人格。務

教一般青年，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完全消滅，并誤信離世界革命并無國民革命之可言。原來國民革命，固然是要全國國民，共同奮鬥，却是青年們的努力，尤其要緊。現在他們既務令青年們不信三民主義，且薄國民革命爲不足爲，這不又是根本上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嗎？三是破壞本黨的中堅人物。中國共產黨所害怕國民黨妒嫉國民黨的：一是普通的三民主義的信仰；二是根深蒂固的偉大的中堅人物。前者要被壞其信仰已如上言。對於後者，他就專事離間。不是今天說某甲將不利於某乙，就是明天說某乙將不利於某丙；一面更造出甚麼左派右派新右派種種名目；五花八門，四布手脚，務使社會上時常現出一種如狂風驟雨頃刻即逝的現象。在中其術的，因茫然不知所措，即心知其計的，亦爲這種疑神疑鬼的環境所逼，像煞有介事而受其強拉硬派至不敢辭。年來因爲這個緣故，幾至使得我黨漸漸失了重心，幸得這次發作得快，與他一刀兩斷，否則我們國民革命，那不會龍頭蛇尾，得不着一點甚麼歸宿麼？四是阻擾北伐。共產黨雖然已經操戈入室，潛襲了本黨的內部，極盡其把持操縱的能事，然而究竟因爲他們的勢力還小，竊恐革命軍急劇發展，他們來不及準備襲取這些地方，

或反而因爲黨羽分發各方，不能集中使用，竟致連那根基尙未穩固的原來勢力，亦跟着搖動——消失。因爲這個緣故，所以阻擾我們的北伐。去年三月廿日的事件，其重要原因即爲蔣總司令要北伐，他們圖危害蔣總司令而發生。及至北伐軍出發，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又有反對北伐的言論，但他們尙料不到我們革命軍前進極速，無敵不摧，咄嗟之間，便攻到武漢；中國共產黨的僞父鮑羅庭嚇得魂不附體，一連打了三次電報給軍事總顧問嘉倫說：『革命軍應到武漢爲止，不可進攻江西，你要設法阻止。』我們試想一想，不得江西，武漢必不能守，此稍具軍事眼光者也能明白。及至江西攻下，總司令召集各軍高級軍官在南昌開軍事會議，提出進攻東南的計劃，鄧演達，唐生智及各俄人異口同聲反對，嘉倫亦然。我記得鄧演達有一次對我說：『出兵東南完全是介石欲在江浙別開局面的政治問題，大家都不贊成他。』唐生智也有一次同我說：『介石獨違衆議，用兵東南，必招失敗，他失敗時我不能救他，他便完了。』嘉倫也有一回到同仁會醫院訪我說：『用兵東南實在毫無把握，我也不知怎樣計畫才好。』試思當時孫傳芳以殘敗之餘，張宗昌乃烏合之衆，如何不能攻打？而他們竟不約而

同，阻擾用兵，這是爲着甚麼？幸而蔣總司令獨排異議，不爲所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鼓行而東。他們既無可如何，乃截止彈餉接濟，搖惑工人，搗亂後方，千方百計，不達其破壞國民革命的進行不止。凡上所述那些妨害北伐破壞國民革命的事實，無論何人都是不能爲他辯護的。五是激起外交的重大糾紛。原來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本是要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但凡事都要有次第，我們若先將軍閥打倒以求國家的統一，那裏就能夠打倒帝國主義以恢復國權？因此我們國民革命的第一步工夫，自然是要打倒軍閥。然而共產黨却有他的陰謀在內，處處只想引起外交上的重大交涉，阻止我們打倒軍閥的進行。觀於這一次北京偽政府所發表從俄使館搜出的秘密文件，更可知共產黨早已定下這種仇殺外人的毒計，其欲顛倒我們的步驟，以妨害國民革命的成功，這也是不問那一個共產黨徒都不能辯護的一件事。

以上所說，均是共產黨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事實。關於第二層，容在下面再寫。

第二，破壞我們國民生活的基礎 我們中國現在的社會，還是一個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社會的經濟情形既然如是，那我們中國人現在物質生活的根據，自

然還植在那些獨立的農業者和手工業者身上無疑。我之所謂獨立的農業者，不單指自耕農而言，凡屬有勢力而又略有牛糧種子可以佃田耕作的佃農，也當然在內。所謂獨立的手工業者，更不單指營手工工業的業主和手藝鋪子的東家而言，凡屬外面開張店鋪內面另有製造場所的工商混合業者，也一併在內。這兩種的社會分子，在農業一方面，他們負全社會食糧生產之責；在工業一方面，他們也負全社會工業品最大部分生產的任務。我們這個社會，在物質生活上其所以能夠存在，就是因為有了他們存在的緣故。假使他們一朝沒了，我們全社會的生活，馬上就會宣告死刑。大家試想，這個關係，何等重大。我們如果不是求死，就決沒有要去破壞他們的理由。可是中國共產黨不然，他知道這些獨立的農業者和手工業者，都有他們獨立的生計，不但不能像那些土匪流氓，容易跟着他去殺人搶人，做他強盜黨的擁護者，而且都有求為小有產者的心理，事實上一定反對於他；此外共產黨知道更有一層，如其容留這些獨立的農業和手工業者繼續存在，那還有許許多多的健全從業者，因為他們一則有業可就，一則他們本又都有求為獨立的農工業者的意志與可能，結果也必不能跟着他胡作非為，



來擁護他這個強盜羣的共黨；於是他就不能不處心積慮，務必把這種獨立的農業者和手工業者根本破壞，叫他們和一切從業者，一齊變作流氓，弄到莫可如何的時候，都得跟着他去亂鬧。大家不要誤會，說我所加於中國共產黨的罪名，是莫須有三字獄；我且依據事實說明，並依序先從農業方面說起。凡是一個獨立的農業者，他每年的生活，照例是把他所生產的糧食及副產物等等，除供給他自己所必要的分量而外，其餘都拿去變換金錢，來購買他所不能生產而又為生活所必需或為繼續他的農事所必要的種種物品。共產黨知其然也，於是在湖南湖北尤其是在湖南，一面不合情理的低減他們產品的價格，務必要他總不值錢，一面又禁止產品的流通，務必要他們有物不能為用。試問產品的價格太低，農業者為什麼要倒貼生產費去耕作，況且有物不能為用，農業者又那有能力繼續耕田。結果下來，自當就只得放棄自己的業務，而獨立的農業者破壞了。其次再言工業。共產黨破壞他們的唯一妙法，就是過度的提高工價，極端的提倡工人自由。本來一個有歷史的社會，因為有不斷的衝突與不斷的調和，生產關係者間的分配關係，換言之就是業主從業者間的利潤與工錢關係，大體是近乎自

然的；特別是在手工業社會，所有獨立的手工業者，都不是有很大的勢力，可以壟斷勞動市場而成立一種只是於他有利的僱傭條件；這是稍有經濟常識或社會經驗者，都可以明白承認的。道理既是如斯，那我們除了對於業主在制度上，（例如徒弟制度，）或特別個所有些榨取勞工的行爲應該加以改革而外，一般的工價關係，在社會經濟未曾進步尤其是在這個長期的戰亂當中，是只好聽其自然不可揠苗助長的。可是中國共產黨不然，他不顧經濟的事實如何，一味提高工價，自變成以至幾倍不等。大家試想，如果業主確是以前榨取勞工得了過剩的利潤，他們爲顧全貨物的銷行起見，自然只好掏掏腰包，由自己來負擔這些新加的工價。但是照我前面所說，長期的手工業社會裏面，這種榨取的情形是不多的，因此這筆新加的負擔，勢不得不轉嫁於社會。本來在這個長期的戰亂當中，整個的社會，都已經弄到精疲力竭，對於一切貨物的購買力，即令物價不變，也都一天減少一天，何況現在因爲增加了許多工資要增加許多物價，試問這種昂貴的貨物，那還能夠銷售，大家都知道工企業的存在，是社會的消費維持的，如今沒了消費，這種的工企業是不是只好關門。加以共產黨無條件的解放

工人規律，弄到東家對於工人，聽他如何怠慢，不敢說他半句話，有時不識時務的老闆，偶然說了一半句，馬上就會提到工會裏面去罰錢，還要戴着高帽子遊街，後面緊跟着如狼似虎的糾察隊，拿了兇器毆打着，要他一面走一面喊說他是反革命他壓迫工人。大家再想，工業家的結果弄到了這個樣子，試問誰還樂意去撐持那個門面呢？結果在這雙重壓迫之下而獨立的手工業者破壞了。我前面說過，我們中國人現在物質生活根據還植在那些獨立的農業者和手工業者身上，現在共產黨極積的爲要製造無產者來供他的指揮，消極的爲要毀滅他的反對者來行他的暴政起見，硬要把他們破壞乾淨，這豈不是要教我們中國全國國民都非去餓死困死不可嗎？人類一切的慾望，生存慾是最根本的，一個不會溺水的人掉在大海裏面，也還要掙扎着只想爬上岸來，一個如何文弱可憐的人遇着猛獸，也都要拚着死力和他抵抗。我們國民現在的生存，受這樣重大的威脅，我們怎能不去捨命的救命？奉勸大家，生存的要求是大家都有的，凡不是願意自殺的人們，都應該快快起來幫同我們國民黨來撲滅這條毒蛇這隻猛獸——這個罪在不赦的中國共產黨！

## 列寧主義的弱點之暴露

劉蘆隱

一

「中國哪裏有共產主義？舶來品罷了。中國哪裏有共產黨？俄國的雇奴罷了。」

這話倒也流行了許久，其簡單含義，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把戲，不過是西洋景。吳稚暉先生現在把這西洋景拆穿了，許多素來不知道共產黨的，現在纔也曉得它們原來不值半文錢。可是在中國不值半文錢的東西，俄國且不惜出重資以豢養之，自必有故，於是吳稚暉先生拆穿中國共產黨的西洋景，我們就不能不拆穿列寧主義的西洋景了。

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所指揮的，而第三國際就是列寧主義的國際，也就是俄國的共產黨的國際。以前有些人一聽見大家說及中國共產黨受俄國指揮豢養的事實，輒起而狂辯，謂共產黨受第三國際指揮，與俄國是沒有關係的，而不知在以前已是欲蓋彌彰，在今日則許多人都知道俄國對於第三國際的委員長有絕對支配任命之權，對於第三國際的政策和策略有絕

對獨攬之權。換言之，第三國際不過是蘇俄用以羽翼東方弱小民族間的共產黨，以中國共產黨而受蘇俄指揮餵養，本不過是這麼一回理所應有的事，何必遮遮掩掩地堅辯呢？不過中國共產黨人以爲跨進國民黨來了，正好借孫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做掩護，避開受蘇俄餵養的惡名，所以就堅說他們只是第三國際的會員，而並非受蘇俄的指揮餵養。這種欺人自欺的辯護，正與否認物質文明的老名士，所得的是洋錢，所吃的是洋菜，所穿的是洋貨，所坐的是洋船，而猶正襟危坐的說道：『我是保存國粹的名教中人，』一樣地可笑。

中國共產黨既然像姨太太偷了和尚，愛上了第三國際的幕後一個蘇俄，而蘇俄所頑弄的法宝又既是列甯主義，那我們直接爲了解中國共產黨的行徑，間接爲了解蘇俄的行徑，都有認識列甯主義這件法宝之必要。列甯自命是祖述馬克思的。而且共產黨人都認定列甯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之擴大。但是考其實際，却又不然。史丹林是俄國現在最有權力的列甯主義者，且看他爲列甯主義所下的定義，他說：『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之馬克思主義，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具體的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

『我們相信史丹林受列甯一生的陶冶，其說明列甯主義，一定是又具體又忠實，一點都不會錯的。將史丹林的定義實事求是的說來，列甯主義，簡單明確，就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的代名。可知列甯所祖述的，只是馬克思主義當中階級鬥爭的理論之一部，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全部。有人說馬克思的全部學說，如科學方法，唯物史觀，剩餘價值，階級鬥爭，非不龐然大觀，但只是有理論而無策略；有理論而沒有策略，就好像一個男子五官四體俱備，却被人割了勢，哪還行嗎？依此說法，列甯祖述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之說，在馬克思全部學說中，還算是比較得了馬克思的勢。但列甯還嫌馬克思的勢不夠，所以就加上了階級專政的策略，這就形成其所謂列甯主義。於是我們就可以斷說，列甯之祖述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祖述全部馬克思，只是祖述馬克思的勢；中國共產黨祖述列甯主義，更沒有祖述全部列甯，只是祖述列甯的勢。所以一般共產黨人，頭上戴了列甯的勢來跨耀人的，正可以不必獻醜，因為他們的祖宗列甯，頭上也不過戴的是馬克思的勢，至於全部馬克思，不但是共產黨人不要用的，就是列甯也不要用的。

再看史丹林爲列甯主義所下的定義，『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句話是怎樣解釋呢？史丹林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在一個革命之前的時代，那時帝國主義尚在初結胎的狀態中，無產者還只是在預備革命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直接的實際的需要。列甯却生在一個帝國主義發展和無產革命擴大的時代，這個時代，無產革命已在一個國家（俄國）獲了勝利，摧毀了那兒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展開了無產階級的民主的新紀元，蘇維埃的新紀元。所以列甯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之擴大。』史氏這個解釋，其意以爲馬克思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尙不是需要，列甯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却在俄國成了功。但是列甯時代客觀上無產階級革命比馬克思時代無產階級革命擴大，就可以說主觀上列甯主義是馬克思的擴大麼？我們姑且退一步，承認列甯的時代產生列甯主義，而馬克思的時代只能產生馬克思主義，那末，史丹林所謂『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在一個革命之前的時代，那時……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直接的實際的需要』一語，就不啻是說馬克斯在那時代所產生的主義，還不是適合於無產階級革命之直接的實際的需要，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就是不適用於無

產階級革命；既然如此，爲什麼一定要借馬克思主義來做列甯主義的掩護呢？爲什麼一定又要說『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呢？所謂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反而言之，即馬克思主義不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主義。馬克思主義成於七十多年以前，其所研究的材料和對象，本來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其不適用，毫無疑義。列甯主義者對於人家說馬克思不適用，就說不對，而自己却也承認馬克思主義不適用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對於考茨克一派學者糾正馬克思主義，就詆爲『馬克思的修正派，』而自己却也承認馬克思主義的不充分。馬克思主義既已不充分，到了列甯手裏，只剩下了一個階級鬥爭的學說，形成其所謂列甯主義，而所謂列甯主義，又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至此我們可以恍然大悟俄國共產黨自詡列甯主義爲馬克思主義之擴大，原來不過是買空賣空，究其實際，列甯主義只是撕裂馬克思主義之一小部分，而其所特有的陰險猙獰之策略，則固與馬克思主義拮合不攏；這正與中國共產黨假意加入了國民黨，拿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去一變，便只剩下『三大政策，』而所謂



三大政策，只是由中山先生全部的思想 and 政策撕裂了一點下來，另外改篡了一點出來，就完全與三民主義拈合不攏的，完全相同。如果列甯主義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之擴大，那末中國一般西比朋友，正可以說『三大政策』是三民主義之擴大，這只怕誰都要嗤之以鼻吧！

## 二

列甯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其出發點就與馬克思主義的根基相反。馬克思所最信賴的是科學方法。他用了科學方法去研究歷史的和當時的事實，便斷定資本主義之崩敗和社會主義之成功，一定是在工業發達到極完備和工人階級佔最大多數的國家。可是列甯就說，不然。列甯的理論，以為資本主義的戰線最先破裂的地方，不必一定是工業最發達或工人最多的國家。反而言之，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最弱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的戰線最先破裂的地方；因為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最弱的地方，無產階級革命纔容易起來。因此，無產階級革命發生而衝破資本主義戰線的國家，反而是生產落後的國家，便是一件很可能的事。列甯這一個理

論，至今一般列寧主義者就拿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做它一個事實的證明，而堅信在生產落後的國家，是能夠作階級革命和階級專政的。我們於此，就可聯想到兩個月前陳獨秀汪精衛兩人的聯合宣言當中，所謂中國是生產落後的國家，中國共產黨決不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話，其為誑騙三歲小兒之談，就可不辨自明了。

依列寧的理論，無產階級革命的地方，必須要在生產落後的國家，這一說是根本和馬克思的理論相背馳，已如上述。但是生產落後的國家，便是工人佔最少數的國家。革命是大多數人的事業，以最少數的工人來造成革命的力量，不是天下最不合於革命原理的事嗎？然而列寧主義者却要強做，因為要強做，便不能不想出種種陰謀挑撥和窮凶極惡的方法出來。這種種方法，中國共產黨已經用到中國來，結果只成了許多反社會和反革命的罪惡，以其非本文範圍所論列的，姑且不說。但就列寧主義而論，生產落後的國家，靠工人作階級革命，力量既然微小得很，那就不能不利用人家做工具，於是列寧的第二個革命理論，便是利用兩種工具：一是農民；二是東方弱小民族。利用此兩種工具的根本原則，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

目標，要由資本主義移到帝國主義。列寧的意思，以為從前滋長發育的資本主義，現在已成爲日薄崦嵫的資本主義，（這一說與今日繼長增高的資本主義之事實相矛盾，盡人皆知，）可以不必打而自倒，唯有提出帝國主義來做革命的目標，則西方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可與東方民族的革命運動聯合爲一條戰線。這一個理論，乃列寧最得意之作，也是第三國際同第二國際立異之要點。我們現在且來批評這一個理論。我們要曉得列寧主義者之所謂工具，是用得着的時候就利用，用不着的時候就要拋棄，甚且要打倒的。所以他們對於農民，對於東方弱小民族，既然是當作工具，也就要以工具來對付。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開始時，農民便是工人的同盟者，東方民族便是蘇俄的同盟者，但是到了他們認爲無產階級革命成功時，農民和東方民族，就一齊要被他們宰制，甚且要被他們打倒。這還不過就他們的理論推闡而言，事實上不待他們無產階級革命成功，農民就給他們做了犧牲品，東方民族也給他們做了犧牲，這是現在湖南湖北的農民被犧牲，和蒙古淪爲蘇俄的殖民地，可以證明的。這是第一點。其次，列寧主義者的革命目標，由資本主義移到帝國主義，可見列寧主義的革命，已離開了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的基礎，依馬克思的學說所下的結論，無產階級的敵人唯有資本主義，離開資本主義，離開資本主義這個目標，無產階級革命便沒有意義。固然，列寧主義也仍舊保存資本主義這個目標，但是因為它要在生產落後的國家作無產階級的革命，專利用最少數的工人做主力是不夠的，所以又想要利用東方民族革命做工具。因為要利用東方民族做工具，所以它的革命目標的重心就不能不移到帝國主義上面來了。革命目標的重心既然移動，列寧主義的革命，便變成一脚搭在無產階級的船上一腳又搭在東方民族的船上的怪物，結果便對於無產階級是不澈底的革命，對東方民族也是不澈底的革命。這個雙方都不澈底的革命主義，只要被兩方船上的革命者一推，便要落到反革命的深淵裏，永遠不能翻身。列寧主義者自己未嘗不預先想到這種危險，所以他們就竭盡陰險狠毒的能力，一定要把無產階級和東方民族操縱住壓制住，使無產階級不能有真正自覺獨立的革命運動，使東方民族也不能有真正自覺獨立的革命運動。但是壓制也好，不壓制也好，列寧主義者終要事實上成爲無產階級和東方民族真正自覺獨立的革命運動的敵人。因為把無產階級和東方民族的真正自覺獨立的革命

運動操縱壓制起來，事實上一定要變為無產階級和東方民族的反革命者。所以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實行起來就一定會做到反革命的地位，其原因就在此。這是第二點。總合以上二點的批評，我們就知道列寧主義的第二個理論，利用農民和東方民族，其所暴露的弱點是：

(一)列寧主義對無產階級的革命不澈底，對東方民族的革命不澈底；(二)列寧主義利用農民是犧牲農民，利用東方民族是犧牲東方民族；(三)結果就是農民為不澈底的革命而犧牲，東方民族也為不澈底的革命而犧牲，犧牲了的，是白白地犧牲了，冤冤枉枉地犧牲了，沒有犧牲了的，一定會起大覺悟，而將列寧主義打倒。中國民族啊，中國的農民啊，我們在還未被革命不澈底的中國列寧主義白白地犧牲的當兒，要趕快起來打倒它，為我們自己獨立的革命運動而奮鬥啊！

列寧主義的第三個理論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簡切地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的核心，其他列寧的理論，都不過是為這個核心而設。列寧說：『革命的主要問題是權力問題，』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意義有兩點：其一，階級獨裁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其二，階級

獨裁是壓制一切階級的權力。階級獨裁何以是工具？史丹林說：『階級革命有三件事要作的：（一）打破地主與資本家的抵抗力，使他們不能恢復資本的力量；（二）組織社會主義的建設，使一切工人都以無產階級爲中心，集合起來，預備漸漸消滅階級；（三）把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的軍隊，反對外敵，帝國主義。要做成這三件事，階級獨裁便是必要的工具。』階級獨裁又是怎樣的權力呢？史丹林又說：『階級獨裁並不是像改組內閣一樣，政府裏面換了幾個人就算完事的，它是一個新國家，無產階級的國家，從資產階級的舊國家之倒塌中樹立起來的。它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材料組成形的，乃資產階級被推倒之後，用種種暴動和武力，破毀資產階級，掠奪地主和資本家，把生產機關歸於社會化，使無產革命擴大而成形的。無產階級的獨裁制是革命權力，站在暴動和武力基礎之上，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家是統治階級的手裏所握的工具，以打破它的階級敵人之反抗爲目的。在這一點上，無產階級獨裁是和其他任何階級獨裁無差別，因爲無產階級的國家是壓迫其他階級的工具。』從這裏我們就知道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原來不過是等於滿清入關嘉定揚州屠城式的舊東西，所不同的是

，列寧主義者爽爽快快地說他們的專政，是以暴動和武力爲中心，這是比一切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狎獮暴虐還要真實得多了。列寧自己也說：『無產階級獨裁無產者壓迫資產者的統治權，這種統治權是不受法律的限制的，完全以暴力爲根基。』從這一個理論上面，列寧更演繹出兩條原則。第一，無產階級獨裁是決不能成爲『完全的民主主義，』而使無分貧富都能享自由平等的幸福的；它只是爲工人和沒有財產的人的獨裁，但只是反對資產階級。第二，無產階級獨裁決不是資本社會與民主主義和平發展的結果；必定要把資本社會的軍隊和國家機器破毀無餘，把資本社會全部行政機器和政治系統毀滅乾淨，纔能產生無產階級獨裁。

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心理論，這樣便赤裸裸地現露出來了。這樣一個殘暴凶惡的獨裁，理論上儘管你說是用以對付資產階級，實際上便是我們中國歷史上秦始皇傳統下來的專制政治，着實做起來只有『天王聖明，』其餘無論何人，都是『臣罪當誅。』自古以來，獨裁和專制在事實上是沒有分別的。歷史家本着一國一代的愚民政策的慣例，說某國某代的君主是君權神授，某國某代的狄克推多是暴力僭竊，其實都是專制，說破了半文錢都不值的。無產階級獨

裁，獨裁之上加了無產階級四個空空洞洞的字樣就會新鮮了嗎？老實說，凡是專制政治的國家，無論古今中外，都有兩個階級，一是統治階級，一是被統治階級。列寧主義不過把統治階級喚做無產階級，把被統治階級喚做資產階級，換湯不換藥，而實際上真正的無產階級還是做了祖傳的胼手胝足的苦百姓，和其他要受公開奴戮的資階級，一樣地要受專政家之壓迫，這只可說得是俄國專制到了列寧手裏換了一個朝代，列寧做了一個秦始皇，史丹林做了一個趙高，明明白白是開回幾千年前的倒車，哪裏還可以算得是革命呢？

### 三

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其最重要之點，我們已經分析過了。但是列寧主義是窮凶極惡的專政主義，專政家所最重的是策略，於是列寧主義之策略，我們更不能不把它暴露出來。列寧主義之策略分兩種：

(一) 戰略 第二國際的階級鬥爭，其唯一工具是國會，國會以外，幾乎無所謂階級鬥爭



的方法。列寧主義者自詡他們比第二國際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們不全靠國會的立法權爲武器，而另外採取種種非法的手段，利用許多勢力爲工具。因此，列寧主義者的戰略就特別的講求起來了。他們的戰略多得很，這裏不過舉出一二重要例子，其餘有機會時再來貢獻罷。

例一，自一九〇三年一月到一九一七年一月，他們的秘密戰略是：

目的——推翻俄皇沙，廢除最後的封建餘毒。

革命的主力——無產階級。

直接的後備——農民。

直接的工作——使自由主義的君主主義的資產階級陷於孤立，不獲與農民謀聯合，及不獲與沙皇謀妥協而延緩革命的進行。

力量的佈置——工人和農民同盟。

列寧以這一期的戰略爲『民主革命的戰略』，所以他說：『無產者應該完成一個民主的革命，把農民的羣衆連合起來作無產者的同盟，這樣，就可把君主專制的抵抗力擊破，而使

不穩定的資產階級陷於麻痺之境，不得顫動。」

我們要曉得中國共產黨自民國十三年以來，跨在國民黨的肚皮裏，大弄其金箍棒，就還是賣弁列寧這一個戰略。國民黨努力於國民革命已經幾十年，共產黨拜了孫中山先生的一個俄國不肖徒弟（孫先生說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還是因為學了他一點三民主義，可是列寧不肖，却要賣弄其既非牛克思又非馬克思的主義，）做師傅，却要拿他俄國陳腐不堪的方法來對待國民黨，焉得不教孫先生的信徒們暗笑其愚昧？他們起初也算認識國民黨要打倒軍閥，這個目的是和他們相同，但是一加入到國民黨之後，他們却大發其列寧之迷，既想竊了國民黨已成的工人組織去做他們的主力，還想操縱農民組織為他們的後備。國民黨乃中國唯一的革命黨，他們却竟敢造出代表資產階級的謠言，以誣衊之陰謀所以陷國民黨於孤立，使民衆不與國民黨接近。舉凡各地共產黨所有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的事實，沒有一樁不是由於鈔襲列寧這一個策略的印版文章而來的。殊不知列寧的策略，用之以對付真正革命的敵人，尙有可說，若用之以對付革命黨，即成了反革命；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反革命罪惡，決不是引列

寧主義所能抵賴的；更深刻的言之，唯其引用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反革命罪惡乃益著。

例二，自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同年十月，列寧的秘密戰略是：目的——推翻俄國以內的帝國主義，並退出帝國主義的歐戰。

革命的主力——無產階級。

直接的後備——較貧苦的農民。

可能的後備——鄰近各國的無產階級。

最便利的形勢——帝國主義的歐戰延長，各帝國主義的國家發生大變亂。

直接的工作——陷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於孤立，（即指孟希維克派，）逼迫他們與

鄉村工人聯絡，並與帝國主義妥協而放棄革命。

力量的佈置——工人與貧農同盟。

這一個戰略，是列寧所認為更進一步的作戰計畫。自一九一七年三月起，列寧以為已由民主革命到社會革命的時期，所以他說：『無產階級應該完成社會革命，其方法在於把半無

產的鄉村分子連合起來作無產階級的護衛，以武力及暴動打破資產階級的抵抗力，並使農民和不穩定的小資產階級都陷入麻木不仁的狀態。」

我們看了這一個戰略，要注意比較它的內容已和前面所舉的第一個戰略不同。第一，這個戰略，目的在於利用歐戰去做社會革命。現在共產黨在中國的陰謀，却要鈔襲列寧的舊文章，沒有歐戰，却想製造一個第二世界戰爭出來，做他們反革命的燃料，只要看看最近英日俄各國的明槍暗箭，就可以知道他們是甘心中國為世界第二次大戰的犧牲品，甘心做俄國併吞中國的導火線。他們是不要祖國的，但是俄國却要他們呼『蘇俄是我們的祖國！』不知一般被狐狸精迷惑的人，看了這個戰略，也還有覺悟否？第二，這個第二戰略和第一戰略不同之點，就是第一戰略，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後備，到了第二戰略，『直接的後備』之下農民已經不見了，其原因就是農民之外，又分出貧苦的農民出來，這就是等於中國共產黨分析國民黨為什麼『左派』『右派』的一樣，分了之後，就要利用貧苦的農民去打倒農民，所以列甯纔說：『以武力及暴動……使農民和不穩定的小資產階級都陷入麻木不仁的狀態。』再參閱列甯

利用農民做工具的理论，我們就應該恍然大悟：第一戰略中做直接後備的農民，直是做了工具；等到第二戰略實行之際，農民這個工具，已經用不着了，所以他們就要把農民打倒；打倒之法，就是從農民當中拆出貧苦的農民，於是又用貧苦的農民做工具，去打倒農民。以此類推，今日被利用的無產階級，和鄰近各國的無產階級，甚至於原來同在一黨的孟希維克派，都是一時工具，到了明日，就立刻要被打倒；更推而至於被認為革命主力的工人，也不過是做了少數專政家的工具，以工具的資格而來的，還是要以工具的資格而去，什麼『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革命』的話，都不過是狐狸精迷人的甘心蜜語，和刁峻肉慾的色香，等到無產階級的精血枯竭時，那狐狸精便要『又顧而之他』了：這便是列寧的主義和策略之秘奧啊！這種秘奧，着實地分析下來，還不過是我們中國的曹操『寧使我負天下人，毋使天下人負我』的極端殘酷的犧牲其他一切個人而爲自己一個人的個人主義。真正的革命者，正要首先打倒這種個人主義，那還能容他在中國流行嗎？

(二)戰術 戰術是實現戰略的具體方法，其目的在於利用一切戰鬥的形式和指揮無產階

級組織的活動，以期發生必要的最大效能，而取得戰略的最大勝利。簡單言之，列寧的戰術，在於利用戰鬥方法和無產階級組織。這裏只能略舉一二種戰術，以見一斑。

### 例一，決鬥時的戰術：

「當革命正在成熟的時候，必須集中它的力量到敵人最易受攻擊之點，以求一擊即決勝負；要擴大我們的攻勢，使反叛的暴動爆發，這個時候，主力的先鋒之外，要把一切後備力量集合起來，纔是取得勝利的保證。」

關於這一個戰術，列寧曾經說過：

「切不要把反叛當作兒戲，我們的反叛行動一旦開始，大家都要牢記着，一定要把它做成功，纔能罷手。在最緊急的俄頃，要把比敵人更優勝的力量合起來，否則敵人比你準備得更好，組織得更好，就要把你的反叛完全消滅。反叛一經開始，要拿最大的努力去進行，尤其無論犧牲什麼代價，都要取攻勢。「取守勢是反叛的死症。」敵人的步隊散亂的時候，必須乘機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例二，暴露敵人的弱點的戰術：

「民衆必須要使他認識維持現狀之不可能，而努力求其推翻，並且要使他隨時能夠贊助我們的先鋒。……我們的先鋒或許早已失了工人的同情，工人或許也失了民衆的同情，如果波希維克當時沒有決議參加克倫斯基政府的國會，到國會內去鼓動盛大的宣傳，把革命的力量集中在國會行動一點上面，使民衆認識國會的不中用，認識帝國主義派的政綱之虛偽，認識與俄皇沙謀妥協之不可能，然後才認識工人與農民聯合的必需要。如果沒有這一個經驗，便沒有方法可以暴露帝國主義派的弱點，使我們取得領導無產階級的地位。」

列寧主義的戰術多極了，我的手也寫倦了，以上不過寫了兩個例證，就可以使我們明白列寧主義之所謂策略，不過是極造謠，挑撥，離間，煽動的能事。列寧用之於俄國，對付君主專制。尙有可說，而中國共產黨承受得來，却不敢施之於軍閥和帝國主義，反而施之於革命歷史最久革命信仰最堅革命主義最完備的中國國民黨，學列寧而不學其所以用之之途，中

國共產黨的反革命罪惡，真是萬死不赦的啊！



## 隱藏在重重黑幕底下的共產黨

劉廬隱

### 一、隱身術

中國共產黨亂處於重重黑幕底下，他的真實醜態怎麼樣，不但非共產黨的人不知道，連共產黨黨員也都不清楚。我們把近來所得的許多事實和證據集合攏來，加以精密的分析，得了不少的論斷。現在且把重要的論斷，列舉出來，給大家看看。

(一)共產黨自己說是祖述馬克思主義，但考其實際，不過冒着馬克思主義之實。馬克思主義本來遭了三種厄運：其一，他本身是成立於七十多年前的歐洲經濟現象之上，而非成立於世界全部進化現象之上，尤其不是成立於現在的進化現象之上，所以他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就遭了第一重厄運；其二，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無論第二國際或第三國際，無論社會改良派或革命共產派，都拋棄了馬克思的科學方法，都不從新的事實中去證驗馬克思的理論和實際，只沿用着馬克思舊理論的幾個空名，如『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剩餘價值』，

而並不去考驗它的實際，所以馬克思的理論，也和馬克思的軀殼一樣，經過幾十年後就成了化石，再也沒有復活的新生命，於是就遭了第二重厄運；其三，全世界各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既然都不從馬克思的理論上努力，而做他們熱烈爭辯的焦點的，還是政策和策略，於是革命派則講革命行動的政策和策略，緩進派則專講改良的政策和策略；兩派對壘的結果，便把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打到九霄雲外去了，這是馬克思主義所遭的第三重厄運。共產黨便是專講革命行動的政策和策略的。以馬克思主義所遭的幾重厄運而言，共產黨是站在第三重厄運之外的，離馬克思主義真不知有多少程途。由此，就可證明共產黨所謂祖述馬克思主義，不過拿馬克思主義做個羊頭，而他們隱身在馬克思主義後面，還是另外賣他們的狗肉。

(二)揭去一般共產黨的第一層黑幕，即所謂馬克思主義，又現出一層黑幕。這一層黑幕上面，寫的是列寧主義四字，於是列寧主義又成爲共產黨的羊頭了。列寧主義後面賣的是什麼狗肉？俄國史丹林已經告訴我們，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且看列寧主義這樣搖身一變，就搖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似乎是理論是理論，策略是策略，釐然

分明。但是史丹林又很老實地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革命的權力，站在暴動和武力基礎之上，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這便見得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只在於顯出暴動和武力的必要，除此而外，就再沒有高深理論了。暴動，就是吳稚暉先生所說的『驅不費一錢的民衆，叫他們站到街上去，把熱情去抵當機關槍，讓民衆去血肉橫飛的大慘劇。』武力，更不算希奇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不能認爲列寧革命的新發明。所以列寧的理論，並無神秘，還是拾取中外史不絕書的殺人盈野的老方法。至於什麼『打倒資本階級』，『打倒帝國主義』，『弱小民族解放』，『不過拿來『激起』民衆的『熱情』，『好叫民衆去抵當機關槍，爲共產黨作血肉橫飛的廣告』，他們哪裏真有打倒資本階級，打倒帝國主義，和解放弱小民族這麼一回事呢？如果列寧主義者真有這麼一回事，爲什麼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不到一年半就派代表尾隨美國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的腳後跟，乞靈於他們的援助呢？爲什麼自來未曾受過中國壓迫的蒙古，還要給蘇俄劫掠得去做被壓迫的附屬民族呢？至此，我們就可以曉得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所謂打倒資本階級，打倒帝國主義，解放弱小民族，都是騙人的假面具。在這些假面具底

下，隱藏着一副猙獰兇惡的真面孔，磨牙張爪的要吞併資產階級，吞併弱小民族；吞併完了，便長大一個比現在資產階級帝國主義還要兇狠百倍的蘇俄資本帝國主義！如果共產黨中真有革命的人，聽了這話，也應該說：『哼，這樣一個蘇俄資本帝國主義，是世界上最反革命的呀！』

(三)這樣一種猙獰兇惡的面目，就有些兒露出列寧主義的骨子來了。但這僅僅乎是有些兒露骨，全部的骨子，我們在後還要把他暴露。這裏且先說明列寧主義的後面還隱藏了一個『好像差人的帽子，見得官，見不得朋友』的中國共產黨。十三年之際，這個中國共產黨戴了一頂列寧主義的帽子，跑到孫中山先生面前，說他們情愿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搖旗吶喊來做國民革命的前鋒。孫先生答應他們了，他們跑回去就定了計劃，散布到國民黨的各級黨部，袖裏帶着一頂左派的高帽子，騙到一些新入黨而不明瞭黨的少年，把它戴上了。等到這些人戴上了共產黨手裏的左派高帽，心中便怡然自得，而共產黨於是就隱身在左派後面，舞弄其煽動挑撥的法術，叫他們出去遊街。這個時候，汪精衛徐謙這幾位忠厚長者的先生們

，看到那些戴着左派高帽遊行的大隊，也就不覺起了熱情，跳向臺上，高叫『革命的向左邊來。』這一喊，給共產黨聽見了，馬上就拿左派領袖的高帽子合在汪精衛徐謙的頭上，叫其餘戴左派高帽的人抬出去遊街。街上看熱鬧的羣衆，從前看見過汪精衛追隨過孫中山先生，徐謙招搖過基督教救國，只當他們是面目很熟的朋友，也就有些兒忍不住冷靜，怡然跟他們上路去了。所以講到共產黨的革命方法，只是：第一步，借列寧主義去騙取國民黨做幌子；而第二步，借國民黨招牌去騙取戴左派高帽的人做幌子；第三步，借戴左派高帽的人去騙取汪精衛徐謙一流人做幌子；第四步，借了種種幌子，纔騙到一些民衆；最後，纔借這種種幌子，添上一些民衆，就大幹其篡奪政權，武裝暴動，殺人越貨的好買賣。結果呢，共產黨終於隱藏在重重幌子的後面；直要等到社會破產了，民衆殺盡了，他們纔現露那副詐取了全社會的財物，掠奪了全民族的政權，殺盡了大多數民衆，只留得少數共產黨去專治專享的真面目出來！

總括起來，共產黨的最大秘訣，就是借幌子。他的幌子是多層的。單就上面所說明的，

第一層是馬克思主義；第二層是列寧主義；第三層是中國國民黨；第四層是所謂左派；第五層是所謂汪精衛徐謙一流的左派領袖；第六層是共產黨所謂民衆。層層的幌子，都受共產黨的操縱和壓迫。給共產黨壓在第六層的民衆，實在是最可憐的：供他們作犧牲，替他們抵鎗彈，替他們掠財物，回頭來還替他們抵命！如果這些可憐的民衆，來得及留下生命來漸漸覺悟，實非起來打倒共產黨不可。現在給共產黨壓在第五層的汪精衛徐謙一流人，比從前跳向臺上喊革命的向左邊來的時候，態度不是由雄壯而變爲惶喪了麼？可是當初隨人舞弄的人，到底還缺乏獨立的自覺性；否則，汪精衛徐謙，不應該早就脫離共產黨麼？至于爲共產黨壓在第四層的所謂左派，現在固然有許多覺悟到他們頭上所戴的高帽子，實在不成革命的樣子，也就丟掉了；但是尙有不少的人，還不肯脫下左派的高帽子，來受三民主義的洗禮，這豈不是他們還是沒有覺悟到他們那種反革命行爲之不當麼？

## 二、戰術

把共產黨所假借的重重幌子揭開了，共產黨所有的秘奧，就是策略或戰術。從表面上看，什麼策略，什麼戰術，似乎都是平常人所自來沒有知道過的。其實共產黨的策略戰術，只是殺人的方法，並無新鮮意義。讀者不要性急，讓我逐一證明出來。

共產黨的策略和戰術，都是本于列寧的『發明。』他的策略，我在本刊第一期中已經說明，大要不外兩點：（一）利用工人做主力，中農貧農和其他一時可以利用的勢力做後備；（二）利用本國的工人農民做主力，以鄰國的工人農民為後備。再加上前面所述假借幌子的方法，就成了所謂『獲取民衆』的策略。這三點，可以盡共產黨策略之綱領。關於他們的戰術，我在本刊第一期也略舉了一二點。但是他們有所謂『列寧主義的戰術』者，則為我前次所不暇備述的，現在且照錄幾部分，使大家窺破他們的鬼胎。原文有好些地方，字句和段落都有錯誤，想見中國的共產黨員實在幼稚，不是看不懂原本，便是糊亂抄寫後就始終置之高閣，沒有再翻來用過：

「什麼是黨的戰術 所謂黨的戰術，就是黨的政治實現性質傾向，和黨的政治行動的方

法。戰術（原文此處爲一段，下文是字起，另爲一段，）是由黨的大會議決的。這與戰術的決議爲的見實現黨的任務（此語究竟是如何抄錯了我們外人不能知，大概「與」字是「種」字之誤「見」字是「是」字之誤。）或在新的經濟環境中統一地實現黨的政策。戰術是隨時變更的。李卜克內西說：「我們若不能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隨環境變更我們的戰術，這個黨是沒有力量的。」因爲戰術是短時期中爭鬥的方法。

我照錄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要證明共產黨所謂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都是假的，唯有講殺人放火的法術是真的。尤其要注意的，就是他們並無誠心爲民衆謀利益的永久主張，只有一套自認爲得意的「隨環境變更」的「短時期中爭鬥的方法。」共產黨每每罵他們的幼稚分子爲「尾巴主義，」現在看他們所謂「隨環境變更」的「短時期爭鬥，」可見原來共產黨根本上就是投機的尾巴主義者，還要推諉到那些幼稚分子身上去麼？

2 怎樣決定戰術 爲要得到好的戰術，必要詳細分析階級力量，要很精細的分析經濟的全部。列寧說：「當討論戰術時，如果不建築在分析客觀的經濟環境上面，這種討論



是沒（沒字原文誤爲說字）有意義的』。……………

照上面所說，我們絕對不應該把階級利益混合起來，但是我們要問，（此字原文誤爲門），我們的黨是（原文又誤爲見）不是在任何條件之下，都是進攻而不調和呢？我們的黨要很靈敏的，在必要時，我們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改變我們的戰術。但是我們的戰術，在必要時調和，絕對不能與妥協主義者相混。

……當我們與某黨合作時必須與事平（按此三字不知中國共產黨員又如何抄錯了），解釋清楚，爲什麼我們要合作，因爲本黨很有利益。列寧曾作專書討論合作問題，他說我們與其他政黨合作時，我們當很確信我們的原則，來維持我們的地位。我們當很靈利的維持我們的信仰心，爲着預備將來革命。

現在我們來看俄國多數黨（波希維克派）關於合作問題之事實。一九零五年（原文誤爲一九五年）以後，多數黨參加極反動的國會選舉。一九零五年（原文仍誤爲一九五年）多數黨會與少數黨，（即孟希維克派）社會革命黨，在瑞士秦麥華德地方開會，

討論列寧第三國際。將軍訶里諾夫（原文此人名不明）圖謀復辟，我們多數黨會與少數黨合作，反對復辟運動，而他們不敢做，於是他們中間的工人，都走入我們的隊伍中來。

現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爲的是對於革命前途有利益。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中曾說過，無產階級應忠實於共產主義，但同時也要能夠有臨時與其他政黨的合作，無產階級（原文以下另爲一段）政黨，應該從與人合作中操練他的進攻和退守的戰術。

讀者看了上面這許多秘術，一定都會下這幾個相同的結論：（一）共產黨是暗中襲取古今奸惡梟雄的愚民政策，要把民衆挑撥到互相分裂而至於自相殘殺，所謂『爲要得到好的戰術，必要詳細分析階級力量，要很精細的分析經濟的全部』就是挑撥社會上一般民衆的利害衝突，然後共產黨便好從中取得漁人之利；所以他們纔反覆申說：『我們絕對不應該把階級利益混合起來』，爲的是如果階級利益混合起來，共產黨便無從施其反覆顛倒的手術。（二）共產黨要舞弄權謀術數，立心是怙惡不悛的，所以他們講『進攻』，同時也就要講『調和』；

不過他們與極反動的勢力調和合作時，就說是『本黨很有利益』，而『不能與妥協主義者相混』；其實我敢說世間唯有列寧所罵的幼稚共產黨徒，才會拋棄自己的利益，和人家講調協，如中國共產黨之拋棄中國民族利益，以受蘇俄指揮，就是一個好證明；除了幼稚的中國共產黨徒外，還有誰相信不顧自己利益的調和嗎？更有誰相信調和與妥協能有差別嗎？所以共產黨簡直是妥協主義者，還能瞞得過人麼？（三）共產黨既然是妥協主義者，但他却是一個手指頭遮羞，還遮不了他們借中國國民黨為租界的鬼計；『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為的是對於革命前途有利益』，因為他至少可以借國民黨去『操練他的進攻和退守的戰術』；無怪乎這次國民黨清黨之中，武漢共產黨忽然變更策略，也憑藉清黨運動做其保護色，而蘇俄共產黨執政的史丹林，甚且要叫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都要抓住國民黨不放手；這種情景，倒絕似上海四馬路的野雞抓住了過路客不肯放手，硬要他替他『操練進攻和退守的戰術』！這只有汪精衛這位忠厚長者才被牠拉住了，國民黨是再也不肯上當的呵！但是讓我們繼續看看共產黨進攻和退守的戰術罷：

3 進攻的戰術 現說進攻的戰術。如羣衆罷工，武裝暴動，國民會議等，都是適合於中國共產黨需要的。但在進攻中，我們有時也需要退守；不過他的趨向，始終是進攻的。……我們有下列幾種戰術：

(1) 羣衆罷工；

(2) 武裝暴動；

(3) 參加或不參加議會，（在進攻時期不取參加議會的政策，但亦不是絕對的）；

(4)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在進攻時期，戰術的根本問題是進攻的。但在進攻過程中的某階級上，也有退守的必要。例如蘇俄自二月到十月革命，所有一切運動的戰略或戰術，都是進攻的，都是預備奪取政權的，都是預備在各方面進攻必要的工具。但在七月時有一部分是退守的，因為資產階級得社會黨的幫助，向無產階級反攻。……但在訶里諾夫將軍復辟運動爆發時，羣衆馬上動作起來，向資產階級進攻。……以現在中國的情形來看，中國革命

到了一個什麼時期？第一大浪潮（五卅的大罷工）已停，革命有部分的失敗，（德謨克拉西革命成分已告了失敗）。但現在的時期，確是革命進攻的時期，是革命緊張的時期，（指五卅後而言）。第一個大浪潮雖然下去，但我們並不驚奇。第二大浪潮又將澎湃地起來，而我們的德謨克拉西的口號依舊保存着了，而戰術的口號，如武裝暴動，國民會議，依然提出進攻的形式。

共產黨的刁峻陰毒，至此已暴露無遺了。孫中山先生國民會議的主張，他們也想拿來利用，做武裝暴動羣衆罷工的引火線。孫先生的國民會議，豈是給若輩殺人放火的工具嗎？舉此一例，可以證明我們說共產黨簡直要把我們國民黨的一切做工具，是無論何人都不能抵賴的了。五卅事件之後，他們定了一個進攻時期，——進攻就當然是指在國民黨肚皮內大舞其金箍棒而言，——這裏也很鮮明的洩漏出來了。去年廣州三月二十日之變，共產黨進得太快，遭了『部分的失敗』。但三月二十日以後，他們對於國民黨提出的條件，都欣然接受，可以說是他們『在進攻過程中的某一階段的』退守。然而他們還是進攻，還是預備奪取政權，如

武漢非法聯席會議前後的事實，都是他們篡奪政權的證明：這裏也很露骨的給我們看得出來。幸而本黨的黨權恢復得快，不然，說不定不待國民黨實行總理開國民會議的主張時，而共產黨殘忍普遍的武裝暴動，早已發生；我們民衆被其淫威屠殺的，也就說不定應合列寧所謂『殺死百分之九十』的預算了。但是共產黨的罪狀，一定要等到他們殺了中國人民百分之九十纔算有了證據麼？兩湖水深火熱的人民，事實上所給的證據還不夠嗎？這裏所抄獲他們的秘密戰術，難道證據還不確鑿嗎？

4 退守的戰術……什麼是退守的戰術呢？退守戰術，就是革命黨在他整個的或部分的失敗底條件下，（此處疑有脫落）。在退守的時候，能保存基本的勢力，不受一點損失和動搖，是很難的。列寧說：『上山易，下山難』，就是說明這個意思。一九零五年的革命失敗後，多數黨的退守，比當時任何反對俄皇的革命黨的退守有秩序。我們爲什麼能做到這樣？因爲在革命未失敗前，黨曾作過很大的工作；即我們看清黨中不革命分子在革命失敗時的危險，因此在革命未失敗以前，就把他們從（原文誤爲以）黨

中完全清洗去，……這就是我們在失敗後能夠這樣有秩序退守的原因。

十月革命後，『布勒士提』俄德條約，德雖提出許多苛刻條約對付蘇俄，而蘇俄終讓步與他訂約，原因就是爲的退守。因爲：

(1) 當時前敵上有一千三百萬農民，不願戰爭；

(2) 可維持蘇維埃的政權；

(3) 若是勉強繼續戰爭，便要將蘇維埃政權墮落下去。當時多數黨中對這問題，分爲兩派意見：一派主張續戰；……一派主張媾和。……主戰派說：『如果媾和，則客觀上幫助了德國』。列寧說：『我們若不與德媾和，即是在客觀上幫助了協約國。現在問題不在此，主要的是要看與德國媾和後，對於蘇俄的利益損害如何。我們與德議和，即是給我們以休息的機會。……如果我們知道德國將革命，一兩星期內就可以爆發嗎，則我們自可與他繼續宣戰；但這種保證是沒有把握的，不敢相信的；想吃天鵝肉反失掉手中小麻雀，我們是不幹的』。

這一段話的總意義，就是共產黨無論遭逢什麼樣的失敗，戰略要馬上變為退守，目的到底不變。退守是靜待客觀的時機，不是放棄主觀的目的：這本來是革命的必要條件。但是有組織有計畫的反革命的共產黨抱持這一種觀念，其作惡的可能性，就比什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土豪劣紳都大得多。因為他們不管策略如何變更，甚至屈伏於德國的媾和，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不變；甚至屈伏於去年三月二十日廣州之變，屈伏於此次中國國民黨的清黨運動，而其破壞國民革命的目的亦不變。這種冥頑的共產黨，是我們不能不加以十二萬分的注意的。

### 三、紅色恐怖

我們明瞭共產黨的戰術，其次就須明瞭共產黨的戰術之作用。列寧主義的精髓，為無產階級專政。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並非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依馬克思主義的真意義，要工廠內的工人纔是無產階級。非在資本制度底下的工廠內作工的工人，便不是無產階級。



這一個觀念，是馬克思的正當解釋。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便已非馬克思之真正工人專政，爲的是：（一）列寧所造起的蘇俄，他的黨權和政權都非在真正工人手裏；（二）俄國共產黨所利用的是無賴階級，而非工人階級，並且無賴階級之外，更拿了剝削農民的無賴做後備隊。所以列寧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簡直是無賴的專政。這些無賴，是利誘威迫而來的，和袁世凱收買北京流氓去勸進是一樣卑鄙可笑的。俄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一樣，都是拿了這些無賴去做階級鬥爭，就成了他們所謂階級鬥爭之恐怖。加米里夫說：『列寧所介紹進來的就是階級鬥爭之恐怖』，（註一）可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恐怖。除淫威屠殺外，恐怖是沒有別的意義的。因此，列寧的戰術，除淫威屠殺外，也就沒有別的藝術的。我們回看前面所舉中國共產黨所謂『羣衆罷工』和『武裝暴動』，恐怖的意義，就更加明顯了。現在且再看『列寧的戰術』當中這一段：

戰術要簡單，口號要明瞭，使羣衆便於了解。因爲無產階級的政黨，是要羣衆維持反對個人的恐怖手段的行爲，但不否認階級的羣衆恐怖，——如德國大革命（資產階級

的)和俄國大革命(無產階級的)的羣衆恐怖。——一九一八年列寧被刺，及列寧格勒秘密警察長涅里次克被刺，我們即宣布羣衆的恐怖。又在南俄的紅軍，在進攻時，而後路有人勾結白黨，和在列寧格勒勸我們進攻時，而紅軍將軍在後方通敵，我們都馬上宣布羣衆的恐怖，殺反革命者。

這是共產黨以紅色恐怖，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明證。最重要的，就是：『爲羣衆維持反對個人的恐怖手段的行爲，但不否認階級的羣衆恐怖』。換言之，就是要個人不用恐怖手段反對個人，階級就要用羣衆恐怖反對社會。但是，既用羣衆恐怖對付了社會，何以又反對個人的恐怖，既然反對個人的恐怖何以又承認羣衆的恐怖？這真所謂『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小二勿曾偷』成了共產黨不打自招的殺人供狀了。這種不打自招的殺人行爲，實在是俄國革命成功的羞恥。所以張溥泉先生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梁山泊強盜方法』，吳稚暉先生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科學的」李自成張獻忠的方法』是等於『白起坑秦卒四十萬，黃巢殺人八百萬，終是開倒車的野獸』：這些話，現在得列寧恐怖戰術做了更切實的證明。但

是恐怖的作用在那裏呢？且看列寧被刺，渥里次克被刺，紅軍通敵，俄國共產黨馬上就宣布恐怖，我們就曉得恐怖之用意，在於使全社會陷於麻木不仁的狀態，好讓少數共產黨的槍子手慢慢去發展殺人越貨的獸慾。我們中國屠夫宰牛，把牛牽到面前來，雙手拿起大鐵錘，向牛的鼻梁上猛力一錘打過去，牛就馬上昏倒在地。屠夫便慢慢兒的割開牠的喉管，流盡牠的鮮血，同時幾個助手用小刀慢慢兒的剝皮抽筋，任意處置。恐怖之宣佈，用意實與屠夫一錘打向牛的鼻梁要害處正復相同。更可恨的。就是共產黨做了屠夫，而社會上大多數人都被他們當作牛來處置！一九一八年八月列寧和渥里次克被刺後，俄國羣衆恐怖的經過，是不是比殺牛還更殘忍呢？且看：（註二）

蘇維埃政府怎樣對付這些恐怖者（刺客）的行爲呢？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日『傑卡週報』發表一個半官式的通信，在列寧格勒一地，傑卡——蘇俄的秘密警察——下令槍斃了五百名的被捕者。……實際上被槍決的還多於此數。……即此五百名的無辜，連名字也沒有宣布。

一個親眼看見這回事的人說：

至於列寧格勒，在一九一八年那一年所處決的人數，一般人都說不下一千三百名。誠然，波希維克只承認殺了五百名，但這是因為他們很小心地把幾百名的軍官，官吏，和個人，由地方蘇維埃的命令，在聖彼得，聖保羅，和克郎斯得砲臺所槍殺的，都不算在裏面。單在克郎斯得砲台後面，被處決的，就有四百名。

莫斯科，因為有人希圖謀害列寧，要為他復仇，在同一時期槍決了三百多名的被補者

.....

為列寧被刺案而槍決整千整百的無辜者，不僅僅是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殺風遍被於蘇俄的城鎮農村，不分大小。蘇俄報紙發表各省槍決人犯的消息很少，只有那榮卡週報偶然提到槍決案，而其標題總是『下面各人，已為謀刺列寧案復仇而槍決』。.....

據 *Nizhny Novgorod* 的勞農雜誌所載，該處的桀卡宣布：「每一共產黨員之被暗殺或被希圖暗殺，必須槍決若干資產階級的人們以報之。現在我們的被殺者和被傷者之血族，已有復仇之呼籲了」。根據這一個理由，當時一天之中，桀卡就曾拘捕了七百人。

刺死渥里次克之兇手是一個學生，名叫 *Leonid Kanne-giesser* 據蘇俄官廳報告他的供詞，他是因為渥里次克拘捕了幾個軍官，而且槍決他的一個朋友名叫 *Paretvveig* 的，所以他就自動的暗殺了渥里次克，並非受任何個人和團體指使。行刺列寧的是一個婦人，名叫 *Kap'aw* 的。牠並沒有刺着列寧。但自這兩案發生之後，全俄立即宣佈紅色恐怖。上面我不過舉三個城市所拘捕槍決的民衆而言，其實蘇俄全境「爲渥里次克和列寧復仇」所屠殺的民衆，還有整千整萬。我案頭有專描寫這一回羣衆恐怖的一本書，其中敘述淫威屠殺中慘死的人數，真是令人不忍卒讀。我且先把蘇俄實行屠夫政策的鼓吹摘錄一二，然後再來敘述全俄恐怖的一般結果。下面是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彼得格勒的『紅報』（註三）爲渥里次克

案而說的話：

我們的敵人必須拿千百條命來抵償這個英雄的命。……資產階級所殘遺的分子，必須飽以恐怖主義的流血滋味和教訓，直要等到『殺盡資產階級』的口號，成了普遍的日  
常的談助爲止。

關於列寧被人謀刺，該報也狂喊着：（註四）

讓我們的敵人整百的殺却！不錯，整百還要加到整千！讓敵人溺死在他們自己的血河裏！只有無數血河，纔能抵償列寧和渥里次克的血！血！血！血愈多就愈好！

黎狄克是蘇俄國有名的主筆，他在蘇俄官報上說：（註五）

如果紅色恐怖不能不發生，其原因當歸諸我們的敵人所實施的白色恐怖。因爲處決資產階級的個人，雖屬他事實上並未會參預白黨運動，然殺一做百，他的被處決，已足有重大的價值。所以凡是共產黨的工人，（革命領袖在外）損失了一條命，應該要資產階級抵償十條命。

這真是赤裸裸的殺人供狀。不必真犯罪，不必事實上與白黨有什麼關係，都要拿來祭他『無產階級』的勝利。共產黨是社會和人類的公敵，還能掩飾麼？列寧更說得澈底：

甚至俄國人民死了百分之九十，只要遺下來的百分之十能活着看見革命變成普遍的事實，有什麼要緊？（註六）

這簡直只把普遍的殺人叫做革命了。列寧主義者直是吳稚暉先生所說的黃巢張獻忠一流人，還算得什麼革命家嗎？

紅色恐怖的中心人物，當然是握政權的幾個共產黨領袖。但是執行紅色恐怖的僧子手，非有一個強力的專制組織不行。這個專制組織，就叫做桀卡。桀卡的意義，就是『軍事革命委員會』，亦即『特別委員會』，亦就叫做『秘密警察』。共產黨人說：『待敵人慈悲，即待同志殘忍』，此語固為共產黨人以殘忍相告戒之信條，然尚不足以代表桀卡專制的殘忍於萬一。因為桀卡既不是一種檢察廳，又不是一種審判廳，更不是一種平常的警察，簡而言之，他就是一個老實不講理的殺人機關。這種殺人機關，遍設於全俄，無一省一市一鎮一村沒有

桀卡的分站的。所以桀卡制度，如同密網，佈於蘇俄全境。無論何人，都不能逃其邏弋。其淫威之大，弄到連俄國中央機關報 Pravda 都不能不承認說：『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的口號，已變爲『一切權力屬於桀卡』了！俄國中央委員會解釋他的作用，有這麼一段話：

全俄特別委員會，是一個武力機關，以國內鬥爭的戰線，爲我們的戰場。他不是對敵人坐而折獄的，他的責任，是要完全消滅敵人。所以桀卡必須永遠不得赦人。因爲他的全部職務，是要把一切站到我們對方的人們，通通殺盡。

把這段話來印證中國共產黨如法泡製的什麼『軍事特別委員會』，『人民裁判所』，『工人糾察隊』，不是俄國桀卡的變相嗎？閱者只要把自己在中國各地所得的事實和經驗回想一回，想，是不是中國共產黨想效法蘇俄的桀卡這樣處置中國人民呢？

我們要把全國資產階級消毀。因此，凡遇一個資產階級分子在審查之下的時候，第一步應該是不必搜查他有何反對蘇維埃政府的證據，不管傳聞的或實在的，但只問他三個問題：『他的階級屬性是什麼』？『他的祖先是否資產階級』？『他的教養職業的



狀況如何」？唯有依照他對於這三個問題的答案，才決定他的運命。因為這是『紅色恐怖』所具的意義和應用。（註七）

.....

搗盡資產階級蛇蠍的齒牙，擊碎他的貪饑饉的雙顎，洞穿他的肥胖的肚皮，把怠工的，背叛的，危險的，虛偽的，貪利的智識階級之假面具，和我們所有奸詐的，非社會的，階級的投機者之假面具，一齊揭破。因為一切『人道』和『道德』的經典，為資產階級所發明的來壓迫下層階級的，於我們都沒有存在的價值，而且自來都沒有存在過

（註八）

.....

有一個醫生被白黨捉去，旋又放回來。他後來告訴人家，紅色恐怖實在比白色恐怖兇狠得多，而且紅色恐怖在農村比在城市兇狠得多，——在農村，每一個民房都被掠了，牛羊都被掠了，許多農民全家被殺，不分男女老少都殺的殺姦的姦了。其他沒有全

家被屠殺的，所留的只有走不動的老人和嬰兒。壯年的男女都逃到白黨軍所在地去了。同時沿路沿巷農民死屍堆遍着，全身傷痕之多，簡直使人難以認領，而且也不許家屬認領，不許掩埋，爲的是要『留着示衆』。同時醫生也說，有幾處地方農民忍氣不住，將共產黨人報復了不少。在彼特諾巴夫諾士克的公堂裏，他看見共產黨人被殺的死屍，一行一行的陳列着。每一個星期日共產黨爲他們的死者舉行葬禮，每次動輒有五六十名之多。各農市農村的公衆場所，和舊時的屠場周圍，都陳列了無數『示衆』的首；這都是波希維克所殺的『反共產分子』的被捕者。……在桀卡的圍場裏面的無名的被槍決者，不知多少。在過去幾個月中，槍決人的槍聲，日夜都聽得見。好些被捕者也有被刀砍死的，死時慘痛的呼聲，周圍的遺民聽着都寒心。（註九）

在一九二〇年之際，亞士特拉汗的大屠殺是最殘忍的了。是年九月加森城的工人代表要求共產黨許以八小時工作和增加工資的權利，桀卡就馬上拘捕工人代表六十名而一

齊槍決了。後來許多工人被屠殺的事件，引起左派社會革命黨勸告工人勿參加各地五一勞動的紀念會，其理由就是因為『自十月革命以後，共產黨政府不斷地屠殺整千整萬的勞苦民衆，——農民，兵士，工人，水手，不分階級的。』（註十）

像這樣的淫威屠殺，俄國各階級人民斷送於紅色恐怖之下的究竟多少呢？這個問題是桀卡專制的制度所不容外人得到確實答案的。上面不過略舉幾個例，證明蘇俄政府所屠殺的，資產階級分子實居最少數，而大多數還是農民工人智識階級和兵士。但是讓我們再來看看桀卡的嚴刑：

米德兒被『人民裁判員』從牢獄裏拖出，被逼迫地跪在牆邊。槍向他射擊着——先射他的左，再射他的右，於是人民裁判員戈丁說：『除非你將你的兒子交出來，你是要被槍斃的！但是我們不要一下就槍斃你，等到我們把你的手和腳，逐一打斷了，再來一槍解決你』。第二天，果然這樣幹了。（註十一）

現在摘舉 Kharkov 城的桀卡長的殘暴，來代表其他無數相同的慘酷的故事罷。這個桀

卡長名叫賽因柯，下面是他許多殘暴的獸行之一樁故事：

九點鐘，他（賽因柯）跑進牢門來，醉態狂昏的樣子，他就下令拖了三個囚人出去。他們的衣服都被剝光了，他就拔出刺刀，慢慢兒從他們的赤裸裸的下部，一刀一刀的割上去。割了又轉手用刀刺進肉裏，慢慢兒搖撼刀柄，向上部推動。等到他完事了，他返身走進牢獄，指着他全身的血污，向其餘的囚人說：『你們看見了這些血嗎？好，無論誰，反對我和勞農黨的，都有這樣的運命！』說過了，牢卒把那早上被毒刑拷打的一個十八歲的少年囚人，拖了出來，強迫他注視那三個血肉橫陳的屍首。其中有一個還在顫動着，獄卒又拔出手槍一擊，纔停止顫動。然後他用刀頭打了少年囚人一頓，纔把他又推進牢裏去。（註十二）

在 Kiev 的地方，桀卡用這樣的酷刑對待囚人：

受苦刑的人，剝了衣服，先被細在柱頭上或牆上，然後拿一個有幾寸直徑的鐵管，一端貼緊在他的肌肉上，一端放進一隻活鼠於管中，用鐵網將鼠塞住，再以火燄燒此一

端。等到燒得鐵管中的活鼠，往貼緊囚人肌肉的那一端拚命橫嚙直衝，攢向他的肉體中求出路，如是者往往延長幾個小時，或由晚上直到天明，到囚人苦痛死了爲止。有時又把囚人的頭，活活的埋在地下，只埋到頸項一節爲止。等到他的知覺快要完結，又把他拖起來。歇一會兒，又如法再埋。反來覆去，直弄到作惡的人疲乏才罷手。

(註十二)

馬士諾夫 S. S. Maslov 在他所著的 *Russia during Four Years of Revolution* 一書中

說道：

讀者或以爲這些殘忍的故事，不過是一片斷的例子罷了。但是完全不然。這是人道上若何的羞辱呵！譬如把生人剝了衣服，活活地推到嚴風雪中凍成冰的偶像，這種方法，凡是『特別革命稅』實行的地方，都普遍的應用了。在 Malo-Orchangel 區域，蘇俄政府收稅機關，捉了人來，強迫他赤足站在火爐上，直到他繳納稅額才放他。在 Voronezh 省區，農民無力繳納食物稅的，就要受一種『催稅』的懲創。往往將農民吊下井

底，浸個半死，又提將上來，仍然強迫他把欠稅納清，才容他自由。

以上許多的述引，不過摘舉萬分之一的事實，證明俄國紅色恐怖，就是共產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之實際。共產黨自己固亦未嘗諱言無產階級專政之殘暴，但托洛次克輩就辯說，這不過應用於由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的軍政共產主義時期罷了。哈哈，七個長年頭的科學的殘忍屠殺，民衆死亡過半，社會斧喪淨盡，這是什麼軍政共產主義？只怕是殺人破產主義吧！殺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同歸於盡時，於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好，列寧的共產主義也好，都在桀卡的刀頭槍口斷送生命了！

#### 四、結論

經過七年的殘忍屠殺，俄國變成了怎麼樣呢？換句話說，現在的俄國情形如何呢？

歷史上矛盾的事實多得很。然最矛盾的莫過於共產黨的理論與實際。列寧主義理論上與馬克思主義想連貫，而實際上則相連貫的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上是階級

鬥爭的武器，但事實上則成爲非無產階級的少數共產黨員茶毒各階級的武器；而其茶毒各階級的權力機關，則爲前俄帝政時代所謂『國家警察』之變相的桀卡；其茶毒各階級的方略，則爲紅色恐怖。這是第一組的矛盾。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還有相差異的要點，就是馬克思專以各國無產階級之聯合爲世界革命之策略，列寧則起初應用馬克思的策略於西方而失敗，一變而以弱小民族革命之聯合爲世界革命之策略施之於東方；理論上既然說是各弱小民族革命之聯合，就應該使弱小民族實現其自由獨立之目的，才合邏輯；但是應用到蒙古，則蒙古成爲蘇俄的附庸，應用到中國內地，則中國共產黨受其豢養指使，而破壞我們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國民革命；這是事實上使弱小民族革命不得成功，而弱小民族之聯合，變了不是革命之聯合，乃是蘇俄帝國主義之併吞。這是第二組的矛盾。至於中國共產黨隱身於中國國民黨之後，以謀實行其蘇俄主人之恐怖政策，則又兼上述兩組矛盾而有之，更不必贅言。

由這幾層的矛盾，則依歷史的因果律而產生的蘇俄矛盾現狀，自然越發顯明，只要看現在專政的史丹林，本着列寧主義的心得，將從前與列寧共同努力革命的人物，一個個都化分

出去了，只落得他一個人大權獨攬；從前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蘇俄政府的中央會議，現在都變成他個人手下的官閥系統 Bureaucratic System，與十月革命以前貴族政治的特質毫無二致。托洛次克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之際，爲着蘇俄一般青年黨員的煩懣，提出改組這種官閥系統，而謀有以防止其擴大的危險，就被史丹林和他的羽翼，同時拉攏辛諾維埃夫，布哈林等，予以重大的排擊。直到今年，托洛次克同辛諾維埃夫也都放逐於西北利亞，而俄皇沙的專制治下著名充軍之場，仍復舊觀。這一切，不都是證明蘇俄回復到獨夫沙的時代了嗎？假使列寧復生，一定也要承認蘇俄的十月革命是完全失敗了，還夠得上說什麼領導東方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麼？

也許唯物史觀派的矛盾，無過於這個了：理論上，經濟的發展支配政治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促起資本主義最後的崩敗；但是事實上俄國適反其道而行之，本國資本主義尚未形成，就蠻幹了無產階級革命，這即是利用政治力量去支配經濟的行程；事實上是否真是無產階級革命，是否能夠把經濟行程支配得了，我們姑且都不管，但是以政治支配經濟，



豈不是與以經濟支配政治的唯物論根本相衝突麼？列寧施行新經濟政策，正是以政治支配經濟的好證據。施行之後，生了多少效果，固然不錯，但是這種效果還是做了馬克思唯物論的叛徒才發生的呀！

然而我們還可以問：新經濟政策是朝社會主義走的呢，抑還是朝資本主義走的呢？這問題有兩個解答的方法，而且都不能不同時明瞭的。第一個解答是：實行新經濟政策以指向社會主義，有列寧之志則可，無列寧之志則不可。列寧死了，以史丹林這一派充滿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的精神，來運用這個政策，是決不能到社會主義之路的。第二個解答是托洛次克已經暗示了的：『在我們的新經濟政策裏面，社會主義的種種傾向，和資本主義的種種傾向，是聯合而勾連在一起的。……我們所常常提防到的而且自來不掩飾的，就是我們這個國家裏面現在的經濟行程，實包含這種種矛盾，因為他們構成兩種互不相容的制度之鬥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換句話說，新經濟政策尚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爭風』之間。在這一種醋海風波中，新經濟政策轉向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比轉向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還要大。其原因

就是：俄國不能於經濟上脫離各國資本主義而孤立；於工業發展上不能放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而不用；這兩個原因就是決定我們當前的問題第二個答案的最重要標準。

關於這問題，當另有專論。我們這裏所當注意的，就是共產黨都是在重重矛盾的黑幕裏討生活。一般癡駭可笑的中國共產黨固不消說，上而至於列寧，至於馬克思。總癥都是陷落在矛盾的深淵，不能自拔。馬克思的『辯證法』，成了他自己和列寧以下的共產黨人的鐵牢籠！他們是把自己鎖在辯證法的鐵牢籠裏面，革自己的命，而不是跳出鐵牢籠來認清辯證法的舊世界，並且來革個這舊世界的命。孫中山先生之偉大，就是在於能夠站穩在這個辯證法的舊世界之上，澈底明瞭這個辯證法的舊世界之內容，拿着一個超越於辯證法之上的三民主義，來解放我們深深鎖在這個辯證法的舊世界牢籠裏的全人類！

註一 見 L. Lawton 所著『俄羅斯革命』，二七頁。

註二 見 S. P. Malgoumov 所著『紅色恐怖』，三——二二頁。

註三 Krasnaga Gazeta Aug. 31, 1918.

隱藏在重重黑幕底下的共產黨

註四 同前。

註五 Izvestia 所載 A Propos of a Current Symposium on Red Terrorism.

註六 見註二『紅色恐怖』，三三三頁。

註七 見 Latzis 所著『紅色恐怖』一文，Published Nov. 1, 1918.

註八 見 Kiev 地方桀卡 Che-ka 所發行的『紅劍』周刊。

註九 見註二『紅色恐怖』，一三〇頁。

註十 同前，一三九頁。

註十一 同前，一六六頁。

註十二 同前，一六八頁。

註十三 同前，一七七頁。

# 革命與反革命

劉盧隱

## 一、歷史上不可忘的革命失敗因緣

在革命的歷史上，革命到了一個時期，往往要發生革命與反革命二者分辨不清的問題。這一個問題發生的時候，是革命發展到了大成功和大失敗之所由決定的最緊要的關頭。如果這時候革命與反革命分辨不清，如果這時候革命之友和革命之敵涇渭莫辨；如果這時候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思想行為政綱政策都交相混亂，使人無從認識，那末，革命是一定會從薄近大成功的前線上潰退到大失敗的荒叢裏。當革命初起前途的成功完全在渺茫不可知之數，反而革命和反革命是極容易分別的，因此，反而進行是極容易獲得成績的。唯有到了革命勢力擴大之際，革命和反革命正是最需要分別清楚的時候，也就是革命和反革命最難認識清楚的時候。這時候在思想上在行為上將革命和反革命間劃出一條鴻溝，好教一般革命勢力格外地鞏固起來，一般革命的民衆釐然知所決擇取舍，是革命者為保障向前取得革命大勝利的最

大任務。反之，如果這時候有誰的思想和行動混亂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線，甚或使二者已經混亂的界線愈加難於分辨，結果不是革命失敗，便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歸於盡，而促起極端殘暴的新式專制

這個歷史的原則，我們只須拿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來證明

當法國革命初起的時候，沒有武裝的平民敢於冒着轟轟的槍林彈雨前進，去打伯斯蒂依 Bastille 的國家監獄；婦女們趕到凡爾塞的王宮，要把囚犯的國王刼取；喧鬧的平民不願政府軍隊的槍殺驟然佔領都意勒里 Tuileries 王宮：這種革命的熱潮所以有如此的壯大，就是因為全法蘭西的民衆，認清楚了當面的革命，是要推翻專制君主的革命，而凡是衛護專制君主的就是反革命。這一個顯明的界限，到了革命高潮擴大於全法蘭西時，便頓然減色，而接着現露出來的現象，就是革命和反革命混沌莫辨的種種情景。激動平民去佔領都意勒里王宮的勒蘇特爾 Lezeindre，他就不敢夢想驅逐國王下臺。被人尊爲革命領袖的唐東 Danton 羅伯史比爾 Robespierre 馬拉 Marat 卽高爾特里埃 Cordeliers 和雅各賓 Jacobins 兩派的領

袖們，却怕共和制度比怕君主專制爲尤甚。唐東是反對外國侵略的最大膽的愛國者，但是對於經濟問題却無半點魄力。羅伯史比爾是被人奉爲偶像，而且尊爲『義人』的，竟把許多主張經濟平等與無神論的人妄加殘殺，而且於一七九三年正當巴黎的平民鬧荒啼饑之際，竟在雅各賓的俱樂部中，竭力要人們討論英國君主立憲的優點！馬拉是號稱革命之神的，他雖有一天膽敢要求二十萬貴族的頭顱，却不敢對於土地的所有權應該屬誰的問題作任何堅決的主張。最滑稽的，還有共和的檢察官，也居然被尊爲革命的要人，因爲這些新官僚曾主張要割取一般貴族夫人和她們的使女的頭顱，而實際却使有產者的黑衣隊劫掠法國，大發無恥的橫財，使一般平民益陷於水深火熱中，備受更大的痛苦。這一切事實都表顯革命當中就混和着反革命的因素，大膽的行動背後伴隨着怯弱的思想，沸騰的熱血裏面缺乏着遠大的眼光，粗暴的民衆上面泛浮着遊離投機的領袖，對過去所要破壞的究竟是什麼既沒有判別，而對將來所要建設的究竟是什麼又視線模糊。這一般混沌的情景，只能使革命陷入內部的紛擾，予革命以一種不可解除的羈絆，倒反使將絕未絕的君主專制得以勾引外國的反革命軍力來侵略革命

的法蘭西。直到外國的侵略來了，羅伯史比爾，唐東，這一般革命領袖們，纔敢想到廢除君主這種怪物是於法蘭西爲必要的。然而等到他們這時候才決定不要君主，已經遲了：因爲平民對於他們不能領導革命的一種普遍的失望，和外國反革命軍力的侵略壓迫，卒至釀成拿破崙這個怪物出來，襲斷一般平民的革命模糊傾向，做他個人攘權稱帝的工具，而以後的革命，遂幾遭銷滅。直到拿破崙自己最後失敗，法國人民第三次宣布共和，纔算恢復了相當的功。

所以，法國這一史例，革命是由驅除路易十六這一個鮮明的日標開展出來；中間因革命領袖們對於將來的建設，視線差異，主張歧異，行動離奇，以及平民對於革命前途的傾向模糊，乃生出革命與反革命分別不清的混沌狀態；有了這種主要的狀態，遂生出外來的侵略和拿破崙的黷武和專政。總合的說，由路易十六的滅亡到拿破崙的覆敗，中間所經過的一段革命大挫折，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線陷入混沌狀態做了主因。

從法蘭西的革命史轉到蘇俄的革命史，是由比較簡單的一個史例轉到比較複雜的一個史

例；但是我們不管它簡單複雜，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法國革命，是由鮮明的普遍的單一的革命高潮，而退到游離的紛歧的模糊的革命與反革命界線之混亂，所以法國革命中間遭受一段大挫折；蘇俄革命，則由游離的紛歧的模糊的革命與反革命界線之混亂，倒流到專斷的偏鋒的殘暴的恐怖高潮。所以蘇俄共產黨專政反而成功。

何以說蘇俄革命是由游離的紛歧的模糊的革命與反革命界線之混亂，倒流入專斷的偏鋒的殘暴的恐怖高潮呢？只要看看事實，要曉得俄國革命運動，不是列寧所發動培養的，而且不是列寧一派所領導的。在列寧之前，俄國的革命運動，已有顯明的三種潮流。第一是由主義的革命運動。此種運動，遠起原於十八世紀，即當法蘭西革命爆發的時候，由加索林二世 Catherine II 起，經亞歷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 嚴酷的專制壓迫，直到尼古拉二世統治之下所發生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自由主義的革命勢力是一直不斷地發展着。第二是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這一個運動是由自由主義的革命所培養起來的，在一八一六年開始離却自由主義的革命運動而獨立發展。第三是下層民衆自治革命的運動，起初是



發動在農民之間，後來工人也照樣自動的組織起來。此種運動，是一八五一年的農民改革令，許農民以組織地方自治團體之權，而勞農階級意識乃逐漸發生。但是勞農階級的社會革命意識還是缺乏，直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才漸漸引動了勞農階級的政治革命意識。這三種革命運動，原是分道揚鑣隱伏了許多紛歧混亂的因素，所以三種運動底下。遂更分出各種別派。在自由主義的革命運動方面，隨着十九世紀時間上的進程而分出三種。自由主義別派：一派叫做『北俄社』Society of North 主張君主立憲，一派叫做『南俄社』Society of South 主張共和；一派叫做『聯邦的斯拉夫』Society of United Slavs 主張聯邦制。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的革命，完全是這三派醞釀出來的。在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方面，從一八六一年以後是以社會黨為中堅的；到一八七五年便分裂為 Narodovolski Narodniki 的兩派；到一九〇三年更分出孟希維克社會民主黨，波希維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三派在農民運動方面，從一八六一年起有公開的農民運動有秘密的農民革命團體；到一九〇三年以後復有農民的合作運動。至於工人運動方面，在俄國本來是代表極少數的一部分民衆，直到最近幾年才擴大的，所以

在一九〇五年以前，工人第一次的組織是一八七五年的『南俄工人同盟』，其次是一八九八年的社會民主的勞動黨，直到一九〇五年才有第一次的工人代表的蘇維埃之組織。這些農民和工人的革命運動，尤其是紛歧而不相統屬的：有時傾向於自由主義者，有時傾向於社會革命者，而往往與社會民主黨接觸較多：至於一九〇五年的工人代表的蘇維埃，則絕對與各派社會主義的革命黨無關，而且列寧一派是時也還沒有和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相接觸。除了由前三大革命運動所分演而出的各種勢力外，還有許多虛無主義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無政府共產主義者的思想家與文學家。所以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以前，俄國革命運動，別派是紛繁的，組織是無系統的，思想是複雜的，行動是不一致的，在一切曆史的因緣之下，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的問題，簡直成爲互相諷嘲互相攻擊的焦點；但是要它們共同認出一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標準來，除了推翻俄皇這一個具體的對象外，關於其餘一切革命的理論和目標是公認不出什麼一致確定的標準來的。因此革命總停留在混沌模糊的狀態中，而屢次所爆發的暴動，不過是混沌模糊的革命亂雲堆裏炸裂出來的雷聲，內部並無整個的一致的革命計劃之可能，所

以轉使俄皇專制的命運，得以延長而存在。

於是著名的一九一七年革命到了。這次革命是經過兩個階段的，一是所謂二月革命，一是所謂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是觸發於工人的罷工，繼之以饑民要求麵包，終之以歐戰前線的一部分軍隊不肯打仗；這三種羣衆，在饑餓窮苦譁潰的情景之下，既無領導，又無憑藉，驟然的示威起來。俄皇沙一面靠着他的凶狠的警察壓迫羣衆而激起更大的暴動外，一面下令解散國會；這一來更引起各種革命勢力對於羣衆的聲援，而俄皇乃不得不到。克倫斯基以國會中社會民主黨領袖的資格，且以素得一部分已有組織的勞工和農民的信仰，遂被推為臨時革命政府的首領。但是幾十年鬱積下來的各種革命勢力，却不是克倫斯基所能容納而混化的，而且也不是任何方法所能混化一致的。爲什麼呢？因爲有兩個事實上的障礙：其一，斯拉夫民族是缺乏理智的容納性與調和性的，凡事只知各求各的理想完全而絕對地實現；其二，俄國傳統的社會，階級差別的壁障是非常森嚴而堅實的，不能一旦發生民主的甚或民族的精神，更不必說

不能希望各派的革命勢力融洽起來，共同鞏固革命的新基礎。這是克倫斯基政府底下第一種隱憂。二月革命，人民所要求的是『和平，土地，與自由。』『和平』是要求拋棄那忍受不住的歐洲戰爭；『土地』是要求脫離俄國幾千年來那種嚴酷的奴農制而爲自耕農；『自由』是要求解除政治上社會上的重重壓迫；所以這三個口號，在人民心目中，都搔着了具體而深刻的痛癢，並不是空空洞洞的廢話。但是在克倫斯基政府和各派革命者能夠把這三個口號兌現麼？他們對於這些口號，各有各的解釋，各有各的主張。單說歐戰問題，這時候已有三派的意見：列寧一派老實不客氣地主張無條件屈服；孟希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要求，只要不割地不賠款，戰爭結束愈早就愈好；不列亨諾夫一派 Plekhanovists 則要求勞動階級與政府合作，趕快把德國打敗了，才可以給人民以真正的自由。此外還有克倫斯基政府本身政策之錯誤，因爲它要靠協約國的承認，便不能不繼續戰爭。所以卽就『和平』這一個口號，各派解釋與行動之紛歧已如此，何況其他？這種紛歧離異的議論，結果只有使克倫斯基政府對人民失信用，只有使人民的要求不能兌現。這是克倫斯基政府底下第二種隱憂。前後這兩種隱憂，克倫斯基

是缺乏能力和決心去把它消滅的，所以不久遂予列寧一派人以再革命的絕大機會。但是歸根結底說來，克倫斯基的革命政府，究竟是懸在游離的紛歧的模糊的各種革命與反革命空氣混亂之中，焉得而不倒塌？

果然，十月革命就從此醞釀起來了。要曉得克倫斯基組織臨時革命政府以來，波希維克的唯一目標，已由推倒俄皇沙變而為推倒克倫斯基奪取政權。他們自一九〇三年與孟希維克分裂後，雖然已有『無產階級專政』和『造成純粹無產階級政黨』的主張，而實際則經過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而亡命後，他們已經同俄國工人農民斷了因緣。直到歐戰期內，他方始急激地向本國活動。自二月革命後，他們因托洛次基在彼得格勒得有基本組織，才此地為活動的中心，但餘外就是列寧托洛次基辛諾維埃夫布哈林等一班領袖，一個幹部，一套無產階級專政的策略，而還是沒有民衆，沒有武力。現在恰巧克倫斯基政府底下的形勢不穩，所以他們就抓着機會，教克倫斯基場台不算數，還弄到他把民衆奉送給他們，武力也奉送給他們。詳言之，列寧這時已看到克倫斯基政府的第三種隱憂，就利用這種隱憂為再革命的機會。十月

革命開始的理論和策略，遂完全以這一種隱憂爲主要對象，換言之，就是認定這一種隱憂是克倫斯基政府的大弱點，而拚命進攻。以當時全俄的兵士不願繼續歐戰，農民要求土地，工人要求麵包的種種羣衆心理，都從『和平，土地，自由』的口號當中呼喊而出的民衆悲哀，乃克倫斯基的革命政府不能爲之解救，遂使列寧一派得以提出幾個簡單的口號，就把全俄的農工兵三種民衆奪取去了。這時共產黨人根據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對俄國農工兵的羣衆說：你們如果還不自己奪取政權，如果還不起來打倒壓迫你們的人和賣民衆的克倫斯基政府，你們便永遠得不到『和平，土地，和自由』，於是農兵工的羣衆被煽動了。同時共產黨更提出『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的口號，叫前敵的兵士們自己組織蘇維埃代表去和敵人開談和議叫饑苦的農民自己組織蘇維埃去直接沒收土地，更叫一般無產者自己組織蘇維埃去爲所欲爲，於是『和平，土地，與自由』的民衆要求，都任民衆自由行動而實現了。列寧一派人，這樣很容易地得了民衆還不算數，同時更足供克倫斯基政府所依靠的軍隊和社會秩序，一齊醞釀起來，騷亂起來，而列寧和托洛次基輩乃進而努力於他們政治的基本隊伍和上層制度之組織。他

們認定原來要求『和平土地自由』的農工兵羣衆，於他們只不過做一時的工具，而不能不另行造起一種鞏固政權的中心組織。所以第一他們造紅軍。第二他們佔取民衆機關。他們施用權謀術數，把這兩個力量造了起來，一面固然要和一切反抗的勢力戰鬥，一方面更要施行紅色恐怖，後來更將原有一切革命勢力根本剷除，於是克倫斯基政府所不能容納混化的第一種隱憂，也完全消滅了。所以蘇俄共產黨的史跡，他們的成功靠着兩點。第一點，在十月革命時代，他們是順水行舟的趁人民厭棄戰爭要求土地與自由的高潮而奪取政權，這一個勝利，是靠着一种民衆的誤解。因爲在共產黨的立場，拿出『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一個口號允許給與民衆所熱望的東西，只是一種手段；但是在民衆的立場，這些被給予的東西却是一種目的。在這一一個誤解的基礎上，共產黨取得政權，所應用的是策略，而所沒有實行的是主義。第二點，在既得政權以後，他們拿穩了暴力就施行紅色恐怖，所消除的不但是反革命的武力，尤其是一切社會革命的勢力和其他不甘爲其工具的民衆；這一種勝利，又是靠着非共產黨的各種革命勢力之游離分散與混亂，資本階級和智識階級數量之微小，和大多數民衆之愚需。如

此，列寧是成功了，可是俄國遂由俄皇沙的專制主義轉到波希維克的專制主義，而更加以殘暴的形體！

這樣把俄國革命的史例作一個總觀察，我們知道從俄國革命運動之發生到列寧主義者的專政之成功，其行程是由游離的紛歧的革命漸漸到偏起的殘暴的恐怖。在這種歷史的行程中，一八二五年與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各種革命勢力最紛歧的時候，其間革命與反革命之分野，亦混亂最甚，所以遭受失敗；其次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革命，表面不過勒住了一陣萬馬奔騰的革命趨勢，然而克倫斯基政府，飄浮於許多凌亂而不能混合的革命勢力之上，再加以本身的猶豫而軟弱，偏私而短視，內不足以團結革命勢力，外不足以安民間的反側，所以還是崩敗；最後十月革命，列寧則適以偏鋒的殘暴的專斷的革命策略，殺人放火，大鬧了若干時，洩盡了一切怨憤槍殺了一切理智，連什麼革命都烟銷雲散了，倒反翹起大指頭，誇說一聲『成功！』

我們總合法俄兩個革命史例，更可簡單地說：革命勢力，在歷史上的行程，其起始是單



一的而發展的中間，必定生出紛歧的現象，這是法國革命由發動時期到拿破崙露面時期如此，俄國革命由十八世紀萌芽時期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期亦復如此；革命勢力一有紛歧，革命必定要遭失敗，而產生反革命的專制，這又是法國拿破崙和俄國列寧的專政做了鐵證，但是遇着反革命的專制之後，如果專政的勢力單弱，革命還是可以恢復的，這是法國第三次共和成立的例證；如果專政的勢力強大，革命便要根本銷滅，這又是蘇俄共產黨剷除一切革命勢力的例證。現在俄國史丹林專政，則借攪動東方民族的革命，一面把他共產黨中一部分假革命派和盲從革命派的視線引向國外，一面把他黨中一部分反對派和真革命派巧借機會而盡力排除，這種維護私權的專政，只有孕育俄國未來新革命勢力之可能，決無實現真共產主義之可能。

## 二、中國革命的最大危機及其總因

將法俄兩國的革命史例當作鏡子，照照我們中國革命的現在，是不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最

緊要關頭？是不是革命本身內部，充滿了革命與反革命混亂紛歧的空氣？是不是革命之友和革命之敵弄到了涇渭莫辨？怕革命的，不敢說，利用革命的，不肯說，要銷滅革命的，不許人家說破，於是現在中國革命，就陷於最混沌的境地。除了吳稚暉先生幾個人大胆地說出了他們的疑懼外，有什麼人從混沌中打救出中國革命的眞面來呢？現在最痛心的是：一方面眞正革命分子，雙肩只擔負到內部的革命與反革命糾紛的苦痛，而擔負不到民衆與國家的苦痛；他方面，民衆與國家只是受盡了革命與反革命糾紛的損失，却並不是承受了眞正革命的損失，尤其得不到半點眞正革命的利益。我們革命者，把從前一種不顧革命成敗只知向帝國主義軍閥猛攻的大無畏精神喪失了，而換了一種不暇管到軍閥和帝國主義之如何強大但有刻刻替革命內部之自潰擔憂的畏葸心理。無論誰個革命者和誰個革命者的私人或公開談話，過細分析下去，根本上只是各把各的革命內部勢力視做眞仇敵，反而放鬆了外面原有的革命的眞敵人。一般眞實要作三民主義的革命的青年，要爲黨效死，却找黨不到，要爲主義效死，却遇到革命主義的理論不一致，要爲農工民衆作忠實牛馬，却得不到眞正農工來作主人。自上

而下，只看到革命的計劃，革命的人才，一切都在紛亂錯出的事實面前，被撒下來。而現在局面上的人們所見的多是戰不過權利慾支配慾為心的個人主義，不過昏迷理智誘惑肉體的快樂主義，不過假冒為革命為民衆為國家而奔走的投機主義，我不過戊戌革命人浴有誓革命陸兩喪失權謀主義。這一切，都備具革命之自趨於根本消滅的極大危機。

如果大家將這一切來對照各人所觀察所聽聞，就曉得中國革命，到現在已走入法兼有兩國革命之短，抑且獨具兩國革命所無之最大危險的趨向。如果中國革命不幸即因此而根本消滅，中國民族真要萬劫不復了。

何以言此？中國革命的絕路的傾向呢？關於此問題，我們就要站在革命歷史的立場，檢查過去的，自能獲得確實的證明。過事實檢查起來，或許是好些國民黨幹部同志所不願意的，但是，事實的教訓，

作未來的鑑戒，就不能只顧個人的好惡，而抹煞已成的事實。現在當國者已呈現最大的危機，而其最大的原因，還要歸結到各人大家都不願承認過去的錯誤；這是一切危機之危機，不能不首先打破。各人都不願承認過去之錯誤，便使革命本身發却自己批評自己的能力。失却自己批評自己能力，便是革命發不出大力量的預兆。因為革命行程中發生錯誤，革命者願批評自己，便是誠實正直的表現，便有丁皮島古昔吳前刺告卡來生命內可能性；如果革命者不願批評自己，則其危險性比之願批評自己還要重大；因為不知自己，至少還可使革命盲目地順着自然的行程展進，其危險性尚不至十分嚴重。但是自己並非不知自己的過誤，而又不願批評自己，那便表現對過去無創造的誠心，對將來無創造新生命的決心，無誠心無決心，都是革命行程上的最大障礙，所以其危險性也就格外嚴重。這種理由，所以我不能因為有些同志的不願，而不把過去的事實檢查出來。尤其是爲了這種理由，所以我之檢查過去的錯誤事實，便不是攻擊個人的錯誤，而是批評革命的過程，希望從這種批評當中尋出革命前途的新生機來。

現在回想過去，最值得我們紀念的，是總理在十三年初的時候把國民黨改組的歷史的重大意義。在那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總理抱着一種沉痛深刻的精神說：『過去四十年革命，是靠着我一個人堅持，一人策勵，領導着同志們奮鬥。從今以後，我把這革命的責任，付託給全黨的同志，全國的民衆。今後堅持三民主義，實現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工作，是你們大家的責任。中華民國這一個幼兒，我擔起師保的責任，已經十三年了，這就是我已經把他撫育到十三歲，今後的教育扶持，使這幼兒長大成人，能夠獨立發展，要靠全黨的同志了。』總理這一次的確是憑着一個托孤的精神，把堅持三民主義，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的責任，付託給全黨同志，教大家拿這種責任的內容來教育扶持這個幼稚的中華民國。爲了要使全黨同志都來擔負這一個大責任，全國革命分子都集中在本黨的使命之下，所以總理一面收容共產分子，一面又把黨的組織改爲總理之下設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而中央執行委員會之產生則由於全國黨員產出之代表大會。如此，在形式上是以總理制扶持委員制；在精神上仍是總理付託革命的責任和目的於全黨。所以這一次改組的意義，就是總

理要拿他的革命未了的生命，來培植一個能夠獨立發展的中央幹部，希望將來由這個能夠獨立發展的中央幹部，去完成他的『以黨救國以黨建國以黨治國』這一個未了的偉大責任。然而不幸 總理於打倒曹吳挺身北上之後，竟一病不起，遺下了一個尚未鞏固的黨，給一個團結未固的中央幹部來擔當一個尚未成功的革命事業，於是黨的一切危機，一切隱患，都從此乘虛而入。

這一般史跡，由十三年一月 總理改組本黨到十四年三月 總理逝世，這前後一年的事跡，確實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值得紀念的最富於意義的一頁。何以它是最富於意義的呢？

因為在歷史的觀點上，它是中國革命再展開和再失敗的多方面因果之總樞紐。何以是最值得紀念的呢？因為在革命的觀點上，它是中國革命在過去期間由鮮明的普遍的單一的革命高潮，退到游離的紛歧的模糊的革命與反革命界線之混亂，而在現在期間將由游離的紛歧的模糊的革命與反革命界線之混亂，倒流到專斷的偏鋒的殘暴的恐怖高潮之總樞紐。

先從歷史的觀點上說，我們總理四十年間所領導的革命，在世界文化的意義上，是懷抱

着一個極偉大的志願，要把人類精神文明的優質和物質文明的優質打成一片來創造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國。總理一生努力革命，其全部意義都結晶於此。由於這一個總意義，所以總理革命，既固執了人類精神文明的最高標準和目的，一方面與鄙棄中國固有精神文明之優而喪失民族自信力的幼稚勢力戰，一方面與沉迷於繼中國精神文明既衰之後而茫的積習惡俗及奴制暴政的頑朽勢力戰，復固執着人類物質文明的最高標準和目的，一方面與阻抗物質文明優質之發展的帝制軍閥官僚及利用物質文明暴力之壓迫的帝國主義戰，一方面又與中國民族本身產業落後的積弱戰。爲了要戰勝鄙棄固有精神文明優質和墮失民族自信力的勢力，所以提倡恢復中國固有的民族道德和民族自信力的民族主義；爲了要戰勝沉迷於積習惡俗如制暴政的頑朽勢力，所以民族主義之外，要提倡掃除弊政杜絕貪婪消滅專制斬絕橫暴改革惡俗的民權主義；爲了要戰勝帝制軍閥官僚和帝國主義，爲了要戰勝產業落後的積弱，所以於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之外，要提倡消除一切國民生計之壟斷改造一切階級經濟之組織的民生主義。總合孫先生這種偉大的連鎖的革命的使命，其意義實非常遠大而深刻，他懷抱這種偉

命，經二十餘年的努力，始在革命的思想，稍稍由感召力而傳遍於全中國，而在革命的武力上，使辛亥一役，造成了一個在中國民族的意志上是統一的中華民國來。所以中國革命運動之開展，革命主義之開展，實由於總理偉大的智力，堅強的毅力，遠大的識力，憑藉着一個混合人類精神文明的優質與物質文明的優質爲一體的文化革命的力量而來。而這一個革命運動之所以能獲得實際上之展開，則由於中國民族勃興的意識，受了滿清幾百年的凌侮壓迫，因總理的領導感召，由潛藏鬱積之中而整個地爆發出來。但是中國革命運動，在辛亥年因排滿的問題，開展是開展出來了，然而總理所懷抱的全部革命主義，在思想上還是沒有深入人心，在事實上還是沒有正當實現。於這一樁事實，我們就不能不歸到政治地理的關係上來說明。詳言之，中國的革命，在地理的意義上，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由總理開始運動革命到辛亥革命，這個時期，總理在海外挾持海洋的地理關係而經營珠江流域的革命時期；第二個時期，由辛亥革命到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這一個時期，是總理在實際的政治工作上，挾持珠江流域的地理關係而經營長江流域的革命時期，而在思想的工



作上，則挾持長江流域的地理關係而經營黃河流域的革命時期；第三個時期，由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經過總理提起一部三民主義，抱病直進北京，直到此次國民革命軍繼着總理逝世後的出師北伐，這個時期，是南方革命勢力挾持珠江和長江兩流域的地理關係而經營北方的革命時期。最近戴季陶先生他所著『青年之路』裏面，曾經從地理的關係上，把中國文化史分爲三個時代：第一是黃河流域時代；第二是長江流域時代；第三是珠江流域時代。他的要點，是說明中國幾千年來文化的發展，是由北向南移動的。在這種文化的歷程當中，『從產業上看，黃河的文化，是以農業爲主力而建築起來的；長江的文化，是以工商業爲主力而建築起來的；珠江流域的文化，是吸收現代歐洲的工業文明，以產業革命爲目的而前進的；從統治力的形成來說，黃河流域的文化，是進取的，創造的，生產的，征服的；長江流域的文化是退守的，享樂的，消費的，被征服的；珠江流域在進行中的文化運動，是很明白地繼承黃河流域的建國精神，只是在天候地理上受了多少限制，文化的實際力量，依舊很小』季陶先生這樣說明中國過去文化的歷程而標明其每一時代的地理的特徵，是極有見地的。這一

個見地，正與我所分析的中國革命在地理關係上的三個時期的見解是互相補充的。依他所說，中國文化的展進是由北而南；依我所說，中國革命的展進是由南而北。這兩個針對的建國運動，也許要成爲中國過去的文化與由總理所領導的革命而開創的中國未來文化所由分界的鴻溝，亦未可定。但是這問題不在我所討論的範圍。我這裏所要解說的是：我們總理所領導的革命，在它由南而北的展進當中，每到一個流域，便受一個流域物質條件的限制，而革命運動，便要休歇若干時才能再進展到第二個流域。在革命運動的第一個時期，總理憑藉海洋的交通上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上之一切便利，而向珠江流域經營革命，竟至遭受十次的失敗，才獲得辛亥革命的成功，這個事實是說明些什麼呢？一方面，是說明珠江流域吸收了多現代歐洲的物質文明，備具了多少創造的進取的生產的征服的建國精神，所以革命雖經十次的失敗，卒能於辛亥八月在武昌收穫那種相當的成就；他方面，却是說明珠江流域雖吸收了多現代歐洲的物質文明，雖備具了多少建國的精神，然而在天然的物質條件上，實際力量，依舊是有限。到革命運動的第二個時期，總理憑藉珠江流域的多少建國精神和地理上

有限的力量，向長江流域及黃河流域經營革命，雖其間顛覆了不少的帝制遺孽軍閥官僚，促起了不少的思想學術上的大變動，然而在大體上說，那十三年當中，革命的實際工作總不能跨過長江以北，革命的思想工作，也總不能跨過黃河以北。這一個事實，其原因又是什麼呢？是由於受了長江流域那種退守的享樂的消費的妥協的傳統精神之制限，而在地理的關係上，昔人所謂長江天塹，至今猶有分限南北的力量。京漢津浦鐵道都在天塹以北早已建築，而其南岸的縱貫鐵道，單說一條粵漢線，至今猶未建築：故其結果，只是把黃河流域的外防綫侵入長江中樞，反使北方農業社會舊有的傳統勢力增加抵抗革命潮流的作用，而發動在珠江流域的革命運動，却十三年間終限於長江南岸，不易北進。幸而縱貫的鐵道雖未完成，而電線的交通却早已網羅於全國，所以總理憑藉珠江流域，領導革命，雖實際上只能及於長江流域，然而他的實際革命運動和思想革命運動之影響，都能朝發夕至的遍及於黃河流域。至於革命運動的第三個時期，是南方革命勢力憑藉珠江長江南兩流域的地理的條件向北方進行革命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總理之改組國民黨與提起一部三民主義挺身上，這兩件事

實，是明白指示了南方革命，經過十三年長時期的宣傳與醞釀，到此時是抖擻了珠江長江兩流域的勢力來向北方展進的，而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則實爲 總理抖擻珠江長江兩流域革命勢力的直接歷史的結果。在這一革命展進的行程當中，我們革命者要深刻地牢記着兩個重大的歷史的意義：第一，在地理的關係上，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是不可分離的，若分離則南方革命要瓦解；第二，在因地理關係而起的傳統的特質上，長江流域的退守性享樂性消費性妥協性不可與珠江流域的進取性創造性生產性征服性分離，若分離則南方革命亦必瓦解。今後的革命，我以爲必須從物質的建設上努力，把珠江和長江兩流域充實地密切地的統一起來，才能完成 總理開創的由南而北的革命文化運動。如果不先從南方物質的建設着手，只靠武力着手，縱使北伐成功，結果必不過趕走幾個本身並無多大力量的軍閥，而北方農業封建的傳統勢力，依然可以把向北移進的革命勢力軟化以至於無形消滅。至於在南方兩流域，如果沒有物質的建設充實起來聯結起來，即使革命軍力到了北京，而南方必依然是四分五裂，既不能被北方結合，亦不能結合北方。這是就今後革命統一的工作上說，其根本條件必不能

外乎此。如果我們回頭檢查過去的事實，就可以曉得在目前革命運動的時期間，即前面所說的第三個時期間，我們總理十三年改組國民黨，其意義是一方面以珠江及長江兩流域的力量爲主，而謀兩流域革命勢力之集中與連結，一方面則以南方兩流域革命勢力之集合爲主，而感召北方黃河流域革命勢力之傳播與勃起。在這個歷史的和地理的意義之下，所以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實在是中國革命再展開的總樞紐。然而同時容納了共產黨的分子加入國民黨，遂使他們成了一個大禍根，等到國民革命軍進展到長江流域而向黃河流域開始攻擊之際，他們就麤集兩湖，把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連結的革命壁壘拆破，同時更把長江流域的上下連結線截斷，所以共產黨是違背了中國革命者所應該牢記的兩個歷史的重大意義，犯了使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分離的嚴重錯誤，而使革命中途挫折。但是共產黨這種破壞革命的罪惡，歸根結底，是因國民黨容納了他們才養成的，所以國民黨的改組，在歷史的和地理的意義之下，又是中國革命再次失敗的總樞紐。我所以說由十三年本黨的改組到十四年 總理在北京逝世，其間事實的關鍵，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富於意義的一頁，其理由蓋如此。

再從革命的觀點上說，十三年黨的改組，隱伏了中國革命由鮮明的普遍的單一的高潮，退到游離的紛歧的模糊的革命與反革命界線之混亂狀態裏的因素。這個因素是什麼呢？也就是容納共產黨這一件公案種下的惡因。十三年黨的改組以前，革命運動，在總理偉大人格堅強意志淵博思想的領導之下，終是整個的統一力量，無論怎樣強大凶惡的敵人，都不能搖撼得它毫末，分拆得它半點。但是自從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之後，國民黨中便有了一個表裏爲奸的內敵。這個表裏爲奸的內敵，比以前什麼凶頑的外敵還要可惡。固然，在總理當初容納共產黨分子的時候，千真萬確是要集中革命的力量，認定共產分子是信仰三民主義而來的；但就共產黨中所經過的事實，千真萬確是到國民黨裏面來大弄第三國際的金箍棒的。現在經過幾年的糾紛，我們且簡單地檢查共產黨的歷史，就可以明白當時的實在因緣。中國共產黨的根源，是始於一九二〇年，其時不過是一個小規模的研究社會主義和馬克斯學說的學社。到一九二四年他們開第三次大會，始改稱中國共產黨，黨員不過五六百人。在這一年

呢？這就要曉得他們內部的情況。因為在一九二三年以前，他們曾勾結吳佩孚，引動京漢路罷工，結果則中途賣工友，犧牲了多少工人的性命，而他們自己也幾乎完全消滅。可是因為這一場的失敗，他們內部便起分裂成爲左右兩派。左派是蔡和森張國燾等爲代表；右派是陳獨秀譚平山等爲代表。在感情上和思想上來分別，右派是偏於中國的傳統性，而左派却是由俄國回來，偏於第三國際的傳統性。當時因爲遭受京漢路罷工事件的打擊，右派主張加入國民黨，加入之後就拋棄馬克斯主義，便算完事。左派則不主張加入國民黨，仍舊要進行共產主義的工作。兩派爭吵了若干時，他們便請教於第三國際。第三國際於是派威丁斯基到中國來，表面是爲他們兩派調和，勸他們一面進國民黨，一面做共產黨的工作，而實際上則第三國際已有陰謀，利用他們內部之分裂，謀以他們的左派而鎮壓他們的右派，更利用他們之加入國民黨，謀以他們的右派來聯結國民黨，而以他們的左派來分拆國民黨。這種右聯而左拆的策略，是列寧黨向來對付俄國各種革命黨的慣技，而其妙用則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右派還未能完全領悟。所以李大釗在國民黨改組時第一次代表大會席上聲明他們加入本黨的意志，還

反覆地說道：『我們加入本黨，是因信仰三民主義而來的；』『我黨之加入本黨，斷乎不是爲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爲，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那曉得李大劍儘管這麼否認，而第三國際整個策略的用意，及由第三國際指揮而發生的事實，却與李大劍所否認的完全相反。我們只要根據這一段經過，就可以確定共產黨之加入本黨，自始即是挾着破壞國民黨的決心和計畫而來的，所以十三年一月黨的改組，無論 總理是持着若何寬大的態度，而共產黨是決不能受其感化包容了。自是而後，國民黨內面，在組織上，宣傳上，政治上，名義是一個招牌，而實際却有了兩個系統。總理當時，以他的聰明睿智，也看到了共產黨分子是在國民黨當中是想另立系統的，所以在改組的時候，他反覆對一般同志說：『三民主義的內容，要聽我解釋，才是對的。』第一次大會閉會之後，總理更於政治軍事百忙之中，每星期確定時間到廣東大學講演，想把三民主義全部思想口述出來。可惜全部的講演尙未完成，而 總理又因曹錕已被打倒，不能不急行北上。



總理北上的時候，在國民黨爲顧問而在共產黨則爲狄克推多的鮑羅庭，就設盡方法來阻止，阻止無效，就想騙總理到俄國去。但是總理不聽他的話，而且到了上海之後，忽然取道日本再赴天津。這一種神龍莫測的行動，使鮑羅庭簡直無法可施，鮑羅庭老羞成怒，於是嗾使共產黨徒在他們的機關報上，用極無賴的口吻慢罵總理。這幾件事實，可以證明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之後，他們所最先要對付的是總理，而在思想上和政治行動上最先與彼黨鬥爭的也是總理。假使總理不死，我敢信總理必能早將彼黨加以相當的懲處。總理既逝，則國民黨的重心頓然失所自主，而共產黨的重心頓然增加力量；一切權力，不能集在國民黨中央幹部團結堅固的基礎上，而旁落在共產黨俄國狄克推多縱橫捭闔的手腕上；國民黨內忽然宣布了一個『容共聯俄政策』，而共產黨內頓然實施了一個『聯合戰線』的策略；共產黨人當初口說『信仰三民主義』，現在忽然向國民黨下級組織裏面去宣傳『共產主義』；總括言之，總理數十年所領導的所統一的國民革命，至此遂根本起了動搖，生了裂痕。所以站在革命的行程上，檢查當日的事實經過，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十三年一月黨的改組時，容納

共產份子。是革命由統一的時代而退入紛歧的時代之伏因，同時不能不承認 總理之遺世，是革命由統一的時代而退到紛歧的時代之急轉直下。因此，我說由十三年一月到十四年三月，前後一年間的史跡，是最值得紀念的：值得紀念的是些什麼呢？正是革命者所不能忘却的這種傷心的失敗的歷史因緣呵！

前面就歷史的觀點和革命的觀點說明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重大意義，歸納下來，可得下面一個總綱領：中國革命，在 總理逝世以前是一個大階段，而在 總理逝世後另是一個大階段。在第一個大階段裏面， 總理一人領導革命，分爲三個時期，即第一步挾持海洋的地理關係而經營珠江流域的革命，第二步挾持珠江流域的地理關係而經營長江流域的實際政治上的革命，更挾持長江流域的地理關係而經營黃河流域的思想上的革命，第三步則單人匹馬直進北京，想統合珠江與長江兩流域的地理關係而一舉完成黃河流域的革命，以建設統一的三民主義的新國家。最後這一步甫經開始，而 總理就中道崩殞，直到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發，才算是迎頭去追趕 總理最後這一步未完的工作。在第二個大階段裏面，從 總理手創

的黃埔軍校裏，發生了一枝革命的生力軍冒着艱難險阻，衝到長江流域來，這是於軍事方面開了一個大局面；然而黨的紛亂割裂，自共產黨分子加入本黨，一直到現在，還不能復合，這是於革命的政治，思想，組織，各方面，都在在呈露游離紛歧混雜的惡現象。我們可以更簡單地說：總理逝世以前，革命是統一的鮮明的普遍的；總理逝世以後，革命是紛歧的模糊的混亂的；而前後之所以不同，都是共產黨分子加入本黨做了總因。

### 三、由容共到容共政策

我們既然明白，在中國革命史上，共產黨分子加入本黨這一個關鍵，確實把民國十四年以前的革命劃作統一的鮮明的普遍的革命，把民國十四年以來的革命劃為游離的紛歧的模糊的革命，那末，我們就要進而檢查自十四年三月總理逝世以後中國革命退到游離的紛歧的模糊的境界之重要的經過。現在有許多人把總理逝世後所發生的一切不幸的事變歸咎於『容共政策』更把『容共政策』指為是總理的政策，而其結論就是教人相信一切事變的責任都

應該歸咎於 總理。這種巧妙卸過的說法，我們不能不嚴厲的加以駁斥。固然，若說 總理逝世後一切不幸的事變是歸根於收容共產分子加入本黨，這是確鑿的事實，但是若說這是 總理的什麼『容共政策』，因而更把 總理已死之後一切責任歸咎於 總理身上，那就直是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的罪人！汪精衛也就是此種罪人之一。本年十一月五日，他在他『武漢分共之經過』的演說裏面。就說：『容共政策，為應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變了，政策也隨之而變化的，這是對於政策和主義的解釋』。舉他這一段話，就可見他竟把容共當作是 總理的 policy 來解釋。而且他還說：『兄弟到了武漢，便感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說到政策， 總理以前有聯段政策，聯張政策。這兩個政策，現在看來，似乎是過去的東西，但在當時是重要的必須的』。這尤其證明了汪精衛不但把容共當作『政策』來解釋，而且語意之間，還承認它是『三大政策』之一！他而今只曉得『三大政策與三民主義並舉是很不妥當』，却還不曉得他把『容共』當作『政策』來解釋已經是『不妥當』！他說『主義是有長久的時間性的』，『政策却是一時的』，

因為他懂了這一個偉大而艱深的基點，他才『感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然則『三大政策』不與三民主義『並舉』，應該效法於你這位汪政策先生，把它拿來與『聯段政策』『聯張政策』『並舉』，是不是這樣就『很妥當』了呢？現在無一個黨員不知道，當日總理允許共產黨分子加入本黨。是要他們以個人資格，在信仰三民主義和努力國民革命的基點上來加入的，而不是把他們當作共產黨團體的資格來加入的。所以李大釗代表他們聲明：『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嚴正地說，總理允許他們入黨，和允許任何黨員入黨一樣。如果一個人入黨便說是 總理的『容什麼人的政策』，那豈不是你這位汪政策先生入黨的時候，總理又定下了一個『容汪政策』嗎？國民黨的張三李四有了幾百萬，難道 總理定下幾百萬個『容張三李四的政策』嗎？這是若何幼稚得可笑一件事呢！要曉得 總理對於已經加入本黨的分，只認他們是黨員，不問他們是帶着什麼階級屬性，更不認他們是什麼共產黨。他們加入本黨，便只問其行動是否違反三民主義與本黨之黨綱政策，違反了便當一律以本黨紀律懲處他們：這是無論對任何黨員一個紀律的最高原則。所

以十四年五月本黨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關於確定最高原則的決議，不惜重行申明此意曰：『中國國民黨對於加入本黨之共產主義者，只問其行動是否合於國民黨主義政綱而不問其他』。同時更加以明確的解釋曰：『中國共產黨黨員之加入中國國民黨，係爲接受本黨之主義與政綱。而負責行國民革命之責任者。……惟既加入本黨者，在取得本黨黨籍中，其責任與義務，完全與一般黨員無殊，此則至爲重要者也』。不僅如此，中央全會更加以嚴正的解釋說：

：『總理在時，黨員之行動，一決於 總理 總理既沒。黨員之行動，惟有完全取決於總理之遺教；如黨員之行動及言論，有不遵奉 總理之遺教者，本黨皆一律以紀律裁制之』

這種決議與解釋，是明白確定了共產黨分子既加入本黨之後，他們在本黨就只有本黨的責任與義務，而沒有共產黨的責任與義務，還不理解嗎？本黨在主義上政綱上紀律上不許可他們把共產黨的主義政綱紀律及一切工作帶進來，還不明白嗎？明乎此，則允許共產分子入黨，決不能與『聯段政策』『聯張政策』相提並論，還不顯然嗎？段祺瑞與張作霖不曾加入本黨做過黨員，總理當日聯他們，是當他們爲政治上對立的勢力看待，所以才說得上是『政策』，難道

共產黨的分子加入了本黨，還是要承認他們是政治上對立的勢力嗎？如果是的，豈不是許可黨內有黨了嗎？汪精衛在『武漢分共之經過』，自己也都承認說：『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是的，唯其國民黨自來沒有所謂『三大政策的名詞』所以當然也沒有所謂『容共政策』的名詞。但是爲什麼汪精衛又要大喊其不見於國民黨決議和黨章的『容共政策』呢？爲什麼不但要承認它，而且還要把它和『聯段政策』『聯張政策』並舉呢？嚴正地說：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黨是自來沒有所謂三大政策的，更沒有所謂容共政策的；允許過共產分子加入本黨來奉行三民主義，這是總理本黨爲出發點以革命爲出發點的正當行爲，但是把總理這一個正當的行爲矯變爲種種的政策，因而助長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組織黨團篡奪黨權分拆同志阻撓北伐破壞革命，這種種賣黨的行爲，便不是 總理的行爲，而是 總理的不肖黨徒的行爲。所以『容共政策』，既然不是 總理的政策，那末，自 總理逝世而後所發生的種種賣黨行爲和事變，歸之於非 總理的容共政策則正屬罪有攸歸，歸之於 總理則爲不肖黨徒之巧避責任，難道這還不黑白分明

了嗎？

現在我們要追問的是：『容共政策』究竟是從何處來由何時起的呢？汪精衛告訴我們說：『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然而關於此點，他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我們且看他說了『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話之後，汪精衛同在一篇演說裏又說道：『現在將容共政策的歷史考查一下。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國七八年。在民國七年俄國革命之後，總理有電報給列寧慶祝俄國革命成功。民國十年 總理在桂林，俄國派人到廣州到桂林去見 總理。俄國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吳佩孚，同時也即在南方考察國民黨。這是聯俄容共未實行以前的經過。到了民國十一年冬，俄國代表越飛在上海和 總理聯名發表一個宣言，這算是聯俄的起點。……宣言中說明俄國願意幫助中國國民黨，反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認共產主義是不能實行於中國，故俄國不是來宣傳共產主義，而係來贊助國民革命。這篇宣言實係國民黨的重要史料，也是國民革命的重要史料。蘇俄既聲明不是要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而是要來幫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也以這個理由來加入國民黨。……嘗



時李大釗見了總理後，說他加入國民黨願爲三民主義爲國民革命努力，但是不能脫第三國際黨籍。總理說可以的。這便是容共政策的起點。我們把汪精衛這段話分拆，有可注意的三點。他在前面已說過容共政策『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而在這段話裏面就說『要上溯到民國七八年』；等到他溯完了，他又說這是『容共政策未實行以前的經過』；民國七八年的經過說完了，他又說民國十一年冬的聯俄經過，而終之以李大釗的加入國民黨，說『這是容共政策的起點』！究竟『容共政策』是去年才發生的呢，抑還是『民國七八年』就發生了呢，抑還是要以李大釗加入本黨爲『起點』呢？連汪政策先生自己都恍惚游離得很！這是一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第一點。他爲什麼要糊塗恍惚到如此呢？這是因爲他的用意別有所在，所以他就弄到這樣的失檢點。他的用意是：要把『容共政策』溯源於『聯俄政策』，以爲只要把『容共』同『聯俄』連合說明，則一切責任自然不必說都可以歸罪於總理，而我們的領袖汪政策先生就可以迴避一切的責備！他却不理解聯俄是對等的聯，而李大釗之加入國民黨却並非對等的容；聯俄可以成政策，而收納黨員却不可與對等的聯盟政策同類論舉。他自己也說李

大劍輩以『願爲三民主義爲國民革命努力』的理由來加入國民黨，可見 總理是以這一個主要理由去收容他們的，而並不是以他們跨了第三國際的黨籍爲主要理由去收容他們的。總理對於李大劍所說『不能脫第三國際黨籍』一句談話，說了『可以』兩字，却不過是表示不強迫他脫除第三國際黨籍的意思，哪裏可以執此以爲樹立『容共政策』的根據呢？汪精衛不會說過『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麼？難道未曾見過，就要把它的根栽到 總理的談話裏面麼？我們退一百步來說，縱使 總理答應了李大劍輩都不脫第三國際的黨籍，但是如汪精衛這樣把共產黨視爲國民黨內有對等獨立地位的團體，這種容共政策，是不是 總理所能允許存在的政策呢？ 總理說：『操之於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這明明是教我們黨員不要把黨的一切權力交給共產分子，尤其不要容共產黨在國民黨以內樹起獨立的勢力。汪精衛把 總理的遺教忘記了，把國民黨的地位忘記了，跟到共產黨的腳後跟大談其容共政策，却不把這個政策的根源溯諸共產黨內的事實，而乃輕輕把責任推到 總理身上，難道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嗎？這是他一路的心勞日拙的第二點。第三點是關於聯俄政

策，這是我們要留在另一節來討論的。現在我們所追究的是：容共政策，既不是 總理的政策，也不是民國七八年起點的國民黨的政策，更不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定的政策，那末，究竟是什麼人的什麼時候起的政策呢？要說明這問題的答案，則我們不能不先把 總理逝世以後的黨的過程作個簡單的敘述。因為要在 總理逝世以後黨的經過裏面，我們才看得出中國革命何以會退到游離紛歧混亂的境界，何以所有的黨的過失要歸到汪精衛一派人負責，而可謂容共政策，猶不過是許多過失當中的一事。

#### 四、三年來共產黨危害本黨的經過

現在要檢查本黨自 總理逝世後的痛史，則當分二個時期：（一）汪精衛做主席的時期；（二）蔣介石同志北伐的時期；而現在黨裏紛歧混亂的現象不與焉，這兩個時期，是依着事實之自然的段落而分的，而其間有個一貫的綫索，為二個時期起伏變遷之中心的，便是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鬥爭。所以我要請閱者諸君站在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的立場，評判這二個時期雙

方的罪證。我更希望閱者評判的時候，要拿正義來做裁判，不要拿私人感情利害來做裁判，要這樣，才能獲得歷史家的見地的真際。

(一)汪精衛做主席的時期 這一個時期，是從十四年四月間汪精衛於總理逝世後自北京回廣州起，不久被推為國民政府主席，一直到十五年三月因中山艦事體發生託病請假離職止。

(二)回粵以前共產黨預決的陰謀 前面已經說過，十三年總理北上的時候，鮑羅庭已有圖謀騙總理到俄國去的事實，總理不受他的誘騙，鮑氏遂嗾使共產黨的機關報『嚮導』等慢罵總理此為國民黨與共產黨兩方最前線交鋒之始。那時共產黨對國民黨作戰的方式是怎麼樣呢？據他們十四年的『黨員須知』裏面說，他們已在十三年一月國民黨改組之際，開始對於本黨實行其『民主的聯合戰線』這一個口號的工作，他們的『同志大半都加入了國民黨』因此，在農民工人中，並且在軍事上，得了許多實際工作的機會』但是他們的幹部，發見他們的黨員在國民黨內的工作上有『左傾或右傾的錯誤』『左傾的錯誤，是主張繼續做無產階級

的革命運動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反對加入國民黨，甚至反對參加國民革命，以爲這是使共產黨變成黃色」。『右傾的錯誤，比左傾的錯誤更危險，而且更普遍：（一）以爲我們（共產黨）既然以國民運動爲中心工作，便應集全力於國民黨的工作，不必同時進行我們黨（共產黨）的工作；（二）以爲我們（共產黨）既然加入多階級的國民黨做國民運動，便只好採取勞資調協的政策，不便鼓動階級鬥爭，懷這種錯誤觀念的，只是少數由國民黨加入本黨（共產黨）的同志；（三）以爲我們（共產黨）應該幫助整個的國民黨，不必助長左右派（國民黨）之分裂。』總括言之，共產黨幹部認定共產黨徒『疎忽了第三次大會』我們（共產黨）以國民運動爲中心工作並同時發展我們黨（共產黨）的組織及國民運動中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宣傳』及『分拆國民黨』之決定。所以該黨於總理北上之前，開了擴大執行委員會，將這些『錯誤』，都指摘出來，而重行確定對於國民黨的戰術原則：（一）警戒他們黨中右傾，他們『參加民族運動，是爲了無產階級自己的利益；……若是忘了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及黨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運動中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若是忘了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革命之準備而沉溺在民族

德謨克拉西運動中，便遺無產階級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二）提防他們黨中左傾的錯誤，說他們不應該反對參加民族運動，爲的是「若要民族革命運動得到較徹底的勝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站在領導地位，同時這領導階級也要能夠抓住被壓迫的各社會階級的力量向共同的敵人作戰，才免得處在孤立地位」。換言之，共產黨是時的戰術，是繼續做成與國民黨的『聯合戰線』，而其參加國民革命運動的作用，一方面對他們的右派說，是因爲要做『自己階級革命之準備』，一方面對左派說，是因爲要奪取革命的『領導地位』，『抓住被壓迫的各社會階級』爲自己的力量，免致陷於『孤立』。同時，共產黨更決定如下的策略：（一）要『在沙面罷工和江浙戰爭中，化分國民黨的左右派，使之發生劇烈的衝突』；（二）要『把國民黨中的工人農民及知識階級的急進分子結成左派；宣傳國民黨中的軍人官僚政客資本家爲右派，而指摘其在廣東和大商買辦階級及地主合作的錯誤傾向；我們（共產黨）要聯合國民黨中派，他們是些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的革命分子，……他們在數量上雖不甚重要，却站在國民黨領袖的地位』；（三）『我們（共產黨）幫助國民黨組織上的滲入產業無產階級是非常危險

的，要努力從發展國民黨之組織中鞏固我們無產階級的基本組織」。總合地說，共產黨在總理北上以前，已經對於國民黨施行急進的破壞。對於農工的羣衆，截斷其與國民黨結合之路；對於國民黨有歷史有地位有名望的中堅人物，施以分拆離間；對於總理，則欲劫之以往莫斯科；他這三道進攻的戰線，條條都進行得很厲害。總理不幸在最前敵的一道壁壘上與共產黨鬥爭而逝世，於是餘下的兩道壁壘，都被共產黨逐一的攻打進來了。

這是汪精衛回粵前的前半段共產黨謀害國民黨的情形，也就是我們總理逝世以前的情形。但是汪精衛將回粵時的後半段共產黨對國民黨進攻的形勢又是怎麼樣呢？我又拿他們的根據來說明。總理逝世後，他們全體大會的決議說：『我們（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工作，已經入一個新時期，而工作的方針，亦應有左列幾項新的決定』。且看共黨醜類，竟把總理逝世後視爲一個『新時期』，而其所謂『新的決定』，就是更進一步的陰謀與策略了。第一條詭計說：『國民黨的分子包含有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及工人農民階級，在羣衆中，他們有造成階級調和觀念之危險，因此，我們在國民黨中工作，對於各種運動，須努力保存階級鬥爭的

成分」。這是共產黨要拆散各階級聯合擁護國民革命的詭謀之巧變的說法。第二條說：「我們固然承認國民黨是中國民族運動中一個重要工具，然亦僅僅是一個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國民族運動之全部；因此，我們在國民黨內各級黨部，並且要在國民黨外各社會團體，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政治，反對帝國主義工具之買辦階級，擁護工人農民一切勞苦羣衆的利益，指摘國民黨中及民族運動中的右派和帝國主義妥協，和反動的軍閥妥協，和買辦地主階級妥協及壓迫農工一切勞動平民的每個反革命事實，並暴露國民黨中派游移的態度」。這可見共產黨的策略，比以前更進一步：以前說加入國民黨是爲無產階級的利益，也即是爲共產黨的利益，現在却更明白地說國民黨僅僅是他們的一個重要工具，到了相當時期，就是要打倒的；以前他們對國民黨是攻擊『右派』，聯合『中派』，結成『左派』，現在他們却不但指摘『右派』『每一個反革命的事實』，而且進一步要『暴露國民黨中派游移態度』。所謂暴露中派游移的態度是什麼呢？就是威脅國民黨的幹部同志，一定要聽共產黨的指揮向左傾，否則便要挾各級黨部來攻擊你。爲什麼他們有這種威脅的力量呢？因爲他們同時要擴大『左派』，所以



第三條的詭計又說：『我們應當在思想上組織上，尤其是在民衆宣傳上，擴大國民黨的左派；對於國民黨中派領袖及一切左右派間游移分子，應該在具體事實上糾正其右傾政策之錯誤，使之離開右派，從事不妥協的鬥爭。當中派結合左派不妥協的革命時，我們應協同農工羣衆贊助他們，但同時必須在農工羣衆中解釋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之不同』這一條決議却比什麼供狀都要說得明白多了。換言之，共產黨要在國民黨中擴大『左派』；拿『左派』去攬『中派』領袖及一切游移分子，使之離開『右派』而贊助『左派』；如果『中派』贊助『左派』，共產黨就要拿盧布黨徒贊助他們。但是同時却必須在民衆當中宣傳階級鬥爭而鄙棄民族運動。這種決議，豈不是分拆國民黨的民衆分拆國民黨的幹部雙管齊下的毒手之最確鑿的證明嗎？分拆了民衆成擁護階級鬥爭的一部分，便利用這一部分去威脅擁護民族鬥爭的一部分，這是共產黨搗亂國民黨的第一條火線；更利用迷信階級鬥爭的一部分民衆去威脅『中派』贊助『左派』分拆『右派』的政策，這是共產黨搗亂國民黨的第二條火線；同時共產黨利用『左派』做大砲，『中派』做砲架，『右派』做靶子，這又是共產黨既然分拆國民黨幹部之後，就要先解決『右派』這

一個策略的核心。這種種戰術，完全在這一條決議裏面預定下來了，還不顯明嗎？最後一條決議又說：『完全在我們同志指導之下的國民黨各級黨部應該努力宣傳黨員羣衆，使他們都有明確的左傾觀念，才算是整個的左派結合，單靠感情的聯絡，或只是黨部領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夠的。』這無異是說，共產黨要在國民黨的下級黨部，不但要使左派分子握權，而且要使黨員羣衆有左傾意識，才可以鎮壓左派分子，使之爲共產黨可靠的工具。總合以上各條的詭謀，我們就可以明白，汪精衛快要從北京回廣州的時候，共產黨的計畫，已決定要趁機實行了。

(2)回粵後國共兩黨鬥爭的經過 汪精衛從北京回到廣州，適在共產黨決定上述種種陰謀之後，實在是歷史上一件巧事。他於四月中旬到廣州，適胡展堂許汝爲蔣介石三先生於平定東江之餘，正約定了討伐楊希閔劉震寰兩逆的計畫，下了動員令的時候。鮑羅庭是時亦剛由北京跑回廣州，聽着政府要打楊劉，就當夜往見胡先生，極力反對，甚至要求收回動員令。鮑之用意，在逼着政府與楊劉妥協，以便共產黨徒在外大做其指摘『某派游移』『某派妥協』

種種預定的宣傳。同時汪精衛一到廣州，遂亦奔走於廣州與汕頭之間，在汕頭就力勸許先生萬萬不要攻打楊劉。那曉得胡先生不從鮑，許先生不從汪，於是鮑就反過頭來在共產黨的機關報『嚮導』上說：『國民黨左派已決計打破楊劉了』；『胡漢民是現在有地位的，汪精衛是向來講妥協的，聽說還天天到什麼地方和楊劉說話哩』！一轉移間，鮑羅庭就這樣中傷人，反把已經發動的軍事秘密洩露於敵軍，把國民黨整個軍事政策歸功於他所御用的『左派』；這種狐狸狐搯的陰險手段，唯有他那猶太孽種才玩弄得出。只有汪精衛勇於相信鮑羅庭輕於相信國民黨自己同志的人，受了鮑羅庭的玩弄，至今還一點兒也不知道。幸而政府於極迅速的短時間內，把楊劉打敗，所以共產黨的陰謀無所施展。但是楊劉既平，接着就有第三國際訓令中國共產黨對付國民黨的計畫，其內容最重要的是分兩步：（一）大元帥府告一結束，改爲委員制；（二）將國民黨員之有力者逐一推倒。於是改組大元帥府之事遂起。結果國民政府應運產生，而汪精衛乃被舉爲主席。那時黨裏有許多有地位的同志，都曉得他們改組政府的動機，是因爲胡展堂先生代行了大元帥的職權，非排除他不可；只是胡先生忠厚待人，被他們擺

佈到一個外交部長的地位，他還不離開廣東：這是許多同志那時責備他的話。然而事實上則胡先生曾經自己提議要往各國作取消不平等條約的運動，但政府總是對他敷衍，而且有人對他表示，如果要到外國，只有到俄國去，無論如何，事實上則國民政府已經產生，國民黨忠實同志就益不能不團結堅固，維護中樞的權力。這又是那時國民黨同志的心理。然而在共產黨一方面，大元帥府既經改組，則就要接着實行其澈頭澈底分拆國民黨的預定計畫。因此在實事上，共產黨就利用對香港罷工，對五卅慘案，對沙基慘案，對九江青島等處慘案，接二連三地所引起的民衆運動，在羣衆中盡全力做分化國民黨『左』『中』『右』等等派別的宣傳。到了分化的工作，一直從下級黨員羣衆中做起來了，於是黨裏的裂痕，都從各地各級黨部的衝突上表暴而出；同時共產黨以廣東爲活動的中心，將各縣的農工羣衆，鼓動了一部分，都抽調到廣州，天天在街上示威游行，狂喊亂叫，喊叫的聲音高了，示威的空氣熱了，便生出一種吸引力和壓迫力，弄到接近的一般人，有的惴惴地懷着恐怖的心理，有的簡直起了『左傾』的狂熱，如中瘋魔，而遠在各省的人，受了這種左傾熱的民衆運動的影響，也就不管是

左傾的也好，右傾的也好，不傾的也好，的確確都中了共產黨的預謀，個個『都有明確的左傾觀念』了。這時候，共產黨一手抓住國民黨最高機關裏面的幾個主要的部分，一手煽動着國民黨中下各級黨部的『左派』分子，雙手縱橫捭闔的攪弄一陣，於是把國仄黨自上而下的忠實黨員，都給他們戴上一頂『右派』或『反革命派』的帽子就擡了出去，而把一切投機的昏迷的不事生業的愛熱鬧的分子，都給他們戴上一頂『左派』的高帽延請進來。在這種形勢之下，『左派』從國民黨的下級黨部起，一直到上級黨部止，都一層一層地癩腫起來，而戴着一頂『左派高帽』而龐然自大地做『左派領袖』的，便是這位汪精衛先生！

斯時共產黨電鍍起『左派』的狂風，威勢是十分猛烈，壓迫到黨裏同志們憤怒在胸，沉憂在面。上海的同志，如吳稚暉戴季陶葉愴楚沈玄慮謝慧生邵元冲諸先生，看到黨的重心已失，並且知道廣東情形，內部舉凡一切要政，悉決之於鮑羅庭，而汪精衛亦事無大小，悉取決於鮑，於是大家開了幾次談話會，結果都一致主張力勸在粵的幹部諸同志，務須共信互助，團結一致，抵抗一切謀害國民黨者之分拆離間。當時並推戴季陶同志起草幾封公函，分致在

粵各幹部同志，條陳挽救黨的危機辦法。函中要義，大意是說：『總理雖逝，而展堂精衛仲愷介石汝爲諸兄，團結一致，即可爲黨之中心』。旋由慧生先生與幾位同志持函赴粵，而季陶先生等則分任宣傳組織種種工作，以圖補救。季陶先生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即完稿於是時。不料慧生先生等甫抵廣州，而仲愷先生被刺，一切救黨辦法之談，都無由而入，而鮑羅庭就更趁此機會，施其進一步推翻國民黨中心勢力的毒計，蓋黨的最重大的創傷，總理死後，以此爲第一次矣。

我今追述此事，心頭積痛，又復如潮湧起。然我當戰勝我的積痛，說明我所知道的事實；因爲國民黨所以弄到這幾年來如此的殘破，一切的惡因，都在廖案那一節史跡撒播下來。我常以廖仲愷先生之被刺，比例於歐戰開始時奧國皇儲非迪南大公之被刺，而其範圍大小之不同，則自然又當別論。歐戰的導火線是起於奧國太子被一塞爾維亞人暗殺，然事實上則協約國與聯盟國早已厲兵秣馬，待機而動，故歐戰之爆發，不過借奧皇太子暗殺案爲觸發之機罷了。是故歐戰的負責者是爭奪世界霸權的歐洲列強，而不是奧國皇太子與其兇手。同樣的

，因廖案所引起的政治鬥爭，負責者是爭奪國民黨權的共產黨，而不是廖仲愷先生與其兇手。因此，在這兩件暗殺案的本身，當與其所引起的政治鬥爭分別追究，這是歷史家所應有的態度。換言之，歐洲戰史的歷史家，在一方面的事實上，把奧皇太子暗殺案視爲一事，在他方面的事實上，則把歐洲爭霸權的列強藉此暗殺案而開戰又視爲一事。我們在同一的觀點上，把仲愷先生的暗殺案視爲一事，把國民黨內外爭黨權的人藉此暗殺案而攘奪黨權消滅國民黨又視爲一事，這是於當日各方面的情形都適合的。且看事實。仲愷先生是八月十九日早上與陳秋霖，帶着幾個衛兵，乘着汽車，往中央黨部去的。他們在大門外下車就跑進外門。外門之內，不上五步路就是正門。他們剛到正門，就有兇徒六七個人，由內面衝出來，向他們開槍，仲愷先生登時倒地而逝！要曉得，那時兇徒六七人在中央黨部內面等着行兇，何以事前竟至沒人覺察呢？當時做組織部長而兼常務委員的是譚平山，黨部的各種雜務人員都歸他調遣的，何以黨部預伏了兇徒會沒人知道的呢？他們何以能夠闖入這種最重要的機關裏面去呢？這種溺職疏忽的責任，至少是譚平山輩要負的吧！以譚平山這一件事，就可以證明他們

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裏自來就沒有把國民黨的事鄭重辦理，所以才有關係如此重大的貽誤！然而最奇怪的是廖先生被難以後，譚平山輩這種疏忽溺職的過失，至今竟沒有聽見什麼人提及過！到了廖先生被難的第二天，忽然廣州市戒嚴，大捕嫌疑犯。同時就組織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蔣介石許汝爲三先生爲委員。鮑羅庭就力主逮捕鄧澤如胡展堂謝慧生鄒海濱古應芬五先生。汝爲先生不答應；介石先生就說『他們都沒有關係的，成爲問題的還是軍隊』；而精衛先生則徬徨得很。但是鮑羅庭却極力逼他們三委員，一定要逮捕五位先生，並以去就力爭，說道：『如果不逮捕他們，我就即刻跑路』！汝爲先生就說：『沒有證據，以何理由逮捕他們呢？』鮑羅庭答說：『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有沒有證據！逮捕了人就是證據』！本來他要逮捕的五位先生之中，謝慧生先生是剛由上海到廣州的，但是只要逮捕，也就不必問了。這兩人的一問一答，就可以看得出：證據之說，還是誠心從獲得真兇的一點上着想；而政見之說，則完全是在利用此案爲政治鬥爭的一點上着想了。所以我說我們把廖案本身視爲一事，把借廖案作政治的鬥爭又視爲一事，是於當時各方面的情形適合的，而其所適合的情形，



這就是其中之一種。當時捕了多少嫌疑犯，他們的嫌疑到什麼程度，他們平日行為怎麼樣，我是從來都沒有曉得的。我只曉得其中一個林直勉，他是陳炯明反叛 總理，葉舉楊坤如攻打總統府時，深夜救 總理出險的一個同志。他在廖案發生前七八個月，就因為患肺癆病到了第二期，帶着幾枝瘦骨臥在家裏的。他關起門來養病大半年，除了醫生吃藥而外，不見一客，不聞一事。然而廖案發生也就把他捉了去。他生平是沒有好朋友的，除了 總理和胡展堂朱執信兩先生外，他是無人不罵的。他被捕的時候，審訊的人問他對於廖仲愷先生的暗殺案怎樣，他就直切地說：『廖仲愷我是反對的，但是殺廖仲愷我是不知道』。汪精衛第二天就對人說：『仲愷是一個剛強的人，反對他不掉，那就會殺他的』，這是汪先生裁判林直勉的方法。這一事，我們又看得出：審訊官的訊問，是法律的訊問；汪先生的判斷，是政治的判斷。所以我說我們把廖案本身視爲一事，把借廖案作政治的鬥爭又視爲一事，是於當時各方面的情形適合的，而其所適合的情形，這就是其中之又一種。在廖案發生的那一天，汪精衛公表一篇談話到各報去，一方面則說胡展堂先生與廖案無關，一方面則極力用旁襯側擊的話

，極力想減殺展堂先生的政治威信；這篇談話發表之後，給季陶先生看見了，就痛哭了幾場。過了幾天，季陶先生又流涕對我說：『他們是重演曹操逼宮，展堂做了漢獻帝；但不知將來逼曹操的宮的又是何人！只是我們如何能夠忍看下去！』我聽了他這話，我就心如刀割，哭黨已無淚，慰他亦無言了。但是汪精衛還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悼廖仲愷同志並勗諸同志』的文章，『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向右去！』我就不由地堅決的說，『他們完全利用廖案做「左派」的宣傳了，倒反把仲愷先生的真敵人放鬆，真是死者替生人擔當罪過太多了！』但是不久就聽說查出了主要的兇犯是朱卓文，可是朱卓文却無人負責把他捕獲。過了許久，廖案的判決案才宣佈，而無關係的被囚者與有關係的被囚者，都過了同樣長久的牢獄生活，而最受冤屈的林直勉同志，直到今年南京清黨的時候才得一副病骨釋放出來。這些事實，又可見他們爲廖案作主張的，輕人命而重政權；所以我說我們視廖案爲一事，視藉廖案而作政治鬥爭又爲一事，是於各方面所經過的情形都適合的，而其所適合的情形，這又是其中之若干種。他們這樣把暗殺案看輕，把政治案看重，而鮑羅庭藉此案以玩弄其共產黨對付

國民黨的方法，其經過則爲御用汪精衛把國民黨之有力者逐一打倒，以履行其第三國際的訓令。自此而後，國民黨中堅人物之不能團結一致，遂非人力所可挽回了。然而汪精衛至今却還不承認他自己是鮑羅庭所用以殺國民黨的第一個劊子手。他說八月二十日的殺死廖仲愷先生，『那並非暗殺的，是明殺的』！可是他們借廖案把國民黨殺到今日，是暗殺的呢抑還是明殺的呢？汪先生可曾知道？現在不知道，汪先生死時在良心的回光返照的俄頃也總會知道，再不然，汪先生死後，後世人也總會知道。廖案經過的期間，共產黨的凶餓逼人至此，汪先生所處的地位是主席，正是權能生人能殺人的時候，而至今汪先生還說：『在那時候，也有些同志以爲「容共政策」應該變「更」了，但是我們並未注意及此；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爲自私，因爲自己的利害，這便是罪大惡極，應該受大家嚴重的懲處』；然則汪先生不是因爲自私，當然也曉得爲公，不是因爲自己的利害，當然就能夠爲黨的利害，而何以汪先生對於共產黨之借仲愷先生的兇手之機關槍掃殺國民黨，竟至毫無抵抗的勇氣，乃反甘爲鮑羅庭的工具而不辭呢！汪先生自己譬喻得好，因爲汪先生說他自己『好比上海拉馬車的馬，他的兩隻

眼睛都被罩着，只顧往前直衝，不容旁顧，雖然輕忽不注意的錯誤，萬無可辭，但決不是出於什麼自私之心，這是當時的實在情形」。然則汪先生便做了拉馬車的馬，鮑羅庭便是高高上坐的趕馬的馬夫，後面拉着一批坐馬車的共產黨，他們將汪先生兩隻眼睛都籠罩着，而汪先生生平是自信有這種勇氣的，所以就只顧往前直衝，却不管連我們總理手創的國民黨都衝成粉碎，你汪先生說這是實情，我們是相信汪先生最深的，也都當然不能不首肯呵！

汪精衛這匹馬，如此被鮑羅庭這個馬夫趕着，橫衝直撞，把國民黨衝得粉碎，坐在後面車中的共產黨，心中當然十二萬分的得意，大家都拍掌贊賞他確是一匹好馬。但是在共產黨與國民黨兩黨的鬥爭上，他們御着這匹馬向國民黨的第二道戰線進攻，比他們向我們最前的第一道壁壘進攻時，所得的勝利是如何呢？當總理在最前線和他們決鬥時，在形勢上和戰鬥能力上，總理都沒有失敗；只是不幸總理因病逝世，喪我統帥，否則他們是決不能攻破我們的第一道壁壘的。自廖案發生，他們利用汪精衛，利用廖案，結果折散了我們黨的中堅領袖們，而我們的第二道壁壘又被攻破。經過這次鬥爭之後，我們檢查雙方的形勢，共產

黨則不但侵入了國民的黨部和政治最高機關，而且奪取了國民黨在民衆當中的隊伍，而國民黨則除了受此種損傷外，以後的形勢，且陷入各部分人自爲戰的狀態了。

當汪精衛的兩隻眼睛被共產黨籠罩着而橫衝直撞的時候，許多同志不忍見國民黨覆滅，於是羣起呼號，力圖挽救。各地青年和農工黨員，一方面奔集於孫文主義學會之下，而中央各委員戴季陶林森謝持居正沈定一葉楚傖邵元冲鄒魯等十餘人，亦於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總理靈前集會，通過取消共產黨分子在本黨的黨籍，顧問鮑羅庭解雇，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應即日停止職權，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不得在本黨執政地方之政府機關服務，修正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等案。這種舉動，當然引起一個與粵方對抗的局面，因爲西山會議是將共產分子根本剔除，而粵方汪精衛與共產分子等則堅持『容共』是總理的『政策』，至是『容共政策』四字，乃從汪精衛輩的函電中，正式發出。所以『容共政策』，是粵方執以抵抗西山會議的決議的政策，而並非見於總理的遺教，更非見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式文獻，其故在此。西山會議以前，國民黨可以說是只取守勢，而共產黨則取攻勢；

此次西山會議，則國民黨一部分取了攻勢，所以才逼出對方用『容共政策』作反攻的中心理由。後來南京清黨的時候，國民黨方面進攻的力量更大了，而共產黨方面則更擴大『容共政策』的政策，提出『三大政策』的口號來相抵忤，也是爲此。所以汪精衛說『容共政策』『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這他是無意中從聯想到『三大政策』的起因而說的；他又說『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國七八年』，這便是他說明他們藉口於民國七八年 總理見過俄國的說客而造出『容共政策』的心事，實際上則『容共政策』純爲他們抵抗西山會議的進攻，蓋已事實昭然。他們不但造了『容共政策』這個口號，同時更提了『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出來，與西山會議決鬥，而這口號就一直到現在還是流行。我們從客觀上紀述，索性將西山會議與西山會議派的各種批評也引述一下。從國民黨當時受共產黨分拆離間的危急情形說，西山會議，總算是國民黨在歷史上一部分同志起來救黨，和共產黨決鬥過，這件事實是不可抹煞的，因爲國民黨對共產黨分子有清黨運動，實始於西山會議，這件事實是不可抹煞的。所以張靜江先生很公正地說：『西山會議是清黨的先覺』。然而同時又有人批評：『西山會議，其事在於救黨，是無

可非議的，而其所取方法，則完全錯誤，實爲可惜。只是又有人說：『歷史上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事跡正多，本來就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何必斤斤於西山會議呢？』實在說來，如果不把這事視爲政治的鬥爭則已，若是視爲政治的鬥爭，則不能完全不講方法。因此，就有幾位同志說過：『西山會議當時的方法錯誤，固然是事實，但是還不是無可補救，只是到了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共產黨打到蔣介石先生的頭上時，他們不能盡棄從前的小怨小嫌，而幫助介石先生，剷除共逆，挽回黨權，實是失策。』還有一個比較從大體上說法的批評，它說：『西山會議的救黨，這是對的，不過弄成一個西山會議派，變成了腐化的代表，那就無可救藥了。』這一說把西山會議和西山會議派區別出來，依今日的情形，也有相當的理由。因爲當日參與西山會議的人，不盡是西山會議派，而今日西山會議派的人，不盡參與了西山會議；然而我們也應承認，西山會議派中人雖有腐化分子，却並不是西山會議派都是腐化分子。所以事實上，西山會議固然與西山會議派有區別，即西山會議派中的腐化分子，也應該與其中的非腐化分子有區別，不可一概抹煞的。總括地說，西山會議，是國民黨一大部分中央委員

對共產黨的決鬥，而其結果則成了一部分的勢力，在行動上不能與全黨的行動一致表見，因之亦成了黨的一個裂痕，而其所以如此，則人的問題和感情利害的問題，乃其背景，非可以純理性的標準律之，能得解決的。這是本黨一部分人自爲戰的第一個史跡。

西山會議之後，汪精衛與共產派分子益發團結，到了十五年春間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左派』的勢力，當然鞏固了。但是他們在這次的大會裏，一方面對西山會議仍復盡力反攻，而他方面則改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憑空添出一個『聯俄聯共』來，此其志在於變國民黨爲共產黨，也顯而易見了。所以不久他們便再進一步來奪取國民黨的武力，遂有三月二十中山兵艦之謀變。幸而介石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預知他們的逆謀，就馬上將它解決，而本黨的基本武力和革命策源地，乃得危而復安。事後介石先生請求中央追認此種應變的處置、而汪精衛却不肯簽字，託病請假離粵。殊不知名爲離粵，實則仍潛處廣州，等到鮑羅庭由海參威回粵，汪精衛與鮑秘密會見一次，得了什麼面諭，才悄然跑到外國去了。



到了五月二十五日，蔣介石先生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席上提出整理黨務案，得着全體的同意，才算於中山兵艦事件得了一個相當的結束。這一個結束，在國民黨可以說得是第二次的清黨運動的先兆，而其決議案的要點如左：

- (一) 他黨黨員，加入本黨，對於 總理及三民主義，不得懷疑或加批評；
- (二) 他黨黨員，加入本黨，任為高級黨部（中央，省，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時，不得超過該黨部執行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三) 他黨黨員，加入本黨，不得任為中央機關之部長；

(四) 凡隸屬國民黨籍者，未得最高級黨部之許可，不得另有政治關係之組織及行動。

以上四項，是因為發現了共黨三月二十日的陰謀而決議的預防方法。以後來共產黨在軍隊內之猖狂和武漢的情形而論，這個決議案是不徹底的，妥協的，無效驗的。然而從本黨基本武力的立場看，此次却是蔣介石先生與武裝同志一部分人自為戰的第二個史跡，不可不紀的。

但是現在汪精衛自己對於三月二十日的叛變，却又是什麼態度呢？且看他在『武漢分共之經過』裏面說：『十五年春間，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再確定容共政策。當時廣東已經統一了。所謂經過一個段落之後，便必有一個風潮發生，西山會議派於是決定聯蔣倒汪的策略了。當時我們二人是一道奮鬥的，他們欲把我們二人分開，所以決定聯一打一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便是此種策略的成功！』汪精衛的嘴巴真是溜滑不過！我們已經注意到，汪精衛輩曾經於第二次代表大會竄改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憑空添了一個『聯俄聯共』出來。我們在前面還沒有討論，而現在則不能不追問的就是：汪精衛爲什麼要說第二次大會『再確定容共政策，』而不說『聯共政策』呢？難道『聯』與『容』沒有分別嗎？這許汪精衛以爲在國民黨的立場說『容，』而在共產黨的立場就要說『聯，』『容』與『聯，』於汪精衛都不過是要與共產黨『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罷了，有什麼分別呢？然而我們却深知道，共產黨在三月二十日的前後，對國民黨則既不須『容，』亦不願『聯。』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那時候胡展堂先生正在俄國，第三國際主席辛諾維埃夫極力勸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過了一星期，史丹林又極力

阻止其不可加入第三國際。這是爲什麼呢？因爲那時俄國共產黨已派遣其東方監察委員主席苦必亞克來廣州，冒名爲商務委員，煽動三月二十日的謀亂事件。史丹林那時以爲國民黨滅亡就在目前，再過些時，只有中國共產黨了，那裏還有國民黨呢？所以史丹林就阻止辛諾維埃夫勸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我們於此，就可以證明共產黨與國民黨說『容』說『聯』，『都是陰謀；三月二十日前，他們的驢山老祖第三國際和史丹林，一個說『聯』，一個說『不聯』，也都是陰謀；而汪精衛却要點清一句，說什麼『再確定容共政策』，你這是向史丹林輩邀功呢，抑還是向國民黨同志們認罪呢？三月二十日的叛亂，既然是俄國共產黨派苦必亞克來廣州煽動的，而且今年蔣介石先生在南京說過是共產黨謀亂的，而今你這卑鄙無恥的汪精衛却推諉到西山會議派的『聯蔣倒汪』策略，你這是想誣蔣介石先生爲西山會議派呢，抑還是借重西山會議派的招牌來遮掩你自己對不住蔣介石先生的羞容和賣黨賣國的罪狀呢？好一個卑鄙無恥的汪精衛呵！

(二)蔣介石同志北伐的時期 三月二十日的事變以後，汪精衛既以袒護中山兵艦的叛變

而去，胡展堂先生適於是時由莫斯科首途回國，到了海參威。那時俄國共產黨得聞三月二十日的陰謀已失敗，連汪精衛也不能保，乃下令阻止展堂先生離俄，以免其回國後與蔣介石先生合力拒共，反於若輩爲不利。但是展堂先生在俄國一言一動，均爲俄國的民衆所欽仰，若以野蠻手段阻止其離俄，則勢必激動民衆之怒，於是設種種假託之辭羈留胡先生於海參威者廿五日。時胡先生的秘書朱和中同志，深知俄國共產黨的詭計，且知其不敢施行野蠻手段的隱衷，於是嚴厲詰責海參威的俄國共產黨要人，逼其行蠻，藉以暴露其詭計。蘇俄共產黨果爲所窘，乃調苦必亞克於滿洲，又調鮑羅庭於海參威，伴隨展堂先生回粵。等到抵廣州，鮑羅庭仍以中國共產黨的蝦兵蟹將逼展堂先生離粵，並藉邵力子以聯絡介石先生。時黨中無人主持，張靜江先生勉爲其難，而鮑羅庭以爲張易與，更無忌憚起來，遂有兵工廠的風潮發生，而靜江先生亦盡情知道鮑之陰謀了。是時鮑羅庭蓋謀奪取兵工廠而置之於共產黨管理之下，所以一方面煽動內面的風潮，一方面開一工警聯歡會，以爲風潮爆發的導線，而他方面則召集由土匪編成的農軍，且煽動軍隊，將由工警的聯歡而變成工農軍警的暴動，由暴動而推

翻政府，捕殺國民黨員，擄掠廣州市，令廣州全體市民變成暴民，始假借這暴民的威力來組織共產黨的政府，是謂之無產階級政府，不料兵工廠的風潮即日解決，而工警聯歡的陰謀，亦經披露，鮑羅庭的鬼蜮伎倆，又不得而施了。這是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由廣東出發以前的罪狀。

兵工廠的風潮，與共產黨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計畫，亦有關係。因為國民革命軍預定了出兵的計畫，鮑羅庭和共產黨人聞知此事，就想設法破壞，而破壞之法，莫過於使廣州發生變故，乃有工警聯歡的事件。他們共產黨何以要破壞北伐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們在各省的勢力完全尚無基礎，北伐便只是國民黨發展得快，而共產黨追趕不上，豈不是他們不能利用國民革命來攪無產階級專政的勾當麼？所以鮑羅庭及其御用的機關報等，那時都有個一致反對北伐的理由，說是『國民革命軍如果北伐，則黨的勢力不能與軍力同時並進，將來必造成新軍閥。』其實何嘗是什麼黨的勢力不能與軍力並進，不過是共產黨的勢力跟不上罷了。只此一事，我們也就曉得共產黨人的革命勇氣是微弱得可笑了。這且不管它。到了七月一

日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了，共產黨人阻撓不了，於是就改變計謀，一定要總司令的政治部主任給鄧演達，使其能從軍隊裏面隱伏許多共產黨徒，一方面監視革命軍，一方面隔絕革命軍與人民相結合的正路。是月，國民革命軍入湘克衡州，八月下長岳，九月克武漢，而鮑羅庭是時就率領徐謙鄧演達顧孟餘陳其瑗陳公博一班共產黨和准共產黨的政客策士麇集武漢，以爲壟斷大權箝制國民革命軍的準備。是時蔣總司令慶兵於江西，與孫傳芳作殊死戰，而共產黨挾持武漢財權把持漢陽兵工廠，不發一槍，不發一錢，且三電廣州兵工廠罷工，以斷國民革命軍的接濟。迨贛閩既定，中央政府及黨的機關，議決暫駐南昌，而鮑羅庭及其爪牙復違抗中央的決議，拒絕改組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力爭政府遷鄂，而實際則篡竊中央政府的名義，舉行其毫無法律根據的聯席會議，這就是所謂武漢國民政府的起點。當時他們且脅迫介石同志，謂政府若不遷鄂，則大局立可破裂，武漢將另設中央。介石同志以大敵當前，不得不顧全內部，遂請在贛中央委員赴鄂，希望他們早日開成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以謀黨的重心，得以鞏固，而不致再受共產黨人之操縱。然而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之前，鮑

羅庭和共產黨徒早已佈置就緒，一方面決定迎汪倒蔣的計畫，一方面準備以武力挾迫及暴徒示威之恐怖，對付國民黨同志。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樞同志，轉戰湘鄂，抵定武漢，勞苦功高，竟被宵夜逼走；武昌軍事政治分校學生，被其妄肆拘捕者千餘人之多；凡是不甘附和共產黨的同志，如張靜江先生，竟誣為『昏庸老朽』，如葉楚傖先生，竟強迫離漢，其餘如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長李仲公同志及忠實的革命將士，或被扣留，或被殺戮，或被逼投江自盡；種種險毒手段，層出不窮的對國民黨盡量施用。這個時候，武漢政府和黨部的最高機關，完全落在共產黨的掌握，黨政各部，莫不有公開的共產黨員或準共產黨員在內操縱把持，而本黨的官僚政客和意志薄弱的黨員，都為所利用，所謂『以國民黨制國民黨』的策略原則，至此已盡人皆見了。但是他們不但篡奪了國民黨，並且魚肉兩湖的人民。國民革命軍自廣東出發以後，鄧演達做了總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却並不跟隨總司令部移駐，而跟着鮑羅庭移駐，所以總政治部等於鮑羅庭的御用的格必烏；一切示威和恐怖的工作，都從總政治部出發；一切訓練的工作，都以訓練武裝暴動和煽動農工為目的；一切活動的人員，都是引用共產黨的蝦兵

蟹將，排斥國民黨的青年同志；凡是國民革命軍進展所及之地，都派遣共產黨以差事金錢女色所勾引的幼稚分子，跟在軍隊後面，佔領機關，委派官吏，搜刮錢財，剝削農工，奸淫婦女，而皆美其名曰『打倒資本家地主土豪劣紳』『打倒禮教！』在這種殺人放火主義的橫決情勢之下，中原各省的人民，於是異口同聲的說：『革命軍可愛，革命黨可殺！』然而贛湘鄂三省的民衆，乃從此益遭共產黨的屠殺擄掠，墮入水深火熱的紅色恐怖裏，而莫能自救了。

他們在兩湖進行紅色恐怖的初期，同時在南京上海等處亦有同時並舉的陰謀，欲乘何應欽白崇禧諸同志的大軍奠定江浙之際，造成暴動。是時蔣總司令由贛來滬，正與吳稚暉胡展堂蔡子民李石曾張靜江諸先生商議護黨救國之大計。適汪精衛亦於四月一日回到上海，介石先生等向汪提出兩事，一是趕走鮑羅庭，一是清黨。汪精衛不然；他以為這是有關於『容共政策』，『不可輕變』，如果要變易政策，就要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介石先生駁他說：『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已開過了，然全爲共產黨所把持。』汪精衛說：『如此可以提議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以新決議來變更舊決議。』其實再開全體會議，共產黨還不是要依然把持嗎？再不



然，他們用進兩步退一步的方法來妥協，還可以取得『容共政策』的繼續權，還不是開了全會等於未開的嗎？然而介石先生等還容納汪精衛的提議：於四月十五日在南京開會，國民政府即可定都南京。同時汪精衛贊成未開會以前應急的辦法四條：（一）由汪精衛負責通告陳獨秀，立即制止國民政府統治下之各地共產黨員，應即於開會之前停止一切活動，聽候全體會議解決；（二）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鄂後，因被操縱，所有命令不能有效，如有認為妨害黨國前途者，於汪同志所擬召集之會議開議以前，不接受此項命令；（三）現在各軍隊及各省黨部團體機關，認為有在內陰謀搗亂者，於汪同志所擬召集之會議未解決以前，在軍隊應由各軍最高級長官飭屬暫時取締，在各黨部各團體各機關由主要負責人暫時制裁；（四）凡工會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部指揮，否則認其為政府內陰謀團體，不准存在。乃汪精衛一方面對這些事件都予同意，一方面則與陳獨秀聯名發表四月四日的宣言，否認證據確鑿的共產黨危害國民黨的陰謀與事實。過了兩天，汪精衛忽然不告而別，逃往漢口。在船中他又寫信給張靜江蔣介石李石曾三先生，說什麼『十三年改組的精神不可犧牲，黨的紀律不可不守

，黨的組織不可破壞，』言外之意，却仍要維持他經手造成的『容共政策，』反譏一般同志爲不守黨的紀律，破壞黨的組織。他一到武漢，得着共產黨的擁護，更發出一個銑電，不承認他在滬與吳李張蔣蔡所談的言論，并且於四月十七日在武漢中央黨部主持免蔣介石先生的總司令職。在滬同志，見到汪精衛這樣反覆無常，不得已乃於四月十八日定都南京，執行與汪精衛所面定的辦法，而檢舉共產黨危害國民黨的種種罪狀。這是南京清黨的經過。

汪精衛這一段經過，現在是舉國都知道的，不能巧辭掩飾的，所以汪精衛這種好作違心之論的人，也就不能不自己承認說：『在兄弟當時看來，以爲蔣同志等是不對的。但是如今看來，不但不是蔣同志的不對，而且是兄弟的不對。因爲當時蔣同志等見兄弟不肯聽他們的話，定要往武漢去，……而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卻不出蔣同志等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對蔣同志的聲勢。所以兄弟事後批評，不說蔣同志不對，而說兄弟不對，這是事實，並不是什麼違心之論。』只是我們要問，爲什麼這種話要等到你大喊『汪蔣合作』的時候才說，難道你到武漢去的結果，當時你自己不但不覺得『增加了反對蔣同志的聲勢，』反而助共產黨盡全

力來攻擊南京的同志們，這種行動，當時都是發瘋，直到而今才醒過來嗎？未免太自欺欺人了吧！簡括些說：黨裏幾年來的糾紛，雖不能盡責汪精衛一人，然而給共產黨利用爲主要的工具，把整個完好的國民黨來分拆欺騙打倒，不是汪精衛一人是誰？這種重大的罪過，豈只是反對蔣同志一人的罪過，只是對蔣同志一人表示認錯，就算完了責任嗎？

以上所述，是自汪精衛在廣東做國民政府主席到南京清黨時的重要經過。但是由南京清黨到現在的情形，知道的人已經很多，不必細述，這裏只消簡括地把汪精衛到武漢以後的幾件重要事申述一下，藉證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所說的三點之內容。他敘述武漢分共的經過，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裁判制共產黨徒；』第二階段是和共產黨和平分離；』第三階段是以嚴厲手段驅除共黨。』我們現在且簡單檢查他這三點的內容究竟是怎樣。

關於第一點，他的主要意思，只說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武漢的所謂中央黨部，曾經決議在贛湘鄂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檢查各級黨部和政府的機關及民衆團體的一切言論行動。他以爲這就是武漢裁制共產黨徒的證據。然而實際上却告訴我們：武漢政府在這時候，正

是非法免總司令職，揭發第三國際所訓令的『反共倒蔣』口號的時候。難道裁制共產黨的言論行動就算是反共麼？一紙決議，以裁制共產黨的言論行動爲名，而拘捕排斥國民黨的同志則其實際，這樣是裁制共黨呢，抑還是頑弄假反共的虛玄呢？汪精衛自己說：『當四月中旬，武漢已成爲共產黨把持的局面了，然而主張分共是做不到的，』可見現在他說當時裁制共產黨也都是假的，因爲最怕是得罪共產黨的是他，在共產黨把持之下，主張分共都做不到，主張裁制又做得到麼？老實說，他那時正要和共產黨『生在一塊，死在一塊，』那肯『破棄聯合戰線？』他說他明知國共兩黨已經到了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不是國民黨銷滅共產黨，便是共產黨銷滅國民黨，然而他却要幫助共產黨銷滅國民黨，決不幫助國民黨來抵抗共產黨，這是不打自招的供狀嗎？

關於第二點，汪精衛告訴我們，從五月二十一起，是他的左派和共產黨和平分離的時候。他告訴我們，他這時候明知『莫斯科有一種秘密決議案，』其要點是：要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土地革命，不要由國民政府下令，要由下面做起，實行沒收土地，』他承認這實

爲湖南共禍的原因，『爲農民運動脫離了國民黨的原因；』要『增加共產黨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裏去，』並且公然說，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變更；』要『武裝二萬C P黨員，並挑選五萬農工分子武裝起來，』而他又明知所謂『農工分子，其實也即是指共產分子；』要『國民黨領袖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共產的軍官，』而他又聰明玲瓏得很，知道『這是要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劊子手，來自己殺自己！』但是我們要問：汪精衛果然到五月中旬以來才知道莫斯科有這種議決案麼？汪精衛三四月間才從莫斯科回來，在俄國住了許久，難道不曉得莫斯科的本部早已有『土地革命政策，』而這個政策又叫做『布哈林對中國革命的方案』麼？這一個政策，在俄國經了第三國際的通過，曾引起托羅斯基派和史丹林派在俄國報紙的大爭辯，難道還算是秘密麼？我們退一步承認，也許汪精衛是一向不留心外國的情形，所以到了俄國還是如同沒有在俄國一樣，那末，汪精衛於十四年六月沙基慘案之後，在廣州對鮑羅庭十二分奉承意旨的時候，鮑羅庭叫你汪精衛起草一篇主張用『土地革命政策』的議案，託孫哲生先生帶到上海和許多中央執行委員商量，後來幸被戴季陶先生等打銷了，難

道你連這一事都忘記了麼？有這些事實作證明，你還說『土地革命』是什麼秘密議決案，沒有看見過，直到今年六月才成了你的新發見麼？汪精衛在『分共之經過』裏，極力要叫我們明白的，無非說他因為知道了莫斯科這種決議，才努力幹其分共的工作，他差不多要說，『國民黨反共，都要算我汪精衛的絕世聰明，發見了莫斯科這個決議，才得了有力的證據呵！』我們是深知汪先生是聰明絕頂識見絕倫的，可是汪先生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共產黨增加他們的分子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來，為什麼你却不得共產黨是要銷滅國民黨的呢？難道這一回你發見了決議就知道分共，那時你眼見了事實却不知道分共嗎？在汪精衛做主席的時期，共產黨在廣東大做其農工運動，使農工脫離了國民黨，這種手段，比他們施之於湖南的豈有分別，而汪精衛於湖南則曉得農工運動脫離了黨，於廣東則不獨不曉得它脫離了黨，而且還罵當時敢說這種話的同志們爲『反革命』，難道於廣東是『汪主席』治下的農工運動，只要沒有脫離『汪主席』，便沒有脫離黨，『汪主席』一人就是黨，於湖南則是『汪主席』到武漢以前所作的農民運動，與你沒有關係，與你沒關係就說是脫離了黨，而

你一人也就是黨，是不是呢？你在廣東以『主席』而兼特別委員，利用廖案而逮捕真兇手以外的一般反共產的同志，驅逐胡展堂先生，那時你汪精衛就不曉得『這是要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劊子手，來自己殺自己，』而在武漢看了莫斯科『要國民黨領袖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共產的軍官』的決議，你到反曉得『這是要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劊子手，』難道你做劊子手的時候，就是對的，你沒有劊子手做了，就是不對的麼？

關於第三點，汪精衛說他七月十五以後是以嚴厲的手段驅除共產黨，這尤其是笑話。事實告訴我們，從那時起，武漢偽政府的驅共，是一方面將湖北湖南的共產分子與江西上海等處的共產分子對調，一方面派張發奎黃琪翔葉挺賀龍從江西攻廣東。他們怕一般國民看破他們的詭計，所以又教葉挺賀龍在南昌假名譁變，而張發奎黃琪翔則假裝追擊葉賀，以為掩人耳目之計。實際上則他們分道入粵，大頑弄其做賊追賊的把戲，奪取我們革命的策源地。到了廣東，葉賀被黃紹雄蕩平而歸於失敗，張黃乃藉反對特別委員會之名而將黃紹雄驅逐，以為實現襲取廣東的目的之計，這就是此次粵變的內容，亦即汪精衛所謂『嚴厲驅共』的內容

！在這一場事變之中，汪精衛誘騙李濟深離粵，實行調虎離山，使張黃得以驅逐黃紹雄於不知不覺之中；到了上海，則大喊其開第四次會議預備會的口號，欲藉此以掩護黃張叛變的陰謀，而搗亂國民政府的步驟，使之不能合力平粵，這是汪精衛要『打倒特別委員會』開第四次全體會議』的真實作用。

總括汪精衛的『武漢分共之經過』的內容，他的總意思是要使人相信他自來都是反共的，把共產黨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的罪過，都推卸於別人。而自己毫不認賬，這是第一點。到了驅共的事實發生，他只認『廣東四月間分共』和『武漢七月的分共』是真正國民黨的分共，而蔣介石先生等在南京的驅共和特別委員會的繼續肅清共產黨，都概不承認，這彷彿只有汪精衛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一派人才是國民黨，而其他與共產黨奮鬥了多少年的同志們，都要趕出國民黨以外去。只要看汪精衛這種心理，就可以曉得汪精衛是始終存了『朕即國民黨』的私心，至今還是絲毫沒有懺悔的！唯其存了這種私心，所以才給共產黨顛倒利用，把國民黨打得粉碎，至今黨是破了，汪精衛也不成人了。我誠心勸天下人，要以汪精衛做鏡子



從今以後，不要再走他的末路呵！

## 五 蘇俄消滅中國革命的陰謀

前面所述，是共產黨逐步拆散國民黨的經過，而其結果則使國民黨內部日趨於分裂，始則有西山會議中的各委員與之決鬥，繼則有蔣介石吳稚暉諸先生與之決裂，而汪精衛自爲『左派領袖』，最後亦不復能自全於國民黨，見信於民衆。

中國共產黨所以如此逐步破壞國民黨，其最終的解釋，是奉蘇俄的命令而來。蘇俄爲什麼要設盡方法施盡陰謀來破壞中國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呢？最簡單的答案，是根據列寧的根本政策。我們對於此點，已經說過了許多次。舉過了許多鐵證。我前在胡展堂先生處，胡先生拿出列寧『對弱小民族及殖民地政策基本案』給我看，原案凡十二條，是列寧在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二次大會中提出的。這是胡先生未曾發表過的，我現在摘舉其中重要的原則如次：

第三國際的弱小民族及殖民地政策之基本，是圖各國勞動階級相互之接近。什麼緣故

？因爲不如此就不能戰勝資本主義。

在蘇維埃俄羅斯樹立的勞農專制，必然的非以全世界之資產階級爲敵不可。因此，在一方面，蘇維埃聯邦俄羅斯非把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牽做自己的一派勢力不可；在他一方面，它們也非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同盟，不能得到解放之路。

以這個原則爲前提，列寧對於一切民族運動，就指示了要各弱小民族非與蘇俄結合不可的根本方針；此乃列寧應用拿破崙假協助歐洲民族革命之名而行征服歐洲民族之實的一個歷史的詭謀，此案已完全暴露了。列寧的方案又說：

『聯邦組織』是各民族完成團結的過渡形式；俄羅斯由此政體，而確定與其他民族共和國之關係；第三國際的使命，是在就此政體之上，期新聯邦組織之發達。

這是在拿破崙聰明了一些，因爲拿破崙征服了他民族，最多只知道派一個兄弟去做西班牙的皇帝，又派一個兄弟去管領比利時荷蘭混合的王國，到了再無兄弟或兒子可派，拿破崙就告完結。列寧爲蘇俄帝國主義立『萬年有道之基，』却換了一個利用『聯邦組織』爲完成

併吞弱小民族的『過渡形式，』而第三國際的存在及其使命，就只是爲此。列寧在他的原則上，舉蘇俄與烏克蘭，韃靼等自治共和國的關係爲例證——現在外蒙古亦可爲證——高呼『世界蘇維埃聯邦化』的口號，也是爲此。對於文化落後的國家，列寧以左列數項爲共產黨應採的方針：

一、各國共產黨，援助弱小民族之革命解放運動；但援助之程度，當與該國之共產黨協定，特別的是與該國經濟關係之最密切的國之勞動者，當負援助之責任；

二、當與宗教方面之中世紀的反動勢力戰；

三、汎回教主義及汎亞細亞主義，是正在和歐美的帝國主義戰的，而同時將使土耳其和日本的帝國主義強大，因此須排斥之。務要滅却封建制度的殘骸，濃厚農民運動革命色彩，儘可能的範圍，結合農民及其他一切被壓迫階級，作成蘇維埃，以建設西歐共產的無產階級與東洋革命農民運動之間的鞏固的同盟。

四、弱小國之特權階級，往往借帝國主義的援助，而形成僅是政治上獨立的國家，至於

在經濟上財政上和軍事上，却陷於帝國主義屬領的狀態：共產黨非和這種傾向反對不可。

以上四條，使我們知道列寧式的帝國主義之造成，必須靠這兩個作法：第一，它是要利用各弱小民族的共產黨去參加各種解放或革命運動，從參加的工作裏面，養成蘇俄的走狗和工具的勢力，從而奪取革命的領導權及其成功後的政權，以爲蘇俄帝國主義伸張的尾閥；第二，各弱小民族自己的民族獨立精神，不管它是寄託在宗教，抑或在回教，抑或在以反抗強大的西方帝國主義爲標準的汎亞細亞主義，都於蘇俄帝國主義之擴大具有抵抗能力的，所以都須撲滅，而其撲滅的方法，乃在誣指各弱小民族的固有精神爲『反動勢力』，爲『封建勢力的殘骸』，爲『反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毀滅他民族的獨立精神，使之讓位於由蘇俄帝國主義輸入的殺人放火無所不爲的精神，然後蘇俄帝國主義才有發展的餘地。這兩種作法，前者是中國所謂『脫胎換骨』的詭謀，後者是西方帝國主義傳教的方法，教人家不要信固有的宗教，而去信它輸入的宗教。所以列寧主義，雖不目之爲帝國主義，亦不可得了。除

了上面四項所謂共產黨應採的方針外，列寧又規定附帶的條文六項，更說明其具體的政策，如下：

一、第三國際先不可不確定我們與中國及印度的革命運動之相互關係。由歐洲大戰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已集中於這一點，歐洲的勞動運動，是與非歐洲之被壓迫國解放運動有密切不離的關係；

二、歐洲的資本主義，爲主的是以其方向殖民地榨取。帝國主義之魁首英國，以亞細亞及亞非利幾億萬人爲奴隸，同時又壓迫英國自己的勞動者。由殖民地榨取的暴利，是現代歐美資本主義之主要的資源；

三、歐洲列強失其殖民地，引起本國內勞動革命的時候，便是歐洲資本主義倒斃的時候。因此，爲世界革命的勝利，殖民地與勞動者，於其解放運動，有協力之必要；

四、歐美之帝國主義，爲自國土業保護，妨害了東洋國民之經濟的發達。因此，東洋爲世界經濟落後的民族，多數的人民從事農業，僅能做成原料品，故殖民地的革命，

在第一步非驅逐外國的勢力不可；

五、兩個互相反抗的運動：其一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民族運動，此以儘資本主義制度存續而解放其民族者；又其一則爲勞動者及農民，脫却一切榨取勢力之羈絆的運動；前者常欲制後者而置之於其支配之下。因之我們的革命的第一步，雖在外國勢力之驅逐，而其最切要之使命，是在於組織勞農團體而直進於蘇維埃共和國之建設，故在文化落後的國，勞動民衆，將立於先進國無產階級指導之下，隨其階級意識之發達，可不經資本主義發達之過程而進於共產主義，此等國家，已有組織的革命黨存在，共產黨可與此等現成的政黨提攜，通過它而進於革命的運動；

六、在殖民地的革命，不可急用共產主義之原則以解決土地問題，當用土地分配等之小資產階級或改革主義的黨綱；但是不可將殖民地之革命指導權，給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之手；非努力宣傳共產主義之思想，作成勞農蘇維埃不可；此等殖民地之勞農蘇維埃，仍然要與先進蘇維埃共和國努力而打倒全世界之資本主義。

於列寧這一個基本政策，我們應該知道它的全部精神之所在。我現在再簡括地批駁它幾點：第一，此政策的總骨幹，在於樹立蘇維埃俄羅斯的帝國主義，以「聯邦組織」為過渡的形式，陰柔地併吞弱小民族，以各國共產黨為其工具，驅取弱小民族的革命領導權，為進行其併吞弱小民族政策之手段；第二，以此總骨幹為出發點，遂產生分拆各國革命勢力的政策之原則，所以才把各國革命運動，根本上強分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民族運動和勞動者及農民之革命運動，因為列寧的用意，要這樣分拆兩種革命運動出來，才拿得起其所謂各國的勞動者乃農民之革命運動，以威脅其所謂各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民族運動，而牽做蘇俄帝國主義的勢力，去抵抗歐美的帝國主義，這實與大戰前英國帝國主義要抵抗德國帝國主義的把戲，一樣的作用，並不是真要援助那一個弱小民族中的什麼革命運動；第三，更從拆散各國革命勢力的政策，遂產生出在文化落後的國家之共產黨，可以屬進已成的革命黨中，去奪取勞動民衆直進於蘇維埃的革命運動的策略。我們這樣分拆解釋，是因為列寧的原案，如果不是以建立蘇俄帝國主義為基本原則，便不足以解釋它其中的矛盾。因為列寧一方面承認馬克斯

共產主義須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始能實現的理論，而一方面又說『在文化落後的國家，可未經資本主義發達之過程而進於共產主義；』既說文化落後的國家可以直進於共產主義，却同時又說『不可急用共產主義之原則以解決土地問題，』而當用『小資產階級式改良主義的政綱；』而且，忽然說了『務要滅却封建制度的殘骸，濃厚農民運動革命的色彩，』忽然又說『不可急用共產主義以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這一切矛盾都是根據共產主義的立場所看得出的，而乃同在一個提案裏面表暴出來，難道列寧是失心瘋嗎？不是的呵！列寧不是根據上共產主義之實行，而是根據了蘇俄帝國主義之發展，來提出這一個對弱小民族及殖民地的政策基本案的呵！我更總合地說：列寧這一個基本案裏，凡談到援助弱小民族革命運動時，就歸納到共產黨；凡談到各民族的勞農運動，就歸納到蘇維埃，而各民族自身的利益，各民族勞農自身的利益，都不在他的基本打算之中，這豈不是明明證實了他的全部政策，目的只在於由各國共產黨而各國蘇維埃而蘇俄世界聯邦這一條線的帝國主義嗎？

列寧對弱小民族及殖民地政策的基本方案，至今爲史丹林一派奉爲聖經。列寧在時，史



丹林分主任管東方民族的革命運動，辛諾維埃夫主管西方勞農的革命運動。但是西方無辦法，辛諾維埃夫即因以失却第三國際主席的地位；剩下史丹林一派着着對中國進行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的陰謀，獨自增加其操縱蘇俄政權的威力，於是形成俄國現在中央的幹部派和反對派分裂原因之一。反對派的領袖托羅斯基辛諾維埃夫和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臘德克輩，盡力抨擊幹部派領袖史丹林布哈林對於中國革命的政策之錯誤，而史丹林輩即根據列寧對弱小民族及殖民地政策的基本原則起而自辯。兩派爲了中國革命問題，自前年起直到現在，鬥爭得非常厲害。去年四月間，兩派更爲了中國共產黨應否退出國民黨的問題，劇烈地鬥爭起來。托羅斯基一派嚴責史丹林派，爲什麼握着第三國際的權力，不令中國共產黨早點退出國民黨，而張明旗鼓做起共產黨的工作來呢？史丹林一派却回駁說，反對派是忘記了列寧的基本政策。今年六月間，陳濟棠同志由俄國回來，到南京就報告胡展堂先生說：『四月十二日南京開始清黨，莫斯科接到電報之後，即訓令武漢方面，集中力量於倒蔣運動，雖提出『反共倒蔣』的口號亦所不顧。但是我們國民黨清黨運動，已惹起俄國幹部派與反對派的內訌。反

對派主張退出國民黨，幹部派史丹林則堅持原來的政策，教中國共產黨務須始終抓住國民黨，不可放手，非到國民黨銷滅，他們不可豎出共產黨旗幟，并且說共產黨以往的錯誤，就是因爲不能堅守他的政策，以後亟當痛改。」陳同志報告這段事實時，我也在坐，我就想起漢口方面，不久必有『反共倒蔣』的障眼法演出來。果然到了七月十八日，武漢方面，竟奉行莫斯科的命令而發表分共的宣言，共產黨則於先幾天發表退出武漢政府——但非退出國民黨——的宣言，先後之間，做得煞是乾淨，以爲令外間人都相信武漢方面是國民黨清共產黨了。在他們分共的宣言裏面，還說『向來沒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的區別』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種種累得吳稚暉先生一見肉麻的可憐語。他們彼此像煞分開了，還怕有失，所以同時送鮑羅庭回俄，并命令他們的黨員，在國民黨當中『要取灰色的態度，』『要使人不知自己是西披。』還有一班已爲社會注目的共產黨徒及準共產黨徒，或表示認錯，或登報脫離，或被莫斯科開除黨籍。這一類障眼法，老實說明白，就是史丹林的第三國際訓令而扮演的。這本來也不是具有靈性的人的法術，海邊的墨魚遇着捕魚

人，要保全生命作個總退却時，口裏就吐洩一陣墨汁，教捕魚人看不出它的本來面目，第三國際所訓令出來的障眼法，就不過是實行做其水裏墨魚的忠實信徒而已。所以自南京清黨以來，第三國際對中國國民黨的墨魚戰術是：武漢方面既奉命送走一個鮑羅庭，莫斯科方面又改派一個克夫捷，武漢方面既奉命『反共倒蔣』，莫斯科方面又訓令葉賀張黃在南昌演弄『兵變』；武漢方面既奉命倒蔣之後作成『寧漢合作』，莫斯科方面又訓令唐生智與張作霖暗裏結合襲取南京；武漢方面既已奉命樹起特別委員會的招牌於南京，莫斯科方面就訓令共產黨『全力襲取廣東。』這一套戰術，正是史丹林秉着列寧『退一步進三步』的原則，而汪精衛在當中是奉行第三國際命令最努力的，所以在莫斯科下令『反共倒蔣』時，汪精衛帶領共產黨的右派担任『反共倒蔣』一面，而共產黨的左派擔任宣言『退出武漢政府』一面；在莫斯科下令葉賀張黃演弄『南昌兵變』時，汪精衛一班右派擔任明令『張黃討伐葉賀』一面，而他們的左派擔任『分隨葉賀張黃進取廣東』一面；在莫斯科下令『寧漢合作』時，汪精衛一班右派擔任到滬寧騙成『寧漢合作』，而左派在粵在滬皆分頭擔任秘密工作；在莫斯科下

令『全力襲取廣東』時，汪精衛一班右派担任『開第四次全體會議，』而左派在粵在滬又分頭擔任做『蘇維埃』與『農民軍』的工作。史丹林的第三國際這樣本着列寧的戰術，一條線的對中國國民黨施用左右夾攻的手段，到了現在，却又失敗，而失敗的原因：第一，在廣東方面，是由於張黃兩人內部不和，於是左派的預定的計畫，根本不能實現；第二；在上海方面，汪精衛一班右派騙人不到，所以汪精衛只有氣得告病而退。這兩點便證明史丹林的第三國際幹部，雖然善於運用列寧的戰術的基本原則，但是却不曾預先提防到張黃不睦與汪精衛假面具失效用的兩件事實，這是史丹林估量不到的，却不是說共產黨就從此罷手。然而我這里所要回覆的論點，就是中國共產黨是向來分排在史丹林管領之下的，但是第三國際不是自己做主席，凡事還須受托羅斯基辛諾維埃夫的干預。到了辛諾維埃夫托羅斯基一派在西歐攪不出亂子來，史丹林就排去辛諾維埃夫的第三國際主席，而以他自己一派的布哈林取而代之，於是史丹林就可以通過第三國際而更垂直的指揮中國共產黨來攪亂中國。史丹林對中國用的什麼政策呢？他的政策的出發點的是什麼呢？單簡言之，就是要樹立蘇維埃俄羅斯帝國主

義於中國的列寧主義！

我於此敢堅決地說，前面所敘述的事實是非常堅實而重要的；因為懂得了這些事實，就可以曉得現在俄國的內政和中國的革命，成了平行的鬥爭，同時却也成了反行的鬥爭。橫的看法，在俄國有史丹林的幹部派與託羅斯基的反對派之鬥爭，在中國則有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鬥爭；所以這兩個鬥爭是平行的。縱的看法，俄國的幹部派與反對派的鬥爭，是一黨的內訌，中國的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是兩黨的對壘；俄國兩派內訌，所爭的是政權，中國兩黨對壘，所爭的是革命領導權；俄國兩派，對內是爭政權，對外却是爭支配中國的革命，中國兩黨對壘，對內是爭革命領導權，對外却是爭誰受俄國的支配與誰不受俄國的支配；在俄國的立場，俄國兩派內訌，誰能支配得了中國的革命，誰就是革命的，誰支配不了中國的革命，誰就是反革命的；但在中國的立場，中國兩黨對壘誰受俄國的支配，誰就是反革命的，誰不受俄國的支配，誰就是革命的。所以俄國內政和中國革命這兩個鬥爭，在這許多意義上，都是反行的鬥爭。合起平行與反行的兩個鬥爭的事實，而總括地說來，就是：蘇俄與中國不

相容；蘇俄共產黨的幹部派與其反對派不相容；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不相容；而這些互不相容的矛盾，都是產生而且適應於列寧的樹立蘇維埃俄羅斯帝國主義這一個基本原則。我應用馬克斯所反串的黑智兒的辯證法而換一句話來說，列寧這一個樹立蘇維埃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實乃建築在以蘇俄銷滅中國以俄國共產黨幹部派銷滅反對派以中國共產黨銷滅國民黨以及由這一條線下去所生的鬥爭的意義上。如果列寧的基本原則，以及由此原則所生的理論和策略，不是建築在這種種矛盾及其從這種種矛盾當中取得逐步勝利的意義上，則列寧算不得是祖述了馬克斯。他所以被尊為馬克斯主義的完成者，不是因他能守馬克斯的正面和全部理論，却是因他能夠運用馬克斯的辯證法，因他能夠運用到把一切政策和策略都建築在一個從層出不窮的矛盾中去獲取逐步勝利的根本意義上，他的樹立蘇俄帝國主義的基本政策的原則就是如此。我們明瞭這一切，就曉得列寧如尚在，一定也是要拿着俄國來犧牲中國，拿着幹部來犧牲任何反對派，拿着中國的共產黨來犧牲國民黨，而在中俄兩國的關係上，為他的帝國主義基本政略所芻狗的，不知有多少政治的集團，多少政治的人物，和多少有組織

與無組織的民衆。列寧死了，落到史丹林佔取了列寧的地位，乘着列寧的遺教，以蘇俄的反幹部派，中國共產黨，及我們國民黨爲芻狗，來執行蘇俄帝國主義的政策。不過他所估量的事實每每不正確，所以格外顯得幼稚罷了。

我們明瞭了史丹林對中國革命的政策，是秉承列寧的基本戰術之遺教，於是我們就要分析史丹林自己在第三國際說明他對於中國所採的策略之供狀，我們要看他的供狀。才能了解今日以前中國革命行程中的種種事變，才能了解今日以前許多事變當中所暴露的種種紛歧和矛盾。但在分析地引述他的供狀以前，有幾點必須先作一個總說明。第一，史丹林對中國的政策，是完全依據列寧基本政策的意義而分析中國革命爲兩種反抗運動——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與『農民的農業革命』兩個運動，——這種分析工作，是中國共產黨奉命做了許久，而史丹林政策所恃以爲成功的基本條件。第二，分析開這兩種運動，其目的在於拿住『農民的農業革命』運動，置諸第三國際指導之下，隨着機會牽做自己的勢力，而向着樹立蘇維埃制及共產黨專政的方向而進。第三，要造起及拿住『農民的農業革命』運動，其方法就

全在施用狐狸精的方法，迷惑住汪精衛一班『小資產階級』奪取國民黨，就一口咬定說是國民黨代表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而利用它來做成『聯合戰線』，以掩護而促成他們的所謂『農業革命』運動。第四，要一方面有做『農業革命』運動工作的人，所以就不能不有下層的CY，要一方面有做『聯合戰線』工作的人，所以就不能不有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甘乃光陳樹人輩在國民黨中做左派而在共產黨中做右派的一種共產黨，要做成國民革命只是掩護他們『農民的農業革命』，而不是三民主義的全民革命，所以就要出死力攻擊三民主義的忠實領袖和信徒，而阻止國民革命向成功的目標展進。在施行這四種基本策略中，第三國際是一等工具，中國的CY是二等工具，陳獨秀譚平山是三等工具，汪精衛是四等工具，徐謙陳公博顧孟餘甘乃光陳樹人輩是五等工具，而一般昏庸無知的，是有名無名的六等以下的工具。這都是下面史丹林的種種供狀當中所極力辯護的幾個基本原則，至於其中誇大無理的說辭，只憑閱者諸君自下批判罷。

(一)史丹林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之演說，題為『中國革命與第三國



際之任務』，這是對托羅斯基一般反對派攻擊之答辯！

同志托羅斯基的根本過誤，在於不理解中國革命意義與其性質。第三國際的政策是從現在刺激中國『農民革命』——其反壓的要素是封建的殘存物——這一點而出發的。第三國際之政策，是從中國農村封建制之殘存物及殘存物上擁着一切的督軍，官僚，如張作霖一派的上層建築全個軍閥官僚制——為現在『農業革命』發生而更發展之根柢，這一點而出發的。因為擁着上層建築全部軍閥官僚的封建殘存物，是在中國抑壓之基礎的形態，所以中國現在，無論從力之點說，或從範圍之點說，都是漸漸進行最大的『農業革命』。但是『農業革命』是什麼呢？它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與其內容。故此第三國際說，中國現在正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

且看『農業革命』是什麼呢？這正是現在中國人民所不懂得的。但是史丹林一句話就替我們供出來了：它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與其內容。所謂基礎，所謂內容，不客氣地說，便是共產黨一定要做黃雀，拿着『農產革命』做螳螂，來捕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

這隻秋蟬罷了。但是本來秋蟬是沒有，做螳螂的做黃雀的便無所施其捕捉，史丹林現在却捉着人來做了秋蟬，這是如何的大功勞呢！所以他就得得意地說：『故此第三國際說中國現在正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且看史丹林接着說：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劍鋒，不僅向着封建制的殘存物，而且是同時向着帝國主義的。什麼緣故呢？因為在中國握有全部軍事的財政的權力之帝國主義，是具有鼓舞，培養，且保存那擁有全部上層建築——官僚軍閥——之封建殘存物的大力量。所以非同時對於在中國之帝國主義行革命的鬥爭，則是中國封建制的殘存物不能除；打破中國封建制的殘存物，必然的不得不對於在中國的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集團而動手。故此第三國際說，在中國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革命，同時是反帝國主義之革命。

這是史丹林預先為後面維護他的『聯合戰線的策略』的辯論栽根的話。他無非是說中國現在『農業革命』運動，必須要在反帝國主義的意義上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作成『聯

『合戰線』罷了。所以他說：

所以中國現在的革命，是革命運動的兩個潮流，網羅着針對封建制之殘存物的運動與針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是結合對於封建制的鬥爭與對於帝國主義的鬥爭的。

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問題，是從這個見解而出發的，（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是的）

史丹林這樣說明第三國際和莫斯科幹部的政策，是基於認定中國的國民革命為結合對於封建的鬥爭與對於帝國主義的鬥爭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個見解之上的。因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是於『農民的農業革命』運動的聯合戰線策略為必要的，所以他不惜反覆誇說『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意義。以下是他反駁托羅斯基的話：

對於中國問題，托羅斯基同志的曲說，其出發點是什麼呢？它是和剛纔所說第三國際的見解垂直的對立的。托羅斯基同志全不承認在中國的封建制之殘存物存在麼？雖然

承認而並不予以何等決斷的意義。將在中國封建以官僚軍閥的重壓之力與其意義估量過小的託羅斯基，（反對派都是），是以中國國民革命主要原因爲對於帝國主義諸國之中國民族的關稅政策之依存。我請諸君許我引述託羅斯基同志數日前提出於俄共產黨與第三國際的中央委員會他的有名的方案。他這方案的標題，是寫着『中國革命與史丹林的方案』的。托羅斯基同志有左面的話：

『心中竊作無理由的想像的，是因爲說『封建殘存物』在中國經濟上有表面支配的權力，而便要承認騎牆主義的妥協的見解之布哈林同志。縱使布哈林同志對於中國經濟問題之判斷，是根於經濟的分析，而非根於就『封建殘存物』一個概念之煩瑣哲學的定義，不拘如何，我們也不能承認他那樣顯明地幫助四月之翻覆的政策吧！中國革命，是根本上以民族的『資產階級革命』爲主。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之發展，是突破中國對於帝國主義諸國之國家的關稅依存性之限界的』。

只看這所引述的，就可見托羅斯基同志不是對於第三國際解釋中國革命的性質之見解

而爭論，而是對於布哈林同志的妥協政策而爭論。這不消說是錯的。實際上這方案成爲問題的，是托羅斯基否認在中國封建制殘存物之『支配的權力』。實際上成爲問題的，是他把在中國燃燒起來的『農業革命』，詭變爲上層的革命，所謂反關稅的革命。托羅斯基同志因爲要隱蔽他從第三國際的見解而變離，所以就有漫罵布哈林同志的『妥協政策』之必要。我率直的說，這就是托羅斯基慣做的扒手的好計。

故依托羅斯基的見解，中國國民革命之主要原因，不是特有上層建築官僚軍閥的封建制之殘存物，而是向於帝國主義者之中國關稅的依存性，以此結果，中國的革命，爲主的就是反關稅的革命。

以上爲托羅斯基同志的出發點。這是他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的見解。諸君，我請大家注意，這個見解是『大元帥』張作霖的樞密院的見地。

如果托羅斯基的見地是對的，我們就不能不認張作霖和蔣介石的見地也是對的。什麼緣故？因爲他們也不願『農業革命』不願『工人革命』，僅僅努力於廢止不平等條約，確

立中國的關稅自主權的緣故。托維斯基——只是落到蔣介石與張作霖的秘書的見地罷了。

如果布哈林同志乃至第三國際所說封建制之殘存物於現在的階段有支配權力的意義是錯的，如果中國革命的基礎是關稅的依存性，不是對於封建制殘存物及擁護它的帝國主義之鬥爭，那末，持『沒收地主土地』與『土地國有』之要求的『農業革命』從何處來的呢？舍此而外，還有什麼理由可以在這時候說中國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呢？沒有什麼事就可以說『農業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嗎？『農業革命』可以說是從天降下來的嗎？在湖南湖北河南諸省——那是農民以他們自身的權力，作成他們自身的裁判所；與他們自衛的組織，驅逐地主，對於地主而作『平民的』舉動，——巨大的『農業革命』，裹着幾百萬幾千萬的農民，這是併沒有何等事實而瞎說的嗎？如果封建軍閥不是中國壓迫之支配力，這樣強大的『農民運動從何處發生呢？如果我們不說帝國主義是加重壓迫於中國民衆的封建軍閥之最強力的同盟者，如果

不立在這個見地上，那麼，如何能使這幾千萬的農民的強力的運動，同時帶反帝國主義的采色，而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作成『聯合戰線』呢？僅是湖南一省，而現在農民協會，已有二百五十萬以上的會員，這不是事實嗎？那湖北湖南的農民協會已有這許多會員，最近的將來，別的省分又不有視此更多的會員嗎？又如『紅槍會』『空腹同盟』等，難道也是幻想，而並非實在的東西嗎？提出『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之幾千萬農民的『農業革命』，不使其劍鋒向於封建制現實無疑的殘存物，還要認做頭腦中虛構的東西，附以引用的符號，這是真面目的主張嗎？這時候的托羅斯基同志，還不是明白變做『大元帥』張作霖的書記長了嗎？

同志托羅斯基的根本錯誤，在於估量過小了中國的『農業革命』，並沒有理解這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性質，否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包含幾百萬中國農民運動之前提，估量過小了在中國革命中農業階級的勢力。

看了上面這幾段話，我們就明瞭史丹林與托羅斯基所爭論的是策略的大前提，而不是什

歷史主義的大前提，尤其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農民的農業革命』正面的理論。史丹林所要力辯的是，第三國際的策略，乃基於這幾點：（一）中國革命的對象有二，其一為封建制的殘存物，其二為帝國主義，前者以後者為同盟；（二）因此，第三國際認定混化這兩個對象的國民革命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要從此中另造『農民的農業革命』的勢力出來，就必須拿封建制的殘存物，為共產黨農民運動的主要對象，同時則拿反對帝國主義為作成共產黨的所謂農民運動與其所謂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同盟的對象；（三）一方面封建制的殘存物是強大的，帝國主義是強大的，二者之同盟也是強大的，因此與之對立的他方面，反封建制殘存物兼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強大的，而專以反封建制殘存物為主的『農民的農業革命』，所以能作成像湖南湖北那樣盛大運動的緣故，就是由沒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同盟。這是史丹林辯護第三國際所以一定要採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聯合戰線的策略之理由。托羅斯基則攻擊第三國際的策略之錯誤，指摘幹部派所據以爲決定策略的大前提之虛構，其論點是：（一）中國封建制的殘存物雖然存在，但是已近於沒



落，力量弱小，不配做『農業革命』的對象；（二）中國革命，是根本上以民族的資產階級革命為主，在此革命潮流之下，軍閥官僚資產階級等等，都混合起來與帝國主義作對，如張作霖亦主張關稅自主，就是證明，而且同時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發展到要求關稅自主的地步，這足見中國各種努力都上了資本主義的大道，所以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此時即可直接拿資產階級作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而不應採用與資產階級妥協的什麼聯合戰線的策略；（三）以此標準而論，現在第三國際的策略，拿中國共產主義者與資本主義聯合戰線，這便是『騎牆主義者』的『妥協政策』。這是托羅斯基攻擊史丹林派的理由。明瞭他們兩方的正當立場，我們就知道史丹林篤守列寧的策略，而托羅斯基則篤守馬克思的主義：如果依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分別他們二人，史丹林是右派，托羅斯基左派。因此托羅斯基漫罵史丹林派的政策為騎牆主義為妥協政策，固然不誣，即史丹林漫罵托羅斯基派為理論拘泥主義者，也正切當。至於史丹林罵托羅斯基墮落到張作霖的樞密院之見地，而且還把蔣介石先生來誣蔑，這真是全不針對托羅斯基本意的狂吠！但是史丹林和托羅斯基，一個誣中國國民革命為『資產階級

民主主義革命』，一個妄指爲『民族的資產階級革命』；前者是從陰謀的騎牆主義而出的詭辭，後者是從偏狹的拘泥主義而出的妄語，二者都該受三民主義者之一擱，便跌出三丈外也。

托羅斯基根據以上所述的大前提，即中國革命是民族的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勞農階級革命，主張中國共產黨應該老早就把國民黨作成二重之支配，不應等到國民黨發展到東南各省，而武漢政府不能作成二重之支配的時候，反宣言退出武漢政策，而取失敗的總退却的步驟。史丹林則力辯第三國際關於此點的政策，並不錯誤，他說這是因爲：

封建制殘存物以及置基礎於其上的上層建築——軍閥官僚——是有各國帝國主義之全面的保護；這纔是中國革命現實的根本的要因。中國現在漸漸經驗向着推翻封建制殘存物及帝國主義的峯尖而進行的『農業革命』。『農業革命』是要作成有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地位，成爲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與內容。武漢國民黨及武漢政府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南京國民黨與國民政府

是中國『反革命』的中心。第三國際擁護武漢的政策，是伴着由此考慮而生的一切結果，同時也是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發展之政策。故此共產主義者向武漢國民黨及武漢政府之參加，並非拋棄對於國民黨內的及其同盟者的不徹底與動搖之全面批判，而是以此爲前提。共產主義之參加，是要促成無產階級勢力的培養，而使其容易爲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之指導者既然如此，那末，第三國際非利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就近完全的勝利，而使之近向『無產階級革命』移行不可；在『資產階級的革命』進展而向『無產階級的革命』移行的兆候，——在此留意的瞬間，而工人農民兵士的代表蘇維埃，非以之爲二重支配之要因不可，非以之爲新的革命政府而爲蘇維埃的政權而鬥爭之機關不可；到這時候，共產黨纔不可不變國民黨內的聯合戰線爲國民黨外的聯合戰線，共產黨纔不可不爲中國新革命的唯一指導者。如果像托羅斯基及辛諾維埃夫同志之所說，現在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尚在初發展的階段，國民黨是最適合的，那末，在國民革命尚在最適合於中國獨具的特殊性的形態中

之今天，而說即時作成二重之支配，是使革命運動瓦解，使武漢的黨和政府容易沒落，那豈不是有助張作霖和蔣介石的意味嗎？

我們要注意上面這一段話，是史丹林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的最重要供狀。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由廣東出發經過寧漢分立以至於現在，其所施用的種種陰謀與策略之總原則，完全於此暴露。合攏史丹林全篇的演說之要點，是盡力說明第三國際要如何拆開中國革命為『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業革命』，要如何利用『資產階級革命』去培養掩護『農業革命』之基礎，要如何養成了『農業革命』的勢力之後，就要去『領導資產階級革命』之進行。爲什麼要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的進行？因爲挾着它來『向無產階級革命移行』。武漢是甘受第三國際指揮的，是第三國際所泡製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就所以非極力維護不可；南京是不受第三國際支配的，是不甘爲其貓腳爪的，所以就罵爲『反革命的中心』之必要。只要有武漢這樣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以後或在廣州，將來或在他處，都有這樣一個中心能夠容共黨作成『向無產階級的革命移行』，在這一留意瞬間，第三國際便要訓令組織『工人

農民兵士的代表蘇維埃』，而中國共產黨便要拿蘇維埃來掌握『無產階級革命』，而消滅『資產階級革命』，這就是史丹林所謂『二重的支配』；到這時候，中國共產黨便要跳出國民黨，利用毛羽已豐的一切反國民黨的勢力，把國民黨銷滅，這就是史丹林所謂『變國民黨內的聯合戰線爲國民黨外的聯合戰線』；直要到這時候，中國共產黨才可以張明旗鼓，露出真面目來做『新革命的唯一領導者』！所以據此說來，本年三四月間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江西等處明白掛出黨的招牌，和在廣東上海等處明白喊出『擁護共產黨』的口號，都是時機未作成以前就露出馬脚，無怪連史丹林都要罵它們幼稚；但是它們所以做了如此的急色兒，正是證明它們以爲已經盡力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相當基礎，同時又已盡力把『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作成『向無產階級革命移行』趨勢。中國共產黨之急色，是事實的幼稚；弄到托羅斯基主張早就應該把武漢的黨部和政府作成二重支配，又是理論上的幼稚；此二點都可從史丹林在第三國際的演說看得出來。可是托羅斯基並不是只是攻擊第三國際沒有老早把武漢的黨和政府作成二重支配這一點，而是根本上抨擊第三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政策全部之錯誤。關於此義，除前

面所引史丹林的演說外，還有下面的演說也可以作證。

(二)史丹林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歐戰十三週年紀念大會演說，題爲『中國革命之現階段』對於托羅斯基辛諾維埃夫等之反對派，答辯第三國際所施諸中國革命的策略爲正當，其演說的要點如次：

反對派聞得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卽說『選去與資產階級聯合戰線的一切共同行動吧，中國共產主義者即時從國民黨脫退吧！』他們彷彿是把現成的公式硬鑲在中國似的。反對派不曉得中國是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不同，而是一個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的國家，因此中國的革命，不單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反帝國主義式的資產階級革命』；……故其結果，中國的『資產階級』，得在一定條件之下，在一定期間，贊助革命；這些事實反對派都忘記了。然而這些事實都是一般人所知的。我們於中國革命之廣東時代，向揚子江沿岸進軍時代，國民黨分裂以前的時代，不能不認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條件下而容許與『資產階級』採共同行動的第

三國際之見解爲正當，但其結果則反對派從其舊公式而退却，揭出共產主義不能從國民黨脫退的新公式（一九二七年四月）。這是反對派因爲不考慮中國革命之國民的特殊性受了第一次的刑罰。反對派聞得北京政府以關稅自主問題與帝國主義諸國的代表爭鬧，反對派便以爲關稅自主權是於中國資本家爲必要。他們又鑲入既成的公式——鑲入中國革命是以關稅自主權之奪回爲主要目的之公式。然而反對派不曉得在中國的帝國主義之主要力量，並不僅僅是限制中國的關稅，而是掌握着掠奪中國農民工人血汗的工廠，工業，鑛山，鐵路，輪船，銀行，和貿易機關。他們忘記了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是連結一切封建勢力以榨取中國民衆的血汁；忘記了中國農民工人不對於帝國主義行革命的鬥爭便不能推倒它們的榨取者。反對派忘記了這些事實是我們可以利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而向『無產階級革命』成長之最重要的條件。他們以爲拿關稅自主權的革命就可以說明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於是就否定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向於『無產階級革命』之成長，却忘記了這是無異把中國革命放在『資產階級革命』指導之下

。事實已告訴我們，關稅自主權之奪回，根本上已成爲中國『資產階級』的政綱，故此反對派是受兩面的夾攻：一方面因關於關稅自主的解釋而犯了與中國『資產階級』沆瀣一氣的嫌疑，一方面因不明瞭第三國際考慮中國革命向無產階級革命成長之可能性的態度，而仍然不能逃反列寧主義的罪名。

以上是反對派因爲不用真面目去研究中國革命的民族的特殊性而受第二次的刑罰。反對派聞得中國商業資產階級侵入農村，借貸土地於貧農階級，而且知道商人決非封建的勢力，因此，遂以爲中國雖有封建制的殘存物的農民階級鬥爭，也於中國革命無何等重大意義；以爲中國現在主要的事件，非農民革命，而是中國民族對帝國主義收回關稅自主權的問題。反對派却看不見中國經濟的物質，不是由商業資本侵略農村，而是封建制之殘存物與村落的商業資本結合起來，維持其榨取農民階級的封建的中世紀方法。他們並不理解中國的官僚軍閥，其全部機構，是靠着封建制之殘存物及封建的榨取方法之支配與村落商業資本之存在兩者間的結合爲政治的上層建築。……但是



反對派不顧如此的事實，還要否定封建制的殘存物，否定封建的榨取體制之存在，否定現在爲中國革命的主要運動之農民革命。他們是蒙蔽事實的。故此反對派又不能不從他們的公式退却。

以上是反對派不願考慮中國經濟的國民特殊性而受第三次的刑罰。

反對派陷落於公式與實際之間相隔的罅隙中，這是他們可憐的指導者之命運。他們這樣的陷落，是脫離列寧主義關於各國革命運動有名的戰術上原則之直接的結果。

這幾段話，是史丹林說明他與反對派兩方的見地不同之點；這就是說，反對派認中國革命爲『資產階級革命』，所以主張共產黨脫退於國民黨之外，而史丹林派則以爲中國革命雖爲『資產階級革命』，但共產黨不可不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以培養『無產階級革命』的勢力。兩派不同的立場，就是如此。但是他們說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這話我們能否承認呢？當然不能。不能承認的原因何在呢？因爲他們所以指中國革命爲『資產階級革命』，完全因爲他們主觀上必須根據列寧主義的精神，凡非共產黨所包辦的革命，都非指爲『資產

階級革命』不可，而並非根據客觀上的考查，知道中國革命確有什麼『資產階級革命』的事實和內容。我們明白此點，就知道我們對於蘇俄共產黨之誣指中國革命爲『資產階級革命』，並不必從經濟的觀點上來駁斥它，而只須從策略的觀點上來駁斥它。直截地說：史丹林何嘗是討論『利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而向無產階級革命成長』的問題，實際上只是主張『利用國民革命而向共產黨專政成長』這一個策略而已。所以他說什麼『資產階級革命』，什麼『無產階級革命』一個只是誣人的名詞，一個只是自飾的名詞，在列寧主義中，此外實在沒有絲毫經濟的真實含義也。且看史氏接着又舉列寧主義的戰術原則以爲辯論的根據，即更顯然了。史氏說：

且看列寧的第一戰術的原則如次：

『第三國際所有爲各國勞動運動作基礎的指令，必須考慮各國民族的特質及其國民的特殊性。於此成爲問題的，就是各國共產主義者全都曉得的，要與騎牆主義和左派理論拘泥主義鬥爭；根本的任務與這個鬥爭，就是在於分析各個國的經濟，政治，文化

，及其民族的構成，殖民地，和宗教之分派等等，從而執持着各種的特性，同時又要考慮不可避的與不得不持的具體特質。我們所以到處對於第二國際感覺不滿，就是因為我們明瞭，我們所不可不考慮的指導的中心不是基於機械的均衡之形式化及戰術上的鬥爭之規定等，而是基於認識各民族及各國家限於它的民族的及國家的差異性之存在——這種差異，只怕無產階級革命之後，還要以世界的規模而繼續存在吧。國際共產主義的勞動運動，其國際的統一戰術，不是要廢止民族的差異——這是現時無意識的夢想——而是要以此原則通於各個點，變更它，正當利用它，以求適應於民族的和國家的差異之共產主義根本原則之應用。因此，為解決統一的國際的使命，為求對於勞動運動內部的騎牆主義和理論拘泥主義作戰而獲得勝利，為推倒資產階級，為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與無產階級政府，我們就要考求研究發見付度因而把握各國具體的特質與其國民的特徵，這是在歷史的瞬間最重大的任務』。

第三國際的見解，是無條件的基於考慮列寧主義之戰術上原則的見解。反對派的見解

則正與此相反，它是破壞列寧主義之戰術上原則的見解。

破壞此種原則，又成爲反對派透觀中國革命問題結論的根據。

史丹林引述列寧第一個戰術的原則以證反對派的見解之相反，其意蓋欲拿列寧「必須考慮各國民族的特質及其國家的特殊性」的遺教，證明他之所以必須認定中國有封建制殘存物的存在，乃基於列寧戰術的原則。史丹林是只求無背於列寧的戰術，而非求無背於中國的實際情況，這豈不是肺肝如見的了嗎？史氏接着說：

我們再看列寧主義第二戰術的原則：

『打倒比強力的敵人，祇有以最大的注意，極度緊張的用其全力；例如遇着最小的罅隙——敵人之間所有罅隙，在資產階級國家間的，又在各國資產階級的集團或其種別之間的，一切利益的衝突——有條件的，一切有爲獲得大衆同盟者之可能的機會——此等一切的東西，必須極注意極慎重極巧妙地利用它來成就我們的目的。不理解這件事情的人，是對於馬克斯主義和現代科學的社會主義一切都不理解的人。所以雖然經

過長期間接觸種種政治的狀況，而不能將此等真理適用於實際為實踐的證明，就是未曾學得在將要解放勞動大眾的鬥爭中而援助革命的階級的事。以上的事，就無產階級說，無論取得政權以前或既取得以後，是同樣適用的。

由透觀中國革命的性質，而謀『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之勝利，我們要為『無產階級』找同盟者的問題就發生了。

無產階級的同盟者一個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中國無產階級之前的強敵，就是大小封建的貴族，新舊軍閥，官僚機構，反革命的土著資產階級，握着中國經濟生活之根脈，恃着陸海軍而有榨取中國民衆之權利的東西帝國主義者。我們第三國際為打破這種種強有力的敵人，則須求同盟者於敵之陣營以內做我們的內應——但若這種同盟者不確實而且動搖時，則我們當做到以它不妨礙我們關於勞動階級及勞役大眾之組織與黨的革命之煽動及暴動為前提。無產階級必要有利用敵人的罅隙及利用自己的同盟者之能力。這是列寧主義第二戰術上原則的根本要求。無此，則無產階級之勝利

爲不可能也。

我們看史丹林引述列寧第二個戰術原則及其解釋，不覺爲他們大喊『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官僚』的口號肉麻。他們打倒什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呢？他們求同盟者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的陣營以內，要極注意極巧妙利用這些反革命勢力間之罅隙，以成就他們自己的目的，這一套權謀術數，不就是帝國主義軍閥官僚所以成爲反革命者的唯一特色麼？第三國際所教人的，列寧所教人的，不就是教人學習這一套權謀術數麼？教這一套權謀術數和學習這一套權謀術數的人，教的學習的，不就是要極力做帝國主義者軍閥和官僚而唯恐其不酷肖麼？列寧的戰術即是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的權謀術數，這不是確鑿的證據麼？中國產共黨即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軍閥官僚的學徒，已經由列寧主義本身證明出來了，還不是千真萬真的事實麼？中國國民黨在這三年間被第三國際和其爪牙弄到帝國主義化了，軍閥化了，官僚化了，還不明白麼？要救出國民黨，要恢復國民黨的革命黨固有的特性，必須根本上肅清帝國主義化軍閥化官僚化的共產黨及其理論和權術，還不是千真萬真不可搖撼的真理麼？國民黨的同志

們醒呵！如果不信，且看史丹林繼續傾吐他的權術主義的供狀：

中國革命，在近的過去，有這樣的同盟者嗎？有的。

在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時代，即廣東時代，革命是統一了全個國民的戰線的。這時候無產階級之同盟者是廣東的『農民共產』和『都市無產者』，『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土著的資產階級』。中國革命運動特質之一，即此等階級之代表者已有一『資產階級革命』的組織，在國民黨之中與共產主義者共同活動。產共主義者通過國民黨而取得諸等階級之同盟者，並非以同一的程度去信用，它們且亦不得信用它們。共產主義者雖然可以從它們當中取得多少或種人爲同盟者，但除却得農民和無產市民之外，別種人就不能十分信用了，所以就有搖動，（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至於第三種人（土著資產階級）則完全不能信用。國民黨當時確是民衆黨，而當時國民黨內之共產主義者的政策，是使『土著資產階級』之代表者（右派）陷於孤立；爲革命而利用，遂逼『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左派）更向左傾，使彼等與『無產階級的農民』和『無產市民』結合

。廣東當時是革命的中心嗎？無條件，是的！今日來爭這個話的人是失理性的人。在這一時代，共產黨取得了什麼的既得權利呢？廣東軍達到揚子江，『無產階級』得到公開組織的可能性（工會，罷工委員會等）在國民黨之內作成共產黨的團體，作成農民組織最初的細胞（農民協會），共產主義者侵入國民政府等等。

所以，這一時代，第三國際的指導是正當的。

這是史丹林第一部分最具體的供狀。他運用帝國主義者的權謀術數，把共產黨當作帝國主義者的爪牙，在國民黨內找着了多少漢奸，使國民黨的忠實同志陷於孤立，而將國民黨內的主權掠奪而去，這還說得不確鑿顯明了嗎？他這手段，和東西帝國主義比起來，不是一樣的嗎？帝國主義利用中國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在中國領域內，能使一般國民一切反抗呼籲的愛國運動，陷於孤立無效的狀態，而將中國的主權翻箱倒篋的掠奪而去，不就是這種情景嗎？在史丹林的帝國主義權謀運用之下，中國共產黨等於軍閥，所謂『左派』即等於官僚，所謂『無產階級的農民』和『無產市民』，其中直接間接做共產黨的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惡化分子



，即等於買辦，這是確切不移的事實。至於史丹林承認共產黨侵入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最高黨部等等機關以內的團體和組織，更是這三年來汪精衛輩一切掩耳盜鈴的言論所不能推翻之總證明。史丹林又接着說：

在革命的第二階段的時代，蔣介石與『土著資產階級』走入『反革命』的陣營。革命運動的中心，由廣東移入武漢。這時候『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無產市民，及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土著資產階級』向『反革命』的陣營而變節，這件事是說明什麼呢？這是說明『土著資產階級』隨革命運動範圍之擴大而起危懼；又因在上海的帝國主義對『土著資產階級』壓迫，而『土著資產階級』就離開這個革命去了。由此種變動，共產黨受了或種損害是不必諱言的，但是我們因此就使革命引農民的廣衆向於更發展高度的階段，進到『農業革命』的階段；這是我們由革命而拾得的東西。在革命這個第二階段的時代，國民黨有民衆的組織嗎？確是有的。當時國民黨比廣東時代更有民衆的組織。當時武漢是革命運動的中心嗎？這是不可爭的事實。如果不然，武漢的領域

(兩湖)，便沒有被共產黨指導的農業革命之最大限度發展的基礎吧！我們當時對於國民黨的政策，是要國民黨中的共產主義者逼國民黨左派變為『無產階級農民革命』的民主主義政府之核心。當時有這樣變移的可能性麼？有的。這種可能性的動因，確實不少。我們當時已公開的說過，爲要變武漢國民黨之一部，使之成爲『無產階級』與『農民革命』的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最少要以使國民黨急激的『民衆化』及全個國民黨掩護『農業革命』爲二大前提。如果放棄這種機會，怕不是共產黨的賢明政策吧！在這一時代，共產黨又取得何種既得權呢。共產黨由五千乃至六千的黨員成長爲由五萬乃至六萬的大衆黨員；我們的工會拿着三百萬的會員，強大的結合起了一個跨於全國的總會；農民原始的細胞，其組織成長爲有幾千萬會員的大會；農民運動成爲莫大範圍的運動，竟至佔着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地位；共產黨由此有公然組織的革命的可行性，而且做了『農民革命』的指導者；無產階級一致團結於共產黨權力之下，竟能由願望而成事實。

固然，中國共產黨在此時代，不知利用一切的機會；固然，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承認這時代犯了若干重大的過誤，但是中國共產黨相信根據第三國際的根本策略與方針，而說今明日中就可以作成真正的波希維克，它是可笑的嗎！我們回想我黨的歷史，經過分裂分割反叛這種真的波希維克黨，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成立的。

由上所述，第三國際的指導是正當的。

這一段是史丹林第二部分最具體的供詞。它又說明了些什麼呢？第一，說明蔣介石先生等在南京清黨，做了於共產黨則視為『反革命』於國民黨則為真正革命的最大工作。第二，說明第三國際當時把武漢的『左派』變為安福系，而第三國際便好做支配安福系履行二十一條密約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如果沒有這種安福系，『便沒有被共產黨指揮的『農業革命』之最大限度發展的基礎』，便沒有史丹林『無產階級一致團結於共產黨權力之下，竟能由願望而成實事』這種大吹其帝國主義成功的牛皮話。但是讓我們再看他的第三部分最具體的供詞吧：

我們在中國現在有同盟者麼？

有的，同盟者是無產階級與都市無產者。

現在是中國革命走入第三階段的時代。在這時代之開始，我們發見武漢國民黨首腦部走入反革命的陣營，武漢政府的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對於我們的革命起了變節的傾向，因為他們：

(甲)對於漸漸擴大的『農業革命』起了危懼的心理，同時受了封建貴族對於武漢政府首腦部之壓迫：

(乙)作為國民黨向北方自由進兵之代價，而要求與共產主義分離，同時亦變了天津地區內帝國主義之壓迫。

反對派還疑惑中國尚有封建殘存物之支配力的存在嗎？現在看來，這種殘存物不但存在，而且還是強有力的壓迫着，這是誰都明白了。現時在中國的帝國主義與封建貴族，是異常強大，所以我們在武漢的革命就變為一時敗北。小資產階級與智識階級由我們的革命離開而動搖，是革命一時敗北的前兆。但因此而農民與都市無產者緊密的

集合於我們共產黨之周圍，以鞏固無產階級之團結的基礎，這是我們由革命當中所拾獲的東西。

這是史丹林說明共產黨爲什麼要脫離武漢政府的理由。依他所說，因爲汪精衛一班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對於共產黨的農民暴動起了危懼，要求與共產黨分離而作爲向北方進兵的代價。但是依汪精衛的『武漢分共之經過』所說，『中央雖然……不得已與之分離，然其分離，必經過鄭重的手續，且……必採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徑，無如七月十六日中央方纔宣布以上的決議和命令，而同日市上已看見共產黨七月十三日的傳單，宣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依史丹林說，則共產黨分離，由於汪精衛派的要求；依汪精衛說，則共產黨早已有分離的宣言：這兩說的歧異，是如何解釋呢？據我研究他們各種的事實和情況，這兩說之歧異，正可說明史丹林派和汪精衛派的不同之心理。在史丹林一方面，共產黨脫離武漢政府，是認定武漢政府形成了一個克倫斯基政府，而可以做他們進一步計畫的攻擊目標；在汪精衛一方面，則他還捨不得離棄共產黨這隻狐狸精

：因此，汪精衛一方面說第四方面軍和張作霖開戰，不願破棄與共產黨的聯合戰線，而史丹林乃說他『作爲國民黨向北方自由進兵之代價，而要求與共產主義分離。』事實同是共產黨分離，而兩人說法不同，其心理的差別，蓋甚顯明。再看史丹林說：

反對派以革命一時敗北爲第三國際政策的結果。但此主張，要捨棄馬克斯主義才能。我們正當的政策，可以不斷地漸漸使敵人受我們的征服。一九〇五年革命，波希維克的政策正當嗎？確是正當的。何以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不管工人委員會成立，不管波希維克的政策正當，還是敗北呢？正當的政策，不必常在所有的條件之下能得直接的勝利。因爲對敵的直接勝利，不是僅僅靠正當的政策而決定，乃是先爲主的，要靠階級間之力的關係，和在革命之側的力之明瞭與優越而決定；要靠敵之陣營內之瓦解而決定；要靠合於好機會之國際情勢而決定：祇有在此等諸前提之下，正當政策才能給『無產階級』以直接的勝利。但是所有的條件皆備了，還要有正當的政策才行。我們黨的政策，是增加『無產階級』的鬥爭力，增加勞役民衆與『無產階級』結合，增加在此勞

役民衆中間『無產階級』的權威。在過去的幾個階段，我們在中國革命的勝利，有最大的有利之前提存在嗎？沒有。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沒有民衆，而其政策也沒有使『無產階級』的鬥爭力增大。我們可以主張無產階級不去增大它們與廣泛民衆連結之間的權力嗎？不能如此主張是很明白的。祇有麻木的人，才會提出這時候『無產階級』爲吸收廣泛的農民大衆於自己旗幟之下，而可以離開『土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的主張。我們在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的共產黨，因爲要擴大革命的範圍，使自己成爲大衆黨，作成公然可以組織『無產階級』的機會，而向農民運動開起道路，所以才做成與廣東『土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結成聯合戰線。在革命的第二階段，共產黨增加了力量，擴大了『無產階級』的組織，從國民黨的首腦部奪取一部分政治權力，奪取它的農民之廣泛大衆，以爲『無產階級』團結之大前提，於是我們就通過了與武漢國民黨『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結成聯合戰線的時代。這時候『土著資產階級』移到『反革命』的陣營，由此而失了與廣泛的大衆之結合。『土著資產階級』怕

『農民革命』而走開，『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便起動搖，因而失了農民廣泛大眾的信用，我們於是乃逼失了農民信用的『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跛行的從他。因為如此，幾百萬農民遂將最相信的信憑集合到『無產階級』的周圍來了。這是沒有明顯的證據嗎？只有正當的政策，才能獲得此種正當的結果，還不明白嗎？只有此種政策，才能增高『無產階級的鬥爭的力量，還不明白嗎？』除外我們的反對派，能夠說我們的政策不是革命的嗎？反對派之所主張，以為武漢國民黨向『反革命』方面而動搖，是我們在革命第二階級對於武漢國民黨的聯合戰線政策之錯誤。主張如此的人，便是忘了波希維克的歷史，把列寧主義連最後一片都拋棄了的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和一九一八年初，波希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結聯合戰線的政策是錯誤的嗎？此政策之正當，就相信是不可爭的。以什麼事情當時的聯合戰線就可終止呢？以左派社會革命黨對於蘇維埃政府暴動的。但以此之故，可以說我們與社會革命黨的聯合戰線政策為錯誤嗎！不能如此說是很明白的了。在中國革命第二階段，我們與武漢國民黨聯合戰線的政策是正當的嗎？據



我想，其爲正當是不可爭的。反對派當時（一九二七年四月）亦嘗承認這樣的聯合戰線爲「當」。但是在武漢的國民黨動搖而反叛我們之後之今天，因其動搖反叛之故，如何能說我們與武漢政府之聯合戰線爲錯誤呢？只有無節操的人類，才能如此強說吧！難道我們與武漢國民黨的聯合戰線非永久存在不可嗎？難道聯合戰線可以說是永久的東西嗎？反對派還絲毫不懂，關於『非無產階級及其團體』與『無產階級』的革命聯合戰線，是列寧第二戰術的原則嗎？列寧第二戰術原則，我已經提明，反對派的見解，與列寧這個原則相背馳，還不顯然嗎？剛剛與此相反，第三國際的政策，是考慮了列寧這一個原則的，還不明顯嗎？

史丹林這樣從政策的條件上和蘇俄革命之經驗上，反覆證明他的政策不錯誤，而供出的要點是：共產黨在廣東所以要與國民黨聯合戰線，爲的是要侵入國民黨內掠奪國民黨；他們在武漢所以要與『左派』聯合戰線，及其所以要逼汪精衛一派小資產階級扮演分共的把戲，爲的是要奪取國民黨的農民大衆；總括地說，就是在國民黨內做扒手而已。什麼『聯合

戰線」，不過是等到共產黨扒手盡獲其所得而去的時候就要破裂的，只有汪精衛這種無忌憚而愚蠢的人，才會始終『不肯破棄聯合戰線』呵！汪精衛一班賣黨的叛徒，以爲他只要幫助『左派』把國民黨打到完結，他的『左派』鞏固而擴大了，他的『左派領袖』做得穩固了，然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聯合戰線』才能破棄，却並不曉得史丹林輩只顧他的帝國主義的勢力之養成，而何嘗顧得你的『左派領袖』的地位之鞏固？他的勢力成長起來了，連你什麼汪精衛一人身首之間的聯合戰線也是要破棄的，還顧你的死活麼？只是汪精衛始終甘心做他的帝國主義的走狗，所謂『笑罵由人笑罵，蘇俄走狗我自爲之』，真是汪精衛的考語了！史丹林又說：

現在移到列寧主義第三戰術的原則，如次：

『爲了要使幾百萬大衆得政治的訓練，則當考慮僅靠煽動與暴動是不充分的；要無條件的考慮大衆自身之政治的經驗爲必要。』

我們曉得這一個原則是關於變更口號的問題，是變更的樣式與方法，與如何把爲黨的口號變成爲大衆的口號的問題，是以如何方法引導大衆，以革命的態度使他們通過自

身政治的經驗而確信黨的口號爲正當的問題。我們只靠宣傳與暴動，是不能使大衆相信的。使大衆相信是要靠大衆自身的政治經驗。它要使廣泛的大衆親自感覺現在秩序之破壞是不可避免的，新的政制之樹立與舊的社會制度之崩壞是不可避免的。確實的，一九一七年四月，波希維克所指導的團體和黨，已經確信克倫斯基政府之崩敗爲不可避免，這事是不可不承認的。但是僅僅如此就想乘機提出推倒臨時政府而建立蘇維埃政府的口號是不充分的。當時爲要把『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的公式，從時代的預見變爲當前直接行動的口號，還須尋求決定的要因，即大衆自身要相信此口號之正當。因此，預見的公式與由此而提出的當前直接行動之口號的公式，不可不細心區別。這一點是一九一七年四月以蒲苦達底夫爲首的波希維克之彼得波一派所沒有區別的，所以他們揭出『打倒臨時政府』和『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的口號太早，而他們就觸着礁石了。列寧當時公然罵他們一派所犯的危險的冒險。這是何故呢？廣泛的勞役大衆尚未到揭開這個口號的階段和這種聯合戰線尚未成熟之故。……他們一派過早的行動，

把我們共產黨逼成離開廣泛大眾的蘇維埃——當時還信托臨時政府的革命精神——而陷於完全孤立。中國共產黨假使在半年前就揭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可以嗎？不能的。這便要做了危險的先鞭。又假使中國共產黨感覺到難於接近廣泛的民衆——他們還是信仰國民黨的——因此遂離開國民黨，而使共產黨本身離開農民大眾而孤立，行嗎？這是中國共產黨所不能爲的。何以故？因爲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對於『農業革命』的鬥爭，對於勞動的『階級鬥爭』，失了廣泛勞役大眾之信用，都未達到最高點的緣故。我們常說：我們對於國民黨首腦部，以放任的意味——如像今後——要做到更換它的問題的口號之一切可能性不失，到此地步，那我們就可揭出打倒它的口號了。現在中國共產黨，應揭『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嗎？不用說應該的。國民黨首腦部既已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失其信用，他們在與廣泛的勞役大眾成了敵對的關係之今天，我們這個口號要得着大反響吧！這是變更口號的問題，以新的革命態度之手段和方法引導廣泛大眾的問題。這樣由我們的行動，做到於適當時期能揭出新的口號

替代別的口號，幫助廣泛大眾，使之通過他們自身的經驗而認識我們黨的見解爲正當的問題，便是列寧主義第三戰術原則的要求。

國際勞動運動之意識的前衛，即共產主義的政黨之基本組織，當運動目前的任務時，在乎曉得將廣泛的大眾引到自己這樣的新的態度，——現在廣泛的大眾還是睡眠的，做無用的事的，無活氣的，保守的，不覺悟的——在乎曉得不只是黨，就是它們自身，也是移大眾於新的態度之指導者。反對派之根本錯誤，在於不了解而且不承認列寧主義戰術上原則之目的和意義的重要。

他們反對派在一九一七年大胆的把農民運動拋棄，已是違反列寧這一個原則。他們否認在敵人團體內之共產主義者的活動的合目的性；他們因爲否認與一時聯合戰線之必要，而却捨棄自己勞動組合的後進性於不顧，這時候，他們已破棄了列寧這個原則。他們反對派現在是捨棄中國革命運動的特殊性（國民黨）與中國民衆的後進性於不顧，

——他們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產主義者即時退出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的

發展階段尙未完結，在現在經過的情形中，要求即時揭出完成蘇維埃的口號——都是破棄了列寧這個原則。

以上一大篇史丹林的第二供狀完了。這供狀是不是證明中國共產黨分子自加入國民黨以來，自始即把國民黨視爲敵人的團體，而與他們所謂敵人作『一時的聯合戰線』呢？是不是證明了『聯合戰線』，是要在國民黨大弄其金箍棒，將國民黨來卵翼成長他們共產黨的『後進性』，一直要等到他們搗得國民黨的中央幹部和基本組織，成了百孔千瘡不可復合的破銅爛鐵，才肯甘休呢？我們不管共產黨對着中國人把『馬克斯主義』『共產主義』『解放勞農階級』等等不兌現的空票怎樣說得天花亂墜，而史丹林却一篇供狀都把他們個中的黑幕和醜態，一一宣露出來了。一切假借無產階級革命的虛名所說的心理論，歸根結底，只是一個陰險貪詐卑鄙齷齪的結晶品列寧主義，而列寧主義就只是一個偷竊手段的代名！這是史丹林的供狀所證明的第一點。我們且看史丹林口裏所說的，國民黨確是一個民衆黨，而共產黨却總是一個沒民衆的黨；沒有民衆，便要對國民黨施其偷竊手段，便要勾結國民黨內最易搖動最不忠實最懷貪詐

的游移投機腐化分子，置諸國民黨各級的首腦部以爲內應。在史丹林所謂革命的第一階段，豈不是汪精衛跳在台上大喊『革命的向左邊來』的時候麼？然而『向左邊來』是來到什麼地方呢？原來照史丹林所說，不過是走進『小資產階級』裏面去了。因此我們就知道所謂『左派』，就不是史丹林所真心稱許的『革命者』，他還是『小資產階級』，而汪精衛自始至終却終於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左派』。這『小資產階級』是第三國際爲了要卵翼中國共產黨所不可少的工具。這時候汪精衛替共產黨取得了什麼『既得權』呢？史丹林就公然說：『無產階級得到公開組織的工會罷工委員會等，在國民黨之內作成共產黨的團體，作成農民組織最初的細胞，共產主義者侵入國民政府等。』在史丹林所謂革命的第二階段，是汪精衛自己說『不願破棄革命聯合戰線』的時候，他還不是史丹林所深知的『小資產階級』麼？然而他又爲共產黨逼得做了『無產階級農民革命的民主主義政府的核心』，結果使史丹林大吹大擂地說『共產黨由五千乃至六千的黨員成長爲由五萬乃至六萬的黨員』，而兩湖人民被此輩蹂躪燒殺的乃不計其數！在這時候，『小資產階級』却被第三國際知道了有動搖的傾向，然而正唯其是有動搖的傾向，所以

第三國際乃更逼了汪精衛『跛行的』跳到上海，驅成『寧漢合作』的局面。在這局面之下，共產黨又取得什麼『既得權』呢？史丹林又不隱諱的誇說：『因爲如此，幾百萬農民遂將最相信的信憑集合到無階級的周圍來了。』史丹林誇大的說辭，其內容的實在如何，我們可以不必問，但是這是由於汪精衛一班『小資產階級』的功勞，也已情見乎詞了。至於最近第三國際的政策，不是史丹林說明了要做『揭打倒國民黨』口號的工作麼？最近廣東的變亂，共產黨揭出這個口號，不是證明了史丹林八月一日的話，到而今發生了行動出來的麼？然而史丹林供說：共產黨提出這個口號的瞬間，必須要做到國民政府的信用完全失掉。這一點是共產黨最後一步成功的大前提，於是我們又看見汪精衛持共產黨準備此次叛亂的期間，忽然跳到九江，忽然跳到廣州，忽然又跳到上海，而其最後的一着，無非就是要力求造成史丹林所謂『揭出打倒國民黨口號』的形勢而已。我們原不解幾個月前汪精衛爲什麼要把一個特別委員會套在忠厚長者的頭上而一溜即跑往漢口，幾個月後爲什麼又要由廣州跑到上海來揭打倒特別委員會的口號，這種自理自搯的反覆行動，如果不是看了史丹林這篇供狀，是沒有一人不要駭怪



的。但是看了史丹林這篇供狀之後，我們馬上了解汪先生之所以要自埋自摺，其目的在於爲第三國際造出一個中國的克倫斯基的政府出來，然後才可以做打倒克倫斯基政府的工作。前幾天聽到幾個青年同志說：『如果站在國民黨的立場，我們處處覺得汪先生的言行是反覆無常的，但是如果站在共產黨的立場，我們就處處覺得汪先生的反覆無常，正是他的人格之所在。共產黨的工具，當如此也！』所以汪先生對於特別委員會之忽然扶起忽然打倒，至少可以公公道道說一句是客觀上做了第三國際的工具。我這話并非爲特別委員會抱不平，它其實是和以前的武漢政府一樣，都是史丹林所需要的一個克倫斯基政府，其倒塌的原因，由於自身的錯誤一半，由於蘇俄共產黨幹部的陰謀一半，而其餘良心上不滿於此種政府者不與焉。然而武漢政府和南京特委會，雖是史丹林所視爲一個必要的克倫斯基政府，而汪精衛所處的地位，却前後不同。在武漢的時候，他自己是跳進去做了一個克倫斯基的角色；這回則特委會已有人做了克倫斯基，而汪先生便扮了一個反克倫斯基的角色；無論如何，汪先生以前是主觀的做了第三國際工具，這回是客觀的做了第三國際工具，已是事實上如此，不管汪先生

自己的想像如何。這是史丹林的供狀所證明的第二點。

總合地說，第三國際的陰謀，是在於把中國國民黨當作俄國社會民主黨對待，而其對待的方法，一曰欺騙，二曰威嚇，三曰分拆。當他們沒有驕進國民黨的時候，他們就說要如何爲國民黨和國民革命努力，要如何鞏固革命的聯合戰線。他們既驕入國民黨之後，他們就要利誘你，利誘不動，就要威嚇你，利誘威嚇都不動，就要拆掉你。到了現在，國民黨經過他們欺騙威嚇之後，已是創痕遍體，不可復合了。第三國際的陰謀，很毒啊！國民黨的經歷，慘痛啊！

## 六、革命呢？反革命呢？

我們把國民黨三年來的經過和第三國際的陰謀兩方總合的看來，得着一個什麼的總結呢？總結就是，中國革命已走入法國革命的壞路，同時兼有走入俄國革命的絕路的傾向。依法國革命史的比較說法，中國革命，從總理逝世以前，是鮮明的普通的統一的革命

，這是與法國革命由一七八九年七月到一七九三年的時代相同。總理逝世而後，汪精衛以共產黨的利用擁護，而養成其所謂『左派』的勢力，排除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和破壞國民黨的重心，這是與法國革命史上羅伯史比爾一派握權的時代相同。當然，汪精衛個人夠不上與羅伯史比爾相提並論，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忘却汪精衛的背後之鮑羅庭，則合鮑汪爲一人以與羅伯史比爾相比擬，正是切當的。羅伯史比爾挾山岳黨以爲一己的勢力，斷行革命的恐怖，排斥異己，宣布嫌疑犯的法令，組織革命裁判所，羅織整千整萬的人以反革命的罪名，此與鮑汪二人之狼狽爲惡，挾共產黨和『左派』以爲自己的威權之基礎，施行示威運動和武裝暴動，排斥一般反對共產黨的本黨同志，宣布『左傾』容共政策』，『反共即反革命』的種種口號，恃着人民裁判委員會的組織，任意加人以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反動派等等罪名，而造成社會恐怖的現象，有何分別呢？當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三日那一天，馬拉Marat被一女刺客殺死，羅伯史比爾即利用馬拉案大捕一般革命要人，甚至最熱心於推翻王政努力革命的羅蘭夫人，亦被處死於斷頭台上，此與鮑羅庭等之欲利用廖案以誣陷國民黨的忠實領袖，不分良莠的逮捕國民

黨員，又有何差別呢？當羅伯史比爾正在殘殺一般主張平等與無神論的急進革命者的時候，唐東曾經批評他不應如此的殘暴，應該以仁恕之心對待愛自由的法蘭西人，而羅伯史比爾即日唐東爲反革命，把唐東及其平日尊重的朋友都送上了斷頭臺。汪精衛在廣東的時候，大倡其『對敵人仁慈即對同志殘酷』的教義，可謂深得羅伯史比爾的神似，而許汝爲同志因不從鮑羅庭逮捕五委員的主張，不願無憑據而污辱同志，乃亦被逐，則可謂有類於唐東之存心，而幸未遭其厄運。至若共產黨及其所利用的新官僚軍閥，如李立三徐謙詹大悲陳公博鄧演達顧孟餘張發奎輩，則又與當時的共和檢查官，使有產者的黑衣隊劫掠法蘭西，大發無恥的橫財，而亦被尊爲革命的要人，同一情景。

然而中國革命之走入法國革命的壞路，不獨表現於革命人物的自相銷滅上，而且亦表現於革命思想的淆亂紛歧上。季陶先生在他『青年之路』的小冊子上說過：

古人說紂有臣億萬，有億萬心，周有臣三千爲一心。國民黨何以會受共產黨操縱搗亂？原因就在於黨員當中有一種人對總理遺教懷疑，不能共信互信，不能同心協力，

所以才曾弄一敗壞至此。我早就見到黨中生出兩種思想的中心；許多黨員，自始至終，不曾相信過 總理的主義；我看到這一種，知道本黨基礎已經發生動搖了。而那時幹部的同志，不但不努力做思想統一的工作，還有變本加厲，想把 總理的忠實信徒趕出黨外去的人。有幾個在黨的幹部中，做很重要的工作，地位也很高，名望也很大，對於黨國也要算忠實，他們並不跨黨，他們也認定國民革命的重要，我問他們：『你對 總理的思想主義的意見怎樣？』他們回答說，『我是懷疑的』。我說，『你既懷疑，便不應該做國民黨的黨員』。他們說，『我是來做革命的工作，我們只要革命，何必人人信仰相同？』大家想想，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們的黨，還說是有基礎有組織有力量嗎？

季陶同志舉這一例，可以說明中國革命的思想上紛歧淆亂的總原因。不革命的，反對革命的，可以不論。參加革命工作的人，根本上把革命當作一事，革命的思想主義又當作一事，則遇着革命思想主義發生動搖，個個黨員間因而起思想上紛歧淆亂的現象，是必然的道理

。汪精衛也就是這種只問革命不革命，不問主義不主義之一人。他在過去的實際工作期間，說什麼『只管國民革命，等到國民革命的結果，橫豎大家都死在地下，三民主義也好，非三民主義也好，終於任後人去解決。』因為存了這種糊塗觀念，所以對着實際革命工作，不當它是從一定不可移易的主義而出發，而當它是從敷衍環境而出發，弄到結果，則只能為環境的被犧牲者，而不能為環境的革命者。唯其如此，所以 總理在時，他跟着 總理，也不失為國民革命的健者， 總理既逝，他遇着鮑羅庭，便一變而大喊其『革命者向左來』的糊塗口號，却不懂得革命所恃的是主義，離開主義而講左右傾的，就只有走入反革命之一途；亦唯其如此，所以這幾年來大家所要的只是政權黨權，而拿了政權黨權在手裏，就只知道用之以擁護自己個人的勢力，而完全不用之以作革命的建設事業，甚至反把做主義工作做建設工作的人都排除盡淨。現在我們回頭檢查過黨裏的重要事實，大家想想，那一件事可算得是三民主義上的成就？那一件可算得是根據三民主義的建設？退一萬步說，就是在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展之中，所破壞的固然不少，而其所以破壞，為什麼破壞，許多地方就說不上是爲了要建

設三民主義的國家這一個目的而破壞的。革命革命，革到現在，事實上已不見了三民主義絲毫的實施，而革命本身之爲物，已等於尋常政黨之鬥爭，等於尋常武力之鬥爭。爲黨作革命重要工作的人，既然把革命視爲尋常實際的政治，而喪失了革命所特以爲源泉之主義的認識與思想的統一，則革命之缺乏統一本身勢力的能力，可以想見。所以這幾年間，在黨的重要人物的思想與行動上，處處現出游離紛歧的破綻，使一般趨向革命的民衆，生出無所適當的反感與反動。向來追隨總理的人，忽然可以變更政治上革命的色彩，而說出『向左』的離奇話；動輒主張依從黨紀的人，到了一定的時期則可以忽然不依從黨紀而幹出毀法害理的事情來；今日說擁護特別委員會的人，忽然明日可以說推倒；今天說『反共倒蔣』的人，明天可以忽然主張擁護蔣反共；種種口和心不對，手和口不對的思想行動，簡直與法國革命中的要人，一方作民主主義的革命，一方要討論君主立憲的優點，一方要剷除貴族封建，一方大殺主張平等與無神論的人們的情景，絲毫沒有分別。因此之故，一般腐化惡化投機的分，都可以奔集於革命旗幟之下，爲的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爲的是『共信不立，互信不生』；

爲的是『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英國政治家格蘭德斯頓在一八六〇年說了一句名言，他說：『一個羣衆觀瞻所繫的人物，若突然見易思遷，其遺害所及，雖較固執的謬見爲小，對於國家也有很大的惡影響。』我們這幾年國民革命的壁壘裏面，在思想上行動上朝三暮四，其所引起的思想上言論上紛淆矛盾的一般惡影響，正是證明格蘭德斯頓的名言爲不謬呵。

由此思想上紛淆矛盾的現象，便發生革命勢力之紛離散亂，這就是中國革命所以有同時走入俄國革命的絕路之傾向。季陶先生說中國革命，在最近幾年有了兩個思想的中心。這兩個中心，不必說，是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然而就事實上說，在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個思想的中心之下，實際上的革命勢力還是不只兩種。在第三國際所扶植的共產黨之中，他們老實不客氣是有左派右派的分別的，可見他們的勢力並不集中。在國民黨裏面，本來是沒有這種派別的，但這幾年給共產分拆離間，就外面有了『左派』『右派』的反宣傳，而內面却有個人不能相容的裂痕。除此兩黨而外，還有無政府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種種多少異其程度的革命小組織，而他們之分離散亂，亦復盡人皆知。所以這種情景，又與一千九百零七年以前俄



國各派革命運動的情形相同，而其不能混化爲一種統一的革命力量，亦復相同。一千九百十三年之際，孫中山先生也看到了各種不相統屬的思潮之發生，在革命上必然要引起分崩離析的惡影響的，所以拚着大成功的決心，一方面與蘇俄親善，一方面把共產主義者收入到黨裏來，根本上是想把三主義來陶冶他們，使他們漸漸認識三民主義之博大性與需要性，而不爲破片的馬克思主義所迷惑。不幸孫先生逝世，黨裏再沒有能夠團結起像孫先生這樣堅決偉大的中心，而第三國際反得施其分拆離間的陰謀手段，所以，縱是一種已成的統一之局，也會弄到分裂至此。現在就全部的中國革命的事實而作總批評，我們可以說，中國革命的勢力是分散的，各黨各派當中也是隱伏了分離的禍根的；少數真實各爲其主義而奮鬥的人既不能混化爲一體，而一般信仰未堅知識未充的青年更是隨人俯仰，不擇方向；有點知識的人既然如此，則一般民衆，更是等於狙公之狙，任人愚弄；經過若干時的各種革命勢力之混亂，則任何一種民衆都要對於革命生出厭倦和畏懼的心理。到了這個時候，不是歷史上反動時代之復興，便是再革命時代之醞釀。在這種反動時代復興或再革命時代醞釀的過程中間，過去誰是

革命，誰是反革命的問題，一定是留在「誰能管得」的狀態裏，而將來誰是反動，誰是再革命的問題，必更成爲不可解決的糾紛。如果此種危險的因緣延長存在，則總有一天，會逼到不管誰是反動，誰是革命，只要遇有一個強大的暴力出來了，都要被掃殺得不留餘地，如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景一般。

總括以上的事實我們就知道中國革命，事實上發生了三大危機：一是革命者的思想和行爲，絕似法國革命爆發以後到拿破崙專政以前的時期之矛盾紛歧；二是各種革命勢力，絕似俄國革命運動發生以後到列寧施行紅色恐怖以前的時期之分離散亂，不能混化合一；三是中國革命因爲本身不能篤實堅定的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上固結自己的力量，就想引入外來的蘇俄勢力，把自己的革命力量堅實起來，而結果倒反給蘇俄將中國革命力量逐一的拆散，逐步的打擊。最後這一種危機，是法俄兩國革命之所無，而中國革命之所獨具的，而這種危機，也就是中國革命此時最兇險的大敵。現在我更將前面的三種事實歸納出下面幾點來，作我們今後革命的教訓。

(一)革命者思想和行爲，固然生出了極矛盾和極紛歧的現象，但是目前各人互相攻訐的時候，都是把『腐化』和『惡化』兩個名詞來包括一切矛盾和紛歧的事實。『腐化』固然是革命之敵，『惡化』也是革命之敵，而互相攻訐之下，『腐化』和『惡化』混戰不清，尤其是革命之敵。所以要消滅『腐化』『惡化』，就不能不認清它的本來面目。胡展堂先生在南京嘗說，『腐化』的定義是『貪』與『詐』；我現在更增補一句說，『惡化』的定義是『使貪』與『使詐』。貪與詐，的確是現在的一切腐化的事實的根源，而使貪與使詐，便是一切惡化的事實之所由起。有了貪與詐，便容易被社會惡習慣惡勢力所淫投而歸於腐化。有了貪與詐，便容易被赤色帝國主義的惡勢力和權術所利用而趨於惡化。腐化弄到革命消沉，惡化弄到殺人放火，也是使革命消滅，表面儘管不同，而其根源和結果都是一樣。所以今後要消滅革命之敵，須從根本上力自反省，銷滅各人胸中的貪與詐做起。如果這一個根本之敵消除了，一切革命者之間的互相猜忌，和事實上的種種矛盾糾紛，都是不成什麼問題的，而結果各人自然不忌威權，革命自然頓增威信了。

(二)中國現在的革命勢力固然很複雜，但究不若俄國十月革命以前的那樣相持不下，而且決不甘於像它們那樣同歸於盡。只要一切真心要革命的人們，認清中國共產黨是反社會民族反國家反人類一切利益之殺人放火主義，而一致真切地覺悟唯有三民主義才是救人救世的革命主義，在這一真切的大覺悟之下，容許各個人同在中國民族生存的觀點上，同在中國社會和民衆的利益的觀點上，各有表現其天賦的聰明才力和思想之自由，使革命受集合各種聰明才力以共同努力之益，而不使有什麼『左派』『新左派』『右派』『新右派』這種分拆革命勢力的現象發生，以至互相傾軋互相消滅，——要這樣，我們革命的力量，才能集中，革命的前途，才有希望。現在革命的勢力既然紛歧複雜，到產生大危機的時候，無論誰人，都要起來挽救革命前途的危機；要挽救這種危機，最大的任務，就要以三民主義籠罩一切個人的思想感情之所異，而求實現三民主義之所同。三民主義是容得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及不知不覺的應有盡有的四萬萬人來共同努力的。除了根本上自絕於三民主義者而外，三民主義是不管各個人思想感情之差異到什麼程度，都包容得下的。如果我們反而拿着各個人思想感情之差異，

而不包容一切三民主義所需要的各個革命者和各個革命勢力，三民主義是不能實現的。所以我們固然以三民主義責人，同時也要以三民主義容人；所責的是各人革命目的之同一，而所容的是各人才具性格之差別。須要這樣，才能使中國革命本身消弭紛歧，集中力量，而完成中國民族所需要的國民革命。

(二)聯俄的革命政策，是引入第三國際拆散我們革命勢力打擊我們革命力量的導線，這已不容諱言。這一個政策，其利益既不能完成中國的自由獨立，其弊害反予中國革命以絕大打擊，也已完全暴露。因為現在俄國事實上已逆反孫中山先生聯俄政策的精神。當十二年一月，孫先生與蘇俄代表越飛交換意見，結果公表了一個英文宣言，內容的要點是：『第一，孫逸仙博士認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事實上不能適用於中國，因為中國是沒有可供共產組織或蘇維埃制度成功之狀態，這個見解，越飛全然表同意；於中國為最重要且急切之問題是獲得民族統一之完成與國家之獨立，越飛就於此大事業而勸告中國應依賴俄羅斯國民熱誠的同情與援助，第二，孫博士對於越飛，要求將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蘇維埃政策列舉於對中

國通牒之原則，再爲切實的聲明，就於此點越飛向孫博士鄭重宣言蘇維埃政府以廢棄帝政時代之中俄條約（中東鐵路包含在內）的根本方針而開始中俄交涉之希望與其準備；……：第四，越飛正式向孫博士宣言蘇維埃政府絕對無在外蒙古行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外蒙古與中國分離之意志，（此點孫博士表滿足之意），孫博士以認俄國軍隊，就中國實際之利益與其必要上，暫時無須從外蒙古撤退，因爲中國北京政府於俄兵撤退後，如白俄之反赤陰謀及其敵對行爲之發生釀成比現在更重大局面之時無防壓之力也。』我們只就這三個要點來看，蘇俄已逐一破棄了孫先生和越飛所同意的原則，尤其反背了第一條所指獲得中國民族統一之完成與國家之獨立的原則。徵以現在蘇俄拆散中國革命力量，及其指使中國共產黨強行階級專政的策略，其背離孫先生聯俄的本旨，毫無疑義。所以在完成我們求中國民族之自由平等的國民革命一個責任上，應該立即廢棄聯俄政策，恢復我們革命勢力本身的自由與獨立，才能談得到實現中國民族的自由與獨立。

以上三點，只是就目前革命現象中救急的方法而言，然而在這三點的基本要義，就是要

澈底將革命與反革命的界線劃清。我所要說的，不是這種界線只在各人的思想上劃清，而尤其要在行動上表現出來。在中國革命的立場，什麼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呢？簡單說來，就是：

1. 在主義上，三民主義是整個的革命理論，所以確實地真切地認識三民主義，依照其所規定的革命程序而求其實現，這是革命；反之，不確實地真切地認識三民主義，或割取三民主義的一部半部一點半點，而掩護個人或團體的勢力之進行，甚或完全離開三民主義而因襲什麼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這就是反革命。

2. 凡是一個民族的革命，其政治的總目的，第一步，必須實現民族的獨立，第二步，必須建築國家的組織，第三步，必須發展民族的經濟，這是從法國革命到俄國革命，其目的都是如此。所以，凡是能夠從這一個總目的而觀察他國的革命，而且要為這一個總目的而努力於自己民族的革命，能如此的，便是革命；反之，便是反革命。

3. 在實現革命目的之進行上，政策和方法，必須要適合於革命的主義，而尤其要適合於

每一個革命程序的實際成就，能如此，才是革命；反之，不顧政策與方法之是否合於革命的主義，不問政策與方法之是否合於每一程序之實際成就，而專以帝國主義官僚軍閥及尋常政黨所用的權謀術數相競尙，其結果便喪失犧牲個人而謀民衆幸福的革命真實面目，於革命本身絲毫得不到成績，這樣的政策與方法，便是反革命。



## 附錄

### 分共以後

汪精衛

上回說的，是武漢分共之經過，黨內分共，武漢爲最難，亦爲最遲，及至最難的部分，已得到最後的解決，分共便成爲黨內一致的主張了，如今所要說的，是分共以後，要怎麼樣？

兄弟於此，想提出個要點，

第一。我們要繼續肅清中國共產黨所謂分共，是將共產黨員，從國民黨裏，分了出去。只是分出去之後，便怎麼樣呢？七月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宣言，和七月十九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宣言，都有同樣的語調，即是一面攻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一面仍主張不要退出國民黨。這顯然是藉着國民黨的掩護，以破壞國民黨。恰如要將國民黨做雞蛋殼，而他却要做雞蛋殼裏頭未孵化出來的鷄鵝，平時借着雞蛋殼

的掩護，時候到了，即破蛋殼而出。這種一相情願的事，只好說是妄想。他爲要實現這妄想，已經定下種種計畫。綜合幾個月來，莫斯科所發表的議論，以及中國以內所得到的報告材料，他的計畫，大概是：以蒙古爲根據，向北方各省，逐步進取，他以爲國民黨在北方各省的勢力，比較微弱些，可以爲所欲爲，至於南方各省，無論什麼運動，都有國民黨做他的對頭，所以他必以破壞國民黨爲第一着，其破壞方法，除在國民黨外實行種種擾亂，最狠毒的，莫如混入國民黨內，做種種挑撥離間的工作，他以爲國民黨分裂之後，創痕是一時不能即合的，借此機會，使國民黨自相殘殺，不難使之同歸於盡，如此說來，現時所謂分共，只能說是國民黨已經確定的主張，而不能說此主張已經完全做到。如今担負國民革命之責任的，是國民黨，共產黨破壞國民黨，便是破壞國民革命。不但國民黨要一致起來，將他打倒，中國國民，也要一致起來，將他打倒。

第二。我們要重新整理國民革命的理論我們所謂分共，不但要將共產黨分子，從國民黨裏分出去，尤其要將共產黨理論，從國民黨裏分出去。國民黨自施行容共政策以來，共產黨

分子，在國民黨名義之下，向農工商學各團體，宣傳了不少共產黨的理論。如今共產黨分子，雖然分了出去，而其所留下的理論，仍然存在於農工商學各團體裏。農工商學各團體，倉卒之間，不能分別出那些是國民黨的理論，那些是共產黨的理論，這已是極大的危險。而尤其危險的，是農工商學各團體裏頭，有些熱心的人，本來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而誤認共產黨理論，是國民黨的理論，且以爲是國民黨裏頭最革命的理論。這種的人，說他是共產黨，他必不服，然他的理論，却與共產黨一般無異。這種的人，在農工商學各團體裏，遇見了不少。所以國民黨當前最急的工作，是將數年以來，國民革命的理論，重新整理一遍。將共產黨的理論，夾雜在國民黨的理論中的，一一剔了出來。明明白白指示給農工商學各團體。這些是共產黨的理論，必須拋棄，這些是國民黨的理論，合乎國民革命之需。然後農工商學各團體，方不致迷了方向。這不但是國民黨當採的手段，而且是國民黨當盡的義務。不然，只將共產黨分子分出去，而共產黨理論，仍然存在，分共之目的，是不能達到的。

至於整理的方法，當如何呢？自然是以三民主義爲度量衡。凡理論之合於三民主義者則

留。不合於三民主義者則去。不能有絲毫苟且假借。舉例來說，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信條。而民生主義裏，却已將階級鬥爭的理論，批評得清楚。人類因有階級，纔有鬥爭。這是事實，無論何人，不能無視的，如其要消滅鬥爭，必先去消滅階級，階級消滅，則人類致於平等，進於大同，自然用不着鬥爭了。這一點，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目的，是相同的，所以先總理說，『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然共產主義，是要無產階級，用鬥爭的力量，打倒其他一切階級，即有時貪圖聯合戰線的便利，與農民同盟，甚至與小資產階級同盟，都不過一時的便利，不是永久的結合。所以各階級間之相殘殺，是必然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是有意做成，並非是出於意料所不及的，民生主義，則是用思患豫防的方法，使階級之未發生的，從此停止，已發生的，也逐漸消融，以引而致之於自由平等之域，所謂事半功倍。所以總理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的，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中國現在的情形。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凡是次殖民地的國家，因為經濟落後，大工業沒有發達，沒有什麼大資本，沒有什麼大商業，所以社會階級

，是不甚懸絕的。而且就全社會看來，最大的壓迫階級，是帝國主義，而全社會皆處於被壓階級的地位。所以中國今日所需要的，祇是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所需要的，是民族聯合，反抗帝國主義。社會間各種力量，應該分工合作，以達此目的。提出階級鬭爭，使社會間自相殘殺，於民族聯合，不但無利，而且有害的。照中國現在的情形來說，已是如此。照民生主義之最終目的來說，『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所以要達到民生主義之最終目的，也不當採用階級鬭爭之方法，而當採用聯合社會間各種力量的方法。

#### 如今舉幾件實事，來做證明

先就農民運動來說，自去年北伐以來，共產黨在兩湖做農民運動，其唯一口號，是沒收土地。所以創出『打倒地主』以及『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種種名詞。其結果大中小地主一齊打倒，農民一無所得，徒便宜了一般地痞流氓。最可恨的，他們還要用『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來做護符。須知道 總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在民生主義第三講裏，說得明白，是要用政治和

法律來解決的。並且在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裏把耕者有其田的意義，更解說得詳細，共產黨借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來沒收土地，並且由下級機關自行沒收，不經過政府。這種做法，正是民生主義所痛恨的。我們分共之後，必須向農民解釋明白，共產黨的農民運動之理論與方法，和國民黨的，全然不同。共產黨之農民政策，所謂沒收土地，不過說得好聽。其實農民不但沒受其益，反受其害。因為他只圖唆使農民打倒鄉村間其他一切階級。其結果社會聯鎖，爲之打破，農民亦無以自全。他却正好利用這些失耕農民的騷動，以爲其獲取政權的憑藉。真是農民之蝨賊。至於國民黨之農民政策，載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雖似乎卑無高論，却適合於農民目前之需要。而其指示農民與國民革命之關係，更爲非常密切。我們可以對每一個農民說；農民所患的，不是沒有土地麼？然而中國有些地方，土曠人稀，農民不愁沒有土地，却愁有地不能種。近年以來，所謂華北旱災，深知原因的，知道不僅是由於天旱，却是由於有地而不能種。因爲農民比工人更苦，工人有了身體手足，便可勞動，以得工錢。農民單是勞動，還不夠的。勞動之外，還要本錢。買牛，買耕具，

買種子。都是非有本錢不行的。農民何處得本錢呢？是由於借貸。鄉村間的高利貸，說起來，駭人聽聞的。農民從高利貸得到本錢。幸而那年無水旱之災，得以豐收，租稅之外，得以還債及供衣食。不幸而那年有水旱之災，賠了本錢不算，還要賣兒賣女，以納租稅，及還債呢。這便是有田而不能種之一原因了。所以農民問題，不是有了土地便得，還須計及本錢，各處設農民銀行，以輕微利息，借給農民，資其耕作，纔可以能解除有地不能耕之苦痛。然而農民銀行，談何容易？不是國家財政充裕，社會經濟舒展，何能辦到？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但當着眼於農民本身，而當兼着眼於社會聯鎖關係了。有了土地，有了本錢，似乎可以耕作無憂了，然而還是不夠的。如果地方不能太平，有土匪打劫，不但禾稼被其蹂躪，鷄狗被其殺戮，田廬被其焚掠，有時連兒女也被其擄去勒贖，再遇着不良軍隊，真所謂賊過如梳，兵過如篦，其痛苦更不堪言！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當但着眼於社會相互經濟關係，而當兼着眼於政治了。政治清明，地方太平，農民似乎可以安居樂業了，然而還是不夠的。出口的是農產品，入口的是工業製造品，農民辛苦種出來的豆子，被外國人用低廉的價，買

了出口，再用機器，榨成豆油等等，運之入口，農民辛苦種出來的棉花，被外國人用低廉的價，買了出口，再用機器織成棉布，運之入口，其價值相去，不止倍蓰。諸如此類，數之不盡！農民將一滴一滴的汗換得來的金錢，以為可以放在手裏；不知其結果是加倍賠了出去！幾十處通商口岸，好比人身上幾十個創口，有限的膏血，從幾十個口裏，日夜流出，無論如何強壯的人，也要病倒的，何況是著名的遠東病夫呢！不平等條約，片面義務的關稅制度，如果不能廢除，全國勢必淪於破產，農民自然不能倖免的。可見得解決農民問題，不當但着眼於政治關係，而當兼着眼於國際現狀了。以上所說，社會關係，政治關係，外交關係，和農民本身，密切連帶如此。可見得國民革命的三個口號，（一）農工商學聯合起來，（二）打倒軍閥，（三）打倒帝國主義，正是農民運動所必需的。這三個口號，為國民革命計，亦即為農民計。國民黨的農民政策，實實在在是為農民謀利益的。經此一番解釋，農民定必恍然無疑，再不去上共產黨階級鬭爭的老當，而明白承認民族聯合共同致力國民革命，為農民解放運動之唯一方法了。



再就工人運動來說，共產黨叫得最響的，無非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以無產階級獨裁爲目的，要做成無產階級的國家。但考之實際，何嘗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不過幾個無產階級領袖的國家便了。幾個領袖，各自以一般無產階級做背景，來奪取政權。一般無產階級，不過做他奪取政權之犧牲。其他階級，更不用說。今年五月間，漢陽縣黨部，爲共產黨所把持，擅自議決，沒收漢陽十五間工廠，組織工人管理委員會。須知道工人管理工廠，是共產黨已經試驗過失敗的事情。俄國十月革命之初，曾經幹過工人管理工廠，不多幾時，原料缺乏了。工資缺乏了，燃料缺乏了，情見勢絀，不能維持下去，趕快由國家收回管理。意大利當大戰以後，曾有一兩處演過工人管理工廠的喜劇，當其佔領工廠之始，豎起紅旗，唱國際歌，十分高興，不多幾時，原料工資燃料都無着落，無可奈何，反去請求政府替他向資本家調停，於是慕索里尼窺見弱點，乘之而起，以棒喝團把共產黨打得落花流水。這兩件失敗的經驗，中國共產黨豈有不知道的，何以還想在湖北從新搬演？哼！你以爲這是他的愚昧麼？其實正是他的狠毒！他明知道工人管理工廠，其勢不能維持，一面以要求國家管理，挾制國

民政府，暴露其弱點，一面利用工人失業之衆多，做成社會的恐怖，經濟的混亂，得所憑藉，以奪取政權，他只圖以共產黨替代國民黨，操縱國民革命，工人的死活，那裏放在他的心裏！所以與其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之友，不如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之敵。至於國民黨之工人政策，載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雖也似乎卑無高論，却適合於工人目前之需要。而且工人之解放與國民革命，息息相關，也和農民一樣。國民革命，不專爲工人謀利益，而工人之利益，必於國民革命成功之後纔得到真正之保障。國民黨戮力於國民革命，卽是戮力於工人之解放。工人如果明白了國民黨之主義與政策，必不再信共產黨什麼無產階級獨裁騙人的話，而誠心誠意，加入國民黨，以努力於國民革命。

再就商民運動來說，共產黨的口號，是『打倒資本』；國民黨的口號，是『節制資本』，兩個口號，截然不同。共產黨還利用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名詞，今日說打倒這個，明日說聯合那個，九月中旬，我到上海，聞得人說，南京清黨的時候，捉着一個當舖的老板，說是共產黨，這固然是奇聞。五月中旬，我在漢口，聞得咸寧縣黨部的宣傳，有五十塊錢以上的

，便是小資產階級。我思田舍間養一只耕牛，價值往往在五元以上，然則一只耕牛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了。我因此聯想到布哈林說道『我們對於聯合富農，其意味等於養取肥牛，搾取牛奶』。所以共產黨說聯合小資產階級，其意味也不外如是。什麼聯合，不過打倒的代名詞便了。至於國民黨之節制資本政策，在建國方略裏，說得最爲明白，『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今欲利便個人企業之發達於中國，則從來所行自殺的稅制，應即廢止，紊亂之貨弊，立需改良，而各種官吏的障礙，必當排去，尤須輔之以利便之交通，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所以打倒資本的口號，實與國民政策，大相違背，容共時代，有些黨員，隨着共產黨的口吻，高叫打倒資本，實是大上其當。分共以後，按照民生主義，和實業計畫，切實宣傳。並時時注意於改善店員與店東之關係，工人與廠主之關係，調和適當，則一般商民和實業家沒有不歡迎國民黨的。

再就學生運動來說，五六月間，我聞得湖北省黨部青年部的宣傳。有所謂『讀書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我初時不信，以為斷沒有如此荒謬的人，說如此荒謬的話，後來問顧孟餘同志，始知確有其事，真是可惡之極了！不讀書的，仍然好叫做學生，猶之不做工的，仍然好叫做工人，不耕作的仍然好叫做農民，不做賣買的仍然好叫做商人，真是名實不符之至。他還說道，『打倒智識階級』。社會是譬如人身，勞動階級，要打倒智識階級，譬兩隻勞動的手，要打倒一個儲智識的腦，何愁不打倒，只怕同歸於盡便了。如果想中國成爲一個自由平等獨立的國家，必須有自由平等獨立之文化。這個責任全在學生身上。學生不去求智識，是自暴自棄其責任，而所謂打倒智識階級，是逼人自暴自棄其責任，這真是亡國滅種之罪人了！孫文學說，諄諄告人以知難行易，一方勉人以力行，一方正是勉人以求知，決沒有如此，滅裂魯莽的理論的。以上嚙嚙嚇嚇的，說了一大段，是證明對於民衆運動之理論及方法，共產黨的，與國民黨的，截然不問。分共以後，第一要義，是將共產黨的理論，從國民黨理論中分了出去。如今一般腐化分子，口口聲聲，不要民衆，且有接近民衆的，幾

乎就要疑心他是共產黨，這種荒謬心理，固然可恨可憐；但是接近民衆的時候，如果不將國民黨的理論，認識清楚，隨手檢起一些時髦書籍，便根據宣傳，也是莫大的危險的。

第三。中國國民黨第一緊要的口號，是『建設起來。』我們的口號。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如今又添了打倒中國共產黨，這些誠然是要打倒的。但是打倒以後，又怎樣呢？自從北伐以來，我們已打倒了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不久便要打倒張作霖，我們已收回了漢口九江英國的租界？我們已將共產黨驅逐出國民黨以外，這些工作，在國民革命史上，誠然有相當價值的。但這些都是消極的工作，不是積極的工作。只能在國民革命的大路上，排除障礙，還沒有將國民革命的目的，實現出來。所以今日我們第一緊要的任務，是將國民黨的主義及政策，實現出來。即使一時力不從心，而最低限度之政綱，不可不求其實現。今日國民之望治，真真如餓者之望食渴者之望飲了。孟子說得好，『餓者甘食渴者甘飲』；又說『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這真能描出一般人民久亂思治的心理。我們不要性命的去做國民革命，如能爲人民解除一些些的痛苦，獲得一點點的幸福。我們的良心，也得到安慰。我們如其

能建設起來，則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以前做過的，不爲徒勞，以後繼續做去。當更有把握。不然，不但不能打倒軍閥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反爲軍閥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做機會了。

以上所說三點，都是分共以後，必要的工作，隨便說來，期與諸同志努力做去。

## 武漢分共之經過

汪精衛講  
林霖記

——十六，十一，五，在中大禮堂演講——

主席各位同志：

今天兄弟來到這個大會，聽見主席和會同志的說話，其中關於兄弟的 兄弟很覺得慚愧不能接受。現在得這個機會來和離別一年多的各位同志作一種報告，因此一切客氣的話可以放棄。

今天的報告 本來應該把各方面的詳細情形都說到，但因為時間關係，只能專就一個標題來報告，這標題是『武漢分共的經過』武漢幾個月來，容共與分共的情形，實有報告的必要，兄弟到了廣州也有幾天，也作過幾次演講，但都未得把事實上的經過詳細報告。經過的事實很多，我知道各位必然願意知道的。自四月以來，武漢同志的工作，廣東後方同志，或者多未完全知道的，因此打算把武漢分共的經過做標題先對各位說一說。

兄弟願意把純粹的事實從頭敘述有時或參加兄弟個人的批評，但這不過是兄弟個人的意見，希望報告事實後得到各位的批評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至于事實有關係于兄弟工作的經過，也應該說一說，因此並非一人的關係，兄弟也是担任革命工作的一份子，所做的工作，非關個人實關于本黨，報告後對於兄弟作一種狠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尤其是兄弟最希望各位的。

要說武漢分共的經過，先把容共的由來說一說，我們要知道『容共政策』四個字，是起於什麼時候，兄弟記得在四月中來到武漢即看見滿街把擁護三民主義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並權貼出，有時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比擁護三民主義還要多些，這個情形是很不對的，因為政策與主義是有分別的，不論是政策或是主義，都是依着時代與環境而定的，在某一時代某一環境下需要什麼政策什麼主義，然後才定出什麼主義什麼政策，故主義與政策總脫不了時代環境的關係，可是主義的時間性要長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時間便不同了，政策係由主義發展出來的，沒有主義的時間長，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時間性是很長的，



自秘密革命運動起以至軍政訓政完全依三民主義而實行的，到憲政時期更是如此，至於政策是主義的產物，由主義按着時間與環境而定出一種適用的政策，故主義不與政策相提並論的。

兄弟到了武漢，便感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主義與政策的不同，沒有弄清楚，而把主義與政策相混，這是很不對的。說到政策，總理以前有聯段政策，聯張政策。這兩個政策，在現在看來，似乎是過去的東西，但在當時是重要的必須的。那時候中國的大軍閥，就是曹琨吳佩孚，握有軍閥大權，害國殃民的，也就是曹琨吳佩孚。總理所以把聯段政策，聯張政策明明白白的定出來，係爲打倒曹琨打倒吳佩孚，這個政策是一時的，是不錯的，打倒曹琨吳佩孚之後，總理即發表一個宣言即北上宣言，說明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的人！所以曹吳打倒之後，便要變更政策，即是打倒曹琨吳佩孚之後，如有繼起的軍閥，也應該打倒。那時曹吳打倒後，張作霖實行

與帝國主義勾結，段祺瑞大開善後會議，故不能再和他們聯合，即曹吳雖倒，而段張繼起，故應以打倒曹吳的精神，打倒段張，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有對段祺瑞忠告的電，後來更明明白白的，發表宣言，來反對他，這實在是總理聯段聯張的精神，因為段張已為軍閥與曹吳相同，故即放棄聯段聯張的政策。政策與主義不同，由此便可明白。

聯俄與容共政策，為應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化的，這是對於政策和主義的解釋。現在將容共政策的歷史考查一下：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國七八年，在民國七年俄國革命之後，總理有電報給列寧慶祝俄國革命成功。民國十年總理在桂林，俄國派人到廣州到桂林去見總理，俄國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吳佩孚，同時也即在南方考察國民黨。這個是聯俄容共未實行以前的經過。

到了民國十一年冬，俄國代表越飛在上海和總理聯名發表一個宣言，這可算是聯俄的起點，當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逆在廣州造反，總理孤軍抵抗了五十多天，然後亡命到

上海。正當曹琨吳佩孚二大軍閥在北方肆行禍國殃民，南方又有陳逆作亂，總理一人亡命到上海，所處的環境是最為險惡的。宣言中說明俄國願意幫助中國國民黨，反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認共產主義是不能實行中國，故俄國不是來宣傳共產主義，而係來贊助國民革命。這篇宣言實係國民黨的重要史料，也是國民革命的重要史料。蘇俄既聲明不是要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而是要來幫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也以這個理由來加入國民黨，兄弟此次在上海見着張溥泉先生，他是很光明磊落，他說容共政策，他也要負一點責任，因為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李大釗，就是他介紹入黨的。當時李大釗見了總理後，說他加入國民黨願為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努力，但是不能脫第三國際黨籍。總理說可以的，這便是容共政策的起點，到十三年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在大會內否決了不許黨員跨黨的提議。自此以後係本黨已確定容共政策的時候。

當時雖有持異議的，但經大會決定，故即一致行動，然而當時大家都認國民黨和共產黨能不能合作到底是一重大問題。有些以為容共政策是因時代因環境而定的，故亦必隨時代隨

環境不同而變化。國民黨內固然討論這個問題，蘇俄共產黨內也討論這個問題。在蘇俄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是很多的，他們的派別也很多。每年大會的討論結果也不盡同。大約蘇俄共產黨的意見，可分爲三派：一派人稱他爲最右的，他們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可以合作到底，但這派是極少數，而且沒有勢力，還有杜落斯基一派，却是最左的，他主張革命無間，從開始革命，直到共產主義完全實現爲止，他主張絕對不妥協，連在俄國，他對於農民也是不主張妥協的，他有許多演說對勞農政府表示不滿，反對很力，他說現在的蘇俄是假無產階級的國家，並不是真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他是這樣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他對於俄國現狀尙且如此不滿，對於中國，更不用說了，他以前批評總理，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民國十四年三月間總理去世後，在俄國追悼大會中，杜落斯基有一篇演說，他並非駁斥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說中國應先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等到這種革命完成後，再做無產階級革命。很明白的，他是不主張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他以爲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好比前清國民黨員加入滿清政府去做官一樣容易腐化，還有一派，是史達林和布哈林，他們主張中

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去操縱一切，慢慢的取得國民黨的一切權力，到必要時便消滅國民黨，俄國現在得權的就是這一派。

他們這種主張在莫斯科孫文大學的刊物上，有一篇叫做『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是說得明明白白的。這篇文章已翻譯成中文，用真筆版印好的，中大同志諒必有見過的，文中說：我們加入國民黨後，得國民黨的掩護，已取得廣大的工農民衆，但我們的加入國民黨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的，不是主義的。所以共產黨該保存原有的組織，到相當時機，並且不能不要有這個組織的，大意是如此，如要知道詳細，請參考原譯，如此看來，俄國已明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一種政策，看時代與環境的變化如何而不同的，他們共產黨每年大會裏都接受各種報告而加以辯論，研究時時變更政策的。自我們容共後，從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他們已變了好幾次的政策了，總而言之，我們容共是一種政策，他們加入國民黨，也是一種政策，這是很明白的事實。但到何時才分手呢？這實爲一個大問題。怎樣解答呢？那也是應該以時代環境如何去解答，時代環境變了，政策不能不變，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

策都因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當然也是如此，至於等到何時才改變呢？這是無人能先知道的，不過總不外跟時代環境如何而定的。因為一個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一個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的，總不能永遠合作在一起的，有人說，國共兩黨爲國民革命而合作時，可以打一個譬喻，如大家共坐一隻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後，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所以由香港到上海的時候，是不會有問題，所以國民革命的時候，也是不會有問題，然而到了上海之後，便怎樣呢，如果是兩隻船，同走一條航線，彼此照顧，則不但未到上海時，不會有問題，到了上海後，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如果是一隻船，則到上海後，便到了分歧點了，一個要駛往天津，一個要駛往日本，如何不生衝突。

不錯，國共兩黨都要國民革命，然只有一個中國，只有一個國民革命，分明是共坐一隻船的譬喻，而不是分坐兩隻船的譬喻，到了一個時機，國民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共產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其勢非衝突不可，即使時機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準備，所以容共之後，必定分共，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容共時候，不

能說出來，猶之明知到上海後，必然分路，不過從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說出來便了。有許多同志早就說要分共，但黨中大多數都不主張，這全在對於時代環境的看法不同。總理爲什麼要容共，我們試看看十二三年間的情勢如何。論軍閥吳佩孚從江西向北江進攻，東江叛軍進到石龍，西江連肇慶也給敵人佔去，南路在鄧本殷手裏，我們只有一個廣州，但廣州尙有時時可以造反的劉楊，故前後左右都爲軍閥包圍住。更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商團的作亂。帝國主義明白宣言說，你如打商團我便打你，處在這樣危險的情勢之下，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內說分裂，是不許的，所以分共是不許的！雖有許多同志主張即時分共，但都受了 總理的詰責，默然而止，至於十四年間 總理逝世之後，情勢還是一樣。東江才於三月克復，而楊劉已在廣州陰謀叛亂了，六月十二日才把楊劉打倒，而六月二十三日帝國主義者已在沙基殺死許多學生，工人，商民，農民，死的滿街是血！想來各位當中，必有些是身歷其境的，也不忍多說了，沙基慘案之後，不久東江方面，又被敵人佔去，把當日克復東江時莫大的犧牲，弄得乾乾淨淨。同時反動派又在廣州幹起來了，八月二十日明

目張胆的，殺死了廖仲愷先生！那並非暗殺是明殺的！廖先生被殺的前一日即八月十九日，曾和我說道，聽見他們要用機關槍來殺我們哩！說時覺得很是可笑，明日早上，廖先生坐汽車到了中央黨部，他們六七個人真是用大號曲尺裝的手機關槍子彈來殺廖先生，那時廣州大勢，岌岌動搖，東江敵人，已向我們進攻，而南路也同時呼應，在那時候，也有些同志以爲容共政策應該變了。但是我們並未注意及此，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爲自私，因爲自己的利害，這便是極大罪惡，應該受大家嚴重的懲處，然而，我們當時實因正在把全力去對付帝國主義，對付軍閥，對於他方面的事不免輕忽不注意。好比上海拉馬車的馬，他的兩隻眼睛都被罩着，只顧往前面直衝，不容旁顧，雖然輕忽不注意的錯誤，萬無可辭，但決不是出於什麼自私之心，這是當時的實現情形，兄弟在南京時，已會說過。

民國十四年冬間，統一廣東，十五年春間，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再確定容共政策。當時廣東已經統一了。所謂經過一個段落之後便必有一個風潮發生，西山會議派於是決定聯蔣倒汪的策略了，當時我們二人是一道奮鬥的，他們欲把我們二人分開，所以決定聯一打一



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便是此種策略的成功！兄弟知道將來蔣同志必然明瞭的，故自動辭職離開廣州，離開以後，許久未和國內同志通消息，因為知道蔣同志終必明瞭，為避去一切離開挑撥，所以緘默不發一言，如果大家說兄弟不應該辭職，不應該去國，致黨的裂痕益深。這是兄弟甘願受大家的責備的！兄弟離開廣州以後，往法國讀書，學生的心情，彼此是一樣的。當七八月的時候，看見法報載中國革命軍的勝利，以為可以安心讀書，雖則有時看見報上說某同志戰死了，覺得很難過，九十月的時候，病得很利害，不能思想，十二月以後，漸漸好了，連接中央及蔣介石同志的電報，催促回來，今年二月間，蔣同志又來一個電報，說你如再不回來我也走了！那時心裏才十分難過，不能再讀書，精神與書本子已不能聯在一起了，後來再接一個電報說黨要分裂了，於是兄弟便不能不回來了。

回到上海的時候是四月一號，那時蔣介石，吳稚暉，蔡子民，李石曾幾位二十多年來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見面了，見面之後，蔣同志等提出兩件事，要兄弟贊成，一是趕走鮑羅庭，一是分共，從四月一號到五號，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這兩件事，蔣同志等對於這兩件事

，很堅決的，以爲必要馬上就做，而兄弟則以爲政策關係重大，不可輕變，如果要變，應該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蔣同志等說道，中央已開過第三次全體會議了，全爲共產黨所把持，兄弟說道，如此可以提議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以新決議來變更舊決議，而且南京已經克復，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可以由武漢遷到南京，第四次全體會議，即可以在南京開會，會議怎樣決定，兄弟無不服從，如不由會議決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黨於紛碎糜爛，這是兄弟所不能贊成的，於是兄弟自任前往武漢，向中央提議，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並提議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討論決定蔣同志等所提議之事件，蔣同志等很不贊成兄弟往武漢去，而兄弟則以爲不得不行，遂於四月六日下船，在船中寫了三封信，兩封是下船後即發的，一是寫給蔣介石同志，一是寫給張靜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說最好能夠在四月十五左右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一切，隨後又寫一封信給李石曾同志，說明十三年改組的精神不可犧牲，黨的紀律，不可不守，黨的組織，不可破壞，這封信，在南京未曾宣佈過，只看見李石曾同志所編「革命」曾發表覆兄弟的一封信，而於信末說明，原函未經本人同意，不便

發表，只能列舉出幾點來，並且說『汪精衛先生的主張，與吳稚暉先生的主張不同，汪注重黨的組織和紀律，而吳則注重以革命手段行之，我是贊成吳的主張的』，這封原信，現時已沒有發表的必要，然從這封原信看來，可見當時兄弟等主張，確有分歧及其分歧之所在了，四月十日，兄弟到了武漢，聞得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已決定選往南京，極爲欣慰，以爲分裂之禍，庶幾可免，不料十二日以後，便接得南京上海實行分共的消息，並且接得南京成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的消息，兄弟每日均有電報去反對及阻止，至十五日而消息證實，十七日而武漢中央黨部也決定免蔣同志的職了。

以上的情形如此，在兄弟當時看來，以爲蔣同志等是不對的，但是如今看來，不但不是蔣同志的不對，而且是兄弟的不對，因爲當時蔣同志等見兄弟不肯聽他們的話，定要往武漢去，不但對武漢同志失望，對兄弟也失望了，所以不待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如何而馬上就在南京幹起來，而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却不出蔣同志等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對蔣同志的聲勢，所以兄弟事後批評，不說蔣同志不對，而說兄弟不對，這是事實，並不是什麼違心之論。

於此有一句附帶聲明的話，四月四日兄弟曾同陳獨秀發表過一篇闢謠宣言，這篇宣言，是有來歷的，當四月一二三等日，吳蔡李諸同志，曾對兄弟說，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並要主使工人，衝入租界，引起衝突，使國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個不可解的糾紛，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兄弟聽得，十分驚訝，曾將這些話質問陳獨秀，陳獨秀力稱決無此事，兄弟以之轉告吳蔡李諸同志，吳同志說，「這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陳獨秀，陳獨秀遂親筆作書，並親筆作此宣言，以解釋謠傳，表明態度，如今親筆書函，還在兄弟這裏，這一段事，本無關正文，因有人誤會謂這篇宣言乃是主張國共兩黨聯合治國的，故不能不附帶說明幾句。

如今再說自從四月十五日寧漢分裂之後，一般忠實同志從黨的組織和紀律着想的，都服從武漢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命令，以反對蔣同志，然而並不因此而停止了北伐的進行，所以十七日免蔣同志職，十九日依然誓師北伐，關於北伐的事，不在今日演述的範圍，如今當說說武漢分共的經過了。

武漢分共的經過，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個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裁制共產黨徒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階段是和共產黨和平分離，第三階段是以嚴厲手段驅除共黨，如今逐一說來。

當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漢，看見那邊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間的廣東，也不像十五年間的廣東了，其時武漢已成爲共產黨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其理論與方法已完全是共產黨的，而不是國民黨的了，一般忠實同志，痛心之極，然而主張立時分共，是做不到的，因爲四月十九日已誓師北伐，第四方面軍陸續出發，沿京漢路線，和張作霖作戰，第四方面軍的主力部隊如張發奎軍長所統率的第四軍第十一軍，及唐生智總指揮所統率的第三十五軍第三十六軍，在容共時代，自然有不少共產份子雜在裏頭，吳先生曾責備兄弟，爲什麼說和共產黨死在一塊，生在一塊，其實這是容共時代的事實，十四年間東征時候，和十五年間北伐時候，死尸堆裏可以證明，卽如此次北伐，蔣先雲等確是共產黨人，確是和國民黨忠實的武裝同志死在一塊的，當第四方面軍在前方和張作霖死戰的時候，如果後方同

志，發生分共問題，則聯合戰線，爲之搖動，無異給張作霖以一個絕好的機會了，所以當時一般忠實同志，雖明知已到了國共兩黨爭生死亡的時候，不是共產黨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上去，便是國民黨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上去，已是無可並存的，然而爲前方武裝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問題，而祇提出裁制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中央黨部決議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機關，各種民衆團體之一切言論行動，便是此意，可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惡感，從此日深，而鬥爭亦從此開始了，及至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長沙發生反共風潮，當時蘇俄代表鮑羅庭等，及中國共產黨徒都要求中央黨部，對於長沙事件，加以嚴重之處置，及至六月一日，蘇俄代表羅易忽然約兄弟去談話，說「莫斯科曾有一種決議案，給我與鮑羅廷的，鮑羅廷有給你看沒有呢」，我說，「沒有」，他說，「我可以給你看」，他於是把那決議案給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們自己翻譯出來，兄弟看過以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兄弟說「可以給我嗎」，他當時有點遲疑，最後才說「今天晚上送給你，因爲要修改幾個

字」，晚上果然送來，兄弟如今將這決議案原文送給主席，以備各位同志的參考，那決議案有幾點狼要注意的，第一點，是說土地革命。主張不要由國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實行沒收土地，這實爲湖南事變的原因，爲農民運動脫離了國民黨的原因，第二點，對於軍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沒收，以避免軍官和士兵的反對，第三點，要改造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執行委員會中，增加農工領袖，其實即是要增加共產黨人去，他不說穿便了，並且公然的說，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變更，第四點，要武裝二萬C P黨員，並挑選五萬農工分子武裝起來，他說的農工分子，其實也即是指共產分子，第五點，是要國民黨領袖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共產的軍官，這是要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劊子手，來自己殺自己。

這決議案的內容，大概如此，拿剛纔的譬喻來說，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做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一法，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

個，更無他法。恰好這個時候，第四方面軍已在河南打破張作霖的軍隊，收復黃河以南，兄弟等便於六月六日前赴鄭州河南，商量第四方面軍班師回武漢的事。

六月十三日兄弟等回到武漢，第四方面軍也陸續班師回來，在那時候，兄弟忽然聽得羅易要走了，不解其故，後來纔知道，羅易因為將那決議案交給兄弟，大受鮑羅廷的責備，羅易的意思，以為國民黨左派，必當與共產派同其生存，否則必為右派所消滅，故應該將這決議案給左派知道，鮑羅廷的意思，則以為國民黨左派，和共產派不同，他仍然是為國民黨的，見了這決議案，必然和共產黨決裂。責羅易的輕率誤事，中國共產黨多數是幫助鮑羅廷的，遂得羅易驅逐回去，兄弟等知道這個消息，當然更加緊張，於是從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黨部非共產黨的同志，商量和共產黨分離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產的武裝同志，將那決議案宣布，請他們在軍隊中留心防範，聽候中央議決，努力奉行，鮑羅廷聞此消息，不能不走，而中央執行委員會遂於七月十五日議決，在一個月內，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來討論決定分共的問題，在未開會以前，裁制共產黨人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可是，同時



又發布命令，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由此可見中央雖然因為發現共產黨消滅國民黨之陰謀，不得已而與之分離，然其分離，必經過鄭重的手續，且其分離必採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徑，無如七月十六日，中央方纔宣布以上的決議和命令，而同日市上已看見共產黨七月十三日的傳單，宣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惟共產黨員，仍須加入國民黨，不能退出，及至七月二十日，又看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七月十九日的傳單，宣言大意相同，對於國民黨厚誣醜詆，無所不用其極，我們其初還不明白，何以共產黨員退出國民政府後，仍要留在國民黨裏呢，後來看見莫斯科的電報，纔知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裏，爲的是好從中取事，以破壞國民黨，而其所以退出國民政府，爲的是可以明目張胆，做破壞國民革命的工作，所以電報裏頭，要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裏，建立非法的戰鬥機關，其用意至爲明顯，兄弟如今將這兩種宣言，和一個電報也都交給主席，留與各位參考。

中央黨部，看破了共產黨這種陰謀，所以一面訓令國民政府，允准共產黨人一律退出，

一面訓令軍事委員會，通飭國民革命軍各部隊長官，將共產黨人一律撤去，因為國民革命軍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人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沒理由仍然存留在國民革命軍裏頭，要想利用軍隊的地位，以為破壞國民政府的利器，這種一相情願的事，是不可能的，共產黨經此一番嚴密的防範之後，知道計無所施了，只有糾合賀龍葉挺一般黨徒，在南昌發難，以希圖一逞，南昌之變，江西備受荼毒，其流荼毒且及於廣東，國民黨遂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而進於嚴厲的驅共了。

以上便是武漢分共經過之大略。

武漢分共的經過，是很艱苦的，尤其五六月間最爲危險，在河南的軍隊和多一倍的張作霖軍隊打仗，而楊森軍隊又到了新隄，如在廣東來說，好比敵人已到了黃浦，夏斗寅軍隊到了土地塘，即好比敵人到了沙河，而下游又天天要來進攻，四面都受敵人的包圍，共產黨乃乘人之危！德國有一種報紙，譯登蘇俄中央的會議錄，其中有一段是杜落斯基質問史達林何故仍要助武漢國民黨，史達林答道，因為武漢國民黨已在共產黨的掌握中。可見共產黨在當

時的勢焰了。分共的時候武漢同志發表許多文章，兄弟也有一篇，題爲「夾攻中之奮鬥」，說我們雖是孤軍，但不要怕，我們要在四面夾攻中奮鬥，以三民主義，總理給我們的精神去奮鬥，有三民主義 總理的精神擺在我們面前，鼓舞我們奮鬥的！我們分共是與張作霖的討赤，帝國主義的反赤不同，我們是爲國民黨而分共，是爲三民主義而分共的！分共之後不是有青黃不接的現象？不錯，是有的，譬如一個人腹內有病，不能不用剖腹的手術，剖腹之後至少要臥床二三星期才能起來，可是如不割去即死，割去才可以生 國民黨到了五六月間，不能不分共，也和人腹內有病，不能不開割一樣，開割後之暫時虛弱，是必然的現象，是須培補元氣，便能回復健康，所不幸的國民黨於剖腹以後健康未復，便發一場大熱，這個熱症，就是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然而這個熱症，是可以精神來治好的。廣東在四月間已實行分共，武漢則到七月才能分共，然而分共以後，同是害着南京特別委員會這個熱症。我們如今須要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纔能不辜負當時的分共。試想，如果說不要黨紀，如何能以黨治國，如何能以黨治軍，其結果，必致變爲以軍治黨，如此，這一個兵力大的，便去打那一

個，互相爭殺，了無窮期，革命永不能成功。故現在割後的熱症，不能不以全付精神去治好他。今天報告完後，希望大家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在最短時期以內，治好這割後的熱症，即是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大家在黨的主義下黨的紀律下黨的組織下實行三民主義！我們既然能用開割的手段，來肅清共產黨，必然能用肅清共產黨的精神，來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能夠把共產黨肅清，誠然是一部分的必要工作。但須知道消極的肅清工作是不夠的，還要積極的肅清工作，鞏固發達國民黨，便是肅清共產黨之根本方法，我們要在三民主義下，在黨的紀律下，在黨的組織下，把忠實努力的同志，團結起來，担負這些工作，担負救黨救中國的責任。要能夠於肅清共產黨以後，把國民黨破壞的能力，建設的能力，同時發揮出來，才能算為忠實努力的同志，將來應該如何做，現在不及詳說，只看我們的努力做到什麼田地！我們要把精神力量聚集在黨裏，對黨努力工作！各位對於兄弟關於黨的工作，若加以嚴厲的批評，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革命與反革命

邵元冲講演

此書首講革命之意義，發生的原因，目的，及革命運動的種類；繼述孫中山先生革命以前之中國革命運動概況；末述中法戰後孫先生革命運動之概況，其背景，及其主張。

廣 (41)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每册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雜費

編 者 郎 醒 石

印 刷 者 民 智 印 刷 所  
上海福州路三十二號

發 行 者 民 智 書 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二號

分 售 處 民 智 書 局 分 店  
漢口 湖北街漢興里十一號  
武昌 省政府前  
杭州 寶安坊  
廣州 永漢北路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九十一至九十二號

發 (一四二)

## 朱執信文鈔

邵元冲編

這本書是專供青年們讀的，選錄朱執信論文中關於思想和理論方面之較少時代性的編爲這一本，至於長篇和繙譯的文字，或祇關於一人一時一事的，都沒有採入。

定價平裝五角  
洋裝八角

廣 (42)

## 黨化教育概論

王克仁著

現在黨化教育一語，幾乎異口同聲，究竟黨化教育是怎樣一回事，還很少有人作系統的研究。這本書是搜集了孫中山先生的許多意見，確定黨化教育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先說明黨化教育的意義，再述說施行黨化教育的重要目標，再次則討論實施的原則和方法，末更連帶論及和黨化教育相關的諸問題，如教會學校、私立學校等，言簡意賅，論斷明確，關心黨化教育者，宜人手一編。

全一册 定價二角

廣 (61)

## 陸王哲學

張縣周著 一册五角

本書分編陸象山王陽明二人的哲學，極爲情晰。講二家學說的背景，傳授的淵源，興廢的原因。復由客觀上去批評他這種學說的效果。

廣 (43)

## 戀愛之價值

日本米田正太郎著  
衛惠林先生譯

著者是專攻社會學哲學的學者，著述很多。此書從科學上哲學上估定戀愛底價值。提倡「戀愛至上主義」底人們說，「不要對於人類做卑怯的讓步。」這是青年男女所歡迎，而道學先生所頭痛的。但要問戀愛底意義究竟如何？於人生底價值究竟如何？就有回到科學和哲學上，纔能得到回話。 全一册 定價四角

廣 (62)



知